

/ 国 / 外 / 马 / 克 / 思 / 主 / 义 / 与 / 后 / 马 / 克 / 思 / 思 / 潮 / 系 / 列 /

当代



学术棱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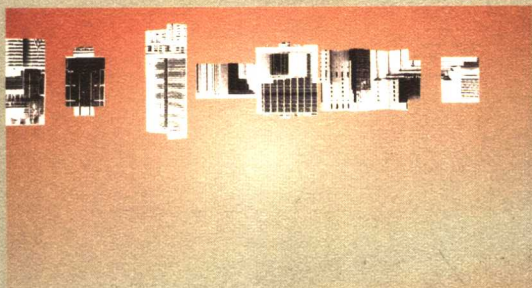
译丛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 宪 周晓虹

# 希望的空间

[美] 大卫·哈维 著

胡大平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一本鼓舞人心的书，行文流畅，插图优美……我希望这本书将有助于改变我们社会生活的道路。”

——Region Studies

“一项较大的学术成就……作者坚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等待着人们去奋斗、去创造，正是这个信念激励着他完成了这项成就。”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研究城市状况的学生应该感激哈维，为严谨且富挑战的治学态度、富有想象的创造力而感谢他。”

——Urban Studies

几个世纪以来，乌托邦运动都试图去构建一个公正的社会。大卫·哈维研究了乌托邦的历史，对它们为什么失败，以及在它们之后还能提供什么样的思想进行了思考。他对现有城市环境的全然描述（巴尔的摩是他研究的个案）推动了他的论点，即：我们能够运用而且必须运用乌托邦想象的威力来对付表示“没有选择”的所有人。他概述了一个新型的乌托邦思想，他称之为“辩证的乌托邦理想”，并使我们再次重新关注这样的可能性方案：设计一个与自然更加平等地工作和生活的世界。他认为，如果任何一个政治意识形态或计划想要发挥作用，那它就必须考虑到我们人类的特性、与生俱来的能力和变化的动力。最后，大卫·哈维在附录中勇敢地勾画出一幅真正的个人乌托邦景象，清晰地阐明了他自己的希望地理学。

大卫·哈维 纽约研究所城市大学著名的人类学教授。他以前曾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地理学和人类学教授，及牛津大学的霍尔福德·麦金德地理学教授。他的著作包括《正义和城市》（1973）、《资本的界限》（1982）、《城市经验》（1989）、《后现代性的状况》（1989）、《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1996）和《资本的空间》（2001）。

责任编辑 蒋桂琴  
装帧设计 赵 秦  
责任校对 夏 娟

ISBN 7-305-04542-X/B · 349

定价：42.00元

ISBN 7-305-04542-X



9 787305 045424 >



南京大学学术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当代学术镜译丛

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系列-

# 希望的空间

[美]大卫·哈维 著

胡大平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望的空间

[美] 大卫·哈维著; 胡大平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7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张一兵主编)

ISBN 7-305-03861-X

I. 希... II. ①大... ②胡... III. 希望的空间 IV. C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7324 号

Spaces of Hope

© David Harvey, 2000

Reprinted 2002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 10-2004-119 号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希望的空间

[美] 大卫·哈维 著  
胡大平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发行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电话 025-83596923 025-83592317 传真 025-83328362

网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信箱 [nupress1@publicl.ptt.js.cn](mailto:nupress1@publicl.ptt.js.cn)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徐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0 字数 348 千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305-04542-X/B·349

定价 42.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销售商联系调换



##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 总 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的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决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示域外学术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 致 谢

本书广泛选取了大量已在很多地方发表(或即将发表)的资料。包括：“阶级力量的地理学”，*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98, 49—74；“质疑全球化”，*Rethinking Marxism*, 8, 1996, 1—17；“作为积累策略的身体”，*Society and Space*, 16, 1998, 401—21；“关于环境正义的思考”，即将出版于 Low, N 主编的 *Global Ethics* 中, Routledge, London；“乌托邦的空间”，即将出版于 Bowers, L., Goldberg, D. 和 Musheny, M. 主编的 *Between Law and Society* 中, Minnesota Press；“马克思主义、比喻和生态政治学”，*Monthly Review*, April 1998, 17—31；“反叛规划的边界”，即将出版于 *Plurimondi* 杂志。我要感谢这些出版物的编辑和介绍人，感谢他们的有益评论。我还从“后现代性的作品：全球空间中的身体”一文中选取了一些材料，这篇文章最初投给了弗吉尼亚大学的“后现代性研究计划”。另外，我还有幸从各种机构中获得了相当大的反馈意见，如在佩鲁贾召开的有关城市替代方案的有影响的研讨会（由 Leonie Sandercock 和 Dino Borri 组织）、巴塞罗那 Tapies 基金会组织的长达一周的讨论会（特别要感谢 Noemi Cohen）、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司法研究中心及俄勒冈大学人文中心的谈话，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无法一一列举。个人、小组和听众对研讨会、会谈、演讲和讨论所作的反应对形成我的思想非常重要，我要感谢参与这一过程的所有人。

当然，有一些人以更加独特的方式给予我帮助。Cindi Katz 和 Neil Smith 的支持是惊人的。很多不同的人促成了（我想常常是不知不觉地）我对某些特别主题的思考。这包括：Jonathan Lange, Bertell Ollman, Peter Gould, Neil Hertz, Bill Leslie, Mark Blyth, Emily Martin, Katherine Verdery, Reds Wolman, Erik Swyngedouw, Andy Merrifield, Melissa Wright, Haripriya Rangan, Jean-Francois Chevrier, Brian Holmes, Masao Miyoshi, 以及霍普金斯大学一群杰出的学生（既有研究生也有本科生），特别是辛苦工作从而使城市和大学中的最低生活工资运动得以直接存在的那些人。我特别要感谢 Mark Damien, 他帮助甄选了本书中的一些插图。我还要感谢爱丁堡大学出版社的 John Dav-



ey,感谢他的编辑智慧和鼓励。我希望他在新的事业中一切顺利。最后要感谢Haydee 和 Delfina,他们总是帮助我确定对生活 and 爱的特别看法,这使得我能够忍受著述中的通常困难。

## 图片致谢

- 图 3.1 这是一幅视图,由 Penny Masuoka 和 William Acevedo 提供,这两人分别工作于 UMBC, NASA 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 和 USGA, NASA Ames Research Center。
- 图 8.17 “理想城市的景象”的复制得到了巴尔的摩 Walters Art Gallery 的许可。
- 图 8.18 承蒙牛津大学 Bodleian 图书馆的同意,从 1518 年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中复制。
- 图 8.23 巴黎柯布西耶基金会 ©DACS 1988 和纽约的“都市生活保险公司档案”。
- 图 8.24 获得了©1999 亚利桑那州斯科特斯德的弗兰克·劳埃德·莱特基金会的许可。
- 图 8.25 “多塞特的庞德伯瑞”的复制承蒙康沃尔公爵领地的同意,由 Mark Fiennes 拍摄。

## 译 序

—

按照哈维自己的解释,《希望的空间》(*Space of Hope*, 2000)的标题与雷蒙德·威廉斯的《希望的资源》(*Resources of Hope*, 1989)相呼应,它代表着与马克思主义直接相关的左派乐观主义理论。这种乐观主义相信,“在历史的这一时刻,我们有一些极为重要的事情需要通过实践一种理论的乐观主义来完成,以便打开被禁锢已久的思想的道路。”<sup>1</sup>而在更深的历史语境中,作为一种知识学立场,这种乐观主义长期与乌托邦想象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例如,这本书的标题便直接类似于埃比尼泽·霍华德的《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 1898),而内容上,它们亦可并入同一种知识传统。后者代表着百年之前通过城市规划对“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的卓越探索,而《希望的空间》同样从空间入手来谋划“每一个作为类成员的人完整地享有尊严和尊重”的可能性。虽然时代背景有着重大差异,但在确切的意义上,这两本书无疑都属于十分引人注目的乌托邦传统,这种传统致力于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批判。

大卫·哈维(Harvey, D. 1935—), 1960年以《关于1800—1900年肯特郡的农业和乡村变迁》一文获博士学位,次年从布里斯托尔开始其教学生涯,其后一直作为职业地理学家在大学任教(20世纪70年代后长期就职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从其全部研究历程来看,他写出一本乌托邦色彩的著作并不难理解。不过,在今天,当我们的社会想象被科技主宰并服务于似乎自主发展的科技以及推动它的资本利润时,哈维以一种出其不意的姿态向早期乌托邦想象的回溯(在本书附录中对那个虚构的“埃迪里亚”的描述),带给我们的可

---

<sup>1</sup> 原书第17页,本书第16页。

能不仅仅是一种意义：震惊？反讽？或两者兼有？

近百年来，由于中国独特的历史，对民族未来的思考始终占据着知识探索的焦点。不过奇特的是，我们的未来想象，很少在严格意义上的乌托邦立场上进行。这可能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较为显著的是，无论是采取追赶型现代化道路（这意味着对西方现代性的直接模仿），还是采取跨越式现代化道路（这意味着对西方现代性的拒斥），乌托邦都是被排斥的，对于前一种道路来说，它是坐着说话——不腰疼，对于后一种道路来说，它是旗杆上挂地雷——空想。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占据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后，“乌托邦”这个术语一直是在贬义上被使用的。这意味着，在我们的学术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谈论乌托邦总是要冒一定的风险。

因此，在我接触这一著作时便产生这一疑问：在今天中国学术界，我们是否需要一本这样的著作？在译文付梓之际，谈谈这一问题，希望不是滥用做译序这种权利。

## 二

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曾经断言：“知识分子”一词乃是一声战斗的号召，它的声音穿透了在各种不同的专业和各种不同的文艺门类之间的森严壁垒，在它们的上空回荡着；这一个词呼唤着“知识者”传统的复兴（或者说，可以说，这一词唤起了对于这一传统的集体记忆），这一“知识者”传统，体现并实践着真理、道德价值和审美判断这三者的统一。<sup>1</sup>当然，在今天，讨论知识分子话题的时候，诚如鲍曼所直接言明的，我们必须首要面对在现实层面上围绕被称为“知识分子”那一类人的多种对立：首先是他们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对立（如工农兵学商），接着是按照分工所设置的学科进行的划分（如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再就是学科内部的因知识立场和政治姿态差异进行排队（如科学主义/人文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等），还存在一系列在理论细节上具有明显差别的小团体（如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等等）。在上述每一个层次上，我们都会遭遇到认知（真理）、伦理（道德价值）和审美判断方面的差异甚至对立。

---

<sup>1</sup> 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



当代,由于社会历史原因,特别是以差异性、异质性和多样性为核心的后现代主张对知识分子所产生的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上述对立更加复杂。不过,社会发展(无论在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层次上)都有其自身的辩证法,当对立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弥合、缝合或综合这些对立便不仅仅作为一种知识难题、价值难题和政治难题而存在,而且往往成为一种实际趋势。

在上述趋势中,以公共文化重建为旨趣的激进乌托邦思想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这个话题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塑造出一群受人敬仰的形象和一种激奋人心的文化,但由于过于苛刻的边缘化策略和拒斥与主流对话的姿态,它不仅没有实现自身对世界进行强制性干预的目标,而且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双重衰落过程中流产了<sup>1</sup>。20世纪90年代,当然与30年前有着重大的历史差异,激进乌托邦的复兴亦因此具有不同的意味。对于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需要专门的讨论。在这里,仅仅指出的是,从整个知识分子文化来看,新的激进冲动已经被纳入总体的“文化转向”背景中,这意味着改造世界的冲动已经演化为改造话语的冲动。由是观之,作为一个知识难题、价值难题和政治难题,弥合、缝合或综合立场,本身是借由知识实现的并且往往局限于知识圈。对于这一现象,下结论似乎尚早。不过,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的焦虑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在一种文化的危机之中,文化理论本身就具有暧昧的特征,它在直接的意义上亦是那种危机的征兆。以詹明信为例,他的言说确实有助于我们理解正在走向崩溃的消费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但由于它并不占据也不能胜任改善既有社会结构或者催生潜在可能社会结构的核心力量,因此其激进姿态在直接意义上能够对知识分子的愤世嫉俗推波助澜,却不能抗拒采取相反综合立场的吉登斯所产生的辩护吸引力。因此,当代激进乌托邦仍然面临着独特的难题。

在全部激进乌托邦思潮中,大卫·哈维是比较醒目的一位,也是容易被误解的一位。说他醒目,关键在于,在人文地理学与激进政治学中间的位置上,如此之久(30多年)地坚持在乌托邦与现实运动之间的接合,以一种显著的方式避免了上述激进乌托邦的核心局限;说他容易被误解,那是因为不仅在理论上,其平实的综合视角,对于激进主义来说可能不够惊世骇俗(如缺乏德里达

---

<sup>1</sup> 在20世纪,激进乌托邦的基本目标无疑是从马克思关于“改造世界”的宣言中演化出来的。但反讽的是,激进批判似乎只能通过解释世界而为世界本身的自我维持提供某种资源,理论总是背弃自己“改造”世界的冲动。这一现实具有理论和实践多方面的原因。但在总体上,这一现实与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双重衰落之间的互动关系亦是一个极为显著的现象。

那样的轰动和詹明信那样的诱惑力),而对于实证主义来说则又难以接受和理解(如缺乏吉登斯和哈贝马斯那样的在不同知识话语之间的协调能力),并且确实也已经发生,如他自己十分看重的《资本的界限》(*the Limits of Capital*, 1982)受冷落,而《后现代性的状况》(*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1989)则因其主题被追捧。

《希望的空间》出版于2000年,这一年被称为千禧年。或许因为过去太多的苦难,这个新纪元的标志激发了全球不同种族和肤色人们的狂欢情绪,从巴黎到北京,从纽约到里约热内卢。由于这本书的标题也谈论“希望”,似乎哈维亦加入了这种狂欢的大合唱,然而,他一开始就谈论“归来的马克思”(本书第一章)。对应于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惊扰,马克思长期被视为现代性理论和知识的一个令人烦恼的幽灵。20世纪90年代苏联和东欧剧变以来,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和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在现实和理论层面上对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做的宣判曾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吸引力,使许多人相信幽灵被驱逐了。在这个时候要求根据《共产党宣言》在理论上重新定位当代的政治斗争,作为一个地理学家,哈维此举似乎有点“另类”。然而,这种“另类”的举动在他全部著述历程中并非第一次。1984年,当左派所称的“里根—撒切尔新自由主义之汉撒同盟”急剧推动全球自由化高潮兴起之际,他提出了“人民地理学”主张。这一次,他只不过再一次以地理学家的身份来谈全球化的潜台词——资本主义不平衡历史地理发展所推动的灾难及其替代方案。

在哈维看来,《共产党宣言》蕴含着丰富的空间(地理学)思想,这些思想能够有效地解释当代世界的历史地理变化特征。在多年研究基础上,在《希望的空间》中,他以不平衡的地理发展作为中轴来分析当代全球化所包含的各种矛盾后果,并且以此作为提出一种更加普遍化替代方案的依据。

暂且不论这个主题如何构成哈维30年教学和研究经历的中心,也不论它如何占据着当前激进左派的理论焦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在前苏东的大规模失败和资本主义在全球的长足发展,在今天谈论对资本主义的替代面临着诸多难题。其中核心问题之一便在于如何定义一种普遍化的理论基础。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人们倾向认为传统的以历史主义为内核的普遍性声张已经失效了。例如齐泽克曾经这样断言,在历史主义理论内部发生的无休止的争论,它们的主题也正是非历史的意识形态封闭性的形式:通过聚焦于本质主义—偶然性这样的简单对应物,聚焦于从一极向另一极的过渡,它混淆

了作为社会的全球结构原则的变化的具体历史性。<sup>1</sup>当然,如果这个评论是中肯的,那么这也不意味着简单地转向偶然性、差异等立场的后现代主义就是合理的。这个问题在当代左派中存在着广泛争论,需要认真讨论。就哈维来说,虽然他并没有直接卷入这种争论,但从其长期的研究路径来看,他面对的确实也是这个普遍性基础问题,只是与传统左派的历史偏好相比,他坚持的是地理视角。例如,他的《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1996)已经给我们提供一种宏大的抱负,通过在话语层面重新解释辩证法来沟通理论与实践、结构与过程、个人与社会,从而为当代激进思想提供一个以空间(城市)为落点的普遍性方案。

在本书中,他深化了自己长期有关资本积累过程的研究,在全球化规模上把身体(body)和政治人(political person)确立为当下普遍诉求的基础,以人的(劳动和生活)尊严的普遍权利为中心来设计乌托邦想象的基础。这一做法,既明显地深化了他在《资本的界限》中发展出来的以使用价值(空间生产、环境变迁)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批判思路,又充分地照顾普遍人权对激进思想的潜在价值,试图从资本生产的过程来解决乌托邦和反托邦双重后果的对立——前者是以开放性和可能性为中心的人类解放前景,后者是以物化和等级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统治现实。<sup>2</sup>与一般的激进批判相比,哈维极大地对那些以最低生活工资、劳动尊严等核心价值为依据展开的现实运动进行了概括,这具有相当大的朴实性;而与那些满足于特殊目标的理论和运动相比,他对辩证乌托邦思想的追求又具有极为明显的理想性。他的中心便在这两者之前进行协调。

与以深刻性、新奇性见长的那部分西方激进思想家相比,哈维的这种综合风格可能并不能立即获得国内学者的认同。因为,与其说他以独特的空间视角提出某种创造性弥合传统分裂的思路,倒不如说他只是以某种顽强的乌托邦冲动来阻止社会的快速堕落与恶化。在这一意义上,其对资本主义进行替代的乌托邦(如“可能的城市世界”)战略选择似乎只是一个地理学家努力改善人类生活状况的冲动。正是在这一点上,虽然其理论视野和政治抱负比19世纪末埃

---

1 朱迪斯·巴特勒等. 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 胡大平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113

2 反托邦,原文是 dystopia,是人们对奥威尔《1984》等小说类型的概括用语,因其意与乌托邦对立,又被称为“反乌托邦”。在哈维的文本中,从空间角度来描述资本积累与阶级斗争态势所共同塑造的多重社会后果时,他亦使用了多个相关空间术语,如源自福柯的“异托邦”(heterotopia),以及表示封闭和排他的“私托邦”(privatopia)等。



比尼泽·霍华德和 20 世纪早期的刘易斯·芒福德等人要开阔<sup>1</sup>，但亦在总体上延续了他们通过理论干预现实促进其渐进改善的知识传统。这使我们看到，在本书的“附录”中，哈维以非常显著的早期乌托邦风格对他称为“埃迪里亚”的未来世界的描述，通过防御性激进姿态迫使人们把自己的眼光从当下的物化中抽拔出来投向可能的未来，从而告别在今天普遍感受到的“恐惧、紧张、焦虑、过度疲劳和无眠的长夜”。这个立场确实能够在绝大多数全球激进知识分子那里读到，但是像哈维这样长期致力于在不同的对立面之间进行调解，既顽强地保留乌托邦冲动，又不仅仅流于理论的批判，亦不多见。

### 三

综观哈维的著述，他占据着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批判的交集，在旨在改进当代人类状况的社会理论运动中，以顽强的乌托邦姿态推动着地理学想象的进展。<sup>2</sup> 但是，这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哈维研究的特征。因为，使哈维在学术界中声名鹊起的，首先是 1969 年的《地理学中的解释》。这本有关地理学科学方法论的著作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地理学实证主义化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甚至被一些评论者视为新地理学的“圣经”。<sup>3</sup> 对于这样一位在英美人文地理学革新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学者来说，他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具有个案的意义。也因此，在介绍、评论以及借鉴的过程中，首先需要阐明他的这种变化。

在哈维的评论者中，人们往往喜欢用“重要的逆转”（significant reversal）来定位这一变化。<sup>4</sup> 这一变化发生在 1973 年，是年，他公开发表《社会正义和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1973），逆转其早期实证主义倾向一跃成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杰出代表。在其后著述中，虽然我们仍然也会看到实证主

1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 1895— ），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社会理论家。1922 年公开出版《乌托邦的故事》，以强烈的人文关怀著称于城市设计领域，并深刻地影响欧美城市规划方向。由于这一点，他被称为支撑着公共思想而不是私人学术的干预性知识分子的代表。其《城市文化》（1938 年）、《城市发展史》（1961 年）、《都市前景》（1968 年）等著作有着广泛的影响。

2 地理学想象（geographical imagination），亦可译为“地理学想象力”。这一术语是哈维的创造，它受到 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想象力”的激发。这一术语既表明一种已经形成的知识传统，又表明由那种传统所蕴含的在总体上把握人类社会生活的理论眼光或知识能力。当然，正如“地理学”这个定语所限制的那样，这种能力本身具有特定的空间视角落点。

3 哈维·地理学中的解释·高泳源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译者前言 vi

4 Peet, R. *Modern Geographical Though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1998. 74

义训练所形成的分析风格,但这种“逆转”或“颠覆”的意义却绝不能低估。因为,它不仅使空间研究溢出严格的地理学科并使之从属于更为宏大的社会理论,更重要的是,它彻底地否定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科学性质。正是这一原因,哈维虽然可以视为一名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学家(他本人亦多次强调这一点),但他的研究确实也不能简单以学科内部的挑衅性姿态来概括,而应与西方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宏大的理论变迁联系在一起。

作为一种人文社会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地理学最初亦是通过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来实现自身的科学化,并为人类地理(空间)设计提供确定性依据。《地理学中的解释》无疑代表了这种取向。但是,正如广义的实证主义社会理论受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启蒙理性批判之釜底抽薪式打击,地理学亦在“传统理论”中走到它的边缘处:试图排除价值的中立科学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由于它顽强地抵抗这种不可能性而实际上倾向于把自身孤立于科学应有之义外。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地理学内部不仅已经出现了对“与社会相关的”(social relevant)地理学主题的研究,而且到70年代,相关性(relevance)甚至被用来衡量地理学家对分析和解决经济、环境和社会问题的贡献程度。这一变迁的实质与霍克海默所主张的从传统理论向批判理论的过渡一致,即从纯粹的逻辑形式走入更为宏大的社会历史实践中。1969年,一份叫做《反对面:激进地理学杂志》(*Antipode: A Radical Journal of Geography*)在美国克拉克大学诞生,这标志着人文地理学之激进传统的形成。在这一地理学转向过程中,哈维起着重要的作用。其《社会正义与城市》的出版,非常明确地把“社会正义”引入并作为地理学研究的重心。这一倾向可以看作对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一文中结论的践履,在那一文献中霍克海默说:“思想家的活动的本质促使它去改变历史并在人们之间建立正义”。<sup>1</sup>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转向中,哈维持续地为其注入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推动并代表着激进地理学向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进一步转向。

当然,实现上述贡献,需要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而这意味着在实证主义方法论方面训练有素的哈维必须脱胎换骨。这一过程是通过艰辛的马克思主义文本阅读来实现的。除了70年代初曾游学巴黎并受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最重要便是从1971年以来持之以恒的《资本论》及其手稿的阅读,这种阅读不仅

<sup>1</sup> 霍克海默. 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 见:曹卫东编. 霍克海默集.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集团,1997. 211

为他游刃有余地以马克思主义姿态介入各个论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同时为他发现和填补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空间研究的“空白”奠定了基础。而他阅读的最重要成果便是1982年出版的《资本的界限》,这本书再次实现一个“惊人的跳跃”(a startling leap)<sup>1</sup>——从空间角度重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这一成果构成了他后来研究的全部出发点和理论基础,因此也是哈维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1985年,哈维同时出版《资本的城市化》(*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1985)和《意识与城市经验》(*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1985)两本书,它们是有关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姊妹篇,它们共同的副标题是: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和理论研究。这两本书于1989年又删节修订成一本《城市经验》(*The Urban Experience*, 1989)。这两部著作所涉及的主题,正是哈维在准备《资本的界限》的过程中所关心的,阅读《资本论》帮助他解决了叙述的逻辑。然而,哈维并非简单地按照自己学术研究的自发路径向前走的,他的这个姊妹篇也是与其他理论的战略对话,在其中哈维自觉地捍卫马克思主义在城市研究中的理论地位。一方面,1981年,两本与空间有关但都包含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论著出版,一本是吉登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另一本是桑德斯的《社会理论和城市问题》。这两本书无疑都主张空间的重要性,但是它们却有意无意地贬低城市或城市化问题在当前的的重要性。前者强调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城市不再是占统治地位的时空容器或者权力容器,民族国家替代它占据了这个位置;后者拒斥“城市化在理论上是一个特殊的分析对象”。更重要的是,它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能胜任空间分析。这种姿态可能影响了另一个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家卡斯特,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他与哈维以及列斐伏尔曾被喻为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三剑客,然而在1983年出版《城市与草根(大众)运动》时,他便公开告别马克思主义了。这一理论氛围显然对哈维构成了压力。另一方面,《资本的界限》出版后,虽然这本书也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但是令哈维不满的是,大多数评论者都忽视其核心贡献是将空间生产和空间构型作为一个积极的要素整合进马克思理论框架的核心(the core of Marxian theorizing)<sup>2</sup>。所以,哈维在这两部著作中,试图通过城市化的历史经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战斗力的。在他看来,城市不是一个物而是一个过程,它并不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因此城市化研究必须关注资本积累过程;劳动力、商品以及货币

1 Harvey, D. Reinventing Geography. In: *New Left Review*. Jul -Aug 2000. 82

2 Harvey, D.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xi

资本的变化流动；生产的空间组织和空间关系的变革；以领土为基础的阶级联盟之间信息和地理的冲突等等问题。正是从这些角度看，地理作为一种景观，它是具有某种特殊空间构型的人工环境的“第二自然”，这种“第二自然”是在资本的控制下生产出来的，因此直接体现了政治权力。

1989年，哈维出版了《后现代性的状况》。这是一本很难以地理学视角来概括的著作，虽然空间的维度（空间的生产及其体验）仍然构成其中心线索。事实上，这本书以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深的历史底蕴把地理学想象植入到社会理论之中，从而为现代性研究提供一种方案。当然，更重要的是，哈维的全部讨论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操作的，他也为马克思主义在现代性这个论域中有所作为展示了一种可能性（不过，与《资本的界限》一样，这个方面仍然被大多数评论者忽视了）。这本书的中心主题是，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体验，其核心在于时空体验，而它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发展之动力，以及文化生产和意识形态上的转变的复杂过程之间重要的中介环节。这一论见是针对后现代主义及其研究的流行腔调而做出的，这种流行腔调在反对元理论、反对宏大叙事、反对本质主义甚至反对实在的口号下主张差异、流动甚至纯粹的个人感觉。对此，詹明信曾经做出反应，强调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sup>1</sup>。詹明信的这一论断激起了巨大的理论反响。不过，詹明信的研究仍然是概括性的，他虽然敏锐而准确地作出了判断，但其政治敏感性和学术的穿透力并没有详细的历史作为支撑。更具体地说，后现代主义文化形成的具体机制和过程在他的研究中并没有展示出来。哈维的《后现代性的状况》，其焦点便落在这里。

如果说《后现代性的状况》以一种宏大的视角重申了《城市经验》的基本论调，那么，由于它的实际影响，哈维将需要进一步夯实他在其中提出但并没有展开的元理论——在理论和实践、空间体验和空间生产之间的协调，并以更积极的姿态介入到当代政治话语的论争中。这一点，也正是他所反复强调的“改造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之马克思主义旨趣。1996年，他出版《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这标志着一种以地理学想象为基础的社会理论的诞生。在这一文献中，他基于话语理论重新定位了理论的功能，设定了以“过程”辩证法为中心的地理学想象的基本结构，在此基础上回答了时空之社会构造的肌理，并探讨了以正义和差异为中心的政治学的可能性和方向。这一文献在直接的意义上为左派马克思主义学者介入全球化论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四年之后，哈维

1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北京：三联书店，1997

出版《希望的空间》时,他所要求的则是在“归来的马克思”(Marx redux)的基础上来探寻对资本主义进行替代的可能性了。

到《希望的空间》,哈维基本上完成了从《社会正义和城市》以来的地理学—社会理论—政治理论的建构。因此,以此来反观他的研究历程时,我们将会有更深的理解。事实上,哈维在2001年出版的《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Space of Capital: an Critical Geography*, 2001)<sup>1</sup>亦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参照。这一著作精选了其1974至2000年公开发表的部分论文(含访谈)。在编排的时候,哈维有意把它们分成两个部分:“地理学知识/政治力量”和“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这两个标题恰当地概括了哈维学术旨趣的两翼: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地理学想象和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批判。这两翼分别代表了哈维理论研究的知识学取向和实践旨趣,而它们则是由马克思主义所维系的。1973年转向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后,在其全部著述中,马克思主义既是主要的方法论资源,又为上述两翼注入了基本的价值目标:促使资本主义向人性化的方向或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转向。正是这个问题,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哈维把地理学(空间视角)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做法对于左派政治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探索具有直接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 四

在理论上评价哈维的贡献及其在汉语境中的潜在价值,肯定会受到不同研究旨趣和专业背景的影响。特别是,在今天所谓后现代氛围中,不同理论立场、学科视角的相互交融产生了不能以传统方式概括的许多特殊论域,如“现代性”、“全球化”、“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等。无疑,对哈维的评价必须围绕前述地理学和马克思主义两个中轴前进,同时必须兼顾他在那些特殊论域的影响。

在总体上,他在“现代性”、“全球化”、“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等论域中主张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想象,为这些论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并成为占据这些论域的一个重要左派旗手。对于地理学来说,他强调:“通过把地理学置于时空之间,并把自己视为时空的历史地理(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space

---

1 Harvey, D. *Space of Capital: an Critical Geograph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

and time) 中的一个积极的参与者,我相信,我们能够更清晰地获得目标的意义,规定一个严肃的知识辩论和研究的舞台,并且在一个深陷混乱的世界里,在知识和政治上做出重要贡献。”<sup>1</sup> 这并非简单地强调地理学必须落实的现实关注目标,这一目标曾在地理学发展过程中被其自身的科学化冲动所压抑。对于哈维来说,正如其《自然、正义和差异地理学》这一文献所展示的那样,当他努力地以地理学作为工具在自然面貌和社会正义之间进行调解时,他实际上也在改写着地理学知识本身,使地理学想象融入宏大的社会理论,并为后者注入重要的资源。因此,作为一个地理学家,他向其他职业地理学家说话的时候,要求把对资本主义的替代作为地理学目标的时候,他所做的亦是改变地理学知识本身。另一方面,他走入马克思主义,也不纯粹是因为它提出了对资本主义革命的目标,他有关“人民的地理学”和“历史的地理的唯物主义”论述,也直指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空间维度的不足,他在理论上努力实现的正是通过《共产党宣言》的地理学或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历史地理学来“升级”(upgrade)历史唯物主义。而这两方面的汇合,不仅展示了空间生产理论如何能够并且必须成为“人性化的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在经验(如对巴尔的摩等城市的实证研究)和理论上发展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研究的视角,把空间研究与日常生活分析结合起来,从而为拒斥后现代、高举马克思主义研究纲领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理论资源。正是这一点使得他在当代全球理论空间中占据着一个独特的位置。作为西方人文地理实证主义传统的叛逆者,他以自己的学术路径提出了实证研究与批判立场之间的沟通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守护者和革新者,他以某种范例指示了今天马克思主义研究拓展的空间和路径,这些问题并不局限于某个学科和论域的内部,而广泛地与今天的知识进步、知识分子定位等重要问题联系在一起。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的高校教师,我对哈维的关注当然受自己的理论背景和专业旨趣限制。几年前,因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研究(最后完成的仅仅是一个个案),在检视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随着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的分裂而增生扩散的多种马克思主义的(或激进的、左派的)理论话语时,哈维引起了我的注意。较之其

---

<sup>1</sup> Harvey, D. Between Space and Time: Reflection on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I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0(3). 1999. 433

他文学或哲学论著,哈维的大部分著述相当清晰和通俗,<sup>1</sup>这对于追求理论深刻的那部分研究者来说,可能多少有些不满足。但是,他在乌托邦理想与理论研究之间不屈不挠的沟通,并且顽强地以开阔和灵活的眼光发展马克思主义论述的冲动,确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通过他的论著,我们清晰地看到,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立场,并不是因为受到马克思主义教义的影响而天生就是反资本主义的刺头,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并没有因为20世纪资本主义的文明化得到根本的改善(并且,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散,无论是在范围还是在深度上都加剧了,这一点绝大多数人都会直接体验到)。因此,问题勿宁说是,人们不甘心“历史的终结”——如果历史真的在此终结,这意味着几乎已经成为全部理论普遍诉求的开放性、多样性和差异性就是一个谎言或一种自欺的安慰剂,在寻求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替代的过程中被迫走向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提出的那些振聋发聩的判断可能在今天面临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也正如今天一些自由主义学者所肯定的那样,《共产党宣言》对世界历史发展基本特征和趋势的描述在全部现代社会研究中至今仍然是最有说服力和最重要的东西。20世纪的历史所造成的反讽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流产了,而他做出这种替代方案的理论根据却越来越被证明是正确的。

在这一背景中,作为一个地理学家,在长期的地理学知识实践中,哈维基于知识与政治(实际上是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自觉理解,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置于地理学知识的元理论地位,将之视为审理不同知识中的政治规划从而更好地发挥知识作为政治规划功能(乌托邦功能)的依据。另一方面,基于“地理学知识在全部形式的政治行动和斗争中占据着中心位置”,<sup>2</sup>承袭由列斐伏尔在20世纪70年代开启的空间生产分析路径,极大地弥补了马克思主义在空间问题上的不足。从最初以城市这个狭义问题作为焦点与实证主义(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竞争,逐步扩大到以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为中心视域全面地描述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最后,以不平衡的地理发展为基础自由地穿梭于不同规模的空间(从微观层次的“身体”到宏观层次的“全球”)与各种后现代主义竞争日常生活

---

1 相对来说,《资本的界限》和《自然、正义和差异地理学》要复杂一些。前者从空间角度对《资本论》的解读,因为涉及空间生产这个问题,可能会给多数读者带来一些阅读的障碍;后者因其综合西方思想史有关相对空间的话语并致力发展一种话语辩证法也会带来一些麻烦。但总体上,较之其他激进左派学者,哈维的可读性是非常明显的。

2 Harvey, D.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 233



的政治规划,主张空间的乌托邦。在这一理论递进过程中,他不仅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空间探索传统,而且试图从元理论层次发展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从而开辟了一种晚期马克思主义的表述。这一点既为我们观察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变迁,同时也在更大的范围内为理解今天全球知识变迁提供了重要的案例。

当然,如果仅仅从上述角度来评论哈维是不够的,这是因为,随着全球化的扩张,他所涉及的主题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越来越成为我们自身必须应对的问题。

历史地看,空间问题不仅内在于马克思的总体论述之中,而且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今天需要直接面对的实践问题。在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环境中,随着以交通、通讯为核心的技术革命,人员、资金、信息在全球规模上的高度流动,生产、技术、资本、劳动力在全球空间的重新布局,阶级、生态、种族、国家以及其他政治主题也发生着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在为解放政治提供新契机的同时,也从空间方面对它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从而直接引发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解放政治学的重新评估要求,例如以生态政治学、生活政治学和差异政治学等为中轴的后现代主义政治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替代要求,<sup>1</sup>再如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转型等等<sup>2</sup>。晚期马克思主义思潮,诚如詹明信、德里克等人的例子,都包括了对上述背景的直接反应,而他们亦都十分重视空间问题的议程。<sup>3</sup>从这一理论动向看,哈维的主题同样值得我们重视。

从当代日常生活(这似乎已经成为流行的学术主题)看,当大多数卷入全球化的人按照资本增殖标准来衡量事业成功与否及生活幸福与否,把自己的未来想象锁定在各种象征财富的曲线上,按照这些曲线提供的标准设计自己的衣食住行环境和方式,并因此承受作为阴暗面宿命般地纠缠着人们的居住生态恶化、能源紧张、劳动强度和心理压力增大、人际关系冷漠、社会冲突加剧、信仰缺

1 这种要求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思潮,分布在不同的学科和论域中。在此,我们只要提及一个代表就行了,这便是以“超越左与右”姿态闻名于全球学术场的吉登斯。

2 这种转型已经引起国际的充分重视,而这种转型用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理论家托马斯·迈尔的概括来说,是从“民主社会主义”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在这里提及这一例子,并非关注其转型本身的意义,而是强调,这种转型见证了当代马克思主义言说的难题。社会民主党的转型,当然是在上述背景中完成的,它亦见证了社会主义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欧洲的挫折(参阅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殷叙彝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 他们对空间问题的关注,不仅仅体现对所谓“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方面,还直接体现在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经验的解释上,例如詹明信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参阅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北京:三联书店,1997),以及对当代激进主义政治的讨论中,如德里克的《地域性想像:全球主义与地域政治》(参阅德里克,《跨国资本时代的后殖民批评》,王宁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失等等代价时,我们亦有必要以新的视角来看待世界、看待世界发展的模式及其未来。在哈维那里,由社会正义切入城市建设,到全球规模空间生产中的资本积累批判,这一学术的递进并不仅仅是分析规模的扩大。事实上,人类对自身生存环境的合理控制始终是其关注的中心,只不过,随着全球化问题的重要性增长,以固定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地理景观的构造问题越来越突出。对他来说,“全球化”这个术语是一个信号,它表明巨大的资本主义的地理重组。与此相对,马克思主义亦必须以“全球化”为焦点整合自身的资源,尤其需要抓住历史机遇,从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的动力角度将空间生产视为一种构造性要素,以此发展解放政治学。<sup>1</sup> 这种政治学不是为哪一部分特定人群的,而是服务全人类生存发展的。在《希望的空间》中,有关“蜜蜂、建筑师和‘类存在物’”的分析,充分展示出他在这一方面的思考。

事实上,在哈维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著述中,由于对辩证法更加自觉的理解,从整体的日常生活出发,他更加灵活地在不同规模的空间之间自由地转换,基于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协调各种局部变化,诸如生活方式、感觉结构、知识形式、社会关联模式和生产模式、社会生态结构、价值和信仰等等,积极推动综合性乌托邦规划。虽然他的许多讨论直接溢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框架,但对于促进人们对今天社会历史状况的认识起着积极的作用。正是因为这一点,有评论者指出,在哈维与列斐伏尔、德塞图(De Certeau)、福柯(Foucault)、吉登斯和索亚(Soja)等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一致性,这种一致不是对景观、空间问题的重视,而是在根本上承认日常生活的必然的空间性,并且努力地解除这一空间所受传统权力的困扰,使之朝向公正、平等、尊严的方向发展。

最后,有必要强调的是,在这个序言中,我们无法一一展开对他的具体观点的分析,而只能按照自己的专业偏好发表一点管窥之见,以供读者参照。我相信读者们会理解这一种做法,当然我亦欢迎其他学者的不同选择。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如果哈维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辩护不是因为忠于一种教条的需要,而是因为当下“市场环境”(詹明信用语)的要求,那么,对于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之中重新激活乌托邦的诉求,这些诉求所产生的种种理论叙事(如“时空压缩”、“弹性积累”、“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学”、“差异地理学”、“可能的城市世界”等),我们同样不能采取概念拜物教的做法,把它们绝对化。

译者

---

<sup>1</sup> Harvey, D.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In: *Rethinking Marxism* Vol. 8, No. 4 (winter 1995). 1—17

#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 已出书目

### \* 媒介文化系列 \*

第二媒介时代 [美] 马克·波斯特 16.80 元

电视与社会 [英] 阿伯克龙比 17.00 元

思想无羁 [美] 保罗·莱文森 24.00 元

### \* 全球文化系列 \*

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

[英] 戴维·莫利 20.00 元

全球化的文化 [美]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三好将夫 20.00 元

全球化与文化 [英] 约翰·汤姆林森 22.00 元

后现代转向 斯蒂芬·贝斯特 道格拉斯·科尔纳著 25.00 元

文化地理学 [英] 迈克·克朗 18.00 元

文化的观念 [英] 特瑞·伊格尔顿 12.00 元

主体的退隐 [德] 彼得·毕尔格 18.00 元

反“日语论” [日] 莲实重彦 16.00 元

### \* 通俗文化系列 \*

解读大众文化 [美] 约翰·菲斯克 16.00 元

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二版) [英] 约翰·斯道雷 16.80 元

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

[美] 阿瑟·阿萨·伯杰 16.00 元

文化民粹主义 [英] 吉姆·麦克盖根 18.00 元

**\* 消费文化系列 \***

消费社会 [法]让·波德里亚 16.00 元

消费文化——20 世纪后期英国男性气质和社会空间

[英]弗兰克·莫特 20.00 元

消费文化 [英]西莉娅·卢瑞 18.00 元

**\* 大师精粹系列 \***

麦克卢汉精粹 [加]埃里克·麦克卢汉 33.60 元

卡尔·曼海姆精粹 [德]卡尔·曼海姆 22.50 元

沃勒斯坦精粹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33.00 元

哈贝马斯精粹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 36.00 元

**\* 社会学系列 \***

孤独的人群 [美]大卫·里斯曼 19.00 元

世界风险社会 [德]乌尔里希·贝克 16.00 元

权力精英 [美]查尔斯·赖特·米尔斯 33.00 元

科学的社会用途——写给科学场的临床社会学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8.00 元

**\* 新学科系列 \***

后殖民理论——语境 实践 政治 [英]巴特·穆尔 20.00 元

趣味社会学 [芬]尤卡·格罗瑞 16.00 元

跨越边界——知识 学科 学科互涉

[美]朱丽·汤普森·克莱恩 26.00 元

**\* 世纪学术论争系列 \***

**“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

艾伦·索卡尔、雅克·德里达、理查德·罗蒂等 22.00 元

沙滩上的房子 [美]诺里塔·克瑞杰 34.00 元

被困的普罗米修斯 [美]诺曼·列维特 38.00 元

**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

[英]巴里·巴恩斯 大卫·布鲁尔 约翰·亨利 18.00 元

**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

[美]安德鲁·皮克林 28.00 元

**爱国斯坦、历史与其他激情——20 世纪末对科学的反叛**

[美]杰拉尔德·霍尔顿 28.00 元

**\* 广松哲学系列 \***

物象化论的构图 [日]广松涉 20.00 元

事的世界观的前哨 [日]广松涉 22.00 元

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日]广松涉 编注 49.80 元

**\* 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思潮系列 \***

图绘意识形态 斯拉沃热·齐泽克 泰奥德·阿多尔诺等 30.00 元

**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美]詹姆斯·奥康纳 40.00 元

景观社会 [法]居伊·德波 38.00 元

希望的空间 [美]大卫·哈维 42.00 元

**\* 经典补遗系列 \***

卢卡奇早期文选 [匈]格奥尔格·卢卡奇 14.00 元

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 [法]雅克·德里达 15.00 元

科学、信仰与社会 [英]迈克尔·波兰尼 17.00 元

黑格尔的幽灵——政治哲学论文集 [ I ]

[法]路易·阿尔都塞 26.00 元

**南京大学出版社发行部**

地址：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南京大学校门东侧)

邮编：210093

电话：(025)83593077 83596923 83592317 83592169

传真：(025)83328362

E-mail: sales@press.nju.edu.cn

nupressl@publicl.ptt.js.cn

# 目 录

##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致谢	1
插图一览表	1
译序	1
导言	1
第1章 一代人制造的差异	3
第一部分 不平衡的地理发展	19
第2章 《共产党宣言》的地理学	21
第3章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40
第4章 当代全球化	52
第5章 不平衡地理发展和普遍权利	70
第二部分 全球空间中的身体和政治人	91
第6章 作为积累策略的身体	93
第7章 身体政治学与争取最低生活工资的斗争	112
第三部分 乌托邦机遇	127
第8章 乌托邦的空间	129
第9章 辩证乌托邦理想	177



第四部分 有关多元替代方案的谈话	193
第10章 建筑师、蜜蜂和“类存在物”	195
第11章 对自然和人类的责任	209
第12章 行动中的反叛建筑师	228
附录:埃迪里亚(Edilia),或者“使它成为你愿意的那样”	249
参考书目	273
索引	280
译后记	289

## 插图一览表

- 图 3.1 1792—1992 年“巴尔的摩”这个地方的变化规模 46
- 图 8.1 放弃城市:巴尔的摩市的住宅 131
- 图 8.2 城市中的施舍处:巴尔的摩市中心“我们每日的面包” 132
- 图 8.3 城市中的贫穷: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阴暗面 133
- 图 8.4 资产阶级乌托邦:郊区的蔓生 136
- 图 8.5 开发商的乌托邦:巴尔的摩的内港恢复 137
- 图 8.6 城市中的公共投资:为富人们建造的体育馆和会议中心 138
- 图 8.7 政府补助和私人收益:海港风景的故事 139
- 图 8.8 城市中的退步乌托邦——作为商品的城市景观 140
- 图 8.9 城市中的退步乌托邦——马里兰科学中心的景观和社会控制 141
- 图 8.10 雅皮乌托邦:巴尔的摩市坎顿行政区内的绅士化和复兴 142
- 图 8.11 给穷人提供新房子 143
- 图 8.12 邻里的复兴:沙城-温切斯特与詹姆斯·劳斯的悖论 144
- 图 8.13 巴尔的摩的非工业化 147
- 图 8.14 临时工 148
- 图 8.15 私托邦:巴尔的摩的门控社区 148
- 图 8.16 城市中的公共投资:为穷人而建的改造机构(门控社区) 150
- 图 8.17 理想城市的景象:来自于巴尔的摩沃特斯艺术画廊 152
- 图 8.18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空间游戏中的一种运用 156
- 图 8.19 为罗伯特·欧文的新哈莫尼而做的设计图 157
- 图 8.20 傅立叶的理想城市 157
- 图 8.21 爱德华·查姆布莱斯:公路城镇 158
- 图 8.22 埃比尼泽·霍华德:从空间理想到新城镇 160
- 图 8.23 柯布西耶的理想城市梦想:理论和实践 161
- 图 8.24 弗兰克·劳埃德·莱特的 Broadacre 城规划 162
- 图 8.25 乌托邦怀旧心理:多塞特的庞德伯瑞 166
- 图 8.26 乌托邦怀旧心理:马里兰州肯特兰兹商业化的新城市生活 167

# 导 言



## 一代人制造的差异

### 1. 归来的马克思

1971 年以来,我每年(只有一年除外)都组织阅读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小组或开设相关课程。尽管人们很有可能将此视为非常平凡的学院做法,但它却让我有机会按照时间序列来收集对这一特殊文本的珍贵反应。

20 世纪 70 年代初,至少就激进的少数派而言,对《资本论》存在着极大的政治热情。读这本书被视为一种政治行为。确实,开设这门课(美国许多其他大学同时也开设了类似的课程)正是试图找到一个理论基础,找到一个方法来理解当时世界各地都存在的混乱和政治腐败(20 世纪 60 年代在美国发生的民权运动和马丁·路德·金被刺引起的城市暴动;对在越南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持续增长的抗议;1968 年震惊世界的大规模学生运动,从巴黎到墨西哥城,从伯克利、柏林到曼谷;“布拉格之春”以及随后苏联的镇压;中东的“七日战争”;芝加哥民主国民大会上发生的戏剧性事件。这里仅列举出这样几个重大事件,它们使我们感到世界正在分崩离析)。

在这些混乱中,人们急切盼望某种政治和思想的指导。即使长期的麦卡锡镇压使马克思的著作在美国被有效禁止了,然而,似乎只有回到马克思才是正确的和恰当的。我们推断,马克思一定说出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否则,他的著作就不会如此长时间地被压制。我们的努力在许多大学遭到冷漠对待就更加证明了这一推断。我尽量掩饰课程的名称,经常将其安排在晚上,对于那些不愿在成绩单上提及这门课的同学,也给他们“独立学习”的学分(后来,我从行政高层中得知,因为这门课开在地理系并被命名为“解读资本(Reading Capital)”,

4 所以他们差不多花了十年的时间才明白我所讲授的正是马克思的《资本论》!')。

《资本论》不是一个容易解读的文本,至少对于外行人来说是这样(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处于这个状态,只有少数老手能够帮上我们的忙——他们大多有着欧洲传统,那里的共产党长期保持活跃状态)。但对于我们这些在大学里的人来说,这一解读上的难题却是一个正常的挑战。

在最初几年,有很多年轻教师和研究生加入我们的行列。他们中有一些人继续下来直至成名(即使是那些已经改变立场的人也会大方地承认这一段经历对于他们的人生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他们来自于各种不同学科(哲学、数学、政治理论、科学史、英语、地理、历史、社会学、经济学……)。回过头来看,当初能有机会与具有不同理论背景和政治观点的人共同研究这一文本,是一件多么荣幸的事啊。我就是这样学习马克思的,通过一个互动的自学过程,几乎不遵循任何特定的学科逻辑,更不用说政党的政治方针。在激进主义者、教师、工联主义者联合起来的社团里,我很快发现自己的教学超越了大学的界限。我甚至有机会去马里兰重犯监狱讲授《资本论》的部分内容(并不很成功)。

在某种程度上,教授本科生存在更多的问题。那时,本科生中激进主义的主旋律是反知识的。对他们而言,学术就是意识形态压抑的中心;任何形式的书本学习自然都被怀疑为教化和统治的工具。很多本科生中的激进分子(当然,他们也是惟一会考虑上这门课的学生)认为,让他们读这样一本冗长晦涩的书是相当不激进的,更不用说去理解和研究了。他们中只有少数人坚持了下来。他们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这个告诫,也没有听到马克思发出的忠告:很多读者“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他们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下去而气馁”。看来,“这些对于急于寻求真理的读者们的告诫与忠告”(Marx, 1976, 104)<sup>2</sup>并没有对这样的听众奏效。他们的直觉和受挫的情感被推向了最高点(必须补充的是,这并不一定是件坏事)。

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资本论》纯粹被当作一门高雅的常规课程来讲

---

1 《资本论》的英译是 *Capital*, 哈维的课程是 *Reading Capital*, 但在课程名称中并没有出现惯常的书名斜体用法, 所以一般人不会将其与《资本论》直接联系起来。——译者注。

2 在本书中, 凡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引文, 我们都尽量采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或《选集》的中文版。——译者注。

授。听课的教师和同学也不再大量地从课堂上消失(以前只有打算与我共事的少数几个人,以及那些把这门课程当作进行更为重要事情之前的“例行公事”的人坐得住)。现在,其他系科大多数的研究生概况课程(survey course)也会分配给马克思一两个星期,安插在其他入中间,如达尔文和韦伯。马克思得到了关注。但在学术界,这种关注要么将马克思置于“无足轻重的后李嘉图(post-Ricardian)”的位置上,要么把他看成是一个过时了的“结构主义者”或“现代主义者”而不予理会。简而言之,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宏大历史叙事的编造者,是某种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历史变革的鼓吹者,而这一变革已经被现实证明,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政治上、实践上都是谬误的。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柏林墙倒塌之前,马克思的确已退出学术和政治的主流。在身份政治以及著名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兴盛的年代里,马克思传统表现为一个重要的消极作用。它在形式上被(不正确地)推举为某种应予以批判的统治意识形态。马克思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被系统地批判,并被指责为对很多更为重要问题缺乏关注,如性别、种族、性、人的欲望、宗教、民族、殖民地统治、环境等等。与阶级力量和阶级运动相比,文化力量和文化运动如果不是更重要就是同等重要,而归根结底,阶级正是各种错综复杂的文化构型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还不能由此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与任何此类的替代公式内在格格不入的思维方式,并因此是一个完全失败的努力,那么所有这些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样的批判有着广泛的基础)。特别是,文化分析取代了政治经济学(无论如何,前者要比专注于阴暗的现实世界、打破资本主义剥削的现实有趣得多)。

接下来,柏林墙倒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被盖棺定论,尽管很多的马克思主义派系长期疏离于实际存在的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很久以前的,如1956年匈牙利革命,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失败更是如此)。1989年后,那些强调马克思还有些有价值的伪称,听起来越来越像一个行将灭亡的恐龙在做最后的祈祷。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成功地驰骋于全球,把所有行将灭亡的恐龙扼杀在它前行的道路上。“马克思话语”(Marx talk)日益被局限于逐渐衰老的“新左派”这种描述中(我自己却决不是渐渐步入“老年人”行列的)。到1990年代早期,马克思理论的知识影响力最终走上了下坡路。

但是,一些本科生仍然继续上《资本论》的课程。对于他们大多数人而言,这已不再是一种政治行为。对于共产主义的恐惧已经基本消散。这门课程的



名声很好。一些学生想弄清马克思主义为何引起如此大的波澜,另一些仍具有激进思想的学生则想从马克思那里得到启发。这样,一些本科生就依照他们的时间表和要求最后选择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而不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或柏拉图的《理想国》。

我从政治和学术兴趣以及对马克思的反应方面对过去和现在所做的这种对比,结果几乎不会出人意外。尽管我所使用的特定镜头不时地夸大、变形,但大多数读者还是会承认其大概要点。

但是,我将要说明的另一个问题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人们很难发现《资本论》第一卷与当时流行的政治问题之间的直接联系。我们需要列宁,使自己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理解在越南发生的那场令人不安的帝国主义战争。我们需要一种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至少如葛兰西提出的那种),让我们从马克思过渡到认识公民权利,我们还需要一种关于国家的理论(如米利班德和普兰查斯所提出的那种),好让我们对国家压迫和为了满足资本积累需要而制造出来的国家福利开支进行批判。我们需要法兰克福学派来理解合法性、技术理性、国家、官僚体制以及环境等问题。

另一方面,还要考虑一下历史—地理状况。在多数发达资本主义世界里,工会运动(相对于我们的激进胃口来说,往往太过改良主义)仍很强大,失业被广泛遏制,到处(除了美国)实行国有化和公有制,并且福利国家的建立已经达到了坚不可摧的地步。世界各地不断兴起的运动威胁着资本主义的存在。在中国,有伟大领袖毛泽东;同时,拉丁美洲的切·格瓦拉、卡斯特罗、非洲的卡布拉、尼雷尔等许多其他杰出的领导人都在为某种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替代方案的可能性积极地努力着。

革命似乎迫在眉睫,我们随后知道,许多当政者们为此感到恐惧(并不只是那些有明显偏执倾向的,如理查德·尼克松)。革命将如何发生,它将导致什么样的社会,这些问题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都远没有谈到(尽管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文本那里获得很多启示)。

7. 总之,我们需要一整套源自《资本论》的理论工具来认识与我们切实相关的政治问题。为了相信马克思的《资本论》与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往往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运动整个历史(或某些杰出的人物,如毛泽东或卡斯特罗)具有信心。但这并不是说文本本身不具有任何魅力——对商品拜物教的思考以及对阶级斗争改变马克思所言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以来世界这一事

实伟大意义的研究,都产生了非凡的洞见。一旦人们习惯了这点,这一文本便会提供独特的消遣性愉悦。然而清清楚楚的事实是,《资本论》与日常生活之间并没有很多直接的联系,它所描绘的资本主义是19世纪原始的、未开化的、最野蛮的状态。

今天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了。这一文本充满了适应解释当今世界的观点。例如,市场拜物教,它使爱护孩子的凯西·李·吉弗德悔恨不已,因为她得知自己通过沃尔玛销售的布料所用的线是由在洪都拉斯仅拿微薄工钱的13岁儿童和在纽约已经数周没有拿到工钱的工资低微的女工们纺织而成。再如,整个裁员的野蛮历史(《纽约时报》上有显著报道)、巴基斯坦的地毯和足球制造业雇佣童工的丑闻(连国际足联都不得不予以关注),以及迈克尔·乔丹因耐克公司而支付的3000万美元律师费,为了反击舆论对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耐克工人所处恶劣条件的相关报道。舆论极力谴责技术变革如何破坏着就业机会、削弱着劳动组织的建设、增加了而不是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和时间(这些正是马克思在“机器和大工业”一章中的中心议题)。这样,问题就归结为一个:近几十年来,劳动力的“产业储备军”(industrial reserve army)是如何依照资本积累的利​​益被生产、维持并日益壮大的? 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前顾问艾伦·巴德曾公开承认,20世纪80年代初的反通货膨胀斗争正是提高失业率并削减工人阶级力量的一个藉口。巴德说:“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被设计出来的正是资本主义危机,它重新创造了劳动力的储备军,并使资本获得前所未有的高利润。”(Brooks, 1992)

现在,所有的这一切很容易把马克思的文本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流连于这门课程中的学生很快便感觉到对自由市场新自由主义世界(World of free-market neoliberalism)无情批判的热度在蔓延。至于他们的期末论文,我给了他们大量《纽约时报》的剪报(毕竟,这是个不错的资源),并建议他们用这些资料写一封信,回答一封家乡的父母、亲戚或朋友的假想来信,信的内容如下:

听说你正在上一门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课。尽管我早有耳闻它既有趣又难懂,但从未亲自读过。但谢天谢地的是,19世纪总算过去。那时的生活是艰难而恐怖的,而我们现在已经达成了共识并建造了一个马克思绝对无法认识的世界……

他们的回信给人启示,并往往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尽管他们不敢把信寄出,却很少有人在上完这门课程之后其思想不为这一与现实切身相关的文本的巨大力量而打动。

那么,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当马克思的《资本论》与日常生活并不具有很多直接的联系时,有很多人在激进的领域里追随它、研究它。但现在,当这一文本与现实切实相关时,关注它的人却寥寥无几。为什么?

## 2. 一代人制造的差异

偶尔接连看了两部电影之后(资本主义视频技术的馈赠),我发现自己在问同样的问题,尽管角度完全不同。我是按照相反的时间顺序观看这两部影片的,我怀疑正因为如此它们才产生了如此强烈的震撼。这两部影片分别是1995年出品的《怒火青春》(*La Haine*)和让-吕克·戈达尔1966年的经典作品《我知道的关于她的二三事》(*Un ou deux choses que je sais d'elle*)。

《怒火青春》记录了三个年轻人生活中的一天。其中两个分别是马格里布和非洲移民的后裔,另外一个有着犹太人的血统。他们的联结来自于在“郊区规划”(60年代为工人设立的公共住房计划)中生成的当代年轻人的生活状况。他们共同面对着一个充满失业、武装镇压、国家独裁、社会崩溃,以及失去了任何归属感和身份感的世界。城市和郊区的动荡不安,再加上90年代法国许多城市里时有发生暴力冲突、当街打劫、抢劫、放火,构成了故事的背景。这一背景还可延伸至1992年洛杉矶罗德尼·金案的判决所引起的暴力事件、80年代末在曼彻斯特、利物浦,甚至像牛津这样一些“体面”的城市突然爆发的青年暴力事件,以及在一些欧洲主要城市发生的暴力事件。

这部电影充满了三个男主人公原始的愤怒、痛苦和强烈的绝望。他们互相之间都是恶言相对,更不用说对待其他人。整部影片难得有片刻的宁静,更不用说反思性的或意味深长的分析(“想得太多”是个可笑的说法)。尽管被愤怒和原始情绪所控制,但他们骨子里却是脆弱的。他们似乎被剥夺了所有的防护,然而,他们仍然拼命寻求着关注、身份和认可,通过能够引起当权者注意的惟一行为——阴险的、往往无法预料的、具有破坏性的挑衅。可供男主角们使用的惟一的权力形式就是一把枪(一位警官丢失的一把配枪,被他们中的一个

发现)。影片惟一相关的实质性问题就是如何以及何时使用这把枪。

影片以其自身的技巧和形式反映了这种具有犯罪倾向的行为,它很少关注细节。影片与它的主题同样地原始、粗糙和不假思索。它也使用了与主题同样的技巧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影片似乎要说,这就是运转中的当代大都市。即使不是完全没有人道,那也是一个艺术贫穷与生活贫困并存的地方。

戈达尔的电影以建筑工地的声音和场面开篇。并且这种画面时常打断片中平静反思的进程——男声旁白(导演)及女演员们讲述她们的生活,并对自己的生活发表看法。这些女人不仅把自己出卖给男人们,还出卖给象征着现代文明的标志(汽车、时尚店、高速公路、郊区公共住房计划、简洁的资本主义家庭生活模式——实际上,影片正是以一个堆满了消费品的城市画面结束的)。城市是处于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空间。它早已打上了非工业化的痕迹,产生了与直接物质再生产的政治经济学相对比的符号政治经济学。问题是:当新的城市世界创造出来时,居住在其中的人们将会怎样?到我们观看《怒火青春》的时候,这个问题的答案无处不在,但在1966年,戈达尔却营造了一种微妙的恐惧感,一种迷失和破碎的感觉。另外,还存在一个强烈的潜台词,暗示着替代的可能性。旁白问道:我们能够重新获得存在的基础(the ABC of existence)吗?

所有的片断拼凑起来就成了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反思,即城市能够并且可能意味着什么(因为“城市”的形象在整个影片中显得很突出)。但是,在由那些似乎遥远的权力代理人——拥有全能规划机构的戴高乐主义政府;与政府合作的、企图依其自身形象重建世界和城市的垄断资本;此外,还有美国的全球化触角,它对莫斯科和北京实施冷战,在越南发动热战,控制媒体,到处安插其权力的标志(TWA, PAN AM...)——所建构的城市生活网络之中,人们似乎无助、被动、受到束缚并分裂。但甚至那样也包含着某种可能性,尽管还不确定。“突然我有了一种感觉,我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我,”在环视巴黎郊区新落成的高层住宅小区未竣工的外表时,异化的朱利艾特如此感慨。

这部电影恰恰处于后来所谓的后现代意识兴起的关键时刻。它提出的问题,我们现在再熟悉不过。语言的界限(维特根斯坦的“我的语言的界限即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被直接引用),“真正”交流的不可能性,失落某种东西的感觉(“但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如实反映事件能力的丧失,“生活就像连环漫画”的感觉,符号、表象、语言肆意地扰乱而非澄清本已让人难以捉摸的现实。影片及其解说词在形象和表象上的清晰与未来的暗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未来

的惟一希望存在于人的精神能力，“占有”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或是“抓住一个稍纵即逝的活下去的理由”。那么，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的梦想由什么构成？朱利艾特的话回答了这一问题（由她的小儿子提出），“我过去经常梦见自己被吸进一个巨大的洞里，但现在我感觉自己正被分解成无数碎片，当我醒来时，我担心其中一块会不见了。”经常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可怕的妄想症现在替换成了与后现代联系在一起的精神分裂症。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思想（长期存在于法国左派中）通过马克思观点的过滤（与阿尔都塞哲学相类似的例子，戈达尔的电影也可算作其远地点），正朝向一种破碎了的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发展。

但这部电影，正如西维尔（Chevrier，1997）指出的，具有一种让人震撼的巨大的美。正如片中女演员平静温柔的美一样，影片用美学力量和智慧来抵御痛苦。在这一点上，它以地下乌托邦来积极抵消其角色的消极性。影片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以此从虚无之中呼唤着未来的可能性。旁白说道：“如果事物重新变得清晰，那只能通过良心的重生”（“良心”一词在法语里有多重含义，包括从外在的到内在的理解）。正是人的精神力量而不是武器的力量把握着通向未来的钥匙。

戈达尔，这位左派先锋电影导演，把法国毛泽东主义（French-Maoism）和阿尔都塞主义两者的提问方式结合起来，并以此通过一种艺术和知识绝活（tour de force）——现在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它帮助左派打开了通向新的激进思想模式的闸门——开创了向后现代主义的过渡。从短期来看，它直接促成了1968年激进运动的发生，但从长期来看，它却导致了功能主义、教条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灭亡。后者被证明不适合于这样一个复杂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世界，也不适合景观与符号的政治经济均在其中扮演了新的重要角色的战后福利国家和日益增长的消费文化。

但是，时代早已发生变化。在戈达尔的影片里作为疑问而悬置的未来城市的问题，在《怒火青春》中完全成形。乌托邦式的渴望已被失业、歧视、绝望和异化所取代，压抑和愤怒随处可见。不存在能够抵御它们的知识或美学的武器，甚至符号也不再具有任何深层意义。城市囚禁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并把他们推向广阔社会的边缘。但这不正是那个相当传统的、甚至粗糙的、（请允许我大胆地说）庸俗的、功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再适合不过的世界吗？如果黑格尔所认为的会对市民社会的稳定造成极大威胁的“贫困的民众”

自发形成一个“危险的阶级”，那将会发生什么？当然，影片并没有对这样的转折作出任何的暗示（尽管法西斯主义的光头仔对于需要斗争的复辟的旧势力作出了回应）。但是，影片所反映出的却与我讲授马克思的经历惊人地吻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戈达尔努力地挣脱马克思教条主义的束缚，同时，他心中又满怀对某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未来的信仰。《怒火青春》记录了某一时间、某一地点中某种政治学的缺席，而这种政治学的某种形式毋庸置疑是适合时代需要的。

### 3. 后现代著作

上文所描述的矛盾与近三十年来发生的一次大规模的话语转向 (discursive shift) 密切相关。这一转向涉及到方方面面，一不小心就会迷失于错综复杂的情况之中。但今天令人吃惊的是，一个近乎神话的信仰占据了统治地位，以相似的方式作用于各个方面，这样的信仰曾经是结构主义、现代主义、工业主义、马克思主义或诸如此类的事物，现在则是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工业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与所有这类神话一样，它很少被如此简单粗劣地谈及。这样做，对于那些原则上否认无限“元叙事 (metanarratives)” 的意义的人来说，会显得格外尴尬。然而，“后”的流行（同时，我们并不能说出所谓的“前”是何物）已经成为当代争论的一个显著特征。捕捉隐秘的现代主义者（如果你是一个尽心尽责的后现代主义者），或捕捉颓废的后现代主义者（如果你恰好支持某种现代主义复兴），成为了学术界一个重要的游戏。

12

神话（我这样称它是为了捕获其诱惑力）盛行的后果之一，便是不可能在这些占统治地位的辩论条件之外讨论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例如，对我近期的作品，尤其是《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最普遍的反应是，对于我如何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融合在一起表示惊奇和怀疑（可参见 Eagleton, 1997）。但是，马克思从未读过索绪尔或列维-斯特劳斯的作品，并且，仅仅依据某些对马克思的结构主义权威解读（主要是阿尔都塞作出的）就判定马克思天生是结构主义者、甚至现代主义的先驱是不足以让人信服的，因为，这些术语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才为人们所理解。那么，基于马克思文本的分析就与我们近来话语史上颇

具诱惑力的神话解读发生了冲突。坦白说,我们近来已经不读马克思(不论他是否相关),因为他的作品被列为“后”的范畴之中。即使我们读他,也只是从我们自认为所处的“后”的角度出发。

现在,从这样的视角来看马克思的全部作品,确实格外有趣。众所周知,马克思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坚定批判者,几乎把毕生的精力都用于“解构”其主要原理。他十分关注语言(话语),并敏锐地意识到话语转向(他在《雾月十八日》中深入分析的那一类)如何承载了独特的政治重担。他深刻地理解知识与“境况(situatedness)”(“地位(positionality)”)之间的关系,虽然他自然最为关心工人阶级的“立场”(standpoint)。我可以一直以这种方式继续下去,然而我的目的并不在于证明在新近的话语史上自认为是创新的大部分东西早已为马克思所预见,而是想指出,对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差异所进行的神话解读妨碍了我们面对身边发生的变化。切断我们与马克思之间的联系,就是切掉我们敏锐的嗅觉以满足现代学术流行的肤浅外表。

带着这样的想法,让我们来关注一下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的话语转向的两个方面:通过“全球化”和“身体”两个术语来捕捉其概况。70年代早期,这两个术语很少或根本没有被当作分析工具。而现在,它们被广泛地使用;甚至可以被视为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比如,70年代中期以前,人们对“全球化”还一无所知,而现在,无数的学术会议围绕这一主题召开,大量的文献从不同的角度讨论这一主题,它还成为媒体评论的热门话题。“全球化”已经成为理解国际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概念之一。并且,它的用途已经远远超越了贸易世界的界限,更多地用于政治、文化、国家身份等问题的讨论。那么,这一概念从何而来?它所描述的内容从本质上来看是全新的吗?

“全球化”第一次为人们熟知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运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用它来宣传其信用卡的使用可遍及全球。随后这一概念便像野火般在金融和贸易刊物中传播开来,主要是为国家解除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作合法性论证。它有助于削弱国家权力对资本流动的管制,使之似乎不可避免,而且还是一个极为有力的政治工具,尤其在使国家和地方的工人运动以及工会权力失去影响的方面(劳动纪律和财政紧缩政策——往往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制执行——成为获得内部稳定和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球化”帮助营造了那种围绕把市场从国家控制下解放出来这个主题的企业家们的乐观主义氛围。简而言之,它成了与不断向全球扩



展的新自由主义的美丽新世界有关的一个核心概念。它使我们觉得仿佛正在迈进一个新时代(偶尔有一点目的论的必然性),因而也成了在政治可能性上区分过去与现在的一整套概念的组成部分。左派越是将这样的说法当成对世界状态的描述(尽管是应该予以批判与反抗的状态),它就越是限制了自身的政治可能性。我们很多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如此不加批判地使用这一概念,允许它替代那些在政治上更加敏感的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概念,这使我们踌躇不前。尤其当这一切越来越成为美国外交政策试图谋取的全部目标的中心时,这只会弱化我们反对全球化政治的力量。惟一残存的政治是关于保存的政治,偶尔进行完全保守的抵抗。

然而,还有另外一个视角,具有同样深刻的意义。名为“地球升起”的NASA卫星图像将地球描述为一个在空间自由浮动的球体。这一观念很快成为一种新意识的象征。但是,球体的几何学属性与地图的二维属性是完全不同的。除了陆地与海洋、云量与植被类型、沙漠与沃土所呈现的那些界线,它没有天然的界限,它也不存在任何特定的中心。人们愈益敏锐地感觉到迄今为止支配着我们认识世界的所有界限与中心都是人造的,这或许并不偶然。有了这一球体的形象作为背景,人们更容易把“无边界的世界”当作写作题材(如1997年Miyoshi所做),并运用一种彻底的非中心的方法来研究文化(中国、印度、南美洲和非洲的大量文化传统看起来顿时与西方文化传统一样地鲜明并具有地理优势)。本已非常容易的环球旅行突然间没有了自然的停靠,空间关系的连续性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修辞学上都成为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这样看来,身体成为一切事物的中心,恰恰是对其他所有事物非中心化的一个回应,非中心化正是由作为人类活动和思考场所的球体形象(而非二维的地图)所提出的。

身体的情况又如何呢?看似情况差不多,实则大不相同。近20年来,对身体的关注达到了极至,“身体”成为所有理论讨论的基础。究其根源,它有着双重的起源。首先,不密切关注“本性-教养(nature-nurture)”问题,就不能回答特别由“第二次女权运动浪潮”所提出的问题,而且,“身体”的地位以及人们对它的理解必然会成为理论争论的关键。同时,社会性别、性、象征秩序的力量以及精神分析的意义等问题也使“身体”重新成为讨论和争论的主体与客体。甚至达到这样一个程度,所有这些都开启了一个新的探究领域,它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概念工具(例如在马克思中所包含的),因此,对于进步的 and 解放的政治学而言(尤其是女权主义和同性恋研究),一种广泛的和崭新的有关身体的理论

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一运动中,确实存在着很多创新的和进步的因素。

另外一种关注身体的动因通常来自于后结构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运动。这些运动导致人们对先前建立的理解世界的全部范畴(例如马克思所提出的)失去信心。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非中心化与球体形象的结合才可能完成其颠覆性的工作。同时,这也激发了向身体的回归,身体成了理解的最根本基础,罗厄(Lowe, 1995, 14)指出:

15

除了其他所有已经被动摇了的所指,仍然存在着一个所指,它的在场不能被否认,那就是身体的所指,即我们每个人活生生的肉体。实际上,这个身体的所指是其他所有所指的所指,因为,最终所有的所指、价值和意义都与描述和满足身体的需要相关。正是因为现在所有其他的所指都变得不稳定,身体的所指,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肉体才作为一个问题显现出来。

在这两个影响广泛的运动的共同作用下,人们开始重新关注身体,身体成为理解的基础,至少在某些领域中(尤其在受到福柯和朱迪斯·巴特勒鼓舞的那些领域中),成为政治抵抗和解放政治学里的特殊场所。

我在后面将对“全球化”和“身体”作更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在这里,我只想评论这两个话语体制在当代学术建构中的定位。“全球化”是当前所有话语中最为宏观的,而从理解社会运作的观点来看,“身体”无疑是最为微观的(就是说,除非我们屈从于还原主义,将社会仅仅看成DNA编码和基因进化的表现形式)。这两种话语体制——全球化和身体——在同一光谱的两极上发挥作用,借助那种光谱,我们从量上理解社会和政治生活。但是,人们很少或根本没有系统性地尝试整合“身体话题”与“全球化话题”。惟一强有力的联系是近年来出现的关于个人权利和人权的讨论(例如,大赦国际组织所做的工作),具体地讲,是妇女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力,以及作为解决全球人口问题手段的生育战略(1994年开罗人口会议和1996年北京妇女大会的主题)。环境主义者也经常做出类似的连接,把个人健康和消费活动与有毒废物的产生、臭氧损耗、全球变暖等全球性问题联系起来。这些例子说明了把这两个看似孤立的话语体制联系起来的潜能与力量。但是,还存在着一个广阔的未开发领域,在那里,这两种话语体制轻而易举地被孤立开来。因此,在本书中,我粗略地拟定了一个方式,

把“全球化”与“身体”彼此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探讨由此产生的政治—知识后果。

我要运用的论述方式基于一种与辩证法相关的概念,这一概念体现在我称为“历史—地理的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之中。在开始讨论之前,我想指出这一方法的一条基本原则以彻底消除那些盛行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教条。这涉及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即知识建构中“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并不认为在我们的思考和论证方式中存在着特殊性或普遍性的选择。16  
 在相关辩证法思维中,它们总是内在于对方并相互牵制。例如,特定时间与地点的具体劳动的特殊性是联系在一起的(孟加拉国的缝纫女工制造了我的衬衫),并且,那种劳动的标准价值只有通过交换、商品化、货币化,当然还有资本的流通和积累的过程,才得以实现。一种劳动力概念是具体的、特殊的,而另一个则是抽象的、“普遍的”(在这个意义上,普遍性是通过在具体过程的概括而获得的)。

显而易见,如果没有世界上千千万万具体劳动的存在,就根本不会有抽象劳动。有趣的是具体劳动的特性在通过全球贸易和相互作用实现以后对抽象劳动量作出反应并将之内在化的方式。从事生产性具体劳动的工人们突然间发现,仅仅因为竞争力量的存在(或者,换句话说,具体的劳动去适应抽象的条件,但同时,抽象劳动的特性又依赖于不同时间地点中具体劳动进程的运作与转变),他们就被解雇、被裁员,在技术上被认为是过了时的,他们被迫去适应新的劳动程序和工作条件。

我用这个例子说明一个一般观点。对身体特殊性的理解不能独立于它所嵌入的社会—生态过程。如果,正如现在很多人所认为的,身体是一种社会构造,那么,对它的理解就一定不能离开围绕它并建构它的那些因素。主要决定因素之一就是劳动过程,全球化描述了这一过程是如何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及与之相关的文化力量的作用下形成的。因此,如果没有对全球化的理解,身体就不能在理论上和经验上被理解。但是,相反地,把全球化归结为最简单的定义,它便是关于亿万个体之间的社会—空间的关系(social-spatial relation)。两种话语之间的基本联系就在这里,但在一般情况下,这两者是相分离的,并对双方是有害的。

近20年来,作为一套话语实践,部分后现代著作已经瓦解并割裂了这些联系。在某种意义上,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明智、重要而有用的战略,用于揭示一

些原本隐蔽的问题(例如,关于性的问题,或是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现在,我们需要把二者重新联系起来,本书即是这种尝试的一个结果。

17 需要指出的最后一点是,近来思想界所谓“文化转向”的一个重要源头在于雷蒙德·威廉斯的著作以及对葛兰西著作的研究(两者对于文化研究运动特别重要。文化研究运动兴起于伯明翰,斯图尔特·霍尔是其最核心的成员)。这一运动的几个奇怪的、出乎意料的结果之一是把葛兰西关于“理论悲观主义与意志乐观主义”的论述转变为人类本质的一个有效法则。我决不是要贬低左派的卓越功绩,他们对1980年以后席卷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新自由主义浪潮进行了抵抗,这在最高意义上显示了意志的乐观主义。然而,行动的最大障碍是,无法提出替代方案以推翻撒切尔的“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本书将不断引用这一句话)的说教。在今天,无法找到替代选择所必需的“理论乐观主义”已成为进步政治的最严重障碍之一。

葛兰西在意大利牢房的恶劣条件下,在重病缠身、几近死亡的情况下,写下了那些著名的篇章。我想应该感谢他认识了这种评论的偶然属性。我们并不在牢房中,那么,我们为什么愿意选择一个来自牢房的隐喻作为我们思想的向导呢?葛兰西(Gramsci, 1978, 213)在入狱之前不也痛苦地抱怨过产生政治被动、理论滞后及对未来持怀疑态度的悲观主义吗?这种悲观主义的情形现在仍然存在。出于对他表现出来的刚毅与政治激情的尊敬,我们不也应该感谢他把“别无选择”转变为理论上的乐观主义,与意志乐观主义一起,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吗?本书以乌托邦的形象结尾,并且与雷蒙德·威廉斯《希望的资源》的题目相呼应,将其命名为《希望的空间》。因为,我相信,在历史的这一时刻,我们有一些极为重要的事情需要通过实践一种理论的乐观主义来完成,以便打开被禁锢已久的思想的道路。

18 事实证明,1998年是此类讨论最为幸运的一年。这一年是那场震动世界的、从墨西哥城到芝加哥、柏林、巴黎的著名运动30周年纪念(通常一代人的跨度)。就局部而言(对我来说),自从马丁·路德·金被刺引起巴尔的摩市暴动(第二年,我从布里斯托尔搬到巴尔的摩),至今已有整整30年。因而,这一年成为探讨我一开始思考的那场世代转折的好时机。同时,1998年也是著名的《共产党宣言》出版150周年。恰巧,也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签署50周年之际。把这些事件联系起来,体会它们的共同含义,这对于反省当前状况是值得做的。虽然马克思对全部有关权利的讨论(将其看成资产阶级的陷阱)都

持深刻的怀疑态度,但是,除了作为人之初的基本权利以外,究竟什么是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权利呢?把《共产党宣言》与《人权宣言》中的带有情感的观点联系起来,我们便会找到一种连接全球化与身体话语的方法。总而言之,我希望这样的努力能够更准确地重新定义这一非常时代向我们开放的政治斗争的术语和空间。



## 第一部分

# 不平衡的地理发展





## 《共产党宣言》的地理学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现在所谓的“全球化”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着——至少可以追溯到 1492 年,要不然就更早。同样,很长时间以来,这一现象及其政治经济影响是人们讨论的主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 1848 年之前的情形作出了热情洋溢而且全面的分析。他们总结,只有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斗争,才能征服资本在世界舞台上的破坏力量,建设一种替代性的政治经济体系,从而在一个更为平等的世界里实现其自身的需要、要求和欲望。

然而,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下那些话的革命时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不过,幸运的是,《宣言》的作者意识到了可能发生的历史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1952,8)在 1872 年德文版的前言中写道,“正如《宣言》中所说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他们评论说,尽管没有权利去改变已经成为重要历史文献的东西,但是,我们有权利并且有义务根据自己所处的历史地理条件对它进行解释并赋予它新的意义。他们问道:“人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72)

当然,对我们这些身处同样令人烦扰却又不是革命性时期的、但仍然坚持社会主义情感的人们来说,《宣言》中的某些段落似乎有些古怪、过时,或者说完全会让人反对。但是,《宣言》的绝大部分是那样深刻、清晰有力,以至其当代相关性令人震惊。

比如说,某些为人熟知的段落依然击中了当代异化和感性的核心,特别是在过去 20 年间它们一直在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时代中发展着。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资产阶级:

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44)

难道这不是极其准确地描述了那些令人震惊的力量吗?这些力量腐蚀了当代教育、政治、社会事务和道德情操,以至于我们几乎别无选择,只能以宗教原教旨主义、神秘主义、个人自恋和自我异化的方式来反抗它们。我们不是经常被包围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吗?再看看这个: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资料,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45—6)

这些段落中的修辞力量、阐述的确定性、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随后在最著名的一个浮士德比喻中,将它比作一个“魔法师,他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条件下释放出来的无边力量的爱恨交织情感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宣言》还警告我们周期性地动摇社会根基的危机的必然性。这些危机具有创造性的破坏,其特点呈现为一种“荒谬性”:无数迫切却又无法满足的社会需要中的生产过剩、充裕之中的极度缺乏、螺旋式上升的不平等、先前创造的生产力——资产阶级试图以此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一个世界——所造成的周期性破坏。我们知道巨大的科技变革完全改变了地球的表面以及我们与自然的关系(“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

23

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魔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人口”[48])。但是,同样是这些表面上看来有魔力的力量却制造了失业,使投资缩减,并对甚至是资产阶级都很珍惜的生活方式造成破坏。那么,资产阶级用什么方法来克服这些危机呢?

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也就是说,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50)

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时时、处处在扩大、在深化。

敏锐的地理学家立即会察觉到这一论点有特定的空间和地理维度。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关于地理转型、“空间定位(spatial fixes)”和不平衡地理发展在资本积累的漫长历史中的作用,《宣言》包含了一个独特的论证。既然《宣言》详细地说明了资产阶级如何既创造又毁灭它自己活动的地理基础(生态的、空间的和文化的)、并按照自己的面貌来创造一个世界,那么对其空间和地理维度进一步详细审查就很值得。这就是我在这里想要集中讨论的主要矛盾,尽管不久就会发现把《宣言》中的任何一个主题与其他主题分隔开来既不可行也不适宜。

## 1. 空间维度

资本积累向来就是一个深刻的地理事件。如果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很早以前就不能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的功能了。不断地转向我在其他地方(Harvey, 1982)称为对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多数明显表现为在一特殊地理范围内的资本过度积累)进行“空间定位”的过程,再加上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形态不平衡地嵌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这样就产生了资本积累的全球历史地理学,我们有必要深刻理解其特点。在今天,这些区别比过去更加重要了,而且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需要去面对和处理《宣言》的优点和缺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把这个问题概念化也同样值得详细审视,因为正是在这里一场欧洲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其代表来自许

多国家——开始联合起来,试图确定一个能够在极为显著的地理和文化差异中实现共同革命议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来研究不平衡地理发展和空间定位问题的方法略微有点矛盾。一方面,城市化、地理转型和“全球化”这些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占据着显著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地理重构的潜在结果往往会迷失于下列这样一种修辞模式中,即最后总是把时间和历史凌驾于空间和地理之上来考虑。

《宣言》的开场白就把讨论定位在欧洲,而且其论题主要陈述的正是那种跨国实体及其工人阶级。这就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即“各国共产党人”(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佛拉芒文、丹麦文和英文一样,都是此文献拟定出版的语言)为了拟定工人阶级的纲领而集会伦敦。所以说,这个文献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而不是国际的。

但是全球背景的重要性并没有被忽视。使资产阶级掌权的革命性变革与“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以及对殖民地、东印度及中国市场的贸易直接相关。从一开始,资产阶级的兴起就与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地理活动及策略密切相关。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了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Marx and Engels, 1952, 42—3)

资产阶级通过这些地理学手段采取迂回战术,从外部破坏、从内部推翻以地方为限(place-bound)的封建势力。通过这些手段,资产阶级还把具有军事、组织和财政力量的国家变成自己野心的执行机构(44)。而且,资产阶级一旦掌权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凭借着内外部的地理转型来继续追求他们自己的革命使命。在内部,大城市的创建和快速的城市化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同时使前者脱离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并迫使农民成为附属的阶级)。城市化使25. 劳动力和生产力在空间集中,把分散的人口和私有财产转变为最终在民族国家法律和军事机构中得到巩固的大规模集中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当交通和通讯系统、劳动的区域分工和城市基础设施成为资本积累的基础时,“自然力”就必

须要服从于人的统治了。

但是随后发生的无产阶级在工厂和城市里的集中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共同利益。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开始建立像工联这样的机构来阐述他们的主张(53—5)。此外,现代通讯系统的发展把“不同地方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斗争”汇合成“不同阶级之间的全国性斗争”。当这个过程穿越边界发展时,工人阶级就失去了“任何民族性”,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必须服从于统一的资本法则(58)。工人阶级斗争的组织以反映资本行为的方式在空间中集中和分散(见下文)。

马克思在一个段落中详述了这一观点,这个段落如此著名,以至于我们很容易把它忽略,而不是以它应该得到的那种关注来阅读和思考:

不断扩大新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46—7)

如果这不是对我们现在所知的“全球化”的令人信服的描述,那么就很难想象“全球化”到底是什么了。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又补充了一些东西:

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

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7）

资产阶级“教化使命”的主题在这里得到了清晰的阐述（虽然带有一丝讽刺的意味）。但这段话也暗示，地理扩张的力量存在着某种界限，它不能无限制永久性地发挥作用。如果资产阶级的地理使命就是在逐步扩大的地理规模上再生产阶级和生产关系，那么资本主义的两种内在矛盾和社会主义革命同样有可能在地理上扩大。阶级斗争变成全球性的，当然，这使得那句著名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成为反对资本主义并支持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

## 2. 空间定位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很突兀地来阐述他们的观点的。事实上他们诉诸了一个长期的分析传统。特别是，他们似乎大大依赖于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解读，从这个文本的灵感中吸收优缺点。

黑格尔（1967，148—52,278）提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于“成熟的”市民社会所固有的严重紧迫的内在矛盾来说是潜在的解决办法。一边是越来越多的财富积累，另一边则是深陷于痛苦和绝望中的“贫穷的下层人民”的形成，这就为社会动荡和阶级斗争创造了条件，这些动荡和战争不是通过任何一种内部变革（如财富从富人向穷人的再分配）就能解决的。市民社会由此被它的“内部辩证法”“所驱动而超出自身范围，并向外部其他民族去寻求消费者，从而寻求必需的生活资料，这些民族或者缺乏它所过度生产的物资，或者在工艺等方面落后于它”。它还必须要发现殖民地，并因此批准它的一部分人口“在新的土地上回复到家庭原则”。它还用这种方法“为其工业提供了一种新的需求和领域”。所有这些都有一种“对利润的极度渴望”所激励，并不可避免地包含风险，所以工业“不再固定在泥块上和有限范围的市民生活上，也不再贪图这种生活的享受和欲望……用以代替这些的是流动性、危险和毁灭等因素”。这明显预示着《宣言》中的某些辞令。

在一些令人吃惊的简短段落中,黑格尔简述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有可能解决不断增强的市民社会的内部矛盾,但他却相当不可思议地中断了这个话题。这使我们仍然不知道资本主义是否能够通过短期或长期地诉诸某种“空间定位”而得以稳定。相反,他却把注意力转向了作为伦理观念的实在的国家概念。可以认为,这暗示了现代国家超越市民社会内部矛盾——一场内部转型——既是可能的又是值得的。但黑格尔却没有解释他认识到的贫穷问题和日益增长的财富两极分化问题如何被克服的。那么,我们是否应该相信帝国主义能够解决这些特殊问题?答案是模棱两可的。正如阿维纳里(Avineri, 1972, 132)所指出的,“这是黑格尔惟一次在他的体系中提出问题——但却没有给予解答”。看起来,似乎只有一种可能性,即资本主义问题的解决方法存在于某个福地或地平线之外的其他空间。

黑格尔到底如何深远地影响了马克思的注意力,这个问题可以无限制地辩论下去。恩格斯自然相信“只有马克思能够承担起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汲取精髓的工作,这个精髓包含了黑格尔的真正发现”(Marx and Engels, 1980, 474)。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以描述资本积累一般法则的语言与黑格尔的非常相似。《法哲学原理》(Hegel, 1967, 150)写道:

当广大群众的生活降到一定水平——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自然然而得到调整的水平——之下……就产生了贱民。而贱民之产生同时使不平均的财富更容易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写道:

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它使贫困积累成为与财富积累相对应的必要条件。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却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799)

这两个文本之间的相似性是惊人的。甚至可以把《资本论》第1卷理解为由许多历史的和具体的证据支持的一场结构严谨的论证,证明黑格尔偶尔提出

28 的命题虽然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或能提供证据的支撑,但却无疑是正确的。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所描绘的内部矛盾不仅不可避免,而且离开了无产阶级革命,将不会有任何的内部解决方案。如果放任自流,不加抑制,那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将衰竭而终,并最终毁掉它自己财富的两个来源——劳动力和土地。这就是马克思不但试图强加给黑格尔哲学而且试图强加给其他每个人的结论。但为了使这种论证更加有力,他还不得不重提某种空间定位的问题——某个其他空间中的乌托邦解决方案——这是黑格尔提出来却并没有给予解答的问题。

这样看来,《资本论》中论证结构的另外一个特征也很有意思。《资本论》第1卷的最后一章中谈到了殖民问题。乍一看,它似乎是一种多余的追述,以补充前一章中对《宣言》的一种修辞性追忆,通过这种追忆宣告,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敲响了。但是从黑格尔的论点来看,本章还具有特殊意义。马克思试图通过资产阶级在殖民地中所鼓吹的政策来说明,资产阶级在资本的起源和本质方面是如何与它自己的神话相矛盾。在资产阶级的描述中(洛克就是典型的一例),资本(一个物)起源于对生产者自己劳动能力的充分运用,劳动力作为商品却是通过那些节俭和勤奋而制造剩余资本的人与那些不这么做的人之间自由缔结的社会契约而产生的。马克思怒吼道:在殖民地中,“这个美丽的幻想破灭了”。只要劳动者能够“为自己而积累——只要他是自己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就能为自己积累——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不可能的”。资本不是自然之物,而是社会关系。它依赖于“毁灭靠劳动挣得的私有财产,换句话说,就是剥夺劳动者”。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种剥夺是“用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马克思引用书籍、诗篇以及萨特伦德公爵夫人的例子来证明他的观点。同样的事实在殖民地的土地政策中也有表述,如威克菲尔德对澳大利亚的评论,在那里,为了给资本主义剥削保存大量的雇用劳动力,私有财产和国家的权利被用来防止劳动者方便地进入自由土地。资产阶级就是这样在它的殖民地计划中被迫承认它在家乡试图掩盖的东西——即雇佣劳动和资本都是以把劳动者从他生产资料的控制中强制性地分离开来为基础的。这就是资本“原始的”或“最初的”积累的秘密。

29 这些事情与黑格尔没有给予答案的问题之间的关系需要进行说明。如果劳动者能够通过移居海外或移往某个边境地区从而回复到真正非异化的生存状态(建立他们的乌托邦),那么资本主义对劳动力供给的控制就遭到了破坏。这样一种扩张的形式也许对劳动是有利的,但却不能为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



提供任何方法。马克思在后来的文本中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更强烈的关注。他首先把两种殖民地类型区别开来：

第一,说的是本来意义上的殖民地,例如美国、澳大利亚等地的殖民地。这里从事农业的大部分殖民者,虽然也从宗主国带来了或多或少的资本,但并不是资本家阶级,他们的生产也不会是资本主义生产。这是在或大或小程度上自己从事劳动的农民,他们主要保证自身的生活……在第二殖民地(种植园)中,一开始就是为了做买卖,为了世界市场而生产,这里就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Marx, 1968, 302—3)

在第一种殖民地中,

资本主义制度到处都碰到这样一种生产者的阻碍,这种生产者是自己劳动条件的所有者,靠自己的劳动使自己变富,而不是使资本家变富。在那里,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在它们的斗争中实际地得到证实。在资本家有宗主国的力量作后盾的地方,资本家就企图用暴力清除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Marx, 1976, 716)

被黑格尔视为至关重要的新兴工业市场和工业领域只有通过重新创造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关系及占用他人劳动的相关权力才能实现。因此,首先,产生劳动异化难题的根本条件重新出现了。马克思有关殖民问题的章节似乎排除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任何外部“空间定位”的可能性。马克思拒不承认殖民化(或通过任何空间定位进行扩展)会最终成为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可行之法,他显然不得不关闭了黑格尔那还有些微敞的大门,并加强了对总体革命的号召。

但是这扇门并不会一直是关闭的。黑格尔的“内部辩证法”在马克思的作品中有着连续的表现,每一次表现时,资本主义矛盾的空间解决这一问题都会被有理有据地重新提出来。有关殖民问题的这一章可能解决了《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惟一关注的生产问题。不过,当马克思要表明生产要求与流通要求

30 相冲突从而产生过度积累危机时,他在第3卷中又怎样做呢?两极分化呈现为这样的形式,“一极是闲置资金另一极是失业人口”(Marx, 1967, 第3卷, 251), 随之的结果就是两者都被贬值了。这些危机的形成可以通过地理扩张和重构加以遏制吗?正如我在其他地方(Harvey, 1982)已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并没有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外贸和外部市场增长、生产资本的输出以及随着其他地区原始积累而产生的无产阶级的扩大等因素会在短期内遏制利润率的下降。但这个短期是多久呢?如果它延续许多代(如罗莎·卢森堡在她的帝国主义理论中所暗示的),那么它对马克思理论及其此时此刻在市民社会中心地带寻求革命变革的相关政治实践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并且,如果工人也寻求他们自己的空间定位,那会怎么样?这样,马克思就不得不面对工人运动中日益增长的一个信念,即通过向外移民而逃到某个福地就是解决其痛苦的方法。马克思在1848年致伊加利亚——富有影响的埃蒂耶拉·卡贝所领导的一个乌托邦派系——的公开信(马林所引用, 1984)中不仅坚持任何新的社会组织基础必须要存在于某地,存在于欧洲,而且认为任何逃到乌托邦王国(不存在的地方——伊加利亚)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他指出,这些移民将“很容易受到其教育中的错误和当今社会的偏见所影响,而这些错误和偏见不能够在伊加利中被根除”。内在的分歧很容易被敌对的、异己的外部力量所利用。而且,因为劳动分工和环境条件的根本改变而落在工人身上的负担将需要一定程度的热情和献身精神,而这些热情和献身精神必定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马克思继续敏锐地评论道,“如果不具有绝对排外和宗派的性质,几十万人不可能建立并维持一种公有的生活环境”。当然,最后证实这正是导致美国伊加利亚移民失败的难题(参见Johnson, 1974),因此马克思的结论就有了一些可信度:

对于认识到个人自由原则的共产主义者——自然也包括伊加利人——来说,如果没有一个过渡期,即个人财产慢慢地变成社会财产的一个民主过渡,一个公有财产的共同体就像不播种就收获一样是不可能的。(Marin, 1984, 273—9)

对于工人来说,乌托邦的渴望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并不存在着任何实际的途径使空间定位为他们服务多过为资本服务。

### 3. 《共产党宣言》地理学的批评性重构<sup>1</sup>

《共产党宣言》中的地理因素在后来的评论中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当它成为关注的焦点时,又常常被认为在政治行动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当我们回顾这种观点时,它暗示一个双重回应。首先,有必要承认(如《宣言》明确指出的),无论是历史还是今天,地理的重新安排和重构、空间策略和地理政治因素、不平衡地理发展等,都是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动态的关键方面;同样有必要承认(以《宣言》所采用的轻描淡写的方式)阶级斗争在高度多样化的地形中以不同方式展开,承认推动社会主义运动必须要考虑到地理事实和地缘政治的多种可能。

但其次,为了更加复杂地、更加精确地、更加在政治上有益地理解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的地理维度如何在维护资产阶级权力的永久性和对工人权利及欲望的抑制方面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这样一种根本性的作用,批评性地重构《宣言》中实际的描述(“概括”也许更为恰当)就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了。

在下文中,我在很大程度上会把第一个回应当作是一种“假定”,尽管我非常明白它需要在运动中反复重申,那些运动无论怎么看也没有采纳它的某些基本含意,更不用说其全部的基本含意了。虽然列斐伏尔(LeFebvre, 1976)也许有一点夸张,但我认为还是值得回顾一下他的某个评论,即资本主义通过惟一的方式——“通过占据空间,通过生产空间”——而在20世纪得以幸存。如果到21世纪末的时候还说这样的话,那就确实是讽刺了!

所以,在此我主要关注对《宣言》中实际描述的东西进行批评性评价。我主要从自己时代的立场而不是1848年的角度来进行(虽然,正如我偶尔指出的,即使就其时代观点来说,《宣言》也存在着一些需要商榷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我将试图把涉及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的时空发展论据从它的黑格尔基础中分离开来。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我将提炼出《宣言》地理学的7个方面予以

<sup>1</sup> 原标题是“Problematizing the *Manifesto's* geography”,其中 problematize 很难找到一个简单的与之对应的汉语词组。它带有质疑之意,但又不是在否定立场上进行的。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哈维一直强调马克思提出了某种有关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理论、资本积累的地理学,但在概念和理论结构上并不清晰。因此,重构这些空间理论或地理学也就成了哈维本人的中心任务之一。problematize 正是批评并加以重构的一种理论活动。——译者注。

评论。

32 1. 把世界分成“文明的”和“野蛮的”民族,这种行为如果不是完全令人讨厌的,至少可以说是不合时代的,即使它可以拿那些时代的特性做托辞。而且,与之相伴的资本积累的中心—外围普遍模式,从好的方面来讲是过分简单,而从坏的方面来讲则是误导。似乎集中于一个地方(英国或欧洲)的资本向外扩散,从而包围了世界的其余地方。这个想法看来似乎源自对黑格尔目的论的不加批判的接受——如果充分考虑到空间,那它则是作为目的论历史过程的被动接受者,这个过程从中心开始,向外流动,从而充满整个全球。资本主义诞生于何处、它是否形成于惟一一个地方、或者它是否同时出现于各种不同的地理环境中,所有这些问题是学者们辩论的舞台,至今还无迹象显示会达成一致意见(参见 Blaut, 1977; 1993)撇开这些不说,随后的资本主义发展——至少到 18 世纪末,在欧洲,特别是在英国集中了它最自由的发展形式——还不能被这样一种传播论的思维方式所包括。虽然有一些例子证明资本从中心向外围扩散(比如 19 世纪晚期剩余资本从欧洲输出到阿根廷或澳大利亚),但这种描述与日本明治维新后发生的情况并不一致,也与今天韩国和中国相继实行某种内在化的原始积累形式并使自己的劳动力和产品介入到全球市场中时所发生的情况不相符。

资本积累的地理学应该比《宣言》中所提供的传播论概述更值得认真关注。问题不在于描述本身的粗略性,而在于它未能描绘出不平衡地理发展(常常伴随着不平衡的原始积累)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将有助于我们绘制欧洲直至全球范围内工人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的动力。马克思在以后的作品中部分地纠正了这个问题。在《宣言》中至少有一丝线索暗示,应该更加辩证地解读资本在占有和掠夺全球财富的商业活动中的起源。

33 更加完整地、理论化地理解资本主义发展中空间/地方的辩证法也将十分有益。位置、区域、疆域如何随着变化了的空间关系而演进?例如,民族国家间(或其他领土单位间)权力的地缘政治游戏在不断变化的空间关系结构中与市场地位相互连接,这个空间关系结构反过来又因为资本主义的积累而优先考虑特定区域和领土。注意到那些不能够顺利运用空间力量来战胜封建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如何以法西斯主义而告终(相关的例子包括 20 世纪的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也是很有趣的。因为这些还都是相当抽象的论点,所以我将在下文中尽力充实它们。

首先,地球从来就不是资本积累可以在其中纵横驰骋的一个水平运动场,它曾经并且还将继续是一个高度多样化的表面,包含着生态、政治、社会及文化的千差万别。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资本流找到一些比其他地方更容易占据的地域。在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遭遇中,一些社会形态适时地进行调整使自己积极地介入到资本主义市场交换的形式中,而其他形态则没有这样做,其原因多种多样,但后果却非常重要。虽然是由与市场网络的接触而推动的,这种市场网络日益将全球绑在一起形成一个经济联合体,但就某个非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而言,原始或“最初”的积累能够而且已经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发生,即使其结果是全球性的,但是原始积累如何发生、在何处发生则取决于当地的条件。例如,现在在日本有一个普遍的信念,即1960年以后日本商业成功部分地归功于它的非竞争性以及革命后的中国所持的闭关姿态,而当今中国力量介入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这对反对食利性经济的、作为制造商的日本来说则意味着厄运。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经常会运用这种偶然性而非目的论。此外,资本积累的全球性提出了分散的资产阶级权力(以及与非资本主义统治精英的复杂关系和联盟)这个问题,恰恰由于它的多重地点性,这个问题在地缘政治学上将会更加难以处理。马克思本人后来很担心这个政治可能性。1858年他在梅扎罗斯(Mezaros, 1995)非常重视的一个段落中写道:

对于我们来说,棘手的问题在于:欧洲大陆上的革命马上就要来临,它立即会呈现出社会主义的特点;**在这个世界的小角落中,它未必不会被镇压,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在更广大的地带仍然居优势地位。**(XII)

反省一下世界范围内居优势地位的资产阶级权力的地缘政治策略所成功包围和镇压的社会主义革命数目是具有警示作用的。

2.《宣言》正确地强调了通过交通和通讯的创新和投资来减少空间障碍对维持和发展资产阶级权力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一主张指出,这是一个正在形成的而非已经完成的过程。在这方面,《宣言》极有远见。正如马克思后来强调的,“通过时间消灭空间”深深地嵌入在资本积累的逻辑中,并伴随着空间关系中虽然常显粗糙但却持续的转型,这些转型刻画了资产阶级时代(从收费公路到铁路、公路、空中旅行,直至赛伯空间)的历史地理特征。这些转型削弱空间的绝对性(常常与封建主义相联系),强调空间关系和地方优势的相对性,并因此使李嘉

图关于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学成为一个高度动态的而非稳定的事件。此外,商品流的空间轨迹必须要从资本流、劳动力、军事优势、技术转让、信息流等方面来绘制。在这方面,《宣言》并非错误,而是其先见之明未得到正确评价。

3. 《宣言》最缺乏的方面之一也许就是没有关注世界领土组织,特别是资本主义的领土组织。比如说,如果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的一个执行机构”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国家就必须从领土上加以确定、组织并管理。《宣言》的概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但却太过简略。财产的集中和资产阶级政治优势的兴起“把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统一的边界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Marx and Engels, 1952, 48)。

虽然主权独立国家共存的权利在1648年《斯特特伐利亚和约》中就作为欧洲一个(特别不稳定的)规范而确定了,但是正如民族国家形态的内部过程一样,这个原则在全球经过了好几个世纪才完全普及。1848年,“统一起来(lumping together)”在德国和意大利还没有发生。在世界绝大多数的其余地方,这个原则直到现在还没有实现。19世纪是领土定义的伟大时期(多数的世界边界线是在1870年和1925年之间确立的,而且这其中的大多数还是由英国和法国单方面绘制的——1885年对非洲的瓜分就是最惊人的例子)。但是国家形成和巩固又是领土定义以外的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事实证明它是一个长期扩展的且常常不稳定的事态(特别是在非洲)。只是在1945年以后,非殖民化运动才推动全世界的国家形态有些接近《宣言》中设想的高度单一化模式。

35. 此外,交通和通讯的变革以及阶级斗争的不平衡发展和天然资源的不平衡分布造成了某种相对性,这意味着领土构型(territorial configuration)不能保持长期稳定。商品流、资本流、劳动力流及信息流总是会使得边界变得可以渗透。偶然性在此起着极大的作用(包括领土重组和再定义的阶段),从而破坏了任何一种简单的目的论解释(这类解释来自于黑格尔,仍然可以在有关未来必然会是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观念中找到)。

4. 当然,国家只是对积累和阶级斗争动力产生影响的众多调节机构中的一个。货币和金融必须也要被赋予首要的地位。在这方面,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宣言》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我猜想,部分原因在于作者对货币、生产、商品交换、分配和生产尚未形成根本性的洞见(这些在《57—58手稿》导言中才概念化)。但同样也可能是作者当时面对两种主要的激进思想派系时充满了矛

盾,这两种激进思想派系分别是圣西门主义者的激进思想,他们视资本联合和信用集中为一种解决方法,与之相对的是强调分权管理和信用合作社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如蒲鲁东),这种思想对手工业者和小商品生产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待此事(这里我把货币和信用的问题看作既是象征性的又是根本性的)。一方面,我们可以把世界货币解释成某种价值的普遍代表,不仅领土与之相关(通过它们自己的货币),而且资本主义生产者在衡量他们的业绩和利润率时需要遵守。这正是一种功能主义的、非辩证法的观点。这种观点使价值看起来像某种飘忽不定的抽象观念一样盘旋在个人和国家的行为之上(顺便说一句,这是当代新古典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中起作用的、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世界货币,作为一种价值代表,它产生于物质行为特殊性(具体劳动)与价值普遍性(抽象劳动)之间的辩证关系,前者发生于特定的地点和时间,后者完成于商品交换变得如此广泛和普遍以至于成为一种正常的社会行为时。但各种机构在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起着调停作用从而使那些原本会成为流砂的东西在表面上获得秩序和永恒。于是,中央银行、金融机构、交换体系、国家支持的本国货币等等就成了世界市场上货币的普遍性与眼下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具体劳动的特殊性之间的强大调节者。这样的调节机构同样会经历变化,例如,当权力在日元、马克和美元之间变动,或者当新机构(如1945年以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涌现出来承担新的调节作用时。

36

这里的问题是,局部的和特殊的条件与在世界市场上实现的价值普遍性之间的关系总是悬而未决的,并且这种内部关系由本身就获得某种独立力量的制度结构所调停。这些调停机构常常以领土为基础,并在重要方面具有偏见。它们对决定某些具体劳动和阶级关系发生于何处起着重要作用,有时甚至能够通过指挥资本聚积和资本流动来控制不平衡地理发展的模式。考虑到19世纪40年代全欧洲银行业和金融业的重要性(路特希尔德家族在1848年革命中是突出的代表)及圣西门主义者关于联合资本的力量可以改变世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尽管《宣言》中关键的政治提议之一就是“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中”(75),但缺乏对货币和金融的调停机构进行分析也让人吃惊。后来的一些陈述(不仅马克思,而且列宁、希法亭和其他许多人都对此作了说明——参见Harvey[1982]的概括)也许有助于详细阐述这些事情,但《宣言》则是偶尔提及金融和货币资本在组织资本积累的地理动

力方面的作用,这可能就是其不经意的、令人遗憾的遗产之一(在希法亭 1910 年的指导性著作和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对这个主题的著述)。

5. 坚持认为资产阶级革命使农村屈从于城市,认为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为更加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政治奠定了基础,这个主张非常重要。归根结底,这个主张强调,对阶级斗争来说,空间组织的生产不是中立的。不管我们对《宣言》关于这些动态的概括如何挑剔,那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具体的陈述如下:

37

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最初是单个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在这个阶段上,工人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工人的大规模集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因此工人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工联)……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阶级斗争。(54—5)

这个描述把握了 19 世纪大多数时期阶级斗争发展的共同道路。在 20 世纪还有大量的例子,可以从中发现类似的道路(韩国的工业化就是一个范例)。但是说它是一个有用的描述性概括是一回事,而认为它是实现社会主义过程中阶级斗争所必经的阶段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而且,如果像我建议的那样把它理解为对空间组织在阶级斗争中的非中立性的令人信服的陈述,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即面对明显威胁其存在的阶级力量的兴起时,资产阶级也可以发展它自己的空间策略:分散、分而治之、在地理上瓦解它们。除了上面引用的段落,我们还发现了另外的警示性陈述:“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



到破坏”(55)。有大量的例子可以反映资产阶级如何运用这些策略来达到那种效果。从19世纪晚期美国城市中的制造业由中心向郊区分散以避免无产阶级力量的集中,到当前凭借生产过程在空间的分散和分裂来对付联合力量(自然,这大多数是对所谓发展中国家而言的,那里的工人阶级组织最为薄弱),这已经被证明是资产者努力增强自身力量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不同空间的工人竞争增强了资本主义优势,更不用说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二国际的立场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大体上,我认为这样说是公正的:工人运动比较擅长于指挥场所和领土而不是控制空间性,其结果就是资产阶级运用它的空间花招的优势力量打败了以地方为限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比较上文引用的马克思1858年的担忧)。最近通过“全球化”对工人阶级的力量形式在地理上和意识形态上形成威胁就非常有力地证明了这一论点(见第3章)。虽然这一切并非与《宣言》的基本观点相背离,但是它当然不同于《宣言》对阶级斗争动态的实际概述,那一概述为1848年欧洲背景下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阶段模式。

6. 贯穿《宣言》的一般假设是,革命行动的关键在于因迅速城市化而产生的工业无产者。但是,即使在当时,忽视乡村、农业和以农民为基础的运动的革命潜能看起来肯定也不成熟(托尔普德尔蒙难者都是农业劳动者,他们竭尽全力试图在多塞特形成一个联盟,结果还是被放逐到澳大利亚;法国乡村的许多地方在1848年充满了法国大革命时期使他们成为主要斗士的相同的革命情感)。不要说由小商品生产者、种植园工人和其他农业劳动者所发动的斗争,就是随后相当长的农民斗争和游击战争史就已使人们对《宣言》在何处能够发现革命作用(和反作用)潜能的主要假设提出质疑。

7. 这就把我们带向了《宣言》的遗产中最成问题的要素之一:“无产者(working man)”和“劳动力(labor power)”在高度多样化的地理领域内的同质化是反对资本权力的恰当基础。虽然“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经过适当修改以消除它的性别预设<sup>1</sup>)仍然是对资本积累全球化策略的惟一相称的反应,但是实现那个反应并使之概念化的方式仍然需要严格审查。这一主张的中心思想在于,相信由资本家所强加的大工业和雇佣劳动(英国的情况与法国的情况相同,美国的情况与德国的情况相同)剥夺了工人阶级的“全部民族性”。结果

1 Working man 含有男性工人的含义,故有性别预设之说。在本书中,我们没有按照英文把 working man 译为“工人”,而是按《共产党宣言》标准中译译成“无产者”。下一章亦同。——译者注。

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71—2)

这个指导性观点非常著名,但这里无疑有许多如意算盘。充其量,《宣言》只是勉强承认,社会主义者开始掌权后最初采取的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它还指出政治主张在从一种环境转换到另一环境的过程中,会产生怎样的难题——德国采用了法国的主张,并稍作改变以适应他们自己的、并没有得到很好发展的环境,因而就产生了马克思所严厉批判的德国式的社会主义(82—3)。于是,在实际的政治世界中就存在着对不平衡的物质条件和当地环境的某种敏感。《宣言》最后部分(94—6)关注了法国、瑞士、波兰和德国的不同的政治情形,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其中推测出,共产主义的任务就是统一这些不同的事业,在差异中确定共同性,并进行一项全世界无产者在其中联合起来的运动。但是要这样做就必须严重地依赖资本的力量,这种力量根除并摧毁了以地方为限的地域忠诚和纽带。

我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当代条件。一方面,《宣言》坚持——在我看来是正确的——抵抗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惟一方法就是通过一场全球性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步步地由地方到国家再到全球所完成的全球工人阶级的形态会获得充足的力量和在场来实现自己的历史潜力。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地、不计成败地去集合各种高度分化的、常常是地方性的运动,使它们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比较 Moody, 1997; Herod, 1997, 1998)。第二种解读方法就比较有点机械化了。它认为,由于资产阶级的发展、工人阶级人口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抱负和运动的非地方化和非国家化,国家差

异和分化会自动消失。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就是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终结做准备,并加速它的进程;教育工人阶级认清自己处境的真正性质,并在此基础上组织他们的革命潜能从而建立一种替代方案。这样一种机械论解读在我看来是不正确的,即使能在《宣言》中找到实质性依据。

主要困难在于假定资本主义的工业和商品化会导致就业人口的同质化。当然,也存在一种不可否认的认为它是正确的见解,但那种见解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同时进行的分化工人的方式,它有时会依靠古老的文化特性、性别关系、种族偏爱和宗教信仰。资本主义不仅通过资产阶级明显的分而治之的策略发展,而且还通过把市场选择的原则转变为集团划分的机制来实现这个目的。其结果就是在资本主义的地理景观中植入了形形色色的阶级、性别和其他的社会划分。诸如城市和郊区之间、区域之间及国家之间的各种划分都不能被认为是某个旧秩序的残余,它们不会自动消失。它们是通过资本积累和市场结构的分化力量而主动制造出来的。通过阶级斗争的机制以及自为的资本和雇佣劳动机构,以地方为限的忠诚扩散了,并在某些方面得到了加强而不是瓦解。阶级斗争实在太容易分化成一系列地理上分裂的社群利益,太容易被资产阶级权力所左右或是被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渗透机制所利用。

《宣言》对资本力量存在着一种具有潜在危险的低估,在通过雇佣劳动和市场交换而实现的全面同质化中,资本具有粉碎、分割及区分的能力,吸收、改造甚至恶化古老文化差异的能力,制造空间差异、进行地缘政治动员的能力。而且同样还存在着一种对劳动力动员方式的低估,劳动力通过领土组织形式动员起来,并在动员的过程中建立以地方为限的忠诚。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法尚不能够以《宣言》的概述所暗示的方式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如果说它能够做到),即使其团结起来的基本逻辑和指令是正确的。

##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即使《共产党宣言》把征服国家权力作为主要政治目标，不过，其论证的地理学逻辑仍然指向了一个更加重大的目标，该目标在《宣言》最后的号召中表达出来，它鼓舞全世界无产者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联合起来。20 世纪下半叶全球工人阶级形态的状况表明这样一个号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要。

世界银行(1995)估计 1966 至 1995 年之间全球劳动力数量翻了一番。到 1995 年，大约 25 亿男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并因此被各种雇佣劳动条件所奴役。大多数雇佣劳动力生活在最骇人的环境之中。世界银行报告接着说：

有 10 亿多人每天的生活标准是 1 美元或低于 1 美元……依靠相当低的辛苦劳动的报酬生活。许多国家，工人们没有代表权，在有损健康的、危险的、屈辱的环境中工作。同时，全世界还有 1.2 亿左右的人口没有工作，数百万人已不再抱有找到工作的希望。

(1-2)

这种情况存在于工人平均生产力水平(据报道，自从 1965 年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就已经翻番了)及世界贸易迅速发展的时期，后者的发展不仅得益于运作成本的减少，而且还得益于贸易自由化的高涨和国际直接投资浪潮的急剧增加。后者有助于建立主要通过公司内部贸易而组织的跨国一体化的生产体系。结果，正如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1996)的一份报告所陈述的：

进出口竞争产业中所雇用的工人数目有相当大的增长。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力市场正变得越来越休戚

相关……一些观察家从这些发展中看到了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出现，在其中，“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集市，各个国家竞相叫卖他们的劳动力，为了做成生意而叫出最低的价钱”……主要的担心就是，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将会对世界范围内的已经很低的工资和劳动标准产生压力。(4)

这个愈益紧密的相互连接过程“由于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诸如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越来越多地参与世界经济”而强化(4)。比如说，就中国而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报告说：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份额在全部出口中从1975年的36%上升到了1990年的74%……在1985年和1993年期间纺织行业的就业率提高了20%，服装和纤维制品中提高了43%，塑料制品中提高了51%。中国现在是为许多工业国提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出口商……虽然有着动态的就业增长机会，但中国仍然面临一个可怕的就业挑战。经济改革已经释放了约8千万的“流动人口”，其中绝大多数都正在寻找工作机会。国家计划委员会预测，在下一个5年中会有约2千万的工人失去国营企业中的工作，1.2亿多人离开农村希望在城市找到工作。如果所有这些人想要找到工作的话，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增长就需要以一种飞快的速度持续下去。(94)

我引用这个例子是要说明已经并正在发生的全球劳动力的巨大变化。而且在这方面中国并不是惟一的。孟加拉国出口导向型的服装业在20年前几乎不能生存下去，但它现在雇用了100多万的工人(80%是女工，其中有一半聚集在达卡)。正如西布鲁克(Seabrook, 1996)报道的，像雅加达、曼谷和孟买这样的城市已经成为跨国工人阶级——严重地依赖于女工——形成的圣地，这些工人生活在贫穷、暴力、长期的环境退化和强烈的压抑条件之中。

这群无产阶级化的大众卷入全球贸易网络是与广泛的社会动乱和剧变(参见穆迪于1997所提供的一些优秀的文献)以及正在发生变化的结构状况相联系的，对此几乎不用感到惊讶，诸如地区间(当东亚和东南亚向前高速发展的时候，剩下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却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及阶级间螺旋式上升的不

平等。至于后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1996)宣布,“在1960年和1991年之间,20%最富裕者所占全球收入的份额从70%上升到85%——而同时最贫穷的人所占全球收入的份额从2.3%下降到1.4%”。到1991年,“85%以上的世界人口仅仅获得全球收入的15%”,“358位最富裕的人,亿万富翁,其资本净值等于最贫穷的45%世界人口——23亿人——的收入之和”(2)。在美国,比尔·盖茨1995年一个人就比美国最贫穷的40%的人口(1.06亿人)净资产总额还要多。

两极分化是惊人的,这使得世界银行的特别主张显得很空洞,该主张认为,国际一体化加上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以及少量的国家干预是巩固增长并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最好办法。(虽然增长是巨大的,但他们奇怪地将之归功于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体制。而一旦这些地区产生问题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改变他们埋怨国家干预太多的措辞)。它同样还使得一套广泛的意识形态主张显得空洞——自由市场将会在一个快速民主化的资本主义内部产生一种“利益相关者”社会。例如,在美国“所谓的人民市场”的时期,“联邦储备系统的统计显示,60%的美国人根本不拥有任何股份”(即使养老金也没有)。此外,“1%的最富裕的美国人几乎拥有全部股份的50%;80%的底层人仅拥有3%的股份”(Smith, 1998, B18)。因此,不难发现在过去10年股票市场的突然增长中谁是最大的获利者。“我们要消灭私有制,你们就惊慌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大声疾呼,“但是,在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65)。

西布鲁克(Seabrook, 1996)形象生动地描述了全球不平等的地区事实:

印度尼西亚以自由市场体系的名义宣扬对人权的极度践踏,并破坏其竞争性优势所要依赖的那些劳动者的生存权。接受跨国公司转包契约的中小型企业正是这样一些地方,在那里,金属敲击声音相闻,束缚产业的镣铐就是在这些车间里制造……

许多的跨国公司在这里签订转包契约:利维斯、耐克、锐步。多数的转包商是韩国的。他们全都倾向于低廉的工资和残酷的管理。耐克和利维斯颁布了一项管理法规来指导投资标准;但事实上,在这个柔弱的制度之下他们总是积极追求最低的生产成本……一些转包商从雅加达迁往更小的城镇,在那里,工人们甚至更加没有能力联合起

来改善自己的处境。(103—5)

或者,从个体水平来说,我们可以看看希拉和米拉两姐妹的陈述。直到最近,她们还受雇于利维斯的新加坡转包商。

“事实上,我们经常被侮辱。当老板生气的时候,他就骂我们这些女工是狗、是猪、是荡妇,所有这些我们都必须容忍而不能有任何的反抗……形式上我们从早上7点工作到3点(每天的工资不到2美元),但常常有强制性加班,有时——特别是有加急订单需要交付时——要一直工作到9点。不管有多累,我们都不许回家。我们也许会得到额外的200卢比(10美分)……我们从住的地方步行到工厂。工厂里非常闷热,大楼是金属屋顶,根本没有太多的空间容纳所有的工人。这里非常狭窄拥挤。有200多名工人在那里工作,大多数是女工,但整个工厂却只有一个厕所……当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除了吃饭和睡觉,根本没有精力做其他任何事情了。”(Seabrook, 1996, 90—1)

44

家是单房间,3米长、2米宽,每个月租金16美元;2罐水差不多要花10美分,每天吃饭至少要花1.5美元。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描述了20岁的制帽女工玛丽·安·沃克利的事,她经常要一连工作30个小时,中间没有休息(尽管可以不时靠喝雪利酒、葡萄酒或咖啡来恢复精力),最后在一段特别艰苦的加班后而死。这段加班时间就是“为了迎贺威尔士亲王夫人,女工们要为高贵的夫人小姐立即赶制参加舞会的华丽服装”。根据医生的诊断,“她致死的原因,是在过分拥挤的工作室里劳动时间过长,以及寝室太小又不通风”(1976年,364)。以此与当代越南耐克工厂里工人境况的描述相对比:

Nguyen先生发现在越南的工厂管理人员(通常是韩国人或台湾人)对待工人的态度就是一种“经常性耻辱来源”,口头辱骂和性骚扰频繁发生,“体罚经常被运用”。他发现总是有极大量的强迫性延时加班强加在越南工人的头上。Nguyen先生在报告中写道:“许多工人由于极度疲劳、炎热和缺乏营养而在轮班时晕倒,这是常有的事。我们

被告知,许多工人甚至在晕倒之前就已经咳血了”。耐克公司不去改善工厂的这种恶劣条件,而是诉诸复杂精致的国际公共关系运动来做出它很关心工人的样子来。但是再多的公共关系也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如果非常简单的三餐就要花费 2.1 美元,那一天只挣 1.6 美元的全职工人相当大部分的时间就只有挨饿的份了。(Herbert, 1997)

激起弥漫于《宣言》中的道德愤慨的那种物质状况并没有消失。它们具体体现在每一件事情中,从耐克鞋、迪斯尼产品、GAP 服饰到丽诗加邦产品。而且,正如 19 世纪的情况一样,改良主义中产阶级所表现出的愤慨是部分回应,这种愤慨得到了工人阶级运动力量的支持,要求管制全世界的劳动条件 (Moody, 1997)。不仅仅是那些反对耐克和其他大公司的特殊运动,那些反对全世界“血汗工厂劳动”的运动,以及支持在我们所买产品上打上“公平劳动标签”从而确保“公平劳动准则”法规的运动,都是最恰当的例子 (Ross, 1997; Goodman, 1996; Greenhouse, 1997a; 1997b)。

另外,《宣言》的背景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全球无产阶级比以前更壮大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要求也比以前更加强烈。不过,那种团结的障碍比 1848 年就已经复杂化的欧洲背景更加强大。现在,劳动力在地理上更加分散,在文化上更加异质,在种族和宗教上更加多样,在人种上更加层次化,在语言上更加分裂。结果就是从根本上分化了抵抗资本主义的方式和替代方案的确定。并且,虽然通讯手段及翻译机会已有极大改善,但是同一直使用新型无线电通讯的国际金融家和跨国人士相比,这对于 10 亿左右每天生活标准不足 1 美元、具有不同文化历史、文艺和智力的工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全球工人阶级内部在工资和社会给养方面的(地理和社会)差异同样比过去更为强大。最富裕的(比如说在德国和美国)与最贫穷的工人(比如说在印度尼西亚和马里)之间的政治和经济鸿沟比 19 世纪所谓欧洲工人贵族与无技术的同行们之间的鸿沟要巨大得多。这就意味着某一部分工人阶级(主要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那些掌握着最强大的政治发言权的工人,但并不仅仅是这些人)有很多东西丢失了,而不单单是枷锁。

虽然妇女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曾经一直是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在她们的参与则更加普遍,同时主要集中于某种职业范围(通常被称为“无



一技之长”的那种职业——参见 Wright, 1996)。这在工人阶级政治学中提出了尖锐的性别问题,这些问题过去通常不能提上桌面。《宣言》在这点上就较欠说服力。诚然,对于这些肯定会破坏家庭制度并将之改造为一种商品化的财产关系的力量,《宣言》中有很多敏锐的评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宣布他们的目标是“废除单纯作为生产工具的妇女地位”。与资产阶级的忧虑相反,他们还试图废除源自私有财产的、被他们称作为“公妻制”的东西(一种“既是公开的又是秘密的卖淫”制度)(70—1)。但是这仍然没有为社会主义方案中性别斗争的更广泛形式留下什么空间。强烈女性化的无产阶级运动(在我们这个时代不是不可能的)也许会被证明是不同于几乎专门由男人领导的政治改革的手段。

46

生态变异及其相关影响(资源战争、环境不公正、环境退化的微分效应)在寻求基本的卫生保健和适当的生活质量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突出。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平坦的运动场可以让阶级斗争在上面平衡地表演,因为与自然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文化规定,它暗含着建设资本主义替代制度的全部道路。虽然这种跨文化条件为激进批判——对深植于资本积累行为中的自然界所持的纯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态度的批判——提供了基础,但它们也对社会主义运动提出了挑战,规定了在生态上比过去更加敏感的政治学。如何在全球层次上设置环境与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结构变得更加困难了,假定价值和抱负在全球是同质性的,这完全行不通。

全球人口也处在流动中。移民潮似乎不可能停止。相对于资本来说,虽然国家边界对人和劳动来说越来越不容易渗透,但它们仍然是有足够渗透力的。移民是一个世界性的重要问题(包括在劳动运动本身内)。面对由移民运动而产生的相当大的种族、人种、宗教和文化差异,组织劳动就提出了特殊的难题,对于这些难题,社会主义运动从来就不觉得它们容易对付,更不必说去解决了。比如说,欧洲现在就必须面对美国许多年来一直纠缠不清的(常常被证明离间工人阶级团结的)来自于种族差异和人种差异的全部问题。

城市化在世界人口空间组织中加速产生了生态、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日益增长的全球城市人口比例 30 年内翻了一番,导致了人口大规模的空间聚集,这个规模迄今为止都是不可思议的。事实证明在像南威尔士煤矿区这样的小规模乡村、甚至是像 19 世纪曼彻斯特这样相对同质化的工业城市(拥有不足 100 万,虽然被分割为英格兰和爱尔兰工人),比在圣保罗、开罗、拉多斯、

47 洛杉矶、上海、孟买等这样的当代大都市更容易组织阶级斗争(甚至发展代议制民主制度),这些大都市拥有密集的、肆意蔓生且常常脱节的人口,接近或超过了2000万。地方(place)在其中得到确定的那种地理规模(见插图3.1)是如此不同以致于整个政治学前景也非常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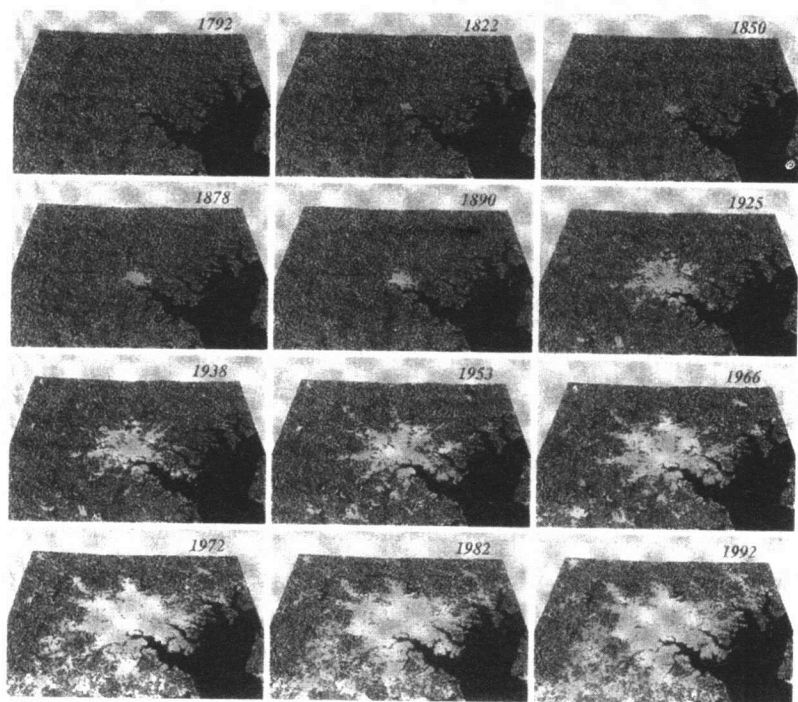


图 3.1 1792—1992 年“巴尔的摩”这个地方的变化规模。马里兰的巴尔的摩 200 年期间城市发展的透视图说明了城市组织中变化规模的难题。它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何才能使得巴尔的摩随着时间的流逝还仍然是一个稳定的政治学、经济学及生态学的分析单位?

社会主义运动必须与这些特殊的地理转型步调一致,并想出办法来应付它们。这并不会削弱《宣言》最后提出的“团结起来”这个战斗口号的重要性。我们现在的处境使得那个口号比以往更加紧迫。但我们既不能在自己选择的历史地理条件之中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也不能那样创造自己的地理。第 2 章对《宣言》的地理解读强调了在复杂的阶级斗争空间动态中空间结构和权力的非中立性,它揭示了资产阶级如何通过驾驭它本身所特有的作为生产力的空间而

获得与先前全部生产方式相对的权力。它显示了资产阶级如何通过相同的机制不断地加强并保护其权力。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无产阶级运动在学会如何对抗资产阶级支配和生产空间的权力、学会如何塑造新的生产地理学和社会关系之前,它的状况将一直是虚弱而不是强大的。同样地,社会主义运动在同地理的和历史的条件相协调并使自身多样化之前,将不能确定和清楚阐述一个现实的取代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方案,并为之斗争。

《宣言》清晰地表明,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以及“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而并不提出他们自己的宗派利益(过去这个指令常常被忽视)。

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应该立志成为]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先进的和最坚决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62)

在这里,存在着某种自大的危险:假设历史定律(以及地理定律?)为我们、且只为我们所知,我们、且只有我们懂得政治行动的正确路线。尽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无疑是强大的、具有洞察力的,但它既不能声称是全能的,也不乏不确定性。而且,还存在着一个谁的想象在某一替代方案的建设中占上风的问题。空想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就提出了“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描绘,是在无产阶级还很不发展、因而对本身的地位的认识还基于幻想的时候”。这些描绘符合“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此外,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全部的批判原则,并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91)。马克思和恩格格断言,问题在于阶级斗争自身的发展使这种空想主义变得多余,甚至当这些派系围绕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而组成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消极的力量,这些领袖通过建立与世隔绝的共同体或海外殖民地从而寻求自身对于社会主义问题的“空间定位”。所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恩求伊加利亚人(即卡贝)这种“好的共产主义者”,不应该放弃欧洲的阶级斗争而躲避到他们的幻想国中去。

但是,当阶级斗争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作为一支统一的力量减退时(虽然仍然以无数种碎片形式出现),这不也就是未来社会的幻想图景发挥一定作用的时候吗?我们迫切地需要一个复活的社会主义先锋,一个能够以

适当方式集合多方面不满的国际政治运动,这些不满源自追求乌托邦新自由主义过程中对资产阶级权力的赤裸裸运用。这并不是指一个旧式的先锋政党,它强制推行单一的目标,妄称自己英明而排斥所有其他意见。但它确实意味着创造某种为某个共同目标奋斗的组织、制度、教义、计划、形式化的结构等等。这种政治行动必须牢固地立足于人类行动得以展开的具体的历史和地理环境之中。在共产主义政党的传统先锋派(由列宁所代表的《宣言》幽灵)与学术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理想主义先锋派——类似于德里达(1994)这样的幽灵——之间有着一块亟待开垦的政治组织和斗争地带。所幸的是,这个地带并非没有可能性。

关于克服这种困难的策略,《宣言》本身包含着一些线索。经过适当修正,这样的深刻见解可以把我们带到更加丰富的斗争地带。比如说,承认阶级斗争的起点在于劳动身体的特殊性,这是很重要的,像玛丽·安·沃克利、希拉和米拉等数十亿这样的劳动身体,她们的日常生活是通过与资本积累动态之间常常是创伤性的、冲突性的关系而形成的。因此,劳动身体是一个抵抗的场所,它通过个人担当道义力量的政治能力而形成一种政治维度(见第7章)。以这种方式论述这些问题并不是回复到某种极端个人主义,而是如《宣言》那样,强调阶级斗争的普遍性源于个人的特殊性,强调阶级政治学必须以富有意义的方式回到个人。所以,个人异化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起点,而且正是这种异化是必须要加以克服的。

这自然是《宣言》的要旨,但那种异化只有通过集体斗争的方式才能够克服。那就意味着要建立一项超越时空的运动,来对抗资本积累的普遍和跨国特性。必须找到一些方式来连接身体的微观空间与“全球化”的宏观空间。《宣言》建议,把个人与局部的、区域的、国家的、最终国际的因素连结起来可以达到此目的。阶级政治学得以构建的那些空间规模存在着等级。但是正如史密斯(50 Smith, 1992)评论的那样,“地理规模的生产理论是很不发达的”,我们还必须学会如何在不同的空间规模之间进行“仲裁和转换”,特别是在全球工人阶级形态和身体政治学方面。如果想要复兴工人阶级政治学,那这就是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尖锐问题。在此我仅举三例。

阶级斗争的传统起点一直是一个特殊的空间——工厂,而且阶级组织正是从那里出发通过联合运动、政治政党等类似形式而得以扩大的。但是当工厂消失或变得如此不稳定从而致使永久性组织变得非常困难(不然就是完全不可

能)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当大量的劳动力变成暂时性或临时性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在这些条件下,传统形式组织起来的劳动就失去了它的地理基础,它的力量也就相应地减弱了。于是就必须要建立替代性的组织模式。比如说,在巴尔的摩,就存在着一个城市范围的为争取最低生活工资的运动(见第7章),它依赖于社区机构(特别是教会)、激进组织和学生团体的联盟以及可以获得的不论什么样的联合支持,以实现它的目标。运动产生于整个城市范围,它不以传统的劳动组织模式来操作,而是以适应新环境的方式来进行(特别是对劳动组织有需要的地理规模,正如希罗德[Herod, 1998]强调的)。这是穆迪(Moody, 1997)所称在地方政治学(politics of place)中发挥作用的“社会工联主义”(social unionism)的一个形式。

再看第二个例子。当代资本主义政府的性质伴随着重要的超国家权威的创建,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欧盟(European Union)。毫无疑问,这些结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sstricht Agreement)是最典型的案例——是亲资本主义的。左派如何作出反应?在此,分析的界线非常重要(在欧洲,左派内部的争论非常激烈),但是所作的反应往往却是沿着下列路线运行的极度简化主张:“因为 NAFTA 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是亲资本主义的,所以我们通过保护民族国家不受超民族的治理而与之作斗争”。这里所概述的主张表明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反应。左派必须要学会同时在两个空间规模上与资本作斗争。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它也必须学会于在不同空间规模上潜在地调整自身内部互相矛盾的政治学,因为在等级制的空间系统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生态难题经常造成这种窘境):在一种规模上产生良好政治意识的东西却不能在另一种规模上产生这样的良好政治学(比如说,欧洲汽车生产的理性化也许就意味着牛津或都灵工厂的关闭)。撤退到民族国家立场,把它当作阶级组织和阶级斗争的惟一战略场所,这(除了是不认真对待民族主义及其所带来的其他东西)必将招致失败。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已变得不相干——事实上,与以往相比,它变得越来越有意义。但空间规模的选择不是“非此即彼(either/or)”而是“既又(both/and)”,即使后一种战略需要面对很大的麻烦。这意味着美国的工会运动应该对跨边界组织(特别就墨西哥而言)付出与反对 NAFTA 一样多的努力,意味着欧盟运动要像它的每一成员在各自国家的首都所做的一样关注它在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所获得的力量和影响。

向国际层次的发展又提出了相似的窘境和难题。劳工斗争的国际性虽然

作为一个明显的、潜在的必然性始终纠缠着多数劳工运动,但它在组织结构上仍面临着严重的问题,注意到这点非常有趣。我再次部分地将之归因于未能正视不同空间规模上一体化斗争的窘境。这些一体化的例子存在于不同领域。围绕人权问题、环境问题和妇女地位问题的运动证明了政治学得以建构的可能方式(及这些政治学的某些缺陷),从而把身体和个人的微观规模与全球和政治经济的宏观规模连接起来。关于全球劳工地位问题,并没有召开过类似环境问题的里约会议或妇女问题的北京会议。我们几乎还没有开始思考诸如“全球工人阶级形态”(global working class formation)这样的概念,甚至也没有分析那些概念可能意味着什么。面对世界性劳工的退化和暴力,对人类尊严的保护大多是通过教会和人权组织而不是直接通过劳动组织来阐述的(教会不同空间规模上运作的能力为政治组织提供了许多的模式,社会主义运动完全可以从吸取一些重要的教训)。就如地方层次上的斗争一样,劳动组织和市民社会中许多其他机构之间的联盟对于国际规模上社会主义政治学的阐释现在看来是至关重要的。许多在美国发生的运动,比如反对一般或特定形式的全球血汗工厂(诸如迪斯尼在海地及耐克在全世界的业务),就是通过这些联盟来组织的(参见 Ross, 1997)。此处强调的不是任何事情都没有做,也不是说那些机构不存在(Moody, 1997,提供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国际劳工组织机构的例子)。但是在1989年之后重建某类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尽管柏林墙的倒塌为探索那种国际主义——它不需要保护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残余免受掠夺性资产阶级权力政治学的侵犯——揭开了新的时机。

52

如何在各种不同空间规模上建立一场政治运动以回应资本的地理策略和地缘政治战略,这是一个难题,这个难题至少在《宣言》中就已经以高度概括的形式清晰地表达过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如何完成它,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还没有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地理复杂性,那就不能开始这项任务。我们需要想方设法来建构一种可以在微观规模与宏观规模之间自由穿梭的政治辩证法,对《宣言》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为解决这个任务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它重新点燃了社会主义的火焰,从雅加达到洛杉矶,从上海到纽约城,从阿雷格里港到利物浦,从开罗到华沙,从北京到都灵。

没有什么神奇的答案。但至少有一种能够说明那种方式的战略性思考方法,这就是1848年的《宣言》仍然为我们提供的东西。首先,充满于其间的政治激情是一种难以置信的灵感。它仍然被当作是一个特别的文献,富有见解、意

味深长并充满了各种政治可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了一个文本,创作了一种迷人的修辞形式,150多年来全世界有数百万人在阅读、欣赏并吸收它(虽然常常以一些模糊不清的方式)。我们现在如何解读它、今天如何借用它的意义,这对进步政治学来说是一个关键问题,正如《宣言》本身所提醒我们的那样,我们要永远记住,其原则的实际应用总是“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8)。

## 当代全球化

近 20 年来,“全球化”已成为我们思考世界如何运行的关键词。它如何开始以及为什么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然而,在这里我只想集中讨论这个概念的兴起所包含的理论和实践含意。为了突出西方话语中(虽然在现实中它未必如此)似乎非常重要的政治变化,我首先从两组一般问题开始。

1. “全球化”这个词为什么会在近期以它特有的方式成为我们话语的一部分?谁把它置于这种地位的?为什么?又是通过何种政治规划?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进步论者”和“左翼分子”中,更加富有政治意义的术语,如“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现在越来越让位于“全球化”,成为组织思想和绘制政治可能的一种方式,这样的事实具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2. 全球化的概念如何被用于政治的?采纳这个术语是否预示着承认国家、区域以及地方工人阶级运动或其他反资本主义运动的软弱无力呢?相信这个术语是否会构成对地方甚至国家政治行动的有力威慑呢?是否如某些人现在所声称的那样,迄今为止由民族国家所代表的团结形式会“被掏空”?民族国家和地区内部所有对抗资本主义的运动是否都是国际市场这个巨大的、可恶的全球机器中的一些微不足道的齿轮,在这个全球市场中,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政治运动的空间?

从这些观点来看,全球化这个术语以及所有相关理论都沉重地负载着政治含意,这些含意对大多数传统左派或社会主义政治学形式都是坏的预兆。但在我们完全拒绝或放弃它之前,还是有必要花一点功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从它短暂的使用历史中,好好地看一看,它具体表现了什么,我们又可以学到些什么?



## 1. 作为过程的全球化

全球化可以被视作一个过程、一项条件或者一个特定的政治规划。正如我想要说明的,这些不同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但我建议首先把它当作一个过程。这种方式并不是假定过程是永恒的,也不排除下面的说法,比如说认为过程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或者已自己设计出一种特别的甚或“最终的”状况。它也不使全球化“自然化”,好像它不要特别力量的努力就能实现。但是,采纳这个以过程为基础的视角,会使我们在一开始就聚焦于全球化如何已经并且正在发生。

这样,我们便看到类似于“全球化”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内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出现过程。当然这一过程是从1492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开始的,那时候,贸易和商业的国际化进展顺利。如果没有自己的“空间定位”,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发展(比较第2章)。它一次又一次地致力于地理重组(既有扩张又有强化),这是部分解决其危机和困境的一种方法。资本主义由此按照它自己的面貌建立和重建地理。它创建了独特的地理景观,一个由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和领土组织构成的人造空间,这促进了它在一个历史阶段期间的资本积累,但结果仅仅是必须被摧毁并被重塑,从而为下一阶段更进一步的积累让路。所以,如果说“全球化”这个词表示任何有关近期历史地理的东西,那它则最有可能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这一完全相同的基本过程的一个新的阶段。

我的本意并不是要回顾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斗争的空间和地理方面的浩瀚文献(即使这样一个工作是行得通的)。但是,我确实认为,认识一系列的紧张状态和那常常令人感到不安的折衷结果,这对于从理论上和政治上理解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的地理动态,是很重要的。比如,当列宁和卢森堡在民族问题上发生冲突时,随后有关一国之内(甚或在一个城市之内)社会主义可能性的巨大争论展开,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民族主义达成妥协,共产国际就如何解释它自己的国际性而摇摆不定,可以说,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从来就没有能够对下列这个问题达到适当的或令人满意的理解,那就是空间生产对于资本积累的动态和阶级斗争的地理政治学是如何地重要和不可缺少。

55 对《宣言》的研究(第2章)指出了这种困境的一个关键根源。资产阶级追求阶级统治虽然很明显地曾经是(而且现在也是)一个真实的地理事件,但这个文本近乎直接地回复到一个纯时间的和历时的描述却是令人吃惊的。看起来,要辩证地看待空间是很难的,它使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去追随费尔巴哈的思想,认为时间是“辩证家的特权范畴,因为它排斥空间所容忍和调整的地方并使之顺从”(Ross, 1988, 8)。我注意到,甚至“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术语也消除了地理意义。如果我在过去那些年曾力图灌输“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这个思想,那是因为发生在术语学中的转变使我们做好了准备去更加灵活地、而且我希望是更加中肯地考虑诸如全球化和不平衡地理发展这些过程的阶级意义(Harvey, 1996)。我们需要以更好的方式从政治上来理解(如果不是解决)这种根本性紧张,这种紧张存在于常常退化为阶级凯旋论的时间目的论(现在它的主要代表是宣告历史胜利终结的资产阶级凯旋论)、存在于表面上看起来不连贯的且无法控制的阶级的地理分裂、存在于世界各地每个角落中其他形式的社会斗争之间。

例如,从马克思之后,关于资本主义如何建构其地理的各种版本的描述就层出不穷(如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卢森堡把帝国主义作为资本积累救世主的理论、毛泽东有关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理论)。这些理论随后就有了陆续的补充:有关世界范围内资本积累的更加综合的描述(Armin, 1974),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生(Wallerstein, 1974; Arrighi, 1994),不发达地区的发展(Frank, 1969 和 Rodney, 1981),不平等交换(Emmanuel, 1972)及依附论(Cardoso and Faletto, 1979)。当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政治实践在全球传播时(与阶级斗争全球化过程平行发展),地方/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入侵、分裂和帝国主义企图进行抵抗的无数种描述就因此产生了。

由此,我们不得不承认阶级斗争的地理维度和基础。正如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89, 242)所暗示的,政治总是嵌入在地方和社群所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感觉结构”之中。因此,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普遍主义就必须通过地方性的特别需求、关注和渴望之间的协商才能得以建立。这必须涉及到他称之为“战斗的特殊主义(militant particularism)”的东西。由此,他表示:

56 工人阶级组织的惟一的、与众不同的特点……是以一种相当特殊的方式把各种特殊斗争与一般斗争连接起来。它作为一项运动致力

于实现那个乍一看很特殊然而实际上却是一般的利益,即捍卫和发展某些完全集合起来的特殊利益。(重点号为我所加)

甚至阶级斗争的时间描述也被证明是受领土限制的。但是却很少有人有兴趣去证明这些描述所依据的地理分界线是正确的。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无数关于英国、威尔士、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泰隆尼亚、南非、韩国等地区工人阶级形成的描述,就好像这些地区是自然的地理实体。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个限定(范围)的空间内的阶级发展上,如果我们仔细审视这个限定(范围)的空间,就会发现它是资本流动、劳动力流动、信息流动等国际空间内的一个空间,它反过来又是由无数更小的空间组成,这每一个空间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地区的甚或是地方的特点。例如,当我们仔细观察爱德华·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权威地描述的行动时,它又变成了一系列常常是松散地连结在空间中的高度地方化的事件。约翰·福斯特在他的《工业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一书中的描述可能已经使这些差异有点机械了,但我认为,下述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在奥海姆、北安普敦和南希尔兹(科尔玛、里尔、圣埃蒂安、或者明尼阿波利斯、墨比尔、罗尼尔这些地区),阶级结构、阶级意识和阶级政治学是非常不同地被构造和解决的,这使得民族国家内的地理差异比多数人愿意承认的更加重要。

不加批判地思考所谓“自然的”地理实体,这种方式现在在新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描述中(特别是那些受“调节理论”所启发的描述)被永恒化,看起来似乎存在着独特的德国、英国、日本、美国、瑞典、新加坡、巴西等等形式的资本主义(有时被分解为更加区域化的秩序安排,比如在意大利、巴西、英国等国家内北部与南部的对立)。这些独特的资本主义就这样被视为全球空间系统中互相竞争的实体。这种观念绝不仅限于左派。把不同国家的资本主义(日本的、北欧的、德国的,等等)当作富有意味的实体进行比较,这是贯穿各种不同政治立场的标准程序。

在此,我并不是说这些民族或文化差别是错误的,而是认为很容易就可以假定它们是存在的,而不需要任何形式的证据或论据。虽然一些研究表明它们要么远比设想的要复杂,要么是如此模糊且可渗透以至于大成问题,但我们仍然可以认为它们是不证自明的。威廉斯所引用的“地方(place)”概念最终被证明比他的想象更加复杂。结果就是在大多数关于近期政治经济变化的描述

内画一条清晰的压力线。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不空间限制的、地理上无差别的理论观点(虽然论战性的和政治性的观点同样大量存在于右翼的和保守的人士那里,但目前来说主要还是理论的),它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纯粹的时间过程,无情地朝着确定的目标前进。在传统的左派看来,阶级斗争为历史运动朝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必然的)结果前进提供了动力。另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些地理学观点:在一些地方形成的阶级联盟(通常包括具有列宁所言的有限工会意识的工人阶级)剥削另外一些地方的阶级联盟(也许有买办资产阶级作为其代理人)。这样,帝国主义(或者,反过来说,争取民族解放或地方自治的斗争)就控制了未来。这两种描述不知怎地就被认为是互相一致的了。事实上,认为一个阶级被另一阶级剥削类似于一个地方的阶级联盟被另一地方的阶级联盟所剥削,这种理论借口从来就不具说服力。而且假设解放空间的斗争(比如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从阶级斗争的意义上来说是进步的(无论是新兴的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这根本就经不起严格的审查。把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混淆起来,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那么,我们又怎样才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搞混淆呢?

“全球化”术语的兴起所预示的事情之一就是深刻的资本主义地理重组,使许多关于“自然”地理单元——资本主义历史轨迹就发展于其中——的假定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如果它曾经有过意义)。因此,我们就面临着一个历史的机遇:迎着资本主义的地理知难而上,把空间生产看作是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动态中的一个基本环节(与某些由这些动态所构成的派生东西相对)。这就提供了一个机会,把我们自己从隐蔽的空间的牢笼中解放出来,那个牢笼是一个拥有不透明的权力、支配着(有时是搞混)我们的思想和政治学逻辑的空间。它还让我们更好地理解阶级斗争和地方间斗争如何经常相互影响,理解资本主义如何能够频繁地通过地理分割和对阶级斗争的控制来遏制阶级斗争。这样,我们就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上来理解资本主义固有的时空矛盾,并且通过那种理解,可以更好地思考如何利用最薄弱环节,并因此激发对资本主义虽具“创造性”但却暴力的破坏倾向的最深的厌恶。

那么我们该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上随此议程而动呢?

当然,无数迹象表明,人们愿意接受正在变化的空间性和再领土化的理论暗示。例如,德鲁兹和瓜塔蒂《反俄狄浦斯》一书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指出了资本主义的领土化和再领土化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但是,与许多其他情况一

样,在这里,社会思想的重新空间化的价值是以与马克思的表述(同时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部分地、有时是根本地决裂为代价而获得的。在我自己的作品中,我就试图表明,虽然在这样一个整合过程中,确实会导致对理论和实践的各种修正,但是,有很多方式可以把空间整合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之中,而并不一定要破坏中心命题。所以,现在我就要概述一下这种主张的主要特征。

我首先从我能发现的最简单的命题开始。对资本循环过程和劳动过程组织榨取剩余价值的行为进行任何唯物主义描述都会包含某些张力。作为历史地理矛盾的强大因素,它们不可避免地周期性爆发。

首先,资本主义总有这样的冲动:加速周转时间、加速资本循环并因此使发展的时间范围革命化。但只有通过长期投资(比如,对人工环境的投资,以及对生产、消费、交换、交通等等精致且稳定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才能做到。此外,避免危机的主要策略在于吸收长期项目(如国家在萧条时期发起的“公共建设工程”)中过度积累的资本,这又延缓了资本的周转时间。因此,围绕着不同资本运行其中的时间范围问题就集中了一连串异常的矛盾。历史上,当然现在也不例外,这种张力主要是通过下列两个方面的矛盾表现出来的,一方面是货币和金融资本之间的矛盾(现在周转几乎是瞬间完成的),另一方面是商业、制造业、农业、信息、建筑、服务及国家资本之间的矛盾。但在各种小集团之间(比如流通和债券市场之间,或者土地所有者、地产开发商和投机商之间)也会发现很多矛盾。为了在各种资本动态之间进行调整以适应不同的时间节奏,就需要各种各样的机制存在。但是,周转次数和时间的不平衡发展(近期在强大的金融部门内发生的时间范围的内爆所引起的那类不平衡发展)会造成一个不受欢迎的时间压缩,它对资本的其他派系(当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其他资本派系)会产生强大的压力。由华尔街所设定的时间范围完全不能灵敏地适应社会和生态再生产系统的时间性。而且不用说,在金融市场中建立起来的迅速的周转时间对工人(他们的工作安全、他们的技能等)以及社会生态再生产的生活世界来说甚至更有压力。这个压力点对过去20年来发达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来说是关键的。

其次,资本主义总是有这样的冲动:消除所有的空间障碍,如马克思所述的“通过时间消灭空间”,但只有通过一个固定空间的生产才能如此。资本主义由此制造了一个(空间关系的、领土组织的、连接在“全球性”劳动分工和功能分工中的地方体系的)地理景观,与它自己在其特定历史时刻上的积累动态相

称,但那个地理景观最终却还是要被摧毁并改造以适应稍后时期内的积累。这个过程有许多独特的方面。

1. 降低在空间中运动的成本,尽量少用时间,这一直是科技创新的焦点。收费公路、运河、铁路、电力、汽车、空运业和喷气式运输已愈益把商品和人的运动从距离冲突的约束中解放了出来。邮政系统的类似改革,电报、无线通讯、电信和万维网现在已经使信息传输的成本(尽管不包括基础设施和终端设备费)几近于零。

2. 建立固定的物质基础设施来促进这项运动并支持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这对地理景观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越来越多的资本被当作不动产资本,被当作固定在土地上的资本嵌入到空间中,创造了一个“第二自然”和一个从地理上组织起来的越来越限制资本主义发展轨迹的资源结构。设法在一夜之间推倒东京-横滨或纽约的城市基础设施并全部重来,这个想法简直荒唐可笑,结果就是使资本主义的地理景观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僵化,并因此与越来越自由的运动产生了严重矛盾。这种趋势越来越显著,以至于人们越来越多地明确阐述有关于地方的机构,对地方的忠诚(及它们的特性)也成了政治行动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60

3. 第三个因素是领土组织的构造,主要(虽然不是惟一)是国家对货币、法律和政治进行调节的权力,根据主权的领土(有时是治外法权的)意愿对强制和暴力工具进行垄断的权力。当然,马克思主义有无数关于国家的理论,其中许多都对历史和地理进行了一种甚至到达有害程度的抽象,使加蓬和利比亚这样的国家看起来似乎与美国或德国是平等的,而且没能够认识到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边界是在1870年和1925年之间绘制的。在欧洲,1500年时有500多个政治实体,到1920年时已缩减到23个。在近些年,这个数目又增加到50个或者还要再多一些,其中有一些面临着更进一步的分裂。世界上的多数国家只是在1945年之后才独立的,而且它们中的许多从那以后还寻求着建立单一民族国家(不过,尼日利亚和卢旺达的近期情况与法国和墨西哥的历史情况一样,也是这样的)。所以,虽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1648年确实首次确立了这样的原则,即相互承认彼此自治和领土完整的独立的主权国家应该共存于资本主义的世界中,但根据这个原则对世界按地区进行分割的过程却花了好几个世纪才得以完成(伴随着大量的暴行)。产生这一制度的那些过程可以很轻易地把它消除,正如某些评论家正在证明的那样,当超国家组织(如欧盟)和区域自治

运动在民族国家内开展活动时,这些过程确实发生了。简言之,我们必须从全球化/领土化这样一些不稳定的过程方面来理解国家的形成和分解。这样我们就看到了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历史地理的领土化、非领土化和再领土化的连续过程(这是德鲁兹和瓜塔蒂在《反俄狄浦斯》一书中强调的基本观点之一)。

我认为,以这些概念作基础,我们就能更好把全球化过程理解为不平衡的时间和地理发展的一个生产过程。而且,正如我希望说明的那样,语言的转变可以产生有益的政治后果,把我们从那些有关万能的、同质化的全球化过程的压迫性和偏狭性语言中解放出来。

## 2. 全球化动态中的最新转变

记住了这点,我们回过头来再谈谈“全球化”这个术语可能意味什么,以及它为什么会具有新的诱惑力并因此在近期变得如此重要。有四个转变异常突出:

1. 20世纪70年代早期首先在美国出现的取消金融管制是对当时国内发生的滞胀及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欧洲美元市场的失控发展所致)被迫采取的反应。取消金融管制这种风潮不是资本蓄意设想的一个策略而是对现实的一种让步,我认为认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尽管某些部分的资本所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其他部分)。布雷顿森林体系曾经也是一个全球体系,所以在此所发生的就是从一个全球体系到另一全球体系的转变,前者是分等级组织的,主要受美国控制,而后者则更加分散,通过市场来调整,并且使资本主义的财政状况更加不稳定。修饰这种转变(自1968年起,它就一步步地发生了,最显著的是1979到1985年期间)的华丽词藻被当作一个优点暗含在“全球化”术语的宣传中。在我比较愤世嫉俗的时刻,我发现自己会想,正是这种金融压力欺骗了我们所有人(包括我在内),让我们相信“全球化”是一个新事物,而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宣传伎俩,目的是要充分利用国际金融体制中的必要调整。碰巧的是,金融压力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强调金融市场区域化的重要性,日本的共荣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及欧盟就是明显的权力集团——有时被称为“三角带”。一些人(甚至包括全球化的推动者)一直在警告,主要以民粹民族主义形式出现的对全球化的“强烈反对”将会受到重视,全球化将可能是一列“无刹车

的灾难列车”(Friedman, 1996)。

2.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对世界产生影响的深刻的科学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及改进为探索世界经济近期发生的转变提供了主要中心。当然,在资本主义的长期历史之中就已经有过许多类似的技术革新阶段。创新往往是集中在一起的(因为各种常常是互相促进的理由),我们近期的确一直在经历着这样一个集中的变革时期,但现在可能比较特殊的是贯穿于世界经济不同地带内外技术转让和引入的步伐和速度。有一些与全球军火贸易有关,但那些受过教育的、按照科学方法培养出来的、能够适应并能从任何地方吸收科技知识和专门技能的精英人士的存在也与新技术和新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速度有关(核浪费问题暗含在其中)。因此,现在有许多人认为,飞速发展的技术革新和技术转让是最单一的、表面上看来最不可阻挡的推动全球化的力量。

3. 媒体和通讯系统,以及最重要的,所谓“信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生产和消费组织并带来了全新的要求和需要定义。通讯领域中“空间的非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 of space)”源于军事机构,但马上被金融机构和跨国资本当作一种手段来利用,以调整它们在空间上的瞬时行为,结果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非物质化的“赛伯空间”,在这些空间中会发生某些重要的交易(主要是金融方面和投机方面)。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开始能够通过电视直播观看革命和战争。媒体和通讯的空间和时间在一个媒体权力的垄断越来越成为问题的世界中内爆了(尽管自由主义可以通过因特网宣布他们的民主化)。

现在,“信息革命”思想非常有影响力,并经常被视为一个信息社会占绝对优势的全球化新纪元的开端(参见 Castells, 1996),对它过分关注是很容易的事情。它的新奇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另一方面,铁路和电报、汽车、无线通讯和电话的新奇在它们的全盛时代同样也引人注目。这些早期的例子是有启发性的,因为每一事例在其黄金时代确实改变了世界运行的方式、生产和消费的组织方式、政治的经营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一个不断拓展的规模上变成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方式。很明显,应信息技术的需要,工作场所内以文化形式出现的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关系确实在迅速地改变着。有趣的是,这是美国右翼政治议程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纽特·金里奇(曾接受阿尔文·托夫勒的建议,该人的右翼乌托邦理想完全依赖于“第三次浪潮”信息革命的思想)说,新技术天生就是解放的。但是为了把这种解放力量从它的政治枷锁中解放出来,就有必要进行一场政治革命以摧毁“第二次浪潮”工业



社会的所有机构——政府管制、福利国家、工资谈判的集体机构，等等。这通俗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变化推动社会关系和历史这个主张，这种认识方式不可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右翼的花言巧语所包含的强烈目的论腔调（玛格丽格·撒切尔那著名的宣言“我们别无选择”也许就是最好的表现）。

63

4. 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周期性发生的另外一些转变中，商品和人员的流动成本和时间也有所下降。这就把各种活动从以前的空间约束中解放了出来，允许生产、消费、人口等类似东西迅速地调整场地。当全球化过程的历史开始被书写时，在克服空间障碍所需要的成本中发生的简单变化似乎远比所谓信息革命本身要有意义得多（虽然两者实际上是彼此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分别提出这几个因素可能会令人厌烦，因为最后正是这几个因素之间的协同性交互作用才最具意义。比如说，如果没有信息革命就不可能取消金融管制；如果商品和人员不能更加无拘束地在全世界自由流动，那技术转让（它也同样严重地依赖于信息革命）就毫无意义。

### 3. 结果和矛盾

全球化过程的上述四个转变伴随着若干其他重要特点，也许最好把它们理解成从发挥主要作用的主要力量中派生出来的东西。

1. 生产和组织形式（虽然很多小企业也抓住了不少新机遇，但主要是跨国资本的生产和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商品和信息的流动成本大大降低。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海外生产突然间变得更加普遍（当生产转移到中国或东南亚的其他地区时，它现在甚至对日本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地理上的分散和生产体系的分裂、劳动的分工及工作的专业化随之发生，虽然这通常发生在公司跨越国家边界进行兼并、接管及联合生产使其权力越来越集中的过程中。虽然许多公司仍然在其宗主国保持了一个强大的基地（很少有真正跨国的），但公司支配空间的权力更大了，使得单个地点越来越受制于它们的一时冲动。全球电视机、全球小汽车成了政治经济生活的一个日常方面。在一个地方停止生产，又在别的地方开始生产，这已成为常事——一些大规模的生产业务在过去20年中迁移了四五次。

64

2. 全球雇佣劳动力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翻了一倍还多(参见第 3 章)。这不仅是因为迅速增长的人口,而且还因为越来越多的世界人口(特别是妇女)加入到了雇佣大军的行列,比如说在孟加拉国、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非洲及前苏联集团。全球无产者现在比过去强大得多(这自然会给每一个社会主义者的目光中都注入一丝顽强的希望),但它从根本上女性化了。它也在地理上分散了,在文化上变得异质了,并因此更加难以组织成一个统一的工人运动(比较第 3 章)。甚至现在它受剥削的处境在总体上比 20 年前还要差。

3. 全球人口也处在不断的生长中。美国现在是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外来人口出生比例最高的国家。虽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阻止人口进入的措施(限制条件比以前——比方说 19 世纪——要苛刻得多),但移民潮似乎不可能停止。伦敦、巴黎和罗马与以前相比,更加是一个移民化城市了,这就使全世界移民问题(包括在工人运动自身内)前所未有的严重(甚至东京也卷入到了这个过程中)。出于同样的理由,面对着相当大的种族、人种、宗教和文化差异,组织工人或建立反抗资本主义的统一政治同样也提出了那些对于民族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运动来说都不容易解决的特殊政治问题。

4. 城市化渐渐发展而达到了恶性化程度,特别是 1950 年之后,城市化的步伐加快,从而在世界人口的空间组织中产生了非常重大的生态、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全球人口越来越多地生活在城市中,其比例在 30 年中已增至 2 倍,我们现在发现人口以迄今为止不可思议的规模在空间集中。世界城市和城市体系(比如贯穿整个欧洲的情况)一直在形成之中,它对全球政治经济运行产生着迅速的转化作用。城市和城市区域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非常重要的竞争实体,产生着各种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65 5. 世界的领土化已发生了变化,这不仅仅是因为冷战的结束,也许最重要的是国家角色的变化,国家已失去了一些(虽然不是全部)传统的控制资本流动(特别是金融和货币资本)的权力。因此,与以前相比,国家的作用更加受到货币资本和金融的约束。结构调整和财政紧缩已成为头等大事,并且国家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已缩小为想方设法改善商业氛围。“全球化论题”在这里成了打击社会主义者、福利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的强大意识形态工具。当英国工党被迫屈服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要求而执行紧缩政策时,很明显国家财政政策的自治权受到了限制(法国在 1981 年之后也不得不承认的一种状况)。所以,穷人的福利已大量地被政府对资本的补贴所取代(最近奔驰公司

从阿拉巴马州获得了2.5亿美元的津贴以说服它把厂址设在那儿——相当于每个未来工作获得了16.8万美元的补助)。

但是在这些“挖空”民族国家的手段中,没有一种像大前研一(Ohmae, 1995)这类作家所断言的那样。为了创造当代新自由主义行为的浪潮,国家必须要比以往更加深入地渗透到政治经济生活的某些部分,甚至在某些方面要比以往更具干预性(撒切尔主义在某些方面就是高度干涉主义的)。出于同样的理由,民族国家也保留了根本防御措施之一来对付原始市场权力(正如法国在1995年之后一直重申的)。面对着时空压缩和全球商品化,保护种族和文化的同一及环境质量也成了—个关键手段。因此,民族国家就成了—个主要场所,“强烈反对”那种诉诸民粹民族主义的全球化。

再领土化不会停留在民族国家这个层面上。经济、环境和政治的全球管理机构快速增长,就像区域集团(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欧盟)在超国家规模上发展—样,而且经常可以发现强大的分权过程(有时通过争取区域自治的政治运动,或者像在美国—样,通过越来越多地强调州政府在联邦制度内的权力)。地方与全球的新型关联形式已被确立,而且在可以掌握、组织并管理世界经济的规模上也已发生—种重大的转变。

6. 虽然单个国家已经失去了它们的一些权力,但我称之为地缘政治民主化的东西已创造了新的机遇。任何一个核心权力都越来越难对其他部分进行约束,而同时外围权力却越来越容易介入到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货币权力是一个“平等派和昔尼克派”。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评论的,—个强大的二律背反随即也就出现了:虽然从质量上说“货币的功效是没有界线的”,但由个人(和国家)所控制的货币在数量上的极限却以重要的方式限制或增加了他们的社会权力。比如说,倘若取消金融管制,那么就不可能预防日本会发挥它作为—个重要财力的影响。国家必须更加多地参与到它们的竞争之中(这是已经变得非常重要的全球化争论中的—个亚主题)。有竞争力的国家能够在全球竞争中做得很好——而且这通常意味着具有强大劳动纪律的低工资国家会比其他国家做得好—些。因此,劳动力控制成了全球化争论中—个至关重要的意识形态问题,再—次地迫使传统的社会主义主张采取守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样—个新自由主义和市场自由理应更加规范的年代中做得相对较好的却是以社团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权威主义的、相对同质的地域——像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然而,既然拥有重大政治和军事权力的中央权力(美国就是—

例)仍然能够提供保护使经济力量的选择性分散继续进行,那么过去和现在就一直存在着对民族国家中资本主义经济权力合理分散的限制。

7. “全球化”表面看来似乎提出了一套新的全球性环境和政治问题。我之所以强调“从表面看来”,是因为尚不完全清楚这些问题本身是新的,还是我们通过全球化越来越注意到它们。例如,长期以来我们对人口和资源之间的不平衡所造成的社会分裂存在着普遍的、有时是强烈的畏惧——可以说是马尔萨斯的幽灵。但是,有一种意识越来越强,特别是在1972年以《增长的极限》为名的那篇著名的“罗马俱乐部”报告发表之后,这就是:先前为了经济发展、移民、资源开发和建设污染汇集地而形成的一些开放边界所赋予的灵活性正在流逝。全球人口的迅速增长、逐步上升的污染和废弃物的产生、环境退化及经济增长的方式已引起了一系列的全球关注,其中经济增长的方式对不可再生资源 and 可再生资源的使用是相当挥霍浪费的(如果还不是完全破坏性的话)。再加上人们已经认识到,小范围的活动(诸如像 DDT 之类各种杀虫剂的局部使用)可以制造广泛的(有时是全球性的)生态后果,或者说急速发展的矿物燃料的使用规模一直在恶化气候变化,而且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也一直在加速,很明显,环境问题将以从前所不曾广泛体验过的方式在全球关注中占据突出地位。可以说,传统的环境关注(比方说,关注清洁的空气和水、景观保存、健康的生存环境)已经从地域性(常常是城市或区域的)向着更加全球性的规模转变。

67 8. 最后就是那个棘手的问题,即我概述的基本过程与下列这些因素的保护和生产之间的关系,这些因素就是文化多样性、不同生活方式、特殊语言和宗教方式以及非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消费模式的技术环境。此外,还有一种文化干预、交叉影响和转让的长期历史地理学,但这些流动的规模和程度却暗示了文化渗透的一个新阶段(其特点是迅速和轻快),它对思考和理解的模式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个问题是棘手的,因为把它仅仅看成是通过市场交换而迈向全球文化均质化的运动显得太过简单化了。有大量迹象显示了各种各样的对立运动:从把文化差异当成商品的市场行为,到那些对全球市场的同质化影响所作的强烈文化反应,以及渴望保持独特性的刺耳声明,各有不同。当然,在所有这些东西中,没有什么是完全新颖的,也许下列这个原始的事实除外,即全球市场暗示了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不受市场的影响。地球人类文化的地图正在快速的调整之中。正在争取的地理限制和正在发生的对传统的众多创新都在表明,这是人类行为的一个动态领域,它正在以某种不可

预知的方式运行着。然而,我认为有一点还是不可否认的,所有这些都是由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冲动强烈地驱动着(虽然是在不同的方向上)。

#### 4. 时代的征兆

对于这些趋势,可以提出两个广泛的问题。我觉得,虽然每个人都会勉强承认已经发生的量变,但真正需要辩论的是:这些量变是否大到这样的程度,当它们积累起来便使我们处于性质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纪元,从根本上要求我们改变理论概念和政治机构(更不用说我们的抱负了)。这个事实主要由纠缠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后”表示出来(如后工业主义、后现代主义)。

68

这样看来,是否有一种基于这些量变而发生的质变呢?我有保留地回答“是的”,并立即要附加一条声明,即在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相关联的社会关系中没有发生任何根本性的革命,并且,如果确实有任何实质性趋势,那它也是再次声明19世纪早期的资本主义价值,以及21世纪喜欢把每个人(以及每样可以用来交换的东西)都拖进资本的轨道同时又使大部分世界人口与资本积累的基本动态相比永远显得多余。这就是“无刹车的灾难列车”这一当代全球化的强大形象开始发生作用的地方,那一形象也是国际资本所承认和惧怕的东西。或者,正如约翰·格雷(Gray, 1998)这种心怀不满的保守派所评论的,虽然“全球自由市场的乌托邦没有像共产主义那样给人类带来损失”,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造成的痛苦可能与之旗鼓相当。”

如果必须严肃对待有限质变的主张,那问题就在于如何重新表述理论和政治学。正是针对此,我所提议的从“全球化”到“不平衡地理发展”的语言转变提出了大部分问题。不平衡状况为政治组织和行动提供了大量的机遇,但它们也提出了特别的难题(例如,如何应付文化多样性的压力,或者如何应付贫富区域之间巨大的收入不平衡压力)。既理解潜力又理解困难,这对于一种恰当政治学的明确提出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正是在这点上,全球化问题作为一个明确的地缘政治方案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在这方面,存在着两个主要的特征,它们共同作用从而在最近推动了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使它具备了独特的形式和风格。第一个特征是这样一个赤裸裸的事实:全球化无疑是一场主要由美国(还有一些臭名昭

著的同盟,如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发动的地缘政治讨伐运动的后果。正如我在后面(参阅第5章)将要论证的,这就是一场乌托邦的运动,它愈益受到来自激进派和保守派的同样程度的批评(比较左派和右派最近联合起来攻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调节世界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全球化作为一个过程自从1945年起就一直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如果没有美国充当整个过程的驱动力和监督人,那它根本就不可能以它所具有的方式发生。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的特殊需要和作用方式(交易方式、企业文化、个人流动性和消费主义的传统、个人权利、法律和民主的政治概念)和全球需要之间的某种混淆。美国在这么多年间经常是本土思考、全球行动,甚至过于频繁而使我们熟视无睹,但忽视这一点是很难的。因而,对于“谁把全球化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个问题,答案自然就是资产阶级利益,它们通过美国外交、军事和商业政策的代理机构而运行。

69 但如果来自各地的大量支持,美国是不可能把全球化形式强加到我们头上的。世界范围内许多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或多或少乐于与美国政策结成联盟,并在美国军事和法律保护的框架之下运行。然而,在某些情形中,在认为可以控制政府的地方,他们会抛开其支撑,尽管常常要具备足够的地方灵活性(在这里就想到了戴高乐的法国)使他们看起来似乎正在抵抗由美国所宣扬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普遍扩张。在另外一些情形中,最著名的就是日本,全球化既回应了这样一种独特方式,又以这样一种独特方式来经营,从而创造了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竞争者。但即使在这种情形中,也还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认同,即全球化对国家的生存来说是必需的。然而,日本的情况不是惟一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认清这样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即全球化如何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各个不同的代理机构(特别是民族国家的政府)地方性思考全球性行动,这完全与美国作为霸权力量驱动整个过程的方式如出一辙。

对于左派来说,蕴含于所有这些变化中的首要意义在于,与世界其他地方劳动力的处境相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相对优越地位已经大大降低了(这种转变最明显地可见于过去20年,纽约和洛杉矶这些地方的血汗工厂再度成为产业组织的基本形式)。第二个意义在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状况已经感觉到了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的全部冲击了,这种创造性破坏导致地方、区域和国家经济前景的极度反复无常(今年繁荣的城镇到明年就成了萧条的地区)。新自由主义为所有这些所进行的辩解就是:假如国家干预(他

们应该加上垄断力量,虽然他们常常不这样做)尽可能地少,那么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将会为所有人谋福利。结果就是:不平衡地理发展的暴力和创造性破坏(比如说,通过生产的地理重组)在资本主义传统的心脏地带也可以像在别的地方一样广泛地感觉到,可以在那种特殊的富裕和挥霍性消费技术中广泛体验到,这些技术作为一种潜在的渴望瞬间传播于全世界。难怪甚至是全球化的倡导者也不得不认真对待这种激烈反应的情形。正如克劳斯·施瓦布和克劳德·斯马迪亚——富有影响的达沃斯论坛的组织者(Friedman, 1996)——这些长期支持全球化的倡导者所提出的:

经济全球化已进入一个关键性阶段。不断增长的、对其结果的对抗情绪——特别是在工业民主政府中——对许多国家而言正预示着一场对经济行为和社会稳定的破坏性冲击。这些民主政府中弥漫着一种无助和焦虑的情绪,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会出现一种新型的民粹主义的政治家。这很容易转变为反叛。

直到1999年,施瓦布和斯马迪亚(Schwab and Smadja, 1999)仍在迫切地寻找一些途径来给全球化戴上一副人的面孔。他们运用浮华的辞令来回应萨帕塔党人的某些观点(见下文),他们写道:

我们必须证明:全球化不只是牺牲任何其他事项而惟一关注股东价值的符码,货物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不会损害到最脆弱的人群及一些公认的社会和人类标准。我们需要想出一种办法来表达全球化的社会影响,它既不是福利计划的机械扩展,也不宿命地认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与不能在全球系统中聚集技能并满足一体化需求的那些人之间所存在的分界线会越来越宽。

或者,如约翰·格雷(Gray, 1998, 207)所总结的:

我们不是站在由自由市场商人所设计的繁荣时代的边缘,而是站在一个悲惨时代的边缘,在这个时代中,无政府主义的市场力量和萎缩的自然资源把主权国家拖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竞争之中……全球

市场竞争和技术革新相互作用,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世界经济。这样一个经济机制必定会是重大地缘政治冲突的场所。较之亚当·斯密或弗里德里希·冯·海耶克,托马斯·霍布斯和托马斯·马尔萨斯更好地把我们领向了全球放任政策所创造的世界当中,这是一个充满战争和短缺的世界,至少差不多缺少善意竞争的和谐气氛。

这种保守主义评论者令人感兴趣地采取了几乎与马克思完全相同的分析立场(比较我自己的著作《资本的限制》第12章和13章,或者 Greider, 1997)。  
71. 对自由市场全球化的强大的反应热潮正在到来(比较乔治·索罗斯这样杰出的资本主义投机商/金融家在1996的著述)。

社会主义运动必须设想出利用这些革命潜能的方法。它必须对抗多重的右翼民粹民族主义(像美国的帕特·布坎南所提倡的那样),它们往往会彻底诉诸一种地方化法西斯主义(法国的勒庞或意大利的伦巴第联盟)。最低限度,它必须聚焦于建设一种在社会上公正的、在生态上敏感的替代性社会。然而,为了有效地做到这点,它还必须与目前存在的全球化条件及日益增长的对它进行改革和管理的各种不同要求相妥协。最重要的是,它必须学会驾驭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强大风浪,这种风浪使得组织草根(运动)和大众运动异常危险和困难。如果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与资产阶级的全球化作斗争(比较第3章),那么必须找到使理论和政治实践可以灵活地运用于空间的那种方式,就像资产阶级已经证明的那样。

可以运用一种有益的方式来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首先要问:可以在什么地方发现反资本主义的运动?答案是:到处。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发现对资本主义制度愤怒和不满的示威运动。反资本主义运动被强烈地灌输到了一些地方或一部分人群之中。局部化的“战斗的特殊主义”(我再次使用雷蒙德·威廉斯的措词)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现,从密歇根丛林中的民兵运动(大多数是极端反资本主义、反社团主义的,并且也是种族主义、排他主义的)到墨西哥、印度、巴西等国反对世界银行发展计划的运动,再到世界各地到处发生的数不清的“IMF 骚乱”。甚至在资本积累的的心脏地带也运转着许多的阶级斗争(比如1995年秋天法国意外爆发的暴力事件,以及1997在美国发生的取得胜利的UPS工人罢工)。

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空隙中隐藏了一个真正的反抗酵母。但是,这种反抗尽



管具有战斗性,却通常仍保留着特殊主义(有时极端如此),并常常威胁着要联合周围发生的排他性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因此,说这种反抗是反资本主义的并不是说它一定是亲社会主义的,广泛的反资本主义情感缺乏一致性的组织和表达方式。一种反抗或抗议运动的发展可能会搞混或有时会抑制其他的运动,使得资产阶级利益集团非常容易分割并控制他们的反抗。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力量之一就是致力于把目标相异而又多重的各种各样的斗争综合成一个更加普遍的反资本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传统对此有着巨大的贡献,因为它首创了在多样性和差异性内部发现共同性的工具(即使它有时使前者太容易淹没于后者之中)。当前综合多重斗争的工作必须与时俱进,因为这些斗争发生的领域和地带以及它们所提出的问题永远会随着资本主义动态和相关全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因而,雷蒙德·威廉斯强调“捍卫和发展某些特殊利益,使之完全地集合”从而为“一般利益”打下基础,这就说明了需要表达的核心任务。受这个传统的启发,我将试图提取许多对当前事态似乎特别适用的论据。

72

## 不平衡地理发展和普遍权利

1996年1月30日,墨西哥恰帕斯的萨帕塔国民解放军发出呼吁,号召“全世界团结起来反对新自由主义,支持人道主义”。他们提议那些在全球化过程中反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人召开一系列的洲际代表大会。他们的呼吁(以不同的方式得到了部分响应)指出,货币权力到处“贬低尊严、危害诚实并扼杀希望”。改名为新自由主义之后,“集中于特权、财富和免除惩罚的历史罪行把不幸和无望都民主化了”。他们认为,“全球化”这个名字意味着“诋毁和忘却的”“现代资本战争”。这种新自由主义“给我们提供股票市场价值指数而不是人道主义、全球性的苦难而不是尊严、空虚而不是希望、国际恐怖而不是生活”。他们认为,为了对抗这种国际恐怖,“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希望国际”。倘若每一个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暴力影响的人能够在政治上团结起来,那么全球化作为“无刹车的灾难列车”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甚至连全球化的鼓吹者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点。

左派出于各种或好或坏的理由着迷于萨帕塔主义的例子。首先,萨帕塔主义者充分地利用了现代通讯工具。他们特别重视运动的方式,把因特网当作动员工具用来宣传国际活动,包括工人权利、人权、妇女权利、环境公正等等。有一些运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反对全球(特别是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耐克工厂工作条件的反耐克运动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而1997—1998年的运动(由环境组织领导)向多边投资协议(有关于外国投资的条件,它可以凌驾于国家实体之上合法地授权给跨国资本)提出了挑战并且将之击退,这就例证了跨

74 国公司的全球计划可以通过全球性的反抗而有效地予以反击。萨帕塔主义运动的另一优点正好在于它坚持认为,那些正在受到反抗的不幸,在各种原因背后隐藏着一个共同性。暴动发生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生效的那一天,这个事实象征着:自由贸易——新自由主义花言巧语的迷人颂歌,或者如

《共产党宣言》中所述的，“单纯的不合理的自由”——的结果才正是所有问题的实质。而且，在面对由国家权力支持的同质化的商品化势力时，它在根本上诉诸权利和劳动尊严、本土生活方式和区域生活方式这些观念。

但是从消极的方面来看，接受萨帕塔主义运动无疑具有某种边缘性的“浪漫”特色，想象它应该是全球化各种形式之外的“真正的他性”，认为它能够在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经常性地包围并腐蚀反对力量。这样，萨帕塔主义运动就属于各种类似运动的范围，诸如尼泊尔的契普科运动，亚马逊河流域的济科·孟德斯和采橡胶工人，或者美国的印第安人，他们通过主张自己的文化身份而获得了普遍的关注。他们看起来似乎是“真正”替代同质化和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真实的”承担者。这样描绘左派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一般反应，并不是认为维持或保护独特的文化身份的斗争是不相干的，或者说在政治上是无意义的——远非如此。它也不否认边缘化的经验是建立更具普遍政治学的重大运动的关键资源之一。确实，破坏独特文化形式和机构是新自由乌托邦主义最重大的失败之一，甚至像约翰·格雷这样的保守派也这样认为。但是仅仅依此来创建一个普遍政治反应就恰恰落入了这样的陷阱之中，即把“文化”从“政治经济学”中分离出来，并且因为前者的本质主义、特异性和特殊性而拒绝后者的全球主义和普遍性。

在此遗漏的就是对建构历史地理遗产、文化形式和特定生活方式这些力量的理解——这些力量在资本主义商品文化及其时空动态的长期历史中无处不在，但又不局限于此。比如说，萨帕塔主义长期以来就深受殖民化和资本主义过程的影响，他们的运动以及对诸如“尊严”——这个概念在1948年联合国人权宣言中很突出——这些启蒙价值的需求就如同它是周围环境的映像一样，只是一个历史产物。

我把在不平衡地理发展一般理论的类别下创造并维持这些特殊多样性的力量联系了起来。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描绘这样一个理论呢？

## 1. 谋求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理论

75

下面的论点有两个基本组成部分。第一个关系到“空间规模的生产”，第二个关系到“地理差异的生产”。我先笼统地概述一下。

## 空间规模的生产

人类很典型地创造了一个嵌套的空间规模的等级制度,在其中去组织他们的行为、理解他们的世界。显而易见,家庭、社区和国家是在不同规模上存在的当代组织形式。当今世界,当我们从全球、洲际、国家、区域、地方或家庭/个人等规模来分析问题时,凭感觉马上就会知道,它们看起来是很不一样的。在一种规模上似乎很重大或有意义的东西却不会在另一种规模上自发地表现出来。但是,我们也还知道在一种规模上发生的事情如果超出了贯穿于各种规模等级而存在的嵌套关系,那就不能够被理解——个人行为(如驾驶汽车)会产生(当这些行为累积起来时)地方和区域后果,而这些后果会在洲际范围的问题上达到顶峰,比方说,酸性物质的沉淀或全球变暖这样的洲际问题。然而,这样一种直觉的分类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使得规模看起来似乎是永恒不变或者甚至是完全自然的,而不是变化着的科技、人类组织的模式和政治斗争的系统产物。

这并不意味着相应规模的确定可以超出于所谓“自然的”组成成分或影响。调控土地、水和空气本身状况的生态过程和多重物理过程在各种不同的规模上运行(通常在物理和生态科学中这样表现)。“生态系统”可能从何处开始并在何处结束,什么样的“实体”可能会处于什么样的规模之上(池塘或陆地?),这些问题对于如何阐述在生态上敏感的政治学这个全新问题是极为重要的。因此,正是通过与所谓“自然过程”的量之间的动态的相互作用,人类才生产并例证他们自己的规模以追求自己的目标、组织自己的集体行为。

我们来讨论一个已经简单提过的例子。变化着的领土这个例子清楚地表明了不存在什么“自然”的政治边界,即使自然特征在它们的定义中经常会发挥某种作用。说到底,领土是政治斗争以及科技和政治经济条件下所做决定的结果。76 欧盟的形成(一个长期的过程,开始于1948年的莫内计划)提供了一个长期的例子,它表明了一种领土性质从一种规模向另一规模转变的历史过程,但是在这种规模上发生的变化在其他地方会有暗示。例如,应该如何解释(既从领土组织方面又从领土权力方面)地方政府,当代在法国就存在着争论。在管理与“集体、区域、欧洲”(反映了在欧盟层次上形成的新现实)相对的“地方、部门、国家”(有其强大的传统吸引力)的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分裂。这种政治斗争的结果对于人们组织他们共同生活的方式有着重要意义。事实上,相对于民族国家和全球力量,正在变化的地方和大城市政府权力(我想到了下列

事件中的每一件事,从都市间为了跨国投资和“都市企业主义”而展开的竞争,到授权一系列的地方政府采取行动以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里约协定第 21 条)已经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方式,人类组织的特定规模凭借这种方式在过去 20 年中加强了它的作用(范例可参考 Borja and Castells, 1997)。

当然,人类行为会在什么样的规模上得以调控深刻地依赖于技术创新(交通和通讯系统是至关重要的)和变化着的政治经济条件(贸易、地理政治的竞争和联盟等等),因此,它们规定阶级斗争必然发生的那种规模,同时也是阶级斗争及其他政治/社会斗争形式的结果(参见 Herod, 1998)。正如斯温格多夫(Swyngedouw, 1997, 141)所主张的:

空间规模永远不是固定的,但却按照它们的程度、内容、相对重要性和相互关系而不断地重新定义、竞争和重建。例如,当前有关于欧盟内社会、劳动、环境和货币调节的规模是地方的、国家的、还是欧洲的,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表明特殊的地理调节规模不断地被争夺和改造。很明显,相关社会权力的地位将根据谁会在什么规模上控制什么而有很大的不同。

再举一例,在美国**进步**时代,当市政府对资本积累采取过多的反对力量时,资产阶级就转到了一个不同的规模上,并且在它更容易控制的联邦政府内倡导权力的集中化(玛格丽特·撒切尔解散了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大伦敦议会,并且出于完全相同的理由改组了地方政府)。把合法权力重新定位到诸如世贸组织(WTO)——该组织提出了更加阴险的多边投资协定(MAI)这个傀儡——这样的国际组织以及像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这种大规模实体的形式上,这一行为从政治上来看同样是由资本主义阶级的利益所引导。那些反对力量经常从别的方向入手,例如,分裂主义运动和对地方自治权的要求(如萨帕塔党人所表达的那些要求)站出来保护少数民族、实际生活水平和福利保护制度,或者环境价值(在这里,“小亦美哉”这个口号有相当大的市场)。

即使当我们把一个特定规模——比如说某个城市规模——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结果仍然证明它还是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发生显著转变。像巴尔的摩这样的城市/地方所确定的规模(见图 3.1),现今已完全不同于 200 年前的情况。政治经济的含意、社会性的含意和有可能被置于城市观念之上的意义的含意

(回想一下柏拉图的观点,他认为理想国的城市人口应该不超过 5 000 人)多得  
不计其数。

因此,从所有这些观点来看,我们可以富有意味地谈论人类事务中的“规模  
生产”,并将其视为任何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的一个生死攸关的方面(参见  
Smith, 1990; 1992)。很明显,今天人类活动的等级规模与 30 年前完全不同了,  
“全球化”部分地预示着那种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

### 地理差异的生产

考察任一特定规模的世界,立即就会揭示出一系列的结果和过程,它们制  
造了不同的地理差异:生活方式、生活标准、资源运用、与环境的关系以及文化  
和政治形式等各个方面。人类占据地球表面以及嵌在不同地方中的社会形式  
(语言、政治机构、宗教价值和信仰)的非凡进化,这一长期的历史地理创造了  
特别的社会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地理拼嵌图。这个拼嵌图本身是“重写  
本”——由在多种层次上互相叠加的部分遗产的历史增加物所组成,就像不同  
时期不同的建筑,它们在拥有古老身份的当代城市的人工环境中被分成了很多  
层次,一些层次比另一些层次更为显著(人们会想到博伊奈战役及北爱尔兰自  
治区天主教和新教的分离,直到今天,这一分离在这个地区仍然具有极大的重  
要性)。这个地理拼嵌图是人类多种行为随着时间而不断加深的产物。

78 但是地理差异远远大于纯历史地理的遗产。它们总是不断地被当前发生  
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态过程所再生、维持、破坏及重构。思考地理差异如  
何在眼下被生产出来非常重要,就如同仔细研究历史—地理原材料如何从前一  
轮的行为中传下来一样重要。例如,投机商(背后有雄厚的国际金融支持)试  
图从地租增长中获得最大化收益,他们这种行为正在从根本上重塑上海、莫斯  
科、伦敦和纽约等大都市的环境。对级差地租的更加普遍的追逐产生了资本投  
资强度上的地理差异,常常会确保资金充足的地区越来越富,而资金贫乏的  
地区则相对地越来越穷。不管怎样,级差过程是纯经济的,同样又是生态的、社会  
的。“生活风格小生境(lifestyle niches)”和“具有共同信念的共同体”(从同性  
恋文化区、宗教定居点和生态学者的社区,到自然保护团体所推动的荒野和野  
生动植物栖息地的保护计划等每一件事情)的发展相当重要,而且在特定规模  
上发生的自发生态变化(不过常常会带有强烈的人为影响,如在河道淤积、飓风和  
洪水灾害、全球气候变暖中发生的情况)也发挥了作用。

然而,部分由于发生于全球化过程内的质变,这些变化在近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从1965年开始就已经席卷全世界的非工业化和制造行业再定位的大浪潮说明了制造业和就业方面的地理划分正在以何种速度重构。经济力量同样地从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毫不费力地从美国流向环太平洋地带及东南亚,现在又回到原处),所以说,重视当代地理形态的易变性和流动性是很重要的。所有的城市和大都市地区(想一想首尔或者甚至是像巴塞罗那那样古老的城市)都在一代人的时期内被重构并在地理上发生了转型。文化变迁(特别是那些由跨国通讯体系所促进的变迁)同样也呈现出一种异常的风化和挥发状态。大量的证据(伴随大量的焦虑)显示,生态和自然系统正处于加速的变化状态(同时伴有大量随之而来的压力)。所以,即使地理变更反映并结合了来自于过去的物质、历史、文化和政治的遗产,由此就认定它们是相对静态的(更不用说永恒不变的),那也是严重错误的。地理拼嵌图在所有规模上总是处于变动中,不过它的当代变动性留下的普遍然而表面的印象却是全球无政府状态,而不是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系统生产力的耗尽。

79

### 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分析学和政治学

我认为,不平衡地理发展的一般概念需要把不断变化的规模和地理差异的生产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各种规模内外的差异、交互作用和关系。因为我们经常把自己固定在一个而且是惟一的一个思考规模上,把那种规模上的差异当成政治分裂的根本分界线,所以就产生了分析理解上和政治行动上的共同错误。我认为,这是从我们现在正遭受的所有全球化议题中产生的最普遍的错误之一,它错误地坚持,每一件事情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在全球规模上确定的。

这个问题非常严肃,我们需要对它进行简短而又详细的陈述。以亨廷顿(1996)的观点为例,他认为未来取决于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某一次重大冲突。他收集了大量的历史和观念来证明自己所言好像很有理。但最后,恰恰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与他的简化论点背道而驰的其他行为规模之间的层层相叠,所以即使是在全球规模上他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意义。不同的行为者和代理人常常跨越不同的规模进行行动(有时是巧妙地)。华裔企业家(具有一整套来自于他们自己文明历史的价值)形成了一个虽然分散但在种族上却紧密团结的与众不同的华人文化社群,他们按资本主义的方式(具有西方“普遍化的”关于财

富、权力和科技的概念)在全球经营。这些社群形成了常常是脱离于东道国风俗和律法的飞地,为华人企业家提供了大量受控制的、顺从的工人,使他们具有某种竞争优势。所以,这种由侨民实现的独特的全球化就依赖于在一个更加局部规模上确定的独特社群的存在。在那个规模上,纽约的唐人街就像一个保持了文化特殊性和同一性的社群(而且我们这些外人可能会在政治上对此表示赞同,如同我们享受中国餐馆的乐趣一样)。但这又完全忽视了全球华侨企业家控制下的在唐人街建立的一个高度剥削且常常非法的劳动关系。为了进行劳动控制,这些企业家还特别宣扬这种局部化的种族飞地的排他特性(有它自己的报纸和文化论坛)。回头看看亨廷顿的范畴,在这个例子中,哪里是东方和西方呢?

80

像唐人街这样的社群内所发生的事情是很难理解的,除非考虑到那些最初在其他规模上运行的过程(跨国移民潮、利率波动、贸易转移、产业活动的再定位、环境变化,等等)如何影响了它们。要增加这类范例并不困难,虽然它们分支不同(像 BCICC 这样的国际银行如何形成又如何崩溃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它说明了各类不同空间规模上存在的阴谋如何产生一个在所有的规模上都具有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的重大事件)。相反,正是萨帕塔党人有能力把与特殊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外人是很难察觉的)联系在一起的局部斗争转变为一个完全不同的分析学和政治学规模,才使得他们的起义如此瞩目,且在政治上如此令人感兴趣。

结果就是使那些只在一个规模上运行的所有思维方式无论如何都值得怀疑,要不就是完全误导性的。因而在概念上,它就难以与那些不断增加的、在数量上迅速变化的不稳定的地理差异共同发挥作用。这些问题变得非常复杂,且不容易在细节上弄清楚。所幸的是,关于如何把地方与全球联系起来,或者用斯温格多夫(Swyngedouw, 1997)那有点不雅的术语来说,如何分析“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这个现象,现在已经有了大量非常有益的文献。简化是不可避免地需要的,但关键还是要永远保持警惕。不平衡地理发展产生了各种既像资本主义计划又像社会主义计划的无意识后果。而且,习惯依据一个规模上测量冲突的透镜来解释所有事情,然后又按这些解释来行动,这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这是“冷战心理”最有害的方面之一,使美国把所有为社会正义而进行的斗争都用亲共产主义或反共产主义这样的术语来解释,从而进行其地缘政治的全球化运动)。



显然,我所概述的这类不平衡地理发展对于把多重特殊利益“彻底集合”成为某种一般利益的表达框架带来了严重的障碍。比如说,存在着许多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中,地方对获得资源、获得开辟美好生活的机会、获得基本的经济安全形式的关注远远胜于培养对重大问题进行全球关注的所有努力,诸如人权、二氧化碳排放、生物多样性的保存、对土地使用进行管理从而防止森林砍伐或沙漠化等等重大问题。

81

然而,也正是通过对不平衡地理发展的了解才使得我们能够更加充分地认识当前资本主义全球化轨迹中的激烈矛盾。这有助于重新定义政治行动的可能领域。例如,全球化在不同层次、不同地点带来了大量的自我毁灭、货币贬值和破产,它使全部人口选择性地容易遭到一些损害:诸如规模缩小、失业、公益事业瓦解、生活水准退化、资源和环境质量损失。它把现有的政治和法律机构以及文化结构和生活方式置于危险之中,这种情况在各种空间规模上都有发生。当它把财富、权力和政治经济机遇集中于一些特殊地点和有限的少数人群时,所有这些会在多个规模上同时发生。

这些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因地区不同而在强度上各有差异。因此有必要记住,全球化总是特定的权力在特定的地方所追求和支持的特殊计划,这些特定的权力从贸易自由中一直寻求并已经获得了惊人的利益以及财富和权力的不断增加。但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许许多多的反对意见恰好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地方化语境中形成,它们迫切需要某种方式接合为一种普遍的相反利益。这就要求我们超越特殊性,要求我们强调跨越地理规模和差异而形成的那种灾害性**样态**和系统特性。于是,这种样态就被描述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形式的不平衡地理的后果。

因此,这种分析可以向外拓展,包含大量不同的、表面上看来不相关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像艾滋病(这是非洲的一个毁灭性问题,在那里的一些国家中,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人都是 HIV 阳性)、全球变暖、局部环境退化、地方文化传统的破坏,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实质上可以理解为阶级问题。以阶级斗争来创建某类国际共同体可以更好地减缓广阔社会生态行为领域中的压迫状况。我强调,这不是呼吁多元化,而是呼吁我们努力去揭示广泛的反资本主义事务的阶级内容。这个观念将会遭遇到来自于激进左派的反对,因为阶级分析常常会被当作保守类别的纯宗派主义而不被考虑(更不用说在媒体和学术界内作为**僵局**而被抵制)。但在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对任何有效的政治

82

行为来说都将继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口号,而且那必然就意味着某类阶级政治学,不管它是如何定义的。

然而,这样的综合工作却必须要在日常生活的有机条件中重新扎根。这并不是要放弃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所传给我们的抽象概念,而是要通过深入各类规模上的大众斗争来使那些抽象概念重新生效,使它们得到重新评价,那些大众斗争有一些在表面上似乎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斗争。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有它自己要斗争的僵化趋势,在概念、机构、实践和政治方面有它自己的内含的固定资本,这些一方面可以当作一种极好的资源,另一方面也可以是阻碍行动的一种教条。我们需要洞悉在知识和政治学的这种固定资本中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无益的,而且对于该抛弃什么、该坚持什么如果不经常有一些痛苦的争论,那倒会让人感到奇怪。不过,这样的讨论肯定还是要进行的(参见第四部分)。

例如,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范畴——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看起来过分简单化而不能完全抓住现今存在的失衡时空发展的错综复杂性。也许它们一直都是如此,但资本主义再领土化、重新空间化,特别是在过去的30年间的行动,使这些范畴似乎过于粗糙而不能解释阶级斗争必定会在其间展开的地理政治的复杂结构。虽然像“全球化”这样的术语因为削弱了社会主义和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影响而重复了那种错误,但我们还是不能通过回归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修辞而重获政治主动权,无论那几个术语的政治内容多么超凡出众。在这里,我还相信,向不平衡地理发展这个概念的转向将有助于重视真正需要完成的任务以及迫切需要联合的多重战斗的特殊主义反抗运动本身所固有的政治潜能。

对规模问题的思考把我们的注意力拉回到了反抗运动有可能在其中形成的“适当的”规模。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多年来的重大(在我看来则是不幸)分歧部分地在于反抗运动应该得以确立的特定规模以及一种替代社会形式应该得以设想和建构的规模(参见 Forman, 1998, 以及 Thomas, 1985)。在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也存在着类似的分歧,例如,在倾向于相信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之中,他们要么必定是全球性的,要么什么都不是,要么是更加传统的共产主义党派,相信赢得国家权力是最重要的、直接的(事实上也是唯一的)、值得讨论的目标。在我看来,通过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所有这些分歧都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更清晰的表述。这样,它们之间的潜在联合(与它们之间

常常是痛苦的分化成对比)就会被当作是如何连接各种地理规模上政治行动的问题了。

在这点上存在着一个更进一步的相当重要的组织意义。马克思主义干预的传统方法一直就是通过先锋政党。但是,把通常在一个特殊规模上规划的单个目的、单一目标和简单目的叠加到具有多样目标和标量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上,这会产生困难。正如马克思主义传统内的许多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冲动在这里制造了自我否定的危险。为实现一个规模上的目标,它抑制甚至是压制另一个规模上的目标。因此,有必要理解:为了人类自身的发展而解放他们就是要打开规模和差异的生产,甚至开放在差异和规模的内部及其之间展开竞争的地带,而不是去抑制它们。这就是右派有时力争的东西——虽然它很少去实施这点,正如它向宗教原教旨主义的转向所表明,但我们应该注意那种论点的力量。例如,可以很轻易地把与商品化相反的真实的文化分歧(我指的是有感情的且具有社会嵌入性的东西)的生产作为反资本主义斗争的目标提出来。创造一个统一的、同质的社会主义个人,这个目标似乎从来就是不可能的。毕竟,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产生相对同质的资本主义个人的支配力量,而且把所有生物和文化差异都还原为不平衡地理发展的一个共同的商品化形式,这本身就产生了强大的反资本主义情绪。的确,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像它关注某种相似条件的创造一样关注从那种乏味的同质性中解放出来。然而,这并不是一个不加限制的相对主义或后现代折衷主义的托辞,而是共性/差异、一个人的独特性与他者的普遍性之间关系的严肃辩论。而且,就是在这里,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如何运行、社会关系如何展开以及人类潜能如何实现的一个替代见解,本身就成为了概念工作的焦点。不平衡地理发展需要从它们的资本主义镣铐中解放出来。

## 2. 政治的普遍性和全球主张

把全球化的“全球性”与(对真理的、道德规则的、伦理的、或权利的)更加一般的普遍性主张混同起来,这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然而,忽视这两者之间相当强大的联系也是错误的。因此,我打算更加密切地关注这种关系。我会支持某类普遍主义,在其中,人类利益的不平衡地理发展可能会以更有趣的、更具

生产性的方式繁荣昌盛。在这里,在一个规模上恰当地创造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全球与普遍被混为一谈——会被视为在另一规模上创造政治和经济替代方案的必要(虽然不是充分)条件。

最近时期的全球化阶段已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普遍性的未决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全球化迫使我们以政治辞令,甚至从政治经济学的事实出发来仔细思考地球上的“类存在物”特性,与此同时,它还迫使我们仔细思考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全球化系统中我们相互之间藉此发生关联的那些规则和习惯。这些情形在整个差异和他性的世界里增添了某种共性(在环境辩论中特别明显),那是后现代圈子中政治理论化的通常收获。事实上,整个后现代运动完全可以被当作是这样一项运动,它庆祝或哀悼无论怎样都已处于灭绝边缘的东西。“他性”和“差异”(甚至作为一个调节性理念的“文化”观念本身,正如里丁斯[Readings, 1996]如此尖锐地提出的)变得对我们很重要,恰恰因为它们当代不平衡地理发展的政治系统内越来越失去实践相关性,正如它们开始为痛苦的种族中心主义和社群主义暴力提供基础一样。

再看看我们大多数人开始称为“地方/全球连结”的政治辩论在当代的显著性。对“地方性知识”(很大程度上由吉尔兹发扬光大的一个主题)及地方文化的迷恋、对“地方”的政治学及“地方建构”的政治学的迷恋明显地存在于每一地方。它繁殖了极广泛的横跨各类学科的文献,这些文献描述了各种局部变化,诸如:生活方式、感觉结构、知识形式、社会关联模式和生产模式、社会生态结构、价值和信仰,等等。它同样还繁殖了一类规范的文学文本,在其中,某类地方主义或社群主义(有时是乌托邦思想)被树为我们所渴望的社会生活理想,被树为一个适当的结构,通过这个结构,所有普遍化的概念(如正义)被中介和翻译成特别适宜接受的地方术语。

85 在此,我并非试图评论和分析这些汗牛充栋的文献,但我确实想要得出一个关键性的结论。它本身至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理解为近期全球化趋势的一个独特产物。因而,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这些占主导地位的论题:

1. 作为一种返祖现象或一种落伍状态,在其中,对往昔时代(如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意识(被语言、教育、话语体制、媒体、政治煽动等所推动)在面临迫切需要采纳纽斯鲍姆(Nussbaum, 1996)所称的当今世界所特有的“世界主义”时得到了维护;

2. 作为政治的乃至乌托邦渴望的中心,它期望一种更加简单的、较少变动

的、更易处理的、安定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建立在地方基础之上的有感情的、个人之间的直接关系在面临表面上看来抽象的、非个人的全球化势力面前得到了促进和增强;

3. 作为一种认识:对大多数人来说,感官体验的和情感社会关系的地形(它构成了意识结构和政治行为的物质基础)局部地受限于这样一个纯粹的事实,即身体和个人被物质性地嵌入到特定地方化生活的氛围中。

因此存在着三种反应方式。第一种是哀叹旧秩序的消逝并要求恢复往昔价值标准(宗教、文化、民族团结,或诸如此类)。当前有关左派(比较 Greider, 1997)和右派(比较 Gray, 1998)的大多数思想都不可救药地在其描述和预见中感染上了怀旧之情。

第二种就是追求某种社群主义的乌托邦幻像(包括民族救赎的运动,作为对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异化和抽象化的回应)。现在,许多政治运动就有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趋势,有时诉诸某类政治神话,再加上对失去的有机共同体之黄金时代的怀旧之情。

第三种就是认真对待全球化并提出萨帕塔党人在墨西哥南部的山区大撤退中提出的普遍主张。这些主张严格地依赖于地方经验,但操作起来却是更加辩证地与全球化有关。比如说,他们诉诸地方文化形式的嵌入性,同时运用了隐含在流行观念中的矛盾,那些流行观念散布于有关“做事”规范和方式的世界以及定义“自由”和选择权的方式之中。全球化暗示着广泛地(虽然常常是非正式地、勉强地、有缺陷地,甚至是表面上地)接受一定的资产阶级法律观念、权利观念、自由观念,甚至是有关善良和美德的道德主张。这种接受虽然常常是勉强的,然而,它却是某种无所不在的政治的必然结果,这种政治在全球为资本投资、资本积累以及劳动力和资源的开发利用维持着开放的机会。这曾经而且现在依然很明显地体现在处于美国权力保护之下、为全球化而战的边缘政治运动的道德维度中。保持世界的民主安全及自由表达的安全曾经而且现在依然被认为紧紧地依赖于保持世界资本的安全,反之亦然。这就是为进步的政治行动形式创造机遇和潜能的当代全部悖论和矛盾的根源所在。

以1948年签订的作为《联合国宪章》一部分的《世界人权宣言》为例。它主要是应美国的要求而创立的,而且马上就被当作工具用于冷战期间的斗争之中。但它也是一个相当无力的工具,尤其是每当美国面临自己的政治私利时就对它不理不睬。由此,大赦国际作为一个跨国组织在1961年创建,致力于在地

缘政治上被区分的、社会上被分割的但也是全球化的世界中提出普遍权利的问题。然而,这些权利的含意也只是在最近 20 年才呈现出一种新型的显著性(某种程度上是随着非殖民化斗争的结束而开始的,像在非洲和亚洲发生的那样)。在卡特总统任期内,人权问题变得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在中美洲和南美洲)。随着冷战的结束,把这种工具直接运用于狭隘的政治目标已越来越不多见(也有例外,最臭名昭著的要数对中国和古巴的态度)。《世界人权宣言》的实施问题现在作为一组被角逐的普遍原则盘旋在世界的头上,期待着应用(参见 Alston, 1992)。因此,在当代全球化环境下,我们怎样来利用这些原则呢?

我们当然可以采取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立场(马克思在对蒲鲁东“永恒正义”概念的攻击中已开创了先例),坚持认为,所有的权利概念都受到了资产阶级制度的约束,因此围绕这些主张所建立的任何政治学都是纯粹的改良主义。或者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广泛的后现代立场,攻击它们只是错误的启蒙思想样式的养子,不能适应难以沟通的世界和无法调和的文化差异。而且大量的迹象集中表明,普遍性主张太容易成为镇压和统治其他利益集团的工具,这种主张无论怎么说都因为过深地嵌入 18 世纪自由主义的概念而不能为了任何其他的或更深层的解放目标被动员起来。

87 我们所能做出的选择就是要认识到所有普遍性主张都充满着困难,而且改良主义和革命之间的区别永远也不会像马克思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尖锐。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区别也不那么容易确定。所以说,问题就在于找到拓展和扩大人权范围的方法,尽可能地赞同保持差异的权利或者“空间生产的权利”。对人权的任何严格且狭隘的解释都肯定会受到争论。但实际上我们注意到,当联合国准则的含意和应用不得不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从一个场合到一个场合经过斗争才能取得(比较 Alston, 1992; Phillips and Rosas, 1995),甚至使 1948 年的一些既定原则成为实质上形同虚设的规定,而同时在另一些情况中则为了面对新问题(如前南斯拉夫和苏联所遭遇的问题)而发掘出大量被忽视的权利(如少数人的权利)时,这种争论在过去 50 年中已成为一种相对持久的特征。

当然,争论在一开始就存在。例如,美国人类学协会执行委员会在 1947 年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递交了一份集体声明。这份声明一开始就指出,在世界秩序中,“尊重不同人群的文化”就如同尊重个人一样重要。对后者的尊重必须要把个人当作“是他所属社会团体的一分子,他接受的生活方式塑造了他的举

止行为,他的命运由此不可避免地受到约束”。声明还进一步担心,世界人权宣言似乎会成为“仅仅从西欧和美国普遍流行的价值角度来构想的权利宣言”。

在努力改善这种困难的过程中,执行委员会坚持,任何权利宣言都必须认识到“价值”和“欲望”如何在明显不同的文化背景中通过微妙的学习过程而达到。然而在不同信仰体系之间保持宽容却是可能的:

在西欧和美国的历史中……经济扩张、军备控制和新教传统已经将文化差异的认识转化成了对行动的召唤。这已经由那些强调价值和目标领域中绝对观念的哲学体系得到了加强。自由的定义、人权本质的概念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就这样被偏狭地定义。其他方案在非欧人种遭受控制的地方受到了谴责和压制。不同文化间**相似性**的硬核一如既往地忽视。

这种观点的后果对人类来说是灾难性的……

然后,执行委员会提出三条基本建议:

88

1. 个人通过他的文化实现自己个性,由此对个人差异的尊重就伴随着对文化差异的尊重。

2. 对不同文化间差异的尊重通过这样一个科学事实得以确认,即:尚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从质量上评估文化的技巧。

3. 标准和规则与它们来源的文化有关系,因此对来自于一种文化的信仰或道德法规的基本原理进行系统表达的任何努力都肯定会极大程度地削弱任何人权宣言对全部人类的可适用性。

文化相对主义和对普遍主义的批判评论很久以来就是政治和学术思想的特征。但执行委员会非但没有提倡一种“无形的相对主义”,如一些人现在可能会描绘乃至喜欢的那样,反而让人们注意“不同文化间**相似性**的硬核”“一如既往地忽视”(黑体字“相似性”为原文所有),而且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全世界的自由和正义标准”必须“是基本的”。所以像现在这样,问题在于设计一个有效的世界秩序,它“允许其社会构成单元的成员自由地施展个性,并来源于多样化个性间相互影响的丰富性中汲取力量。”执行委员会得出结论:

只有当人类按照自己传统而生活的权利被融入到所提议的宣言

中时,规定人类团体相互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下一步骤才可以在今天有关人的科学知识的坚实基础之上建立起来。

在我看来,这些似乎正是萨帕特党人的主张。一方面,他们反复地、强有力地诉诸“尊严”这个概念以及需要受到重视的普遍权利。另一方面,他们则基于地方性、嵌入性和文化历史(这些强调了他们作为社会生态团体而具有的惟一且特殊的身份)来提出主张。在这里,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地结合在一起。

当然,1948年以来,人权应用的全部领域实际上一直由两种解释的分裂主宰着:一方面是市民权力和政治权力,另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力。直到最近,后一组权力还避而不论,即使它实际上在1948年的宣言中就已出现。全球化以及大量多国和跨国资本形式的出现所产生的影响之一就是使这样一种严格的分裂越来越难以维持。随着对普遍权利进行重新阐述的议程的到来,经济权力的问题也就开始显得突出起来。有很多的征兆显示阶级斗争出现了新形式,那就是正好把人权研究普遍领域内经济权利的产生当作它们的目标。让跨国机构来说明这些问题,这一努力到现在就成了一个熟悉的目标。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公众针对尼日利亚的肯·萨罗-维瓦及其8个共同被告判决执行所产生的反应,那些被告为了维护奥贡尼人的权利干扰了壳牌公司对当地石油储存的开采。壳牌公司不太可能维持它假想的立场,即:它不会干涉像尼日利亚这样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事务(一直以来它就是公然地这样做的),最终它被迫勉强给予人权法的一些主要原则以有限的支持(虽然很悲哀的是,这只发生在上述一案执行后的几年内而不是在这之前)。的确,要超越这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很难的,但是跨国公司对这些问题的脆弱性却是越来越明显。

现在,一些更加广泛的斗争即将来临,它们仿效19世纪发生的某些民族斗争。宣布童工为非法的国际大会被提议召开,限制和调节全世界血汗工厂的国际协定正在商讨之中。现在还有一种国际运动努力促进把全球性的“最低生活工资”作为所有产业和地方都必须遵守的一个标准。即使在主流媒体(不是在网络中)它们规模仍然很小而且较少受到关注,但意义却越来越来大(Pollin and Luce, 1998)。从资本主义逻辑学的广泛意义上来说,如果某种民主化和资本积累联合起来,那么经济权利还怎么可能更普遍地远离人权和公民权利呢?这种联系在1948年的宣言中就已出现,如宣言的第22条至25条。



### 第 22 条

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这种实现是通过国家努力和国际合作并依照各国的组织和资源情况。

### 第 23 条

1. 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

2. 人人有同工同酬的权利,不受任何歧视。

3. 每一个工作的人,有权享受公正和合适的报酬,保证使他本人和家庭有一个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必要时并辅以其他方式的社会保障。

4. 人人有为维护其利益而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

### 第 24 条

人人有享受休息和闲暇的权利,包括工作时间有合理限制和定期带薪休假的权利。

### 第 25 条

1. 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庭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

2. 母亲和儿童有权享受特别照顾和协助。一切儿童,无论婚生或非婚生,都应享受同样的社会保障。

这些条款的惊人之处在于(特别是它们强烈的性别偏见被剥离出来时——其本身就是一个方便的指标,说明所有的世界宣言如何令人忧虑):过去 50 年来对这些条款的执行或应用几乎未受到任何关注,而且几乎所有的签字国都在公然违背这些条款。严格执行这些条款将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中引起巨大的且在某种意义上是革命性的变革。比如说,新自由主义就很有可能作为对人权的公然违反而被抛弃。的确,过去 20 年来美国的所有政策轨迹(克林顿政府的福利改革使得这一轨迹戏剧性地持续下去)与保障这些权利是完全相反的。

人权的实际应用也很有代表性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不同权利之间有了区别。前者(像投票权、政治表达的自由权)已得到了加强,而后者(妇女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割礼这样的文化习俗、以及妇女支配自己身体或抵抗家庭暴力的权利)却被广泛地忽视了。结果就是在人权概念内产生了强烈的性别偏见(可以在原版条款的语言中找到)。另外,新自由主义也通过许多方法扫清了公共领域权利和私人领域权利之间的许多区别,比如,把许多原先的公共机能私有化,然后,相反地,把许多本来应该属于私人的问题(比方说,关于生殖权和个人健康权)带入到公共领域,这些都使得维持这种区别越来越难。一个在政治上清晰界划的“公共领域”,它的广泛的、令人遗憾的丧失在此为重新定义一般意义上的人权观念创造了机遇。

91 一开始,我主要是从消极和被动无力的方面来思考全球化政治学的。现在,越来越清楚的是,全球化的矛盾和悖论为替代性进步政治提供了机遇。当代全球化彻底变革提供了一系列相当特殊而又独特的条件。

首先是对既定体制存在着广泛的改革要求,因为这种体制有明显的不稳定性(定期的金融困境、非工业化阶段等类似事情)且会加深经济不平等。第二,环境困境在各个地方都很明显,而且这其中有很多也要求在包括全球在内的各种规模上采取调节行为并进行干预。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为保证更加稳定的、更持续的经济发展的,新的制度安排是必需的。第三,自我实现及自我成就这种西方思维方式的传播(以1948年的宣言为代表)已释放了一系列制造经济、社会和文化挫折的强大力量。谋求更加普遍的大众文化——虽然可能有点令人遗憾——在提供异化和挫折的同时也推动了自我实现的需要。强制推行资产阶级民主权利和自由,这项全球运动同样促进了全球文化革命的风潮,这股风潮是反独裁主义的、个人主义的、颠覆顺从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太成熟的平等主义的(这在妇女运动中尤其明显,比如在日本和东南亚发生的)。因此,虽然地方差异和适应、甚至地方创新和主动性可能真地广泛存在于权利和价值问题之中,但认识到这些变化如何构成某个意义家族而非差异很大不可沟通,这也是一种可见的趋势。

总而言之,全球化重新提出了地球上的“类存在物”问题(参见第10章)。它既开辟了概念和理论争论的领域,也开辟了政治斗争的领域(已经可以观察到的模糊形式)。重要的是,它使得重新定义超越1948年所承认的世界人权成为必需和可能(在第12章我将再次讨论)。这样的权利不会被随意地给予或授

予,恰恰是因为它们可能会导致社会秩序和政治经济的革命性变革。这些权利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取得。这将会引起激烈的且常常是不可调和的争论,特别是当各种权利相互矛盾的时候,或者更重要的是,它将开创与市场资本主义运行方式完全对抗的先例。

我们来看一看这样一个普遍概念,即各地劳动者应该被有尊严地对待,他们应该得到保证最低限度的经济安全和足以维持正常生活的“最低生活工资”。这种普遍概念虽然完全与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相一致却明显地与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状况相冲突,这种状况既滋养资本又在许多情况下被它主动创造。它以一种根本的方式向新自由主义挑战,因为它以一种根本的方式干扰劳动市场的功能。然而,我们也知道,对“最低生活工资”的要求显然意味着依据历史地理状况而定的一些不同的事情。达卡或孟买的最低生活工资与约翰内斯堡、德卢斯、律勒欧或纽约城所可能要求的最低生活工资不是一回事。这是否暗示着全球争取最低生活工资权利的斗争是不可能的或不切实际的?

1998年7月17至19日,来自于美国、加勒比海、中美洲、墨西哥、加拿大和欧洲的工人权利组织的大约40名代表齐聚一堂,认真思考此问题(参见 Benjamin, 1998)。他们认为:提出一个最低生活工资作为全球性的标准(最初是在制鞋业和服装业),这场战役不但切实可行,而且非常值得,虽然不管如何精心设计以考虑到各个国家和地区间的文化、社会和经济差异,对这种工资的任何计算公式无疑仍将会成为激烈争论的中心。而且,它还不太可能会被普遍接受。但是,他们断定,“对这种计算公式的争议越多,提出的备选公式越多,则越好”(Benjamin, 1998, 4)。仅仅通过把工业和公众引入到一场采用何种公式的辩论中,就迫使最低生活工资——被确定为“维持尊严的工资”——的问题摆到了政治议程的最前沿,这个做法完全与1948年采纳《世界人权宣言》的做法一样,后者把有关于世界人权的某些问题(无论有多少争议或如何不明确)不可挽回地置于全球议程之中。

当我们试图重新嵌入(或调解)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内部那个假定的人权普遍性时,这个问题所指向的两难困境就变得极为明显了。美国人类学家在1947年所提供的研究就强调了这个问题,尽管——这一点一定要说——他们有点把文化当作独立实体的拜物教倾向,这个倾向在当时是成问题的,在现在也是明显不恰当的。《联合国宣言》的力量在于它把普遍和全球规模同身体和政治个人的微观规模结合起来了,但是,它对富有意义的人类联合得以建立的其

93 他不同规模关注较少(虽然民族国家被当作是负责保障和执行权利的仲裁实体)。它也不关注所有那些风俗和习惯、生活方式以及感觉结构的无限变体,这些作为人类生存的极为重要的方面得到了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们的长期关注。从这点来看,有权利进行不平衡地理的发展,有权利在各种规模上建立不同形式的具有不同法律、不同规则和不同习惯的人类机构,这种权利似乎与其他任何权利一样是人类的一项基本权利。这样一个主张所内含的矛盾和紧张随处可见。保持差异的权利对抗着权利的普遍性。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被视为一个幸运的而不是绝望的情形,因为新的人类状态恰恰就是从这样不能解决的紧张中建立的。

尽管如此,如何调解不平衡地理发展的权利(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和一些有关权利的普遍理想,这个痛苦的问题永远也不会消失。但是,说它会永远伴随着我们,这并不意味着认为这种两难困境是不能超越的。在绝对主义的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协调余地,前者宣称在雅加达或越南基或波尔得和巴尔的摩市中心这样一些地方没有什么事情会成为我的道德或政治评价的合适主题,后者坚定地把普遍性当作一个有关判断和处理的总体一致性和平等性的问题。长期存在的少数人权利问题在最近重新流行——它导致了1992年有关此主题的联合国宣言——就是一个相关的例子。正如索恩伯利(Thornberry, 1995)所表明的,这个背景依赖于矛盾走向的冲突:

一方面,存在着超越冷战限制的为争取环境、资源、人道主义和权利问题而进行的国际化或全球化运动。另一方面,我们又见证了各种恶性形式的种族主义、对多样性的敌视、对已被埋葬的对抗性的挖掘以及丑恶的“种族清洗”在国家内部或国家之间死灰复燃。(13)

社会很可能在未来几年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文化多样化和多元性而不是相反,那种文化差异正在发生(因此那些权利必须要超越于既存文化的“博物馆格局”),1992年的联合国宣言及其随后的发展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它们例证了用于延伸权利思想以处理不平衡地理发展问题的多种方式之一(Phillips and Rosas, 1995)。一种精心构思的权利体系不但不会为扩散不同种族间的竞争和仇恨提供特许,反而在这里提供了一种手段以“捍卫社会中所有人之间的平等;促进确保每个人的尊严和身份所必需的团体多样性;发展国内及国际间的稳定

与和平”(65)。

因此,在把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法运用到以不平衡地理发展为特色的世界舞台上时,在某个适当的制度结构内建构参与这种对话的政治势力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中介步骤。而且那大概就是“彻底地集合各种特殊利益”所包含的全部内容。

马克思有关权利的讨论并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常常认为它试图强制实行一系列的独特权利——那些由资产阶级所规定的权利——认为它是每个人都向往的一个普遍标准。但如果全世界的工人都联合起来,那么它当然要围绕他们的权利以及历史使命概念。作为实践政治学的一个问题,某种权利观念看起来是必不可少的。受马克思影响很大的第一国际最后还是诉诸了“道德和正义的简单法则,它应该”作为指挥“国家间交流”的适当基础“支配个人间的关系”(Marx and Lenin, 1940, 23)。而且有关权利的问题,资产阶级已经在世界舞台上制造了这样一个矛盾的大漩涡,以至于它无意中打开了某种在全球规模上通往进步和普遍化的政治道路。在眼下这个历史阶段,不管这些普遍性如何令人焦虑甚至它们是败坏的,然而拒绝接受它们,就是拒绝接受各种形式的进步政治行动的前景。在这一点上,我们时代的全球化的中心矛盾或许就是一条道路,借以此,根据每一个人作为类成员所完整地享有的尊严和尊重来对待他们,它就召唤出自己的复仇女神。



## 第二部分

# 全球空间中的身体和政治人





## 作为积累策略的身体

在我看来,非常清楚的是,身体是最深刻意义上的积累策略。

(丹纳·哈拉维,《社会与空间》,1995,510)

可以说,资本是通过作为可变资本的劳动力的身体来循环的,并因此把劳动力变成了资本循环本身的附属物。

(大卫·哈维,《资本的界限》,1982,157)

事实上,两个积累过程——人的积累和资本的积累——是不可分割的。

(米歇尔·福柯,《规训和惩罚》,1975 [1995],221)

为什么关注上述这些引言?部分原因在于,过去 20 年左右的时间里,作为各种理论研究基础的“身体”引起了人们特别的兴趣。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现象呢?简单地说,当代对先前早已确立的范畴缺乏信心,这导致了向身体的回归,把它作为不可还原的理解基础(比较:第 1 章及 Lowe,1995,14)。但是把身体视作决定全部价值、含意和意义的不可还原的核心,这并不是最近的事。这是前苏格拉底哲学流派的根本问题,而且“人(man)”或“身体(the body)”是“万物的尺度”这种观念也有着漫长有趣的历史。例如,对古希腊人来说,“尺度”就超越了与某个外在标准比较的观念。它是一种“形式”,借以洞察通过感官和心灵而被感知的“所有事物的本质”。据说,在清楚地理解全部世界实在的过程中,这种对内在意义和均衡性的洞察力具有根本意义,由此它对和谐有序的生活也十分重要。正如波姆(Bohm,1983)所指出的,虽然我们也有一些术语(如音乐和艺术中的“尺度”观念)显示出较广的意义,但现代人的见解基本上已失去了这种微妙性,变得相对粗糙和机械。

98 在当代争论中,对身体兴趣的复兴确实为重新评价各种研究的(认识论的和本体论的)基础提供了一个受欢迎的机会。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理论家们试图在理论和政治实践中解决性别和性问题(issues of gender and sexuality)时,他们就已经开创了先例。并且,尺度如何失去与身体康乐之间的联系,这个问题也已作为有一定意义的认识论问题而重新受到关注(Poovey, 1998)。我在此要探讨的论题是:在确定价值和意义被构造和理解的方式时,这种向“作为万物尺度的身体”回归的态度至关重要。我特别希望回到作为“万物尺度”的身体的更为广泛的相关意义上,并提出一个更加辩证的理解身体的方法,它能够更好地把有关身体话语和其他话语转向联系起来,那种转向把“全球化”置于争论的中心。

## 1. 身体过程

我首先谈两个基本命题。第一个命题来自于不同的作家,如马克思(Marx, 1964)、艾利亚斯(Elias, 1978)、葛兰西(Gramsci, 1971)、布迪厄(Bourdieu, 1984)、斯塔福德(Stafford, 1991)、列斐伏尔(Lefebvre, 1991)、哈拉维(Haraway, 1991)、巴特勒(Butler, 1993)、格罗西(Grosz, 1994)和马丁(Martin, 1994),该命题主张身体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历史和地理的可塑性。当然,它不是无限地或者轻易地可塑,它的一些与生俱来的(“天生的”或生物学遗传的)品质并不能够被取消。但是,通过同时反映内在转化的动力(常常是精神分析工作的中心)和外在过程的结果(在社会建构主义者的研究方法中最常用),身体可以继续进化并改变。

第二个命题与第一个命题明显地一致(要不就是含蓄地包含在其间),该命题认为身体不是一个封闭的未知实体,而是一个相对的“物(thing)”,在多重过程的时空之流中被创造出来,被限制、维持并最终消融在其中。这就需要一种相对的一辩证的观点,它认为,身体(被当成物一样的实体)使创造、支撑、维持和消融它的这些过程的影响内在化。我们占据的、且对我们来说是万物之不可还原尺度的身体,它本身不是不可还原的。这就使得身体成为问题,特别是作为“万物尺度”时。

由于多重社会生态过程汇集于身体,身体便是一个内在的矛盾体。例如,

维持身体存在的新陈代谢过程就需要与它的环境进行交流。如果这些过程改变了,那么身体要么转化并适应它,要么就不再存在。同样,特定地点和时间中,身体所能进行的各种述行行为组合(the mix of performative activities)并非与身体存在于其间的科技、自然、社会和经济环境无关。在社会中进行的各种再实践(representational practices)同样塑造着身体(通过服装和姿态的形式提出各种附加的象征意义)。这意味着,任何对占统治地位的身体再现系统的挑战(如近年来由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理论家所提出的那些挑战)都是对身体实践的直接挑战。最终结果就是,不同过程(自然的和社会的)“生产”(在物质上和表象上都)根本不同的身体。由于作用于身体的不同的社会生态过程,人类就被烙上了阶级、种族、性别及形形色色的其他特性。

如此表达这个问题并不是把身体当作一个客观过程的被动产物。有关生命实体的最引人注目方面就在于它们获得传播能量或信息流并将之聚集成复杂而有序形式的方式。如普里高津和斯滕格尔斯(Prigogine and Stengers, 1984)指出的,从混沌中创造秩序是生物体系的一个重要特性。人体作为“欲望机器”,不仅能够在其的自身内部而且能够在它的周边环境里创造秩序,在生产、维持和消融它的那些过程中,它是积极主动且能起改造作用的。因此,被赋予符号能力和道德意志的身体个人使得他们的身体成为我们长期称为“人民(the body politic)”的这一东西的基本元素。

把身体(个人和自我)与环境之间的渗透关系概念化,这就以特定的方式构造了“自我—他者”的关系(包括与“自然”关系)。比如说,如果我们认定身体把所有的东西都内在化了(我在其他地方已作略述的一个有关各种内部关系的顽固教条——参见Harvey, 1996, 第2章),那么逆命题同样适用。如果自我把所有事物内在化了,那么自我就会是“万物的尺度”。这个观念应该追溯到普罗泰戈拉和古希腊人。这使得个体被看作某种非中心的宇宙中心,或者正如芒恩(Munn, 1985, 14, 17)在对美拉尼西亚岛的社会行为的意味深长的分析中所表达的,“身体时空是它所属的更广阔时空的浓缩符号”。只有当身体被认为向世界开放并且易于渗透,我们才能以这种方式有意义地思考它。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传统中,身体并不是被这样看待的。斯特拉森(Strathern, 1988, 135)强调这个问题:

社会化的、被内在控制的西方个人必须作为教化过程的缩影出

现,自然资源就借助这个缩影被赋予文化用途……在这里,惟一的内部关系就是个人角色“属于”他/她自己的方式。其他关系都是从外部带进来的。个人的属性就这样被外部压力所修改,就如物的属性被修改一样,但他/她所固有的身份保持不变。

100

但是在美拉尼西亚这个例子中:

人是生产它的各种活动的一个活生生的纪念品……人是各种关系的客观化形式,它不是有争议的自我的持存,而是各种关系的持存或终止。吃并不必然意味着汲取营养;西方的商品观念认为自我就是使自己的存在永久化,以这种观念来看,吃在本质上并不是受益行为。更确切地说,吃使美拉尼西亚人暴露在他/她所处的各种关系的所有危险面前……从社会学方面来说,成长不是营养的一种反映;相反,在成为一个真正的营养容器的过程中,得到营养的人见证了与父亲、母亲、姐妹的丈夫或其他什么正在从事哺育工作的人之间关系的有效性……这样,消费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自我取代问题,而是各种关系的承认和反映……自我作为个体主体存在……于他/她改变各种关系的能力之中。

(Strathern,1988,302)

在西方传统中,有关身体、自我、个人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身份概念只有以辩证的论证模式才能把握。在当代造诣很深的生态学者的工作中,也可以发现它的轨迹(比较 Naess 和 Rothenberg,1989),并且这种见解在文学理论和女权主义理论中很流行。它构成了对通常被认为属于笛卡尔、牛顿和洛克的世界观的否定,那种世界观为大多数西方思想中“文明的”和“个性化的”身体理想(被认为是绝对时空中的一个实体,还被当作是不可剥夺的和有界限的财产权的一个场所)提供了基础。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时空的生产方式不可避免地与身体的生产相关联。列斐伏尔(Lefebvre, 1991,1)抱怨说,“随着笛卡尔逻辑学的出现,空间就进入了绝对王国……空间通过包含全部感觉和身体而开始支配它们。”列斐伏尔和福柯(特别是在《规训和惩罚》一书中)在此目标一致:把感觉和人类身体从那种

人为的牛顿/笛卡尔的时空世界的绝对论中解放出来,这成为他们解放策略的中心问题。而且那就意味着要挑战那种遏制和规范身体的机械的和绝对的观点。但是笛卡尔/牛顿的这种时空概念是被什么样的身体实践所制造出来的呢?而且怎样才能彻底推翻这些概念呢?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特别的难题。一方面,回到作为全部经验(包括空间的和时间的经验)源头的人类身体,这在目前被认为是挑战整个(科学的、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的)抽象概念网络的一种(现在正越来越有特权的)手段,社会关系、权力关系、公共机构和物质实践是通过这种抽象概念的网络得到定义、再现和调节的。但是另一方面,没有什么人类身体可以存在于社会决定过程之外。因此,回到它就是用具体例证来说明据称正受到反抗的社会过程。例如,正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如果工人在工作场所和消费领域这两方面都被转变成资本的附属品(或者,用福柯喜欢的表达方式,从18世纪开始,通过增加强大的惩戒机构而改造身体使其成为**温顺的身体**),那么他们的身体怎么能够成为资本循环之外的或者规训它们的各种机构之外的任何事物的尺度、符号或接受器呢?或者,采用更加当代的描述,如果我们现在全都是**电子人**(正如哈拉维在她有关此主题的著名宣言中所指出的),那么我们如何衡量作为我们自己身体延伸的机器和作为机器延伸的身体这一绝对范围以外的任何东西呢?

101

所以,回到作为理论抽象——这种抽象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纯粹抽象——的更加真实的(认识论的和本体论的)基础的场所的身体,尽管这可能被证明是合理的,但那种回归除了自恋的自指性生产以外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保证任何东西。哈拉维(Haraway, 1991, 190)注意到了这个困难。她宣称,“客观性最终与特定的、明确的体现有关,而绝对与承诺超越所有界限和责任的假象无关。”所以,谁的身体会成为万物的尺度呢?它要怎样衡量,又能够衡量什么呢?这些都是我们必然要反复回归的深奥问题。然而,不预先理解身体如何被社会地生产出来,我们就不能开始回答它们。

## 2. 马克思思想中的身体主体理论

我们先假设并不会因为马克思的范畴“非常不稳定”而抛弃它们。我并不

是要为这种假设进行辩护,尽管我注意到,从《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Marx, 1964, 143)开始,马克思就把他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观点建立在与世界之间的真正感性的身体相互作用这个基础上:

**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

102 马克思还详细阐述了一种内部关系的辩证法哲学,这一哲学与以上概述的(特别是由斯特拉森所概述的)相关身体概念相一致。因此,在当代,竞相回到作为所有论点不可还原基础的身体就是竞相回到马克思——除他之外,还有其他不少人——得以开始的那个点。

虽然马克思没有告诉我们想知道的全部事情,但他的确提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身体主体(bodily subject)的生产理论。既然我们全都生活在资本循环和积累的世界中,那么这就必须成为任何有关当代身体特征争论的一部分。回避它(依据似是而非的理由,说马克思的范畴不稳定,或更糟糕,强调它过时了),就是回避下列这个问题的一个至关重要方面,即身体必须怎样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并且,虽然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框架经常被解读为(如我想要表明的那样,这是不正确的做法)一种悲观主义基调,描述了身体是如何被资本循环和积累的外部力量所塑造,认为身体是承担某种特定经济角色的被动实体,但正是这种分析激活了他在其他方面的考虑,人类抵抗、渴求改革、反抗和革命,这些起改革作用的过程如何能够并确实发生。

一个准备性步骤就是稍微扩大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或更确切地说,“阶级关系”)的传统定义,使它表示**与资本循环和积累相关的位置**。马克思常常根据生产资料所有权(在劳动者方面,它包括劳动者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来确定这种关系,但我坚持认为,这种定义过于狭窄而不能捕捉甚至马克思自己分析的内容(想一想,马克思在全部著作中都回避对阶级作任何正式的社会学定义)。拥有“与资本循环和积累相关的位置”这样一个定义,我们就能够更清楚地阐明人类活动于其中的多重位置的内部矛盾。作为个体的劳动者是一个工人、消费者、储蓄者、情人和文化载体,甚至间或也可以成为一个雇主或地主,然而作为经济角色——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范畴——的劳动

者却是单一的。

现在,我们来看马克思提出的那个独特的系统性概念。**可变资本**把劳动力的买卖和使用称为一种商品,但是正如马克思分析的那样,很明显,可变资本本身存在着一个独特的循环过程。劳动者(人)在劳动过程中出卖劳动力(商品)给资本家从而换得现金工资,并以此购买资本主义制造的商品以维持生存从而重新工作……马克思在劳动者(作为个人、身体、意愿)与劳动力(从作为商品的劳动者的身体中榨取出来)之间所作的区别立即为激进批评提供了一个大好机会。劳动者必然就是异化的,因为他们的创造力被资本家当作劳动力商品而占有。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扩展为:可变资本(劳动力和剩余价值的榨取)的循环对它赖以周转的那些人的身体(个体和主体)有什么影响?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对生产性消费、交换和个人消费等等不同的环节进行探讨。

103

### 生产性消费

在资本主义控制的劳动过程中,劳动力商品的生产性消费尤其需要把“活力”、性驱力、情感意识和创造性劳动力等等动员到资本所规定的特定目标之中。这意味着:利用人类的基本合作/协作能力;根据科技需要使劳动力熟练化、非熟练化和再熟练化;使劳动力在文化上适应任务的惯例化;使劳动力封闭在受管制(有时是受空间限制的)行为的严格时空节奏中;使他们“作为机器附属物”频繁地服从身体节律和欲求;使劳动力按不断变动且经常是强度增加的长时间集中劳动的要求来社会化;不同性质(取决于工作的异质性或同质性,以及与社会劳动分工相对的复杂组织)的劳动分工的发展;在工作场所中对等级制的适应以及对权力结构的服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最后一点但却不是最重要的一点,对资本主义发展所特有的生产过程中的那些快速变革能够作出反应的劳动力的可变性、流动性和灵活性生产。

我提供这份目录(来自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主要是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紧迫性如何在各种不同且常常根本矛盾的方向上推动劳动身体(working body)的极限——它的能力和可能性。一方面,资本需要受过教育的、灵活的劳动者,但另一方面,它又拒绝认为劳动者应该能够独立思考。虽然劳动者的教育看起来很重要,但它却不能是那类允许自由思想的教育。资本需要某些种类的技巧,但憎恨任何种类的垄断技巧。虽然一只“受过训练的大猩猩”足以胜任一些工作,但其他一些工作仍然需要创造性的、负责任的工人。虽然对权

威的服从和尊重(有时是卑微的屈服)是极为重要的,但劳动过程的“塑形之火”(form-giving fire)所必需的创造性激情、自发的反应和活力同样必须被释放、被动员。健康的身体也许是需要的,但残疾、病态和疾病往往在所难免。马克思强调了这些矛盾:

104

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绝对的矛盾怎样破坏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稳定和保障……但是,如果说劳动的变换现在只是作为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碍时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那末,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生产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Marx, 1976, 617)

马克思发现这些矛盾正历史地、辩证地得到解决(主要是运用强制力和积极斗争,但并不完全如此)。但是资本主义创造性历史所关注的部分东西正在揭示着一些新方式(和潜能),借助那些方式,人体被当作劳动能力的载体来运用。例如,马克思(Marx, 1976, 617)评述说,“工艺学揭示了为数不多的重大的基本运动形式,不管所运用的工具多么复杂,人体的一切生产活动必须在这些形式中进行”。人体的旧能力被重新改造,新的能力被揭示出来。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带来了对劳动身体所涉及东西的彻底变革。人类身体未完成的计划在一组特定的互相矛盾的方向上被推向前进。而且对于作为生产机器和流动有机体的人体极限,人们已确立了一大批研究和探索它的科学,从而来探索这些可能性。和其他人一样,葛兰西(Gramsci, 1971)也由此反复强调资本主义如何关注新型劳动身体的生产。

虽然这种矛盾可能会在总的劳动力内部被内在化,但这不一定就意味着它们在每个劳动者的身体内被内在化。实际上,劳动力的“集体身体”被分解成有关技巧、权威、智力和体力功能等许多等级,以这样的方式使可变资本的范畴在内部具有异质性,这就是马克思本人叙述的要点。并且,这种异质性是不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生的永久变革确保:需求、技巧定义、权威体系、



分工等等不可能保持长久的稳定。因此,虽然集体劳动者会被瓦解和分裂,但这些碎片的定义和碎片之间的关系将会不稳定,而且个体劳动者在这些碎片内及这些碎片之间的运动也相应地变得复杂。不难发现,面对这些矛盾和多重不稳定性时,资本主义会需要马克思经常提到的某种规训性监督、惩罚和意识形态控制机构。福柯对此作过详细阐述,我发现他所运用的方式是对马克思方案的广泛补充而非对抗。但是这种不稳定性却永远不会消失(就像使劳动力熟练化、非熟练化和再熟练化等方面全部历史地理学所证明的那样)。虽然不稳定性令人感到不安,有时是破坏性的,而且还总是难于应付,但它为劳动者提供了很多的颠覆和反抗机会。

但是谁的身体卷入到可变资本的循环之中,并且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马克思并没有给这个问题提供系统的答案,部分原因在于这不是他理论探询的主要目标(他主要研究经济职能而不是人)。谁正好卷入到什么地方,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地理学问题,它不可能有一个简单的理论答案。马克思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身体是根据历史、地理、文化和传统而由不同的物质生产能力和性质来区分和标记的。他还意识到,种族特征、种族划分、年龄和性别这些符号被当作外在标准用来衡量某一类劳动者能够或者被允许去做什么。在19世纪的英国,妇女和儿童卷入可变资本的循环有它独特的理由,马克思对此尽力做了详细的阐述。这反过来又引起了特别的效果,其中之一就是把有关工作日长度的斗争和工厂雇佣规章制度的斗争变成了一种独特的斗争:保护妇女和儿童免受资本主义对剩余价值的“狼人欲望”的影响。此外,雇佣妇女和儿童作为雇佣劳动者不仅“为劳动分工”提供了“一个新基础”(Marx,1976,615),而且它还对家庭和性别角色的许多传统概念提出了(并且继续提出)根本性的挑战:

不论旧家庭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解体表现得多么可怕和讨厌,但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同样很明白,由各种年龄的男女组成的结合工人这一事实,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也就是在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的那种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变成人类发展的源泉。

106 在评论奴役、殖民主义和移民(比如爱尔兰人移民进入英国)时,马克思清楚地说明种族特征和种族划分的结构同样被牵涉在可变资本的循环过程之中。只要性别、种族特征和种族划分全都被理解为社会构造而不是本质主义的范畴,那么它们卷入可变资本循环所产生的影响(包括在集体劳动的内在异质性中的定位,及由此而产生的分工和阶级制度内的定位)就必须被看作是以独特的资本主义方式重建它们的一股强大的力量。

随之产生了许多必然结果。首先,个人生产力被还原成了创造剩余价值的的能力。马克思(Marx, 1976, 644)讽刺性地谈到,“所以,成为生产工人不是一种幸福,而是一种不幸”;劳动者可以具有的惟一价值不是由他所做的工作及产生的有用的社会效果来决定的,而是由“一种特殊社会的生产关系来决定……,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劳动者作为人所期望的东西,以及从他/她的身体中榨取出来的对劳动力商品的需要,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便是异化的核心。而且,虽然工人作为个人可能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体现自己的价值,这些方式取决于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生产力、有用性和对他人的价值,但是由他们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的的能力所决定的那种十分有限的社会评价必然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正如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层管理人员在他们也会被解雇时所发现的那样)。然而,那个价值到底是什么,这取决于外在于劳动过程的那些条件,从而也就取决于交换问题。

其次,生产力缺乏、疾病(或任何一种病态)在这种循环过程中被确定为不能工作、不能在(生产剩余价值的)可变资本的循环中恰当完成任务或不能遵守其纪律规则(由罗斯曼[Rothman, 1971]和福柯[Foucault, 1995]所阐明的存在于收容所和监狱构造中的那种制度效果,马克思早已在《资本论》中有关“工作日”和“所谓原始积累”章节中明确表达过了)。此外,那些(因生理、心理或社会原因)不能继续承担可变资本的人要么落入产业后备军的“医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疾病被广泛定义为不能劳动),要么落入无纪律的流氓无产阶级的地狱(大家都知道的“社会最低层”),很遗憾,马克思对这些人的同情少得可怜。可变资本的循环,对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运行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它规定了受雇的“圈内人”和失业的“局外人”(常常受到欺骗和污辱)的角色,这些角色使社会在总体上有了很多分支。这使我们回到了“交换”的环节。

## 可变资本的交换

劳动者(以人的身份)与资本家所交换的商品是劳动力,是可以从事具体劳动的能力。契约的基本条件大概是:资本家有权占有劳动者生产的任何产品,有权指挥劳动,有权决定劳动过程,并且可以在工作时间内以契约规定的报酬任意地使用劳动能力。资本的权利常常受到争论,了解这种争论是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的是非常有趣的。虽然资本家对劳动力商品拥有完全的权利,但他们不能对劳动者个人拥有合法的权利(那将会是奴隶制)。马克思反复强调,这一点是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劳动的一个根本原则。

劳动者作为人应该对他/她的身体拥有完全的权利,应该总是在自由订约的条件下进入劳动市场,即使如马克思(Marx, 1976, 272—3)所指出的,工人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但是作为人的劳动者与劳动力之间的区别有着更深远的意义。例如,资本家不具备形式上的权利置人的身体于危险之中,这样的行为会受到质疑。这个原则甚至一直贯穿到文化和身体资本领域(如布迪厄所定义的那种):由此就产生了大量的对劳动力非熟练化和重新定义熟练化等方面的反抗行为。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合法性持续不断地遭到破坏,而且经常会发生在下列这样的情形中,即劳动者的身体和个人在类似于奴隶制的条件下被接管。但马克思认为,保存劳动者个人和身体在可变资本循环过程内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是劳动过程内外争论和阶级斗争得以发生的支点。连资本主义的合法性(体现在当时的“工厂法”和现在的一些法规中,比如说“职业安全和保健条例”)也不得不勉强承认有权拥有劳动力商品和无权拥有那个商品载体的个人这两者之间有巨大差异。

这种斗争延续到可变资本价值的规定,因为在这里劳动者身体的“贫困”形成了契约条件所依赖的论据事实。在《资本论》中,为了进行分析,马克思假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这些贫困是固定的并且是已知的(只有这样他才能对资本通过榨取剩余价值而得以生产出来有清晰的定论)。但是马克思清楚地知道,这些条件绝不是固定的而是依赖于自然环境(如气候)、文化和社会境况、劳动者争取基本工资长期阶级斗争史,同样还依赖于文明社会中对什么可以忍受和什么不可以忍受这种道德观念的规定。看看马克思(Marx, 1976,

341)在“工作日”这一章中是如何表述这个问题的:

这种生命力每天必须有一部分时间休息、睡觉,人还必须有一部分时间满足身体的其他需要,如吃饭、盥洗、穿衣等等。除了这种纯身体的界限之外,工作日的延长还碰到道德界限。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因此,工作日是在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变动的。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主要观点在于,它如此频繁地违背、损害、抑制、残害并消灭劳动身体的完整性(甚至所使用的方式对进一步的资本积累都有危害)。而且,对替代生产方式的探求最初正是从劳动身体(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称呼它为“类存在物”[Marx, 1964])的潜力和可能性角度来考虑的。

但是剩余价值取决于劳动所获得的(劳动力的价值)与劳动所创造的(所生产商品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劳动力商品对资本家的使用价值在于,它能够从事于具体的劳动,使生产出来的商品包含一定量的抽象劳动。对于资本家来说,正是抽象劳动才具有价值,而且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者的具体行为在可变资本的循环内被视抽象劳动为论据事实的“价值法则”所控制和调节。

抽象劳动——价值——通过商品在时间和空间进而最终在世界市场上的交换来衡量。价值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时空结构,它依赖一大批时空实践的发展(包括通过财产权和国家形成而发生的地球表面的领土化,及地理网络的发展、货币及包括劳动力本身在内的全部商品的交换制度的发展)。对资本家来说,劳动力的价值本身视这些价值在社会地构成的时空政治经济行为世界中的实现而定。这限制了劳动者在生产和市场中的一个特定地方可以获得的价值。  
109 而且,在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交换的这些条件既受到体系偏见的限制(比较劳动报酬中的性别和种族差异已得到了清楚的证明),又受到了产业后备军动员的限制(或者是在原处,或者通过资本和劳动为了寻求“更好的”合同条件而进行的迁移运动)。

我们现在称为“全球化”的东西与身体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一点上变得清晰明白。但是应该如何思考这个问题呢?马克思把可变资本的循环描述为“用于商品交换的商品”:为了获得可以用货币工资购买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工人用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来交换。这类交换通常具有高度的地域性和地方差异。工

人必须使自己的身体每天都劳动(即使是在远程办公的情况下)。但是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被卷进了货币—商品—货币的循环过程中,这个过程轻易地避开了局部劳动市场的时空约束,并导致了世界舞台上的资本积累。积累加速了周转的时间(它缩短了工作周期、循环时间等等),虽然它同时也通过时间消灭了空间,却也保持一定的领土(工厂的和民族国家的)作为监视和社会控制的领域。在一个规模上(“全球化”及其所有相关意义上的规模)确定的时空性与在一个更加地方化的规模上运行的身体互相交叉。时空规模上的转换在这里通过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循环过程的交集得以实现,一个过程通过长期的资本积累的历史地理学来确定,而另一过程取决于劳动身体在一个更受限制的空间上所进行的生产和再生产。这导致了一些严重的分离,哈雷文(Hareven, 1982)在《家庭时间与工业时间》的分析中所指出的那类分离。但是正如哈雷文接下来所指出的,这两种时空体系虽然在性质上互不相同,但却不得不彼此“同步(cogredient)”或“共存(compossible)”(这些术语的进一步解释,请参见Harvey, 1996)。“地方”与“全球”之间的关联就这样确立了。在不同地方实现的不同的身体特性和价值模式(包括对身体完整性和劳动者尊严所保持的尊重程度)通过资本循环被带入了空间上竞争的环境之中。那些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人,他们在身体实践和敏感性方面的不平衡地理发展成为由资本和劳动所共同发起的阶级斗争的确定特征之一。

用更加直接的当代术语来说,削减规模而产生的失业、对技能及技能报酬的再定义、劳动过程和专制性监督系统的强化、精细分工愈益专制化、移民的卷入(或者,换句话说,资本向替代性劳动资源的转移)以及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下实现的不同身体实践和价值模式之间的强制的竞争性斗争,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作为个人的劳动者的不平衡地理价值,对生活在可变资本循环之中的劳动者的身体所造成的明显的影响确实非常强大。纽约的血汗工厂模仿危地马拉的类似公司并使加入其中的工人屈服于身体纪律的集权化的而又极端压抑的体制。通过资本循环建立特定的时空关系同样会在我们穿在身上的名牌衬衫、我们运动时所穿的耐克鞋、我们行走于上面的东方地毯,与中美洲、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只列举这些商品的一些生产点)好几万受剥削的妇女儿童的劳动之间建立一种联系。

110

## 消费环节

劳动者不仅作为制造者和交换者存在于可变资本的流通之中,他/她同样作为消费者和自我的再生产者(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存在于循环过程之中。一旦拥有货币,劳动者就被赋予了任何市场实践都具有的所有的自主权。

正是工人自己把货币变成了他所渴望的任何什么使用价值;正是他购买了他所期望的商品;而且,作为**货币的所有者**,作为货物的买主,他与货物卖主的关系完全与任何其他买主一样。当然,他的生活状况——他挣得的货币有限——迫使他只能从相当有限的商品选择中采购。但是从报纸构成了英国市内工人基本采购物的一个部分这个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到,还是有可能会有某种变化的。他可以有一点储蓄,否则他就可能把钱花在酗酒上。即使这样,他也是一个自由的行为者;他必须勉强维持生活而不负债;他自己对其花费工资的方式负责。(Marx,1976,1033)

在这一例子中,马克思暗中诉诸“与资本积累相关的位置性”,将之视为阶级关系的一个实际定义。当焦点发生转移时,阶级位置性的意义也发生了转移。劳动者拥有有限的选择自由,不仅可以选择个人的生活方式,而且通过共同运用需求偏好来表达欲望(个人方面和集体方面),并因此影响资本主义的生产选择。当  
111 我们从整体上来考察可变资本的循环时,对这种思想的详细阐述使我们发现,对个别劳动者来说是真实的东西如果从集体的观点来看就变得相当有限了:

资产阶级不断地付给工人阶级支票,以货币的形式给予由后者生产却被前者侵占的商品的一部分。工人又只是不断地把这些支票送回给资本家,并因此从后者那里收回他们自己产品的分配份额……工人的个人消费无论是在车间内外,无论是在劳动过程内外,都仍然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方面……因而,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工人阶级即使是处于直接的劳动过程之外,它还是像无生命的劳动工具一样也只是资本的附属物。

(Marx,1976,713,719)

对资本和劳动之间那种相当于“伙伴商店(company store)”的关系作进一步的思考是有益的。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有效需求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非常详细地研究的关系)。为了积累而进行的积累要么显示了一个日益增长的、可以向其出售必需品的劳动者数量,要么显示了劳动者变化了的生活水平(通常它同时指这两者)。新需求的产生、确定不同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全新生产线的开辟被当成避免危机和解决危机的一种重要手段而推行。这样我们就更清楚地发现,可变资本如何不得被当成是一种循环过程(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因果箭头),因为正是通过支付工资这种方式才使得购买资本家产品的可支配收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保证。

但是所有这些都假设了劳动者的“理性消费”——也就是,从资本积累立场出发的理性(Marx,1978,591)。组织、动员并引导人的欲望,以说服、监视和强迫的策略鼓励积极的政治参与,这些成为了资本主义消费机构的一部分,反过来又对身体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压力,这个身体就是进一步积累所需要的“理性消费”的场所和执行代理人(比较:亨利·福特着迷于培训社会工作者来监视其工人的预算)。

但是“理性消费”这个词绝非固定不变的,部分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技术和产品不断变革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失衡效应(这些变革既影响了家庭经济又对工厂产生了影响),而且还由于,假设工人可支配收入的运用中真有任何因素的话,那么在争取生活方式和相关身体实践的社会斗争中就存在着像在生产领域中一样的潜能。争取社会工资的斗争——例如,争取国家支出的范围、方向和分配结果的斗争——对建立可能由“文明”国家适当生活水平所表现的底线已变得很重要。争取“家务劳动”和“市场中的劳动”与家庭环境中工作的性别分配之间关系的斗争同样也引人注目(比较:Marx,1976,518,对家务劳动的重要性如何被“官方的政治经济学所掩盖”的评论,及20世纪70年代再次兴起的对家务劳动的作用与可变资本的循环之间关系的讨论)。

112

马克思对可变资本循环中的这个环节虽然没有完全忽视,但也没有非常强调。罗厄(Lowe,1995,67)在做出以下论断时,想到的便是美国(并且大概也是多数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

生活方式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消费关系,像社会生产关系一样是不同于阶级的。从消费关系来看,视觉构造和自我表达至此

已使工作场所中的阶级生产关系黯然失色……(消费)本身是通过变化的产品特色的设计和生产、生活方式和格局中形象和符号的交叉重叠以及消费者市场的分割这些因素而逐步显示出来的。

这暗示了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内的一个双重矛盾(以及发展中国家内的一个新兴矛盾)。首先,通过在生产中不加思索地屈服于资本的命令且缺乏有意义的反抗(或者只是通过对日益增加的可支配收入的导向性斗争),工人可能会在消费环节内为不同的(社会的或个人的)选择开辟一个更加宽广的领域,这主要体现在生活方式、情感结构、家庭组织、生殖行为、欲望的表达、快乐的追求等方面。但这并不会自动地产生更大的幸福和满足。正如马克思(Marx, 1965, 33)所指出的:

虽然劳动者的快乐在增长,但是较资本家增长的快乐而言,他们所负担得起的社会满足感却降低了。我们的需求和快乐起源于社会;所以我们以社会来衡量它们;我们不以充作其满足感的物来衡量它们。既然它们具有一种社会性质,那么它们就具有一种相对的性质。

相反地,通过使工人受困于生活方式、消费者习惯和欲望这样的概念之中,  
**113** 资本家就可能轻而易举地在劳动过程内获得顺从,并同时为他们的销售活动赢得独特的、扩散的市场环境。

工人如何个别地或集体地履行他们的消费者职责并进行生活方式选择,与资本力量如何试图抓住并指导那些选择朝着有利于可持续积累的理性消费方向发展,这两者之间就产生了斗争。虽然马克思并没有详细地审查这些冲突,但是把这些冲突结合到他的框架中也不会特别困难。很明显,这个过程具有独特的异质性,同时它又充满了不稳定性。例如,所有的生活方式共同体(诸如工人阶级在产业环境中塑造的那些生活方式或由不同文化传统塑造的那些生活方式)可能会在可变资本的循环之中产生,最后却又会被产生它的同一过程所解散(即使面临相当大的阻力)。最近的非工业化历史就充满了这样的例子。

就消费而言,那些广泛的身体实践和文化选择原则上可以嵌入可变资本的循环之中。当然,这个范围取决于劳动者财产中可任意支配的收入的数量(而且,很清楚,十亿左右每天生活费不足一美元的那些工人根本不能像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中高收入工人那样发挥影响)。可变资本并不决定消费者选择的、乃至消费者文化的特性,虽然它的确带来了有力的影响。这意味着生产必须使异质文化传统和消费者选择的强大影响内在化,无论是通过政治行为(通过福利计划建立“社会工资”)集体地表现出来还是通过个人消费选择个别地表现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生产和消费的环节当作彼此之间内部关系的一个问题来谈论才富有意味。

### 可变资本的总循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可变资本总循环规则内劳动者的形象。经验世界、物质存在、主观性和人的意识部分地(不然就是主要地)形成于劳动过程的激烈考验中,形成于劳动过程中对价值和竞争优势的热切追求中,形成于商品文化的永恒欲望和显著失败中。它们还形成于主要隐藏于物的交换与物的运动之背后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空母体中。可变资本循环过程的显著不稳定性,配上那些由生产、交换和消费不同环节建立的世界的不同窗口,使劳动身体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不受个体控制的一系列力量的支配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劳动身体必须被视为历史地和地理地获得的资本循环过程的一种内部关系。

114

然而,当我们把积累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时,我们也会发现“维持和再生产工人阶级仍然是资本再生产的一个必要条件”。实际上,工人阶级深陷于与资本积累的那种“伙伴商店”关系之中,这种关系使之在其存在的任何环节中都是资本的附属品。简言之,资本家“制造了作为雇佣劳动者的工人”。马克思(Marx, 1973, 717—18)继续说道:

劳动力所得报酬是资本,这种资本转化成维持生存的手段,它必须被消费从而再生产现有工人的肌肉、神经、骨头和大脑,并创造新的工人。因此,在绝对必需的范围内,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就是把劳动力以资本回报所得的维持生存的手段恢复成资本可以再次剥削的新鲜劳动力。这就是资本主义最不可缺少的生产工具——工人——的生产和再生产。

这样,再生产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马克思对这个问题准备不足,正如资本家一样,他把它留给了“工人自我保存和自我繁殖的驱力”。他所提出的惟

一规则就是,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劳动家庭,无论是在繁荣还是在萧条时期都将努力积累它所拥有的惟一“财产”形式:劳动力本身。因此就产生了扩大的积累和“人口最大限度的增长之间的联系——这里的人口指的是活劳动能力”(Marx,1973,608)。

但同样很清楚,当劳动者依靠自己获得财产或者开始以技能形式获得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时,这种平等将会很有可能改变并产生不同的再生产策略,以及由世界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提出的不同的社会供给目标。此外,马克思间或把“家庭”视为一个社会地构造的再生产单元(结合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两性物种繁殖之间分工的强调),这显示了性特征和性别这些问题与政治经济学交互作用的物质交接点。在此,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近些年所作的详细阐述在此表现出巨大的重要性。如果总的可变资本循环说明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再生产,那么它的生物的和社会的再生产条件问题必须要在承认这种复杂性的前提上提出来(比较巴特勒[Bulter, 1998]与弗雷泽[Fraser, 1997]之间的争论)。

对资本进行抵制和反抗的各种可能性从生产、交换、消费或再生产的不同角度得到了明确的解释。不过,总的来说,我们仍然会发现调节可变资本总体循环过程的资本主义的恶性规律如何在这些不同的环节上对劳动身体产生建设性/破坏性作用(既是实质上的又是表象上的)。资本不断地努力按照它自己的需要来塑造身体,但是同时在其作用方式内使转变结果内在化,并且不断地展开劳动者的身体欲望、需要、需求和社会关系(有时公开表现为集体阶级、共同体或以身份为基础的斗争)。这个过程构成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如有关性特征和生物繁殖的“选择”,或者是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正如那些“选择”(如果它们真的是那样)更主要是由社会秩序及其占统治地位的法律、社会和政治代码以及规训行为(包括操纵性特征的那些行为)所构成。

说来说去,对可变资本循环的研究并不能自然而然揭示一切事情。首先,它只是许多不同循环过程中的一个部分,这些不同的循环过程组成了一般意义上的资本循环。生产资本、金融资本、土地资本和商业资本,这些资本全都有它们自己的运行模式,而且资产阶级税收的循环产生了“必需品”、“需求品”和“奢侈品”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关系影响了生活方式的选择、身份的象征以及由富人、权势人物和名人所树立的时尚。这些为劳动人民设置了相对标准,因为正如马克思所坚持的,生活安康的感觉是一个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标准,贫富

之间的差距像绝对生存状况一样重要。而且,在资本积累的世界舞台和可变资本循环得以发生的固定条件中,国家的调节行为(通过税收的循环和国家支持的债务表示出来)在确定社会工资和规定“文明的”及“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教育、健康、住房等水平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在此,关键问题并不是在理论上或历史上坚持完整地或严格地描述这些相互作用的过程,但是,理解可变资本循环的条件却无疑是理解当代社会中身体状况的必要条件。

对于劳动身体的生产、个人和集体主体性的生产,马克思所提供的提论有限而集中,对此存在着无数的阐述、修正、再表述甚至直率的挑战。马克思的图式缺乏(或者只是简单触及)许多东西,如性和性欲、身体的性别和种族身份,以及精神分析和再现、语言学 and 修辞、想象和虚构等诸多方面(这里只列举一些明显的缺乏)。空间和社会分工中的性别角色已经成为近年来大量研究的中心(可参见 Hanson and Pratt, 1994),碎片化的劳动力市场中的种族关系问题或种族/宗教歧视问题也得到详细研究(可参见 Goldberg, 1993),这些研究所运用的方式较深地理解并坚持了马克思的思想(Marx, 1976, 414),即“白人劳动者不能解放烙印在黑人身上的他自己”。同样还有很多其他的过程——新陈代谢的、生态学的、政治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对身体实践和可能性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116

但是这些缺乏还不能通过抹杀马克思研究的方法或主旨来加以解决,后者是需要依赖的而不是要否定的东西。人体是一个战场,冲突的社会生态评估和再现力量永远都运行在这个战场的内部和周围。马克思为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下身体生产的过程和作用提供了丰富的概念工具。同样非常重要,他为研究如下问题提供了一种适当的认识论(历史—地理的和辩证法的),即在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条件下,人体是如何产生的、它们如何成为意义的能指和所指,以及内在化的身体实践又怎么样反过来改变其自我生产的过程。

## 身体政治学与争取最低生活工资的斗争

### 1. 身体政治学中的政治身体

嵌在一个诸如可变资本循环这种社会过程中的身体从来就不被视为温驯的或被动的。毕竟,资本只有通过劳动能力的“塑形之火”才得以生产。即使受资本支配的劳动注定要在极大程度上创造它自己能够控制的条件和工具(在消费和交换领域内与在生产本身领域内差不多),但是劳动者的变革和创造能力总是有可能(虽然在现在的形势中难以想象)形成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替代方式。这些变革和创造的能力永远不会被消除。这就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既维持资本主义权威,同时又为劳动者提供多重机会来维护他们的力量和意愿。因此,丝毫不意外,马克思在嵌于可变资本循环中的劳动的前面会加上“活的”这个定语来强调它根本的动态性和创造性,而且着重指出改变现状的生命力和破坏力存在于什么地方。

对可变资本循环的分析表明,“身体政治学”与生产、交换和消费的观点显得不一样。劳动者在某一时刻屈从于资本的命令或与其作斗争,而在另一时刻却又加强它们的力量,在这两者之间明显地存在着取舍。例如,对某些人来说,在生产内部卑微地屈从于资本的命令也许是获得消费领域内适当快乐及满足(假设在多重市场拜物教的情况下这是可能的)的一个合理的代价。但是,什么东西规定着那个代价是否定得太高呢?工作身体不只是威廉·吉布森在其互托邦小说《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中轻蔑称呼的“肉(meat)”,劳动者不只是“手”(假设他们既没有头也没有肚子,就如查尔斯·狄更斯在其小说118《艰难时世》中用嘲讽口气所评论的)。在此,身体的概念面临着失去政治优势的危险,因为它不能提供一个基础来确定与政治行动位置相反的方向。因此,

把身体当成基本概念的那些人(如福柯和巴特勒)在阐明性之外的政治学时肯定会遇到巨大的困难。卷入可变资本循环之中的身体发生了什么,这些更广泛问题典型地消失于这种政治理论中(尽管巴特勒最近[Butler, 1998]煞费苦心指出了身体政治学问题与政治经济学问题之间的联系)。但是,假定劳动者是资本积累纯粹主体,这种可变资本的概念也不会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因此,在狭隘的还原论意义上,“身体政治学”就像全球化观点一样在资本积累面前失去了影响。从作为积累的“肉”的身体领域转换到作为政治行动者的劳动者概念,实现这一转换需要其他一些东西。

如果不理解“个人”、“人”或社会运动这样的概念在这个世界上想要做什么、或能够做什么,那就不能把身体当作政治行动的位置。像人、个人、自我和身份这些充满了政治思想和潜能的概念像凤凰涅槃一样从身体还原论的灰烬中显现,从而在概念的空中占据地位以指导政治行动。当马克思把可变资本概念的极度被动性与“活劳动”的概念,或更广泛地说,与竭力重新定义自己嵌入资本积累中的历史和地理条件的“自为阶级”概念相比较时,他想到的就是这点。正是作为人的劳动者是劳动力商品的载体,而且那个人背负着无数的理想和抱负,比如说他们渴望着劳动的尊严,渴望当作一个纯粹的活人被尊重和敬重,也试图如此对待他人。

在这点上,有人也许想放弃这个相关的观点,因为,正如伊格尔顿(Eagleton, 1997, 22)所抱怨的,“如果你事先已经认为人类是孤立的原子,那么把他们消解于这些过程的关系中也许是有益的,但是如果你要坚持它们的道德自主权,那这样做则是无益的。”马克思(Marx, 1973, 84)则提出了不同意见:

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在这里,马克思所依赖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人类既是社会动物又是政治动物,需要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且那样的社会关联形式构成并支撑了市民社会。人类完成这项任务的方式经历了历史和地理变化。自我感和人格感是相关的且社会地构造的(在这里,马克思的观点要早于上面引用的斯特拉森的表达),这与身体是一个社会构造物完全一样,只不过发挥作用的力量(马克思引证语言作为类比也就不足为奇了)显著不同。例如,“享有道德自主权的个人”不是一个普遍观念,而是产生于商品交换和资本积累变得更加普遍化的18世纪的欧洲。在马克思看来,积极的政治学的任务就是要寻求社会关系的变革,充分承认政治行动的出发点依赖于实际的历史地理条件。

在这里我们遭遇了反思性观点,从其出发可以批评在近些年很有势头的“回到身体”口号。“身体还原论”认为身体是我们寻找替代政治学过程中惟一可以信任的基本概念,这种论调的危险一目了然。但是,相反地,在搜寻关联概念(如“人”、“自我”和“个人”的概念)的过程中,同样存在着重建18世纪自由主义“个人”理想的危险,这种“个人”被赋予了“道德自主权”,被当成政治理论和政治行动的基础。我们必须在“身体还原论”和本顿(Benton, 1993, 144)所称的“自由主义幻想”之间找到一条道路,后一幻想基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之间的天然联系鼓吹政治权利,同时极具破坏性的影响:

在由严重不平等的政治权力、经济财富、社会地位和文明成就所统治的社会中,平等权利的承诺是骗人的,其结果就是,对大多数人来说,权利只是抽象的、形式上的权利,在社会生活的现实中很少或实际上(*de facto*)根本就没有价值。只要社会生活还是由这些抽象原则所操纵,只要还在实现这个承诺,那么权利和正义的话语就是一个意识形态,是一种神秘化的形式,它在把个人束缚于依附和贫穷状态中起着因果作用,而它却自称要从那种状态中解放出来。

对相关观点的需求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强烈了。因为,虽然本顿看到了问题<sup>120</sup>的一个方面,但他还是忽视了这样一些方式。通过这些方式,即使隐藏的压力以令人惊讶的方式摧毁主流意识形态,内含在社会中的个人自主权的观念和个人有能力按照自己意愿支配生活的观念同样也能持久地发挥作用。比如说,马克思(Marx, 1964, 181)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就开创了这样一个相关的概念,他

主张：

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说一个东西是对象性的、自然的、感性的，又说，在这个东西自身之外有对象、自然界、感觉，或者说，它自身对于第三者来说是对象、自然界、感觉，这都是同一个意思……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存在物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

虽然这段文字比较复杂，但意义却足够清楚——没有什么身体可以存在于与其他身体的关系之外，在各个身体之中实施权力和反权力是社会生活的一个主要构成方面。在较近时期，从利科(Ricoeur, 1992)对帕菲特的尖刻批评以及对洛克和休谟的含蓄批评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暗示：个人身份的自由主义概念与利科所说的叙事身份的相关概念之间的冲突戏剧性地为身体政治学的构造提供了一个替代性的解读方法。

虽然是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但所有这些还是使我们回到了在全球化现象的分析中所达及的那个观点。从劳动者的观点看——他们在资本循环过程中体现为一个政治人——政治学深深地植根于他(她)所处的位置以及附随的潜力之中。一方面，存在着一种革命冲动，要求从资本循环的嵌入性中解放出来，这种嵌入性极大地限制了生活机会、身体政治学和社会生态学前景。另一方面，改革主义者要求在那种循环过程中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比如，摆脱在消费中的适当补偿和生产中的可怜屈从之间做不愉快的选择。对于十亿左右每天生活费不足一美元的工人来说(比较第3章)，争取劳动场所的尊严、争取适当的生活机会、争取最低生活工资、争取更广泛的人、市民和政治权利概念，这样的斗争成了最低限度的政治规划。但是，不同的时机产生了不同的政治主张，121而且当政治人就他们的身份和利益而选择立场和采取行动时，工人声音的潜在

一致性和单一性也同样尴尬地习惯于被不同意见所淹没(比较 Unger, 1987b, 548)。正如我在第3章的结尾处所坚持的,这样的政治学必须既是地方事务又是全球事务。因此,我现在回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斗争的地方性形式。

## 2. 争取最低生活工资的斗争

自从托马斯·霍布斯断然宣称“人的价值就是他的价格”之后,直到现在,劳动力的恰当价值这个问题一直作为一个问题盘旋在资本主义的头上,这个问题在理论和在实际中同样难以解决。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从来没有完全解决这种混乱,这种混乱一方面产生于把价值与劳动等同起来,另一方面产生于不得不承认作为生产输入的劳动价值不知怎地要小于它所生产的价值(因此就为地租、利润、利息等类似东西留有余地)。马克思巧妙地解决了那个问题,他承认作为价值实体的劳动与作为商品被劳动者出卖给资本家的劳动力(创造价值的能力)之间存在着差异。新古典主义者同样巧妙地除去了马克思所述的政治寓意的核心部分,把适当的工资等同于作为一种生产输入的边际劳动报酬(因此使资本和土地的“公平”回报率的可能性悬而未决)。那个观点从来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因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力这个商品不同于其他的商品。一大批道德、社会、历史和地理情境干扰了它的表达和评估。所有这些东西之中,最主要的是长期而广泛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地理学。

例如,在美国,充足的“最低生活工资”这个概念(与由社会调节的工作日概念相比)对1877年发生大规模铁路罢工的巴尔的摩和匹兹堡这类城市的骚动十分重要。正如格里克曼(Glickman, 1997)所表明的,这种骚动最终导致了美国的最低工资立法,起初在州层次上,随后在新政期间的联邦层次上。

是什么构成了最低生活工资,这个问题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争论。正如波林和卢斯(Pollin and Luce, 1998)所证明的,1968年以后,确立于联邦层次上的最低工资的价值实际上下降了约30%,使那些依靠全职最低工资生活的人现在完全处于贫困线之下。它在1997年的增长(从1994年每小时4.25美元的基线上升到5.15美元)仍然处于1968年的水平之下。随着联邦范围内确保充足最低生活工资的运动遭到大量挫折,近年来,在更加地方化的层次上一系列地方性运动和骚动在美国全面爆发。这种运动的先驱之一在我的家乡巴尔的摩,所



以,我可以对这种地方性斗争作一描述,以此来说明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理论如何可能与普遍人权体系的主张共同发挥作用(比较第5章)。

在巴尔的摩市,对工资和生活状况的调节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就经历了重大的变更(见第8章)。(与全球化进程有关的)经济上的急剧非工业化意味着大都市区域内可变资本循环中的一些根本转变。除了广泛的结构性失业之外(以及所谓的带有诬蔑性的“下层阶级”的产生),其影响就是就业机会远离蓝领(主要是白种男人和加入工会的人)产业区,而向广泛的服务机构转移,特别是那些与所谓“接待部门”有关的巩固巴尔的摩经济恢复成就的行业(宾馆、旅游、会议、博物馆)。结果(与美国大多数地方的经济一致——参见Wilson,1996和Kasarda,1995)就是分布广泛的长期的结构性失业,以及工作机会转向非工会化的、女性的工人在低薪“无技能”工作中的就业。低收入工作机会出现在这样一些领域,如清洁、守卫、停车和安全服务行业。仅仅只需支付最低工资,而且常常是临时性的工作,甚至不超过一周(没有健康、安全或养老金福利),这种就业的增长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工作穷人”(working poor)——个人或家庭成员全部都有工作,他们的收入总是完全低于官方的贫困线(最近的一份报告对照了美国1994年和1974年工作穷人的童工数字,分别是560万和340万——参见Holmes,1996)。从市中心的贫民区被吸引过来的美国黑人妇女成为了巴尔的摩市这种劳动力的主要来源,这显示了来自于那种地方的那种劳动力所与生俱来的“价值”的话语构造和很大程度上的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的构造。这种固定形式在可变资本和资本积累的循环过程中自动地得到了加强和构造,这种劳动力正是那个循环过程的自我增殖的基本要求。

这些广泛的经济趋势伴随着全国范围的对工人阶级机构和政府补助的攻击(见Edsall,1984),以及广泛的公共和私人机构向强调资本积累的政治经济实践的普遍转向。后果就是社会不平等的螺旋式上升,它表现为真正价值意义上的最低工资价值的持续下降。

反映这种政治经济转向的一个特定例子值得记录。1984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两家都是非盈利性的教育机构)在巴尔的摩联合组成了一家完全自主赢利性的子公司——德姆公司(Dome Corporation),它通过另外一家叫做百老汇服务有限公司(Broadway Services Inc.)的子公司来提供安全、停车、清洁和守卫的工作。这个公司为霍普金斯体系以及大量的市立学校、市政府机关等类似机构做一些清洁和守卫工作。它的大多数雇员是女

人和黑人,来自于巴尔的摩市的贫困区。多数人的工资是当时普遍的最低工资,4.25美元,或略高一些(1996提高到4.75美元,1997年提高到5.15美元)。全职雇员每周的工资约为5美元,有最低限度的健康保险,但是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作是由没有任何福利的临时工来做的。约翰·霍普金斯体系通过这种策略实现了清洁费用的成本节约以及非常大的投资回报率(约10%)。从那以后,其他大学就以此为榜样,即通过外购承担清洁工作而削减成本同时又能赢利。

这个例子说明了上述转变如何在可变资本的循环中发生的。这些转变对身体状况和身体实践有着根本的影响。每个人都承认每小时4.75美元是不足以维持生存的。让巴尔的摩的一个四口之家维持在官方贫困线之上的生活将需要一份每小时最低工资7.70美元(1996年的标准值)的长期工作,外加福利。对市中心许多居民来说,医疗福利和基本护理的缺乏转化成一种长期的、流行病的状况(很可悲的清洁工悖论,他们得不到自己所清洁的医院的服务)。打两份工才能维持生存,这使身体长期处于精疲力竭状态:12小时的工作日再加上花费在工作地和居住地之间不可靠的公共交通上的行进时间。由于不能拥有两份工作,一些工人就不得不居住在收容所而不是正常的住房里,在慈善团体的施舍处吃饭,而不是 Roy Rogers 或者 Burger Kings(这是两个比较平常的消费地方,所提供的是廉价的、营养很少的食品)。劳动过程的需求(常常是很晚的时间)限制生活地点的选择(假设能够负担得起租金和住房,公共交通能够有效发挥作用——这对汽车拥有者等诸如此类的人不适用),这就加强了地理隔离。具有明显种族和性别标志的身体卷入到这种制度中使某些社会团体对这些贫困区的前途充满了绝望(参见 Fernandez-Kelly, 1994; 更常见地,参见 Hanson and Pratt, 1994)。

124 要公正地评价这些状况在特殊的可变资本循环过程的各个方面所造成的令人惊骇的影响,这是很难的。在工作场所中缺乏尊重和尊严、在劳动市场上谈判能力微不足道、消费形式是最低限度的并威胁健康的、抚养孩子的条件是恶劣的,所有这些就是典型特点。所有这些暴力对个人身体所烙下的印记并不难理解,系统研究反复强调不平等对生命机会的残酷影响。巴尔的摩市的平均寿命几乎是美国任何其他类似管辖区中最低的(可与许多贫困的、不发达的国家相比)。杰罗尼穆斯等人(Geronimus et al. 1996, 1555—6)在比较了底特律、纽约、洛杉矶和阿拉巴马等类似地区之后,他们得出结论:“在我们研究的团

体中,平均寿命以下的死亡率一般随贫困人口的比例而增长,随死亡人口中占半数以上种族的贫困率而增长。”这个资料讲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哈莱姆区一个15岁女孩能活到45岁的概率与美国任何地方一个典型的白人女孩能活到65岁的概率是一样的”。虽然我们并不能由此认为缺乏最低生活工资在这里是惟一起作用的因素,但其中的联系是如此强大从而使我们不能否认它们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在领导权发展中融为一体的巴尔的摩人(Baltimoreans United in Leadership Development,简称BUILD)所组织的争取“最低生活工资”的运动试图改变这一切。BUILD成立于1978年,是各宗教团体的牧师联盟(Interfaith Ministerial Alliance,这个联盟主要但绝非仅仅由美国黑人组成)和工业区基金会(Industrial Areas Foundation,简称IAF,是一个以芝加哥为基础的Saul Alinsky风格的社区授权组织)的联合,前者是当地争取公民权利的一个重要的教会力量。BUILD成为了激进主义者呼吁进行城市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组织,它致力于改进穷人和边缘化人群的福利。它在重建正在衰落的邻里的斗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最初全心全意地加入到由城市和社团领导的战略中,旨在通过公共投资和对商业的补贴来创造就业机会(例如,在内港的复兴中,会议中心、新的棒球场等等设施建设全都位于市中心)。

20世纪90年代早期,BUILD认识到它的策略太有限。缺乏适当就业机会,新生的邻里重又衰落。公共投资和对公司的补贴正产生着贫困线之下的工作。由社团支持的市区复兴并没有能够履行其诺言,BUILD越来越认为它是一个“大背叛”。那些构成BUILD基础的教会发现它们自己被迫越来越以社会服务的方式(施舍处、服装、社会救济)接济格鲁乔·马克思的俏皮话所描述的人群。“瞧,我在进步,从一无所有到一贫如洗”,这是个残酷的笑话。

BUILD决定以“家庭价值”和“社区”改良的名义发动一场争取“最低生活工资”的运动,这与它的宗教基础是一致的。他们指出,作为对政府补贴的回报,商业应该遵从社会契约。这就把每小时7.70美元最低工资的理想转化为永久性工作、足够的福利和对全体劳动者开放职业机会。基于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实现这个理想,BUILD提出了逐步的工资涨幅计划,在1996年7月从每小时6.10美元增加到6.60美元,1997年增加到7.10美元,1999年增加到7.70美元。这实际上是一个保守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加利福尼亚的圣何塞最近提出的一份最低生活工资法把标准定在了10.75美元)。

诸如此类的全部斗争中,就如马克思(Marx, 1976, 409)所评述的,“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阶层中的同盟”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这项运动的动力来自于教会,由此就决定了它的风格,即关注道德和文明行为的定义,这始终是确定劳动力价值所要讨论的内容。BUILD实际上所表明就是巴尔的摩市现在所发生的:劳动力的市场估价不能被当作一个“文明”国家的“道德”论据予以接受。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立即就与劳动制度联系起来。一种新型的劳动组织形式势在必行,它应该利用IAF的技巧、AFSCME的力量(州、县和市政府雇员,从人员和资源上来说,他们是1994年运动的全程参与者),这意味着改变可变资本循环基本条件的运动,从传统的车间产业组织向全市性运动发展。与BUILD合作的劳动组织者乔纳森·兰格(Jonathan Lange, 1996)对这个策略的概括以下:

组织化是一个相关的行动,它发生在人群中的一个地方,而且它不像资本那样完全不稳定。最终你组织的不是工作场所和工厂而是人,所以……产业模式没有绝对意义。因此,你必须要了解如何组织……一个全面的劳动市场,不管人们在什么地方工作,如何创建一个可以把人们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的组织,那意味着福利计划必须是可转移的,组织中的关系必须是可转移的而不是完全固定在一个工作地方;意味着必须要理解,人们不是必然马上就会成为领导者,而是潜在的领导者,他们可以在现在工作的地方或搬到新的地方时发展其追随者。这表明你必须锁定那些产业和公司,在其中,拒绝劳动不是你所拥有的惟一力量,你还可以尝试其他的平衡方式从而最终达到共识和融洽……这是解决下列问题的一个实验:在某一劳动市场内,如果你合并,如果你联合具有其他行为规则和能力的劳动群众,而且如果你认真地瞄准那些并非全面易变的、不会轻易失去对其资本控制的机构,那么工人们能够争取更加平等的地位吗?而且,如果你充分做到了这一点……你能开始真正地,提高城市中最低工资额的基础吗?

126

因此,这个策略具有两个分支。首先,建立一支工人的骨干,他们能够履行领导才能并发挥自身潜能。一些工人——主要是美国黑人妇女和男人——直

接加入到以“攀登天梯”(Climbing Jacob's Ladder)<sup>1</sup>作为座右铭的**团结赞助委员会**(Solidarity Sponsoring Committee,简称SSC)中并成为领袖。但另一些人则比较勉强。其次,全力以赴创造一个强大的各种力量的联盟以改变可变资本循环的基线。最初,BUILD的力量在于教会,但事实上,主要是遭受压迫的妇女和非裔美国妇女,她们以可能潜在地统一各种不同社会运动(包括各种工会及公民权利和妇女组织)的方式把性别、种族和阶级问题联合起来了。而且,这项运动过于依赖劳动尊严和劳动者尊严这一概念,甚至有时竟然主张:考虑到现实的劳动过程的特点、潜力和尊严,我们应该质疑“有工作总比没有工作强”这个准则。

这项运动在1995年赢得了具有特殊意义的承认。现在市政府要求全部城市工资以及与城市签订的转包合同都必须兑现“最低生活工资”政策。虽然市长起初为了使巴尔的摩在“全球化”环境中能够保持竞争地位而抵制它,但他现在声称这份努力是划算的(如果把穷人享受的降低了的社会服务成本算进去的话)。紧接着世界贸易中心(由州政府管理)也跟着做(有趣的是,它受到了国营大楼中商业承租人的支持,但却遭到了州政府中商业首领的大力批判)。在1998年早期,市立学校董事会同意在其全部转包合同中加上最低生活工资条款。现在约翰·霍普金斯体系就面临着完全相同的问题,它既是服务的提供者(通过百老汇服务机构),而且作为本州最大的私营雇主,它又是这些服务的需求者(一个有趣的例子,证明了资本在涉及劳动时是如何频繁地在供需平衡的两边运转——比较马克思的主张,1976,752)。为了实现这个目标,1996年早期,一项运动应运而生,旨在说服霍普金斯体系接受最低生活工资作为它自己合同惯例的一部分。

在约翰·霍普金斯体系内寻求同盟变得至关重要。研究生代表机构,加上一些教师团体,以及黑人学生会和学生自治会的一些代表开始着手处理这个问题。起初也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冷淡阶段,连应该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校园团体也是这样。大学里的一些经济学家反对(更确切地说,预见性地)对自由市场力量进行任何干预,理由是“现在拿最低工资的多数人只值那么多”(Hanke, 1996)。很明显,斗争的结果不仅取决于(并将继续取决于)SSC(在AFSCME的帮助下)的组织能力和BUILD的道德劝诫能力,而且取决于在约翰·霍普金斯

127

<sup>1</sup> Jacob's Ladder 是《圣经》典故。“创世纪”曾记录雅各梦到天梯,上帝立于其上。——译者注。

体系内创立一个强大联盟的能力,宣扬最低生活工资对所有直接或间接(通过转包合同)在这个机构中工作的人来说都是强制性的。到1998年,多数学生和教员相信了这个观念,但仍然要面临一个顽固的行政部门。到1999年,迫于内外压力(金融和道德),后者慢慢地承认了它对在其控制下占支配地位的令人惊骇的贫穷和疾病状况负有责任,它还最终承认自己的工资政策对构成这些状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宣布将在各大学中“成为一个领头人”,讨论最低生活工资的问题,并保证到2002年每人每小时的工资至少有7.75美元(1996年的最低生活工资)。

巴尔的摩市争取最低生活工资的运动(这个运动现在被30多个其他城市和州级别上的地区所仿效——参见Pollin and Luce,1998)提供了一系列相当特殊的有利条件来改变这种“在城市内身体被建构/被摧毁”的政治。它把自己的基础建立在教会、共同体、工会、大学及那些“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阶层之中,开始以一种相当特殊的方式来制定身体政治学,同时回避一些比较传统的二元论概念问题,如资本/劳动、白人/黑人、男人/女人及自然/文化。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者大概会欣赏而不是反对对这些术语的混淆。例如,巴特勒(Butler,1993,9)断言“回归到物质的观念,不是作为场所或表面,而是作为一个物质化过程,它随着时间的变化而稳定下来,从而产生了被我们称为物质的那些边界线、固定性和表面”,如果把这一主张当作理解此类情境中的身体的特定框架,那么“最低生活工资”运动则是身体政治学的一种基本形式。这并不是说该模式没有问题。与它的宗教根基以及它所强调的作为特定繁殖单位的传统家庭概念相一致,这项运动的宗教方面可以被视为或者甚至成为独一无二的。而且除了一般地谋求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授权,BUILD还想获得它试图服务的低收入人口的授权。然而,这不是放弃最低生活工资目标的理由。实际上,许多不同的利益集团(既有世俗团体也有宗教团体)现在都支持在巴尔的摩市工作的每个人实现体面的最低生活工资这个共同的目标。

“最低生活工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阶级问题,贯穿于生产、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因此,它有权确定当前“工作福利制”福利改革方案的“劳动”方可能会涉及到的东西。不幸的是,当这个城市被迫容纳好几千(可能多达14000)工作福利制受益人成为它的劳动力时(市区各种各样的工作岗位加起来大概有100000),这种可能的关系现在被颠倒了。城市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体系开始以每小时1.5美元雇用工作福利制受益人(作为“实习生”),凭第一

感觉,这意味着对最低工资工人的某种取代,结果就产生了比维持城市可变资本循环的合法最低工资还要低的工资。由 BUILD 所组织的全市性政治斗争以及约翰·霍普金斯体系内各种力量的联合使地方长官和霍普金斯总裁做出承诺:工作福利制实习生不会取代现有工人。

这不是一场轻易就可取得全面胜利的政治战争,它的演变证明了阶级斗争如何从资本主义方面发起。例如,汉堡王在巴尔的摩市拥有最赚钱的特许经营权之一,它坐落在“授权区”,有资格获得政府津贴,可以不受福利制的影响而雇用工人当“实习生”,所花的代价远远低于最低工资,更不用说最低生活工资了。汉堡王还在克林顿总统 1997 年国情咨文中被引证来说明它作为大公司之一愿意不受福利制影响而雇用人员,总统还保证要敦促给这样做的公司实行特殊课税扣除。但是,稍后,在全国隶属于工会的工人和许多共同体集团的强大压力下,总统同意(顶着共和党的激烈反对)把所有的工作福利制工作纳入到劳动法的框架之中(允许工作福利制工人组织起来以免于更加公然的直接剥削形式)。当阶级斗争围绕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最具争论性、最令人焦虑的社会问题之一而展开时,资本积累也如此运行着,而政府的援助主要落在资本方面。

在总体的“城市”水平上,最低生活工资运动结合了种族、性别和阶级所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在改变身体实践并要求基本经济权利的斗争中,它为美国黑人妇女担任领导角色开辟了空间。此外,在对劳动力评估进行政治干预的过程中,这项运动提出了一种不同的空间模式,突出了芒恩的主张,即“身体的时空是一个它所属其中的更广泛时空的缩影”(Munn, 1985, 17)。创造另一个空间格局来代替越来越被分割的工作场所(在这个场所中,劳动力价值只能零碎地确立),这成为改变可变资本循环状况的手段之一。这项运动为在不同空间规模上建立具有广泛基础的联合政治学提供了某种可能性。

129

改变可变资本循环的底线条件不会改变巴尔的摩市需要改变的每一件事情,无论是在劳动过程内部还是在其外部,它不会自动地提高工作经验的质量,它不会自动地正视妇女在工作中受到的性骚扰、城市中猖獗的种族歧视、憎恶同性恋的示威游行、许多邻里的显著恶化,乃至家庭机构内部及周围产生的压力。除了工资制度改革(在这里,废除工资制度几乎不是一个问题,尽管改良主义者声称——马克思对其曾作有力的批判——一天公平工作换得一天公平报酬),它也不会打开革命之门。但它确实为巴尔的摩市大量劳动人民身体实践的转变创造了必要条件。没有它,社会转变的许多其他可能性都行不通。马克

思(Marx, 1967, 第3卷, 320)在认识到这种两难困境之后,在其一段值得深思的著名段落中这样表述:

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130 在这个具有令人吃惊的改良主义观点的著名段落末尾,我们也可以加上一句:“一个适当的最低生活工资是根本条件”。在资本主义日趋全球化之间隙,巴尔的摩地区争取最低生活工资的斗争在争取各项权利、正义、尊严和体面的更加普遍的斗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它的特殊性使它与众不同,这决定了它的各种优缺点,但它们并非与更加普遍化的政治学成就无关。虽然迄今为止所影响的人数还有限,但这些运动方式已经证明,在某一规模上遇到的政治挫折可以通过转移到政治行动的不同规模上而潜在地予以解决。

### 3. 空间和时间中的身体

成为“万物尺度”的身体本身就是创造它的各种力量进行争夺的场所。身体(就像人和自我)是一种内部关系,并因此对世界是开放的、易渗透的。不辜



的是,相关的身体概念实在太容易发生唯心主义的转变,特别是在学院政治学中。身体不是单子,它也不会随意地漂浮在某种文化、话语和表象的以太之中,无论这些东西在身体的物质化过程中有多么重要。身体研究的基础必须立足于对物质实践、再现、想象、制度、社会关系和政治经济力量主要结构之间的真正时空关系的理解。这样,身体就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连结点,解放政治学的可能性藉此得以研究。在这个主题上,虽然有许多著名的富有洞察力的著作,但是,马克思对身体在资本循环内发生的物化的理解,却是值得关注的至关重要的论见。身体“从最深层的意义上来说可以是一个积累策略”,但它也是政治抵抗的场所,正如巴尔的摩 BUILD 争取最低生活工资运动的例子所证明的,那种政治抵抗是由下列基本事实决定的:我们是最名符其实的政治动物,具有道德主张并因此能够变革处于任何市民社会中心地位的社会关系和制度。总之,劳动者可以要求与尊严、需要以及对公益所做贡献相符的各项权利。如果这些主张在可变资本的循环内不能实现,那么,解除这些限制的革命性要求似乎就是身体政治学必须关注的根本方面。我们有必要思考这个问题。



## 第三部分

# 乌托邦机遇



## 乌托邦的空间

一幅不包含乌托邦的世界地图甚至都不值得一瞥。

(奥斯卡·王尔德)

### 1. 巴尔的摩的故事

我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巴尔的摩度过的,我视之为故乡,并对它和这里的人们产生了浓厚的情感。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城市却是一团糟。不是那种迷惑人的、引发人探究兴趣的糟糕,而是一种可怕的糟糕。而且现在比我 1969 年初识它时似乎更加糟糕。或者它可能与过去一样糟糕(见表 8.1),只是那时候许多人相信他们对此能够有所作为,现在这些问题似乎难以处理了。

繁琐的混乱局面使人不知所措,不过,有一些特点还是值得指出来。在这个城市的 30 万个单元的住宅区内大约有 4 万个空置的、一般来说也是废弃的房子(1970 年有 7 千个)(插图 8.1)。而无家可归者(尽管有那么多空房子)、失业者,甚至更为重要的,那些有工作的穷人(他们没有福利,靠着每星期不到 200 美元的工资努力生活着)却到处可见。施舍处(马里兰州 1980 年有 60 处,现在有 900 处)的队伍越排越长(根据一些非官方调查,这些人中的 30% 是有工作的),许多市区教堂的慈善工作已难以维系(图 8.2)。生活水平和机会的不平等快速地增长着,丰富的教育资源(巴尔的摩有全国最好的学校,但它们是私立的)对大多数居住在那里的孩子是不开放的。公立学校的质量又非常低劣(根据最新的测试,在阅读技巧方面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两年半)。

表 8.1 过去与现在:巴尔的摩内城区邻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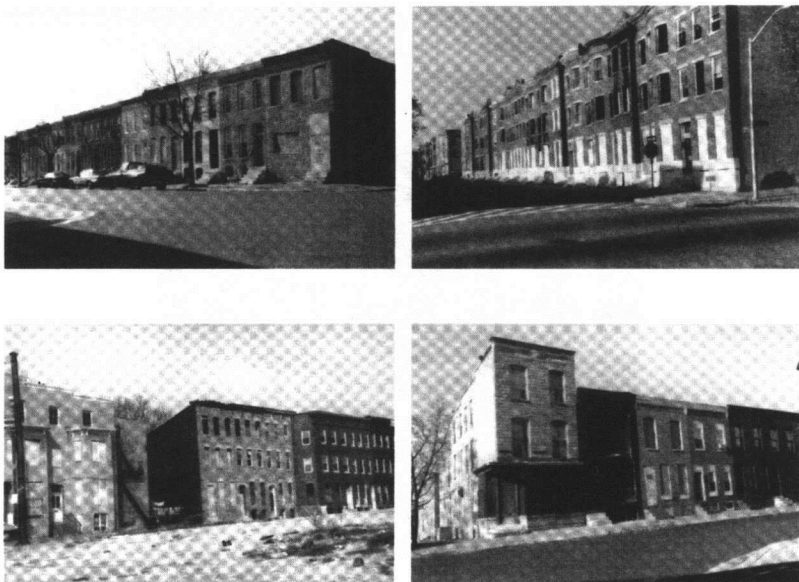
	1966	1988
<b>经济比例</b>		
成人失业率	7.0	17.0
接受福利的家庭	28.0	30.0
收入低于 10 000 美元的家庭(1988 美元)	41.0	47.0
收入低于 20 000 美元的家庭(1988 美元)	16.0	18.0
具有中等学历的成年人	10.0	49.0
至少有一人拥有小车的家庭	23.0	36.0
体力劳动者的比例	43.0	8.0
办事员工作人员的比例	1.0	30.0
<b>家庭结构</b>		
中等家庭规模	2.9	1.9
退休人员比例	13.0	30.0
18 岁以下人口比例	45.0	34.0
有孩子的男性单亲家庭比例	56.0	43.0
独身家庭比例	16.0	31.0
有 5 个或 5 个以上成员的家庭比例	30.0	12.0
<b>邻里</b>		
最经常被引证的“好”的方面	人	人
最普遍的抱怨	住宅	毒品/犯罪
租户比例	85.0	78.0
住在邻里超过 10 年的成年人的比例	48.0	60.0
认为邻里正在改进的人的比例	/	14.0

以上数据根据巴尔的摩城市复兴和住宅机构在 1966 年委托所做的调查及《巴尔的摩太阳报》在 1988 年 4 月再次调查而汇编。它们都集中在被马丁·路德·金暗杀之后的暴动所严重影响的邻里。在这起事件 20 周年纪念日时,这些调查发表在《巴尔的摩太阳报》上(1988 年 4 月 4 日)。

除了中等学历比率、小汽车拥有量和过度拥挤之外,这些数据极可靠地说明了一些情况下邻里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恶化。虽然这其中有一些是由于人口的老齡化,但就业机会的缺乏也是明显的。体力劳动就业的灾难性降低及办事员工作就业的上升隐藏了就

业机会从男性到女性的根本性改变。这与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和居家成年男性数量的降低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期间为相似的邻里所汇编的数据证明这些趋势没有任何逆转。

(资料来源:Harvey,1988,238)



**图 8.1 放弃城市:巴尔的摩市的住宅。** 1970年在巴尔的摩城大约有7 000套被遗弃的住房,到1988年,这个数目估计已经增至40 000套,当时这个城市的全部住宅也才超过300 000套。这对整个邻里的影响是灾难性的。现在,城市政策的导向是大规模的破坏(1996到1999年期间有4 000套被破坏,另有11 000套在计划中),“官方”希望以此把穷人和下层人从这个城市中赶出去。为穷困的人收回从前的邻里——特别是那些有高质量住宅群的地区——这个念头已经被放弃了,即使那可能具有很大的经济和环境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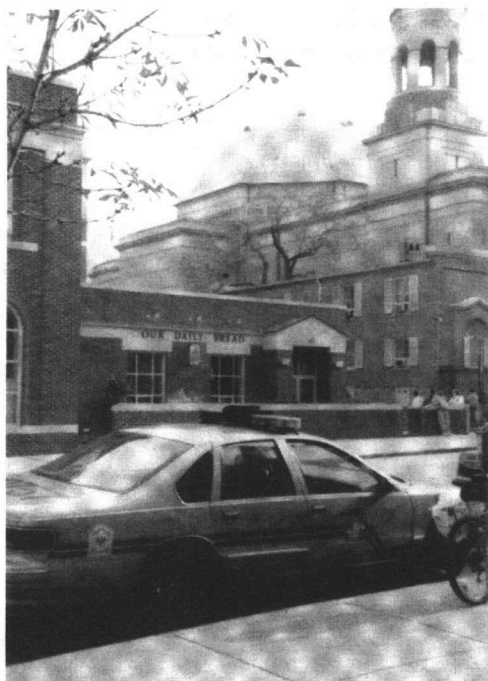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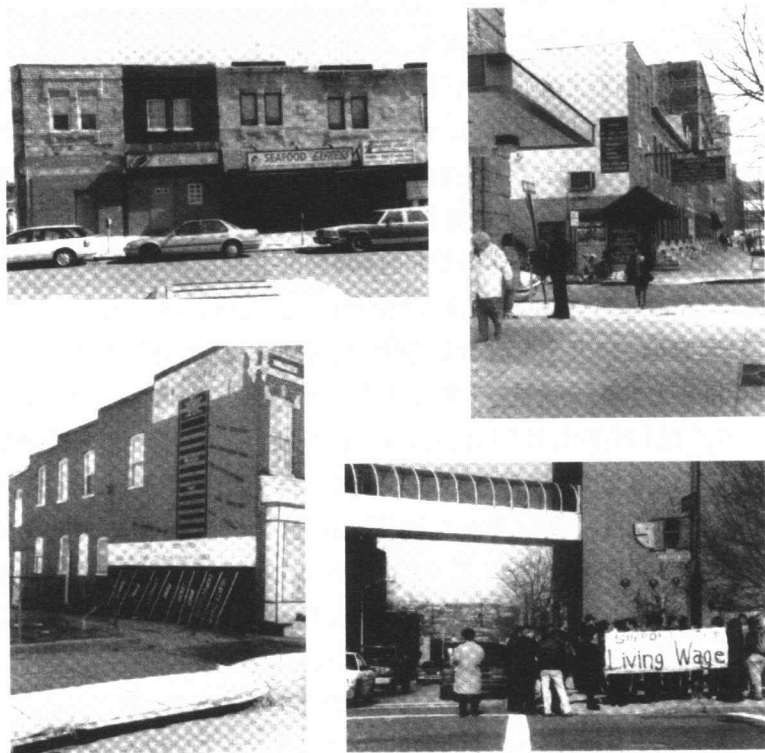


图 8.2 城市中的施舍处:巴尔的摩市中心“我们每日的面包(Our Daily Bread)”。“我们每日的面包”由天主教慈善团体创办,每天大约为 900 人提供食物。罗马教皇曾经访问过这里,它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给城市穷人提供服务的佼佼者。但是,在 1998 年,由彼得·安吉洛斯——巴尔的摩金莺队的大富豪主人(每年为棒球运动员所开的工资预算就达 9 千万美元)——所领导的“市中心伙伴”运动开始煽动反对穷人穿梭于市中心地区,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穷人滋生了犯罪,使财产贬值并阻碍了经济恢复。“伙伴”敦促这个城市为穷人建立一个“社会服务区”以使穷人远离市中心,天主教慈善团体被要求寻找一块不太中心的地方。1999 年 4 月,“我们每日的面包”宣布将迁移到一个由安吉洛斯捐赠的改建过的大楼里,这座楼象征性地隐藏在城市监狱的后面,在一个很荒凉的邻里中。由于当地居民的抱怨,天主教慈善团体放弃了那块地方并开始寻找其他的地方。正如恩格斯所认为的,资产阶级对社会问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他们把这些问题移来移去同时又责备这样做一点也不解决问题。





**图 8.3 城市中的贫穷: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阴暗面。**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及其附属公共卫生学校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机构之一。然而,这个城市中的个人平均寿命却是非常可怕地低,在这些机构的近邻地区,卫生统计学讲述的是有关贫穷、边缘化、被剥削和被忽视的骇人听闻的故事。当铺、崩塌的店堂教堂、保释的人,所有这些都处在这所医院的附近,表明着社会的不幸。但表达穷人“攀登天梯”以脱离苦海从而自我肯定和自力更生这种欲望的一幅破碎壁画却提供了一丝乌托邦理想的光芒。在这个城市以及在约翰·霍普金斯体系中所开展的最低生活工资运动(打出的口号就是“攀登天梯”)给予人们踏上那个梯子的希望。

世界上最好的医疗和公共卫生机构掩盖了长期的贫穷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不幸(图 8.3),那些机构对于当地居民来说是不可企及的(除非他们为了低于基本工资的薪水而拥有清扫艾滋病病区的特权或具有医疗保险或公共医疗机构身份或患有罕见的疾病能引起精英医疗研究人员的极大兴趣)。在这些国际知名的医院设施的近郊地区,平均寿命是本国最低的,与世界上很多较贫穷的国家相比也是最低的(男人 63 岁,女人 73.2)。梅毒的传播率是任何一个发达

国家城市中最高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而且还有过呼吸道疾病的爆发(根据为环境保护署所搜集的数据,在1986到1996年期间城市中所有类型的呼吸道疾病都不止翻了一番,但最令人吃惊的是哮喘发病率的提高,从每10000人中大约8例上升到约170例)。这个城市记录在案的惟一值得注意的公共卫生成就就是对肺结核感染的戏剧性控制。这件事的发生依赖于一个公共卫生委员,他曾经在越南的战场上有过军事医疗经验,他觉得有必要将中国共产党的“赤脚医生”概念应用于巴尔的摩城区,并由此在10年内将这个城市肺结核比率由它在国内并不令人嫉妒的糟糕地位降低到国内平均水平之下。

大量的人(白人和黑人)继续成群结队地(根据人口普查局的数字,在过去5年中每个月的净比例就是一千多人)离开城市去郊区寻找慰藉、安全和工作(当我刚到这个城市时,其人口接近于100万,现在它的人口降到刚刚超过60万)。郊区、边缘城市和远郊地区(借助于政府对交通的巨大资助和上层收入阶层通过抵押利息税额的减除而进行的住宅建设)以一种极度非生态的趋势蔓延(图8.4)——长途交通班车、夏天严重的臭氧浓度(几乎自然地与螺旋式上升的呼吸道疾病联系起来)以及农用土地的丧失。开发商把破坏稳定一致的郊区风格(当然,由于在建筑上借用了意大利式别墅和多利安式圆柱的风格而有所缓解)当作治疗城市文明崩溃和瓦解的万能药,这种崩溃和瓦解首先是在市中心地区,然后,这种致命的打击就传播到了内郊。就是在那里,在那个平淡普通的世界中,大多数的都市人口快乐地居住着,就像其他大多数的美国人一样,他们从来没有生活得如此舒心快乐。这种商业化的“资产阶级乌托邦”(如罗伯特·费希曼在1989年所称)住所奇特地混合了政治保守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那就是当代美国的特点。

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热诚而又独断的市长威廉·唐纳德·谢菲尔的支持下,这个城市还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努力试图扭转一些事情,伴随而来的就是公私企业合伙经营的形态,在市中心和内港恢复区投资(图8.5)从而把金融服务机构、旅游业和所谓的接待功能(so-called hospitality function)吸引到城市中心来。这个程序运转起来花了不少公款。合伙企业一旦拥有了这些宾馆(海厄特只在20世纪80年早期投资了50万美元就获得了一个价值3500万美元的

141 酒店),它就需要建造会议中心来填充这些宾馆,并取得一部分现在估算起来价值一年830亿美元的会议产业。为了保持竞争力,政府还需要进一步投资1.5亿美元来建造一个更大的会议中心以招揽大型会议。现在担心的是,如果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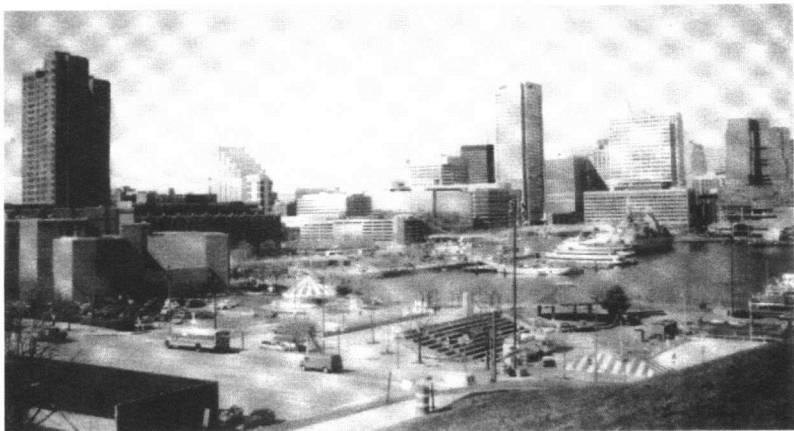
一个巨大的“总部宾馆(headquarters hotel)”，那么所有这些投资都将无利可图，而这个“总部宾馆”同样需要“大量的”政府补助(大概是5000万美元)。而且为了提高城市形象，差不多有5亿美元的资金被用来为运动队(其中一个运动队还是从克里夫兰挖来的)建造体育馆(插图8.6)，这些运动队每年付给明星运动员的工资就是好几百万美元，球迷们就是为了观看这些明星运动员才会购买高昂的门票。这在美国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故事(国家足球联盟——值得赞助的福利客户——估计在1992到2002年期间将有38亿美元的巨额公款被投入到建造新的国家足球联盟体育馆上)。国家花费了500万美元为足球体育馆建造了一个特制的轻轨车站，这个车站一年还使用不到20天。

这就是所谓的“喂养市区怪物”。每一波新的政府投资都是为了使上一波的投资获得赢利。公私合伙意味着政府承担风险而私人获得利润，市民等待着永远不能实现的利益。一些公共项目恶性膨胀，滨水区满足高消费层次的综合共管公寓(图8.7)经营得非常糟糕，从而获得了200万美元的税务减免为预防破产，而贫困的工人阶级——接近于破产，如果在技术上来说还不是——却什么也得不到。“我们必须保持竞争力”，市长如是说，“如果他们失败了，那就不会有其他人想来这儿投资了”，很明显，他忘记了加在我们其余人(包括那些可能会提高他们财产的人)身上的更高税单同样也刺激着人们加入到正在进行的离开城市去郊区的队伍中。

当然，这种恢复努力也有好的一面。许多人来到内港，甚至发生了种族混合。人们显然很喜欢观察别人。而且，有一种共识在增长，即城市要显得生机勃勃就必须24小时营业，大型书店和硬石餐厅要能够提供像贝纳通和香蕉共和国一样多的东西(图8.8)。为了使这种行为可行就需要有大量的社会控制，而且这种控制的迹象无所不在(图8.9)。接近这种行为的愿望使一些年轻的职业人员(没有孩子的那些人)回到市中心。当“绅士化”在标准意义上取代低收入人口时(就如它主要在港口周围发生一样)，它至少在物质上恢复了城市中由于不被重视而慢慢侵蚀的部分地区(图8.10)。政府为低收入者所建的一些破旧的公共住宅区已被爆破以便给更高质量的住宅和环境让路(图8.11)。在各个地方，邻里们都紧密地团结起来，发展了一种特殊意义的社区，其目标是更安全的、更放心的居住场所，而不会堕落为疯狂的排他主义。在一些邻里，为使穷困的社区获得新生，许多主要项目已着手进行，使用的是一批公私资源(图8.12)。但所有这些都未能触及巴尔的摩问题的根源。



**图 8.4 资产阶级乌托邦：郊区的蔓延。**像其他许多美国大城市一样，巴尔的摩也以一种异常的速度爆炸（参见图 3.1）。受各种恐慌心理、种族主义和阶级偏见以及城市许多地方公共基础设施的崩溃所影响，而且被渴求隔离和保护的“资产阶级乌托邦”欲望所吸引，这种有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后果就是显著重复的低密度景观的蔓延，以及对汽车的完全依赖。这对生态的影响是绝对负面的，而且交通阻塞及基础设施建设的社会和经济成本正在迅速上升。



**图 8.5 开发商的乌托邦:巴尔的摩的内港恢复。**现在,在巴尔的摩内港地平线上所能看见的全部东西几乎都是1970年以后建造的。背景建筑主要是办公室和宾馆,高层共管公寓(最终证明这两者除了打折以外都很难销售出去)守卫在两头。左边的共管公寓建在价格很高的土地上,这块土地是因为开发商允诺帮助其他地方而作为回报出让给他的,只是这个诺言从未兑现。在前景上是休闲和旅游活动场所,集中于港口前沿(劳斯的一系列观景建筑投资占据了港口主要的角落)。大多数的开发是通过“公私合伙”的途径进行的,它有着多变的历史。凯悦酒店(正上方)使海厄特只付出50万美元的投资就获得了一个价值3500万美元的酒店(其余的都是公款)。这项投资对这个城市来说最终是成功的,但哥伦布科学中心(正下方有白色长笛状屋顶轮廓线)花费了1.47亿美元国家担保的私人款项,而其主要功能区,即探险大厅,却在1997年开张后的9个月后被迫关闭。这座楼被国家接管而免于破产,现在由马里兰大学经营,海军生物技术中心是主要的承租人。

142



**图 8.6 城市中的公共投资：为富人们建造的体育馆和会议中心。**20 世纪 90 年代，差不多有 10 亿美元投入由国家投资的两个体育馆（5 亿美元）、一个会议中心的扩建（1.5 亿美元）以及其他主要的市区项目上（如：500 万美元用在为足球体育馆建造的每年使用还不足 20 次的轻轨车站的附属设施上）。这些投资的根据就在于它们创造了工作机会并产生了收入。但是两位资深的经济学家（Hamilton and Kahn, 1997）所做的细心的成本效益分析显示了棒球体育馆投资每年的净亏损是 2 400 万美元。与此同时，图书馆在关闭，城市服务机构在缩减，对市立学校的投资已减至最小限度。



**图 8.7 政府补助和私人收益:海港风景的故事。**当中心公路造船厂在1982年关闭之后(丧失了2000个工作机会),这块空置的场地(上图)就成了旷日持久的争论焦点。1987年最终决定在这块地方建一系列高层建筑,但因为这个项目的绝对规模威胁了现存邻里的亲密关系,也因为通向滨水地区的入门将受威胁,它受到了当地社区的强烈反对。这个项目投资最初被开发商抵押品赎回权的丧失和多重转让权所干扰,最终(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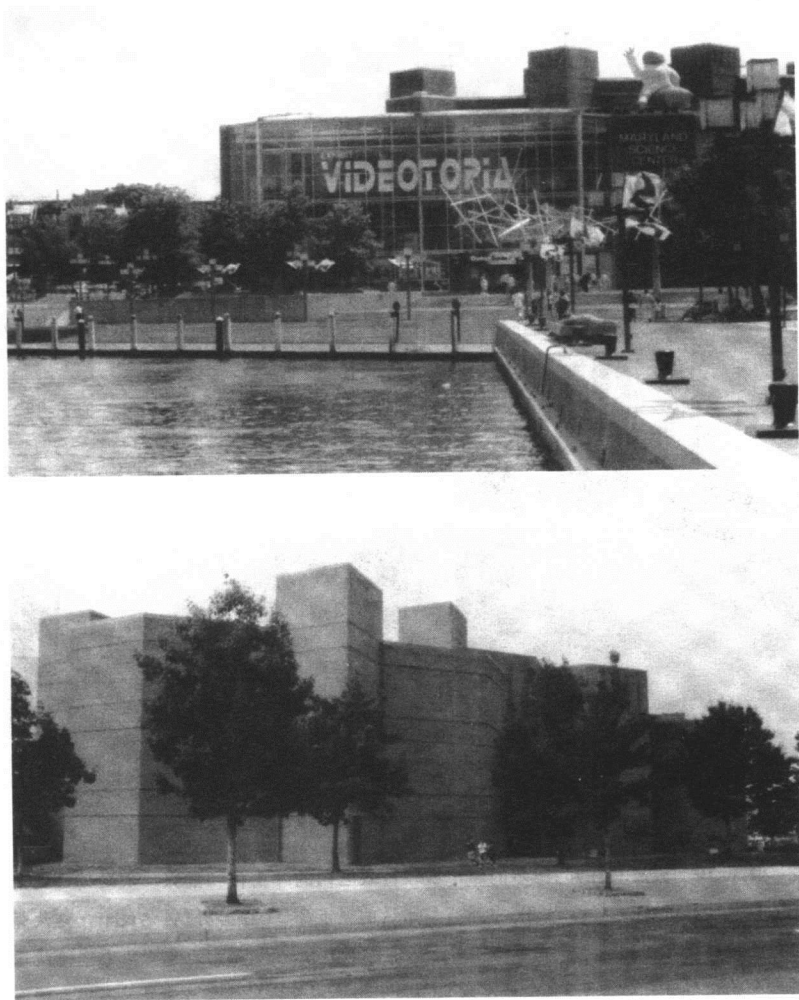
且突然地)从东南亚获得(当时富有剩余资金的 Parkway 联合公司毫不犹豫地提供了这笔钱,因为这块地方使他们的代理商想起了香港)。这个项目随着 1987 年 10 月份的金融崩溃立即遇到了困难,在 1993 年第一座大楼热闹开张(“城市生活中的一个新风格”)之时似乎就不可能赢利(顶层公寓的市场价 150 万美元)。开发商最终在 1998 年得到了一系列 200 万美元的税费减免从而摆脱困境,之后他们绞尽脑汁使这块地方变得更有利可图。提案包括再建 3 座大楼以使第一座大楼得到更大发展。1999 年,开始建造豪华的市区住宅和“河滨之家”,在朝向陆地的一侧建造一些错落有致地掩映其中的适中高层建筑。也许还要建另一座大楼。

144



**图 8.8 城市中的退步乌托邦——作为商品的城市景观。**紧随 20 世纪 60 年代震惊这座城市的市区骚乱之后,政府官员和商业领导这些有影响的精英企图通过消费和旅游来拯救市区投资。内港周围所建的市区景观现在被视为比迪斯尼还要吸引参观者。港口广场的劳斯观景建筑(右上图)提供了休息的地方,但普通的休闲消费场景有它的机构要素(国家水族馆,马里兰科学中心)、内部形式(港口广场的劳斯画廊,左图)以及最近增加的外部象征,比如硬石餐厅、ESPN 区和星球好莱坞(右下图)。





**图 8.9 城市中的退步乌托邦——马里兰科学中心的景观和社会控制。**马里兰科学中心向世界展示了两种形象。这个中心通往内港的商业地区,作为一个友好的空间吸引着人们,在其中我们可以学习、可以体验“Videotopia”(花很高代价)。但是,这座楼的背面却讲述着另一个故事。它创建于1976年,是内港城市复兴计划的第一批投资之一。从后面看,它像一座堡垒,最初它并没有通向社区或者街道的入口。它是紧随马丁·路德·金被暗杀之后发生在1968年的骚乱之后而设计的。当时住在附近的法裔美国人社区(自从公路建设和绅士化之后大部分已被取代)被认为是个威胁。所以说,堡垒设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意在抵制社会骚乱,并担当内港南端的战略(碉堡风格)前哨以保护即将到来的投资。



**图 8.10 雅皮乌托邦:巴尔的摩市坎顿行政区内的绅士化和复兴。**成功改建的老工业建筑物 (America Can, 左图) 和附近滨水区的城市房屋 (右上图) 在该城市东端坎顿区的迅速绅士化中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在市区范围内,从坎顿到市中心沿着海港边缘的一条狭长地带被认为是“黄金海岸线”,因为它对高消费阶层的经济恢复具有很大的潜力。对坎顿区老住宅的影响令人吃惊。由于缺乏任何其他可扩展的空间,传统的狭窄的长排形房子的主人们竞相建造可以看得见海港风景的古怪显眼的屋顶(右下图)。



**图 8.11 给穷人提供新房子。**公共住房(上图)主要建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这些房子需要翻新,而且无论如何,这些地方都被谴责为滋生犯罪和其他反社会行为的消极环境。这些房子在20世纪90年代被爆破,现已被市区范围内处于门控社区氛围中的低层郊区风格建筑所取代,“愉悦的风景花园”(下图)现在被认为是“新城市生活”的一个范例——市中心环境中一种乡村风格的门控空间。



**图 8.12 邻里的复兴:沙城—温切斯特与詹姆斯·劳斯的悖论。**在沙城—温切斯特,大规模的社区恢复正在尝试之中,得到了来自于政府与私人两方面的支持。在社区组织(BUILD)的积极推动之下,人们很快就认识到缺少工作机会和低工资是社区衰退的根本。“最低生活工资运动”(参见第7章)从沙城—温切斯特经验之后就一直在继续。詹姆斯·劳斯藉以他自己的企业基金会(他退休之后所建立,以帮助贫困的邻里复兴)参与到建设沙城—温切斯特的努力之中。作为一个主要的郊区和商业开发商,早年他通过自己的行为帮助摧毁了市中心住宅的可生存能力,退休之后他又回过头来试图恢复那些被他自己行为严重摧毁至此的地区。现在,劳斯的工作通过一幅极具争议性的壁画得到纪念,这幅画使他看起来像是美国黑人种植园里一位慈祥的长者。

这些根源之一在于就业机会的迅速变迁。1973—1975年第一次严重的战后萧条期间,制造业加速了它们的向外迁移(主要是向北方和海外),而且从此之后没有停止过(参见表8.2)。比如说,造船业几乎消失,那些留下来的工业已经“缩小规模”。伯利恒钢铁厂(图8.13)在1970年雇佣30000人;在一轮又一轮的高科技投资之后——最近一次投资得到了500万美元的国家补助,现在,它只雇佣不到5000的工人,而维持相同的产量。通用汽车公司——另一个值得帮助的福利客户——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收到了一笔巨大的城市发展行动津贴以便使它的装配厂继续开业,现在它威胁着要结束它的卡车装配业务,城市和州代表急于找到一揽子足够有效的援助方案以挽留它们。与先前相比,港口操作的集装箱化和船运自动装载(图8.13)已将码头上的就业机会降低到微不足道程度。

服务业工作确已替代了制造业和港口业中所失去的25万个工作机会。在这个城市中,这些工作大多数是低报酬的(几乎没有福利)、暂时的、无工会保障的、女性化的(图8.14)。许多家庭的最好期待就是通过两个人在低工资的情况下工作时间长一点来保持家庭收入的稳定。普遍缺少适当的、供应得起的日托对孩子们并不是一个好的预兆。虽然有“最低生活工资”运动努力改善穷工人的命运并保护那些正被福利抛弃且被投入到不景气的劳动市场中的数千号人(参见第7章),但贫穷无所不在并且永远存在。到处存在的老工业设备的改造带来了新的谋生资源,它们为邻里的复兴提供了一定的支撑。

财富和权力的地理悬殊加速形成了长期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大都会世界。近郊地区在一段时间内消耗来自市中心的财富,但它们现在也存在着“问题”,虽然许多工作正是在那里被创造出来的。因此,财富发生了转移,不是进一步向排斥穷人、下层人和边缘人的城市远郊转移,就是把它自己封闭在高墙后,在郊区的“私托邦(privatopias)”和城市的“门控社区”内(图8.15)。富人构成了富人居住区(他们的“资产阶级乌托邦”)并削弱了公民权、社会归属和相互支持这些概念。在美国,他们中的600万人现在居住在门控社区内,与10年前的100万形成对比(Blakely,1997)。如果社区不是门控的,他们就会在红线范围内很快构筑一个,所以巴尔的摩市的种族隔离情况(主要是通过阶级,但也包含强大的种族脉络)现在比以前更加糟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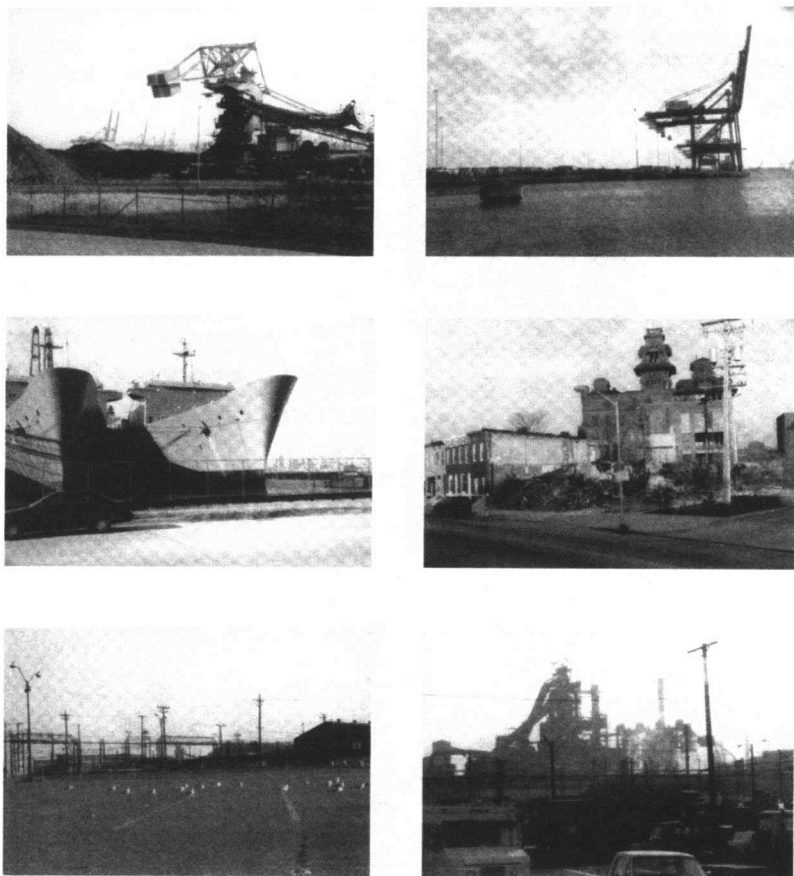
150

表 8.2 工作都到哪儿去了:巴尔的摩 1980—1985

公 司	商业类型	所失去的工作数
* Acme 市场	食品连锁店	1 200
* Airco 焊接	带芯电线	150
* 联合化学公司	铬	145
伯利恒钢铁厂	钢铁	7 000
* 伯利恒钢铁造船厂	船舶维修	1 500
* Brager-Gutman	零售	180
* Cooks United	折扣店	220
Esskay	肉类加工	240
通用电器	电器商品	550
通用汽车	汽车配件	247
* Korvettes	百货商店	350
* 马里兰玻璃厂	玻璃	325
* 马里兰运输和干船坞公司	船舶维修	1 500
Max Rubins	服饰	225
* 雾港雨衣厂	防雨衣物	210
* Pantry Pride	食品连锁店	4 000
* 普拉斯折扣店	折扣店	150
* 两个家伙	折扣店	150
维克特拉聚乙烯纤维公司	纤维和纱线	600
* 西方电器公司	电器产品	3 500

如这张明细表所阐明的,1980-1985年间的衰退给巴尔的摩地区带来了另一次强大的失业波。这个表由1985年3月21日《巴尔的摩太阳报》上的一张图表改编而成。星号标出的公司已完全停产。在这些停产的案例中,早就经常存在着显著的逐步减少劳动力的情况。零售业中失去的工作最终又恢复了,但那些制造业中失去的工作则永远地失去了。例如,这段期间就是造船业和船舶维修业作为巴尔的摩经济主要成分的最后时期。

(资料来源:Harvey,1988,236)



**图 8.13 巴尔的摩的非工业化。**1960 年以后巴尔的摩失去了 2/3 的制造业就业机会(净损失约 10 万个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差不多建造了 500 艘“自由轮”,但如今惟一残留的迹象只是一些封存的海船(左中图)。被弃工厂杂乱无章,糟蹋了这些地方的风景,等待着被重新使用(废弃的酿酒厂,右中图)。保留下来的工业,如伯利恒钢铁厂(左下图和右下图),提供的就业机会已大大减少。这个工厂在 1970 年雇佣了差不多 3 万名工人,而现在却不到 5000 名,闲置的停车场上栖息着海鸥。港口的集装箱化(右上图)和自动化(煤炭装载,左上图)同样也减少了那里的就业机会。

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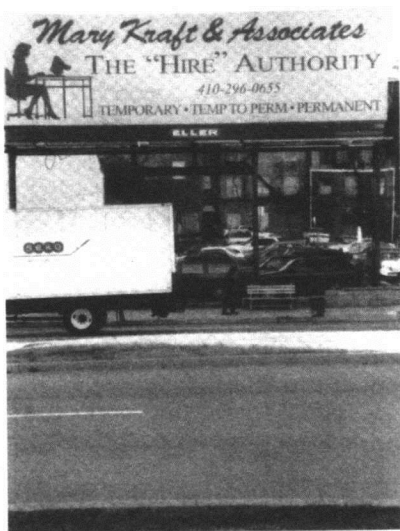


图 8.14 临时工。制造业工作机会和蓝领工会化工作机会的丧失被服务业(如卫生保健,使约翰·霍普金斯系统成为马里兰州最大的私营雇主)、金融业、保险业和房地产业中日益增加的工作机会所抵消,被与会议贸易和旅游业有关的“招待业”的有力增长所扩大。但许多这些新工作都是暂时性的、低报酬的,没有什么福利,即便有,也是非常少的。而且这些工作对妇女的需求量很大。

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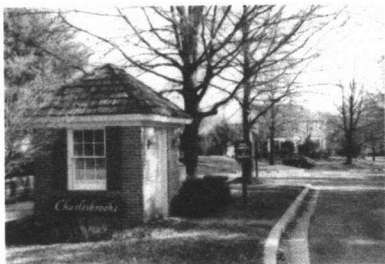


图 8.15 私托邦:巴尔的摩的门控社区。美国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居住在门控社区的受保护空间中。巴尔的摩也不例外,在市内和郊区,这样的社区越来越多。



一团糟的第二个主要根源在于机构的分裂和崩溃。长期陷于财政困境的市政厅坚信削减政府始终是增强城市竞争力的手段,无论是否需要,它都减少公共设施(但同时却增加了对企业的补助)。与郊区司法权进行合作的可能性被控制税款、排斥穷人和边缘化人、维持富人的状态这些竞争性压力所压制。152联邦政府的权力分散,被郊区和乡村利益所支配的州现在抛弃了城市。特别税额行政区开始出现,各个邻里可以根据财力不同而提供额外的服务。既然财力各不相同,那结果就是把城市分割成一片片拼凑物,相对富有的人努力地在传播贫穷和堕落的海洋中保护自己。总的结果就是都市空间的分裂和碎片化、是多样化中社会性的缺失以及对城市其余地区——这些地区在政治上已经难以驾驭,如果还不是完全失去功能的话——的局部保护性姿态。

举例来说,“市中心伙伴”是由彼得·安吉洛斯所创办,他是该州最富有的律师,是巴尔的摩金莺队的老板。(他从事钢铁工人代理职业安全和卫生事务起家,并在石棉诉讼中赚了几百万,这起诉讼使好几家大公司破产,伦敦劳埃德“名下”的许多公司也因为愚蠢地为他们保险而导致破产。)伙伴接管了市中心,试图把无家可归者——以及吸引他们的施舍处(特别是“我们每日的面包”,图8.2)——推到某一外围区,它甚至提议在一个人们看不见的地方设立一个隔离的“无家可归者校园”。市政厅与此保持一致,并寻求对所有低收入者住宅区的广泛破坏,希望迫使这些穷人离开这里而进入郊区,这与恩格斯很久以前的一个评述全然不谋而合,即资产阶级对其问题所能找到的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要把它们推来推去。154

制度改革的前景似乎无足轻重。官僚政治和法律的不变性以及严格的政治机制安排之间的复杂混合产生了僵化的城市治理。排他性社群主义、狭隘的既得利益集团(通常由各种各样的身份政治所构成——在民粹主义层次上主要是种族方面,虽然在巴尔的摩偶然还会插入大量种族对立)、公司的利润欲望、金融上的缺乏远见,以及开发商的贪欲,所有这些都促成了这些困境。新的资源作为不可缺少的部分融入大城市地区的社会、政治和自然地形中,从而使得不平等和分裂(特别是在种族方面)都在加剧。看起来,除了富人更加富有,穷人(主要是黑人)退回到赤贫以外,是别无选择了。如果后者行为不当,他们总是会被监禁在巨大公共投资所建的另外一个地方,即新的城市改造机构(图8.16)。

在所有这些螺旋上升的不平等中,繁荣昌盛的公司和大型商业集团(包括媒体)以多个政治正确的宣言大力推广他们自己的身份政治学品牌。他

们反复强调的要点就是：对自由市场（更准确地说，实际上是垄断的、独占的和政府补贴的）荣誉的任何挑战都会被无情地镇压或被挫败从而消灭。我猜想，这些思想的力量是我们当前无助感的关键。“别无选择”，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全盛时期如是说，甚至戈尔巴乔夫也同意。公司化的媒体无情地、不断地重复着这一口头禅。一种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暴力构型已经产生，它将不会容忍任何敌对意见。那些拥有货币权力的人在名牌商品（包括有安全保障、门控设施和良好服务的高贵场所）之间自由地选择，但对于政治体系、社会关联的方式、或者生产、消费和交换的模式，总的说来，公民们是没有任何集体选择的。如果说这种混乱局面似乎不可能改变，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确实“别无选择”。这就是与其他任何事情的愚蠢的不合理性相对的市场的极度合理性。所有那些可能有助于确定某种替代方案的机构要么是被压制，要么——除了教会这种著名的例外——被逼屈服。我们人民是没有权利选择在什么样的城市居住的。

155



图 8.16 城市中的公共投资：为穷人而建的改造机构（门控社区）。对城市穷人直接利益的惟一投资就是扩充城市改造机构。政府在监狱上的投资是美国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的主要增长部分（现在有 100 多万人被监禁）。与此同时，所有其他形式的福利供应却被严重削减（仅巴尔的摩地区就有 14 000 人被迫从福利名单中消失），收容一名犯人每年的花费却是 25 000 多美元。

但我们又是如何相信“别无选择”的呢？用罗伯特·昂格尔(Roberto Unger, 1987a, 37)的话来说,为什么“在我们所居住的单调和虚构的世界中,我们似乎总是无助的傀儡”。只是因为缺乏揭开替代方案并积极追求它们的意志、勇气和理解力？或者有什么其他事情在起作用？当然不可能是缺乏想象力。比如,学院就充满了想象力的探险。在物理学上,对不确定世界的探险是标准而不是例外。在人文学科中,对所谓“想象力”的迷恋到处都显而易见。我们现在接触到的媒体前所未有地充满了对替代世界进行集体探讨的幻想和可能性。然而这似乎没有一个影响到我们身边物质世界中日常生活呈现的可怕轨迹。正如昂格尔(Unger, 1987a, 331)所述,我们似乎“处在看起来不可实现的梦境与看起来几乎无关紧要的前景之间,不知如何是好”。这真的是“梦工厂”之间的选择吗？抑或什么也不是？

当然,竞争性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在主要的机构中——媒体和大学——开展了潜移默化的、阴险的工作,它们塑造着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想象的语境。这些几乎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的。由原始的货币权力(和市场竞争逻辑)所强加的政治正确性在这些机构中为审查舆论所做的已远远多于麦卡锡主义的公开镇压曾经所做的。“可能性受到了新闻舆论的苛评”,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 1988, 7)如此评论道,他还补充说:“存在着一个非常明显的利益集团,它阻止世界实现那个可能。”有趣的是,布洛赫把这个状况与全部乌托邦思想的死亡、诋毁和毁谤联系在一起。他认为,那意味着希望的丧失,而没有了希望,替代政治学就不可能。那么,是不是可以说乌托邦传统的复兴将允许我们思考真正替代方案的可能性？布洛赫(Bloch, 1986)无疑是这么想的。

156

在巴尔的摩市中心附近的沃特斯艺术画廊中悬挂着一幅画,名为“理想城市的景象”(图 8. 17)。它描绘了完美城市的理想,根据画中的情况,这可能是 15 世纪晚期某位不知名的意大利画家所作。我愿意将之视为哥伦布着手准备他那致命航行时期的作品。虽然它的形式和风格是很久以前的,当时希望、恐惧和可能性是不同的,但其精神仍然作为一个谴责性评论在巴尔的摩心脏内发出耀眼的光芒,这不仅是对画廊墙外城市废墟的评论,而且是对与那种废墟作斗争的梦想的缺乏所作的评论。

## 2. 城市的形象

“城市”形象和“乌托邦”形象长久以来一直纠缠在一起(参阅 Fishman, 1982 和 Hall, 1988)。在它们早期的化身中,乌托邦通常被赋予一种独特的城市形态,大多数被称为城市规划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乌托邦思维模式的影响(一些人更愿意用“激发”一词)。这种联系在时间上要比托马斯·莫尔爵士 1516 年开始的乌托邦类型的第一次冒险要早得多。柏拉图把理想的政府形态和他的封闭共和国以某种方式联系起来以至于把城市概念与公民概念互相混合在一起,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所描述的费阿刻斯城邦就具有莫尔后来所暗示的许多特征。犹太教与基督教所共有的传统,把天堂定义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在经历过尘世之审判和磨难之后,所有善良的灵魂都会进入那里。所有的比喻样式都来自于此天堂之城、上帝之城、永恒之城、光辉的山巅之城(这是深受里根总统喜爱的一个比喻)。如果天堂是一个“快乐的地方”,那么“其他的”地方、地狱、那个“邪恶的他者”之地就不会太遥远了。城市形象作为社会骚乱、道德崩溃、绝对邪恶的支点——从巴比伦、索多玛、俄摩拉到哥谭镇——

157



**图 8.17 理想城市的景象:来自于巴尔的摩沃特斯艺术画廊。**这幅 15 世纪末期中部意大利学派风格的匿名油画描述了那个时期理想城市的景象。它现在装饰着巴尔的摩市中心附近弗农广场山上的沃特斯艺术画廊的墙壁,在巴尔的摩这样的城市中,理想被磨灭了,似乎别无选择。

对传递“城市”这个词在我们文化世界中所承载的比喻意义也具有一定的地位。反托邦(dystopia)呈现的城市形态,就像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或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所揭示的那样。“政治”一词来自于希腊语“polis”,意为“城邦

(city)”。卡尔·波普尔把柏拉图描述为“开放社会”最伟大敌人之一,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柏拉图所激励的乌托邦则可以轻易地被归类为压迫性的和极权主义的地狱,就像它被定义为解放的和快乐的天堂一样。

粗鄙的日常生活实践和话语影响着城市生活,把它们从自由地交织了对良好生活和城市形态充满情感和信仰的宏大比喻意义中清理出来是很困难的。注意到乌托邦社会秩序的理想如何经常地在小规模城市生活的地理规模上被频繁塑造,这是很有趣的。柏拉图把人口的最大数量限定为五千,“民主”雅典在它最鼎盛时期可能也不超过六千参政“公民”(当然,这并不包括妇女和许多奴隶)。在这里我并不指望能够理清所有比喻和象征含义,但是我们需要承认它们的情感力量。一些例证性的联系可能会有助于强化这样一个观点,即城市政治充满了被深深控制的(虽然常常是秘密的)情感和政治激情,乌托邦梦想在这些情感中有特定的地位。

曾经有人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当奴隶挣脱枷锁在中世纪城市的自治的合法实体中主张政治和个人的自由时,这个概念就具体化了。城市生活与个人自由——包括探险、发明、创造和定义新生活方式的自由——之间的联系有着悠久且复杂的历史。移民的后代们试图把城市变成远离乡村镇压的避难所,在这种表达中,“城市”(city)与“公民身份(citizenship)”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但城市同样又是焦虑和混乱的场所。它是无名侨民、下层阶级(或者,我们的前辈们喜欢称之为“危险的阶级”)的地方,是不能理解的“他性”(移民、同性恋、精神错乱、文化上有很大差异、种族上有明显标志的人)的场所,是被污染的(物质污染和精神污染)并发生可怕堕落的地带,是需要封闭和控制的该诅咒的地方,它把“城市”和“公民”变成公共想象中的政治对立面,尽管它们在词源学上是连结着的。 158

正反形象的这种两极化有它的地理学因素。传统上,它表现为城市内部世俗和宗教空间之间的分界线。后来,农村和小城镇的假想优点经常被拿来与城市的罪恶相对照。例如,当乡村的反动军队1871年聚集在巴黎郊区准备对约三万名巴黎公社成员进行无情屠杀的时候,他们首先相信自己的使命就是从撒旦军队的手中收回这个城市。当福特总统拒绝在1975年纽约市的财政危机中给予援助时(“福特对城市说:‘倒闭!’”,某家著名报纸的头版头条这样写道),到处都能听到小城镇上正直、虔诚的美国人的喝彩声。在当代美国,可敬而又虔诚的市郊形象(主要是白人和中层阶级)与作为苦难场所的市中心相对立,

所有受谴责的东西(外加许多下层阶级的种族编码)都囚禁在后者那里。此类想象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例如,当有人提出要把约200户家庭从巴尔的摩市中心驱散到郊区作为“争取机会运动”的一部分时,郊区居民愤怒地起来阻止这项计划,他们的言论听起来就好像是魔鬼的代表将要从其市中心的监狱中被释放出来,并且在他们中间带来一种破坏力量。当然,宗教并不总是这样做的。它也同样支持许多试图在崩溃的市中心保护穷人、改善社区并稳定家庭生活的组织(如BUILD)。

这些想象都不是单纯的,也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样。“我们建造了房子,房子创造了我们”,这句格言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 1967, 3),城市社会学的开创者,对此有非常好的理解,他写道:

159

正是在城市环境中——在人类本身制造的世界中——人类初次实现了智力生活,并获得了那些区别于低等动物和原始人的特征,因为城市和城市环境代表了人类最协调的、且在总体上是其最成功的努力,即根据他心中的期望重塑他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但如果城市是人们所创造的世界,那么这就是他今后注定要生活其中的世界。因此,人类在间接地、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工作性质的情况下,就已在构造世界的过程中重塑了自己。

虽然我们会相当渴望去干预这个“重塑我们自己”的过程,并且甚至“清楚地了解我们工作性质的某些意义”,但我们不可能跳出辩证法之外并设想逃避自己创造出来的制度世界和人造环境的包围和限制。我们仍然不能逃避这种想象的问题,如马克思(Marx, 1976, 283—4)所评论的(在一个基本陈述中,对此我们将在后面更深入研究):把人类劳动和建筑师的最差作品与蜜蜂的最好作品区别开来的东西就在于,建筑师在以物质形式实现作品时他已经在想象中建立了一个结构。因此,当我们思考城市未来时,必须与广泛的情感和象征意义作斗争,这两种意义都激活并弄乱了我们对“自己工作性质”的理解。因为我们共同制造了城市,所以我们也共同地制造了自己。因此,我们希望城市会是什么样的计划就是关于人类可能性、我们需要谁,或者甚至更加贴切地说,我们不希望成为谁这样的一些计划。我们每一个人对此都有一些要想、要说和要做的事。因此,个人和集体想象的方式对定义都市化的劳动就非常关键。然

而,为了担当起我们命运的有意识的建筑师而不是我们所居住的制度和想象世界的“无助傀儡”,对我们想象的批判性反思就既要面对又要复兴那种隐蔽的乌托邦理想。正如昂格尔(Unger 1978b,8)所述,如果我们承认“社会是被制造和想象的”,那同样也要相信它可以被“再塑造、再想象”。

### 3. 作为空间游戏的乌托邦理想

任何复兴乌托邦理想的计划都要考虑它在历史地理学中作为建设性和破坏性变革力量是如何运作的,并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来看看托马斯·莫尔爵士的《乌托邦》。很明显,莫尔的目标就是社会和谐与稳定(与当时英国的混乱状态相对照)。为了这个目标,他排除了具有潜在破坏性的社会力量,诸如货币、私有财产、雇佣劳动、剥削(工作日是6小时)、内部(并非外部)的商品交换、资本积累和市场过程(并非集市场所)。快乐完美的社会和精神秩序就取决于这些排除行动。正如卢克曼和波特(Lukerman and Porter, 1976)所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些都由一个严密组织的空间形态加以保护(图8.18)。乌托邦是一个人工制造的孤岛,它是一个孤立的、有条理地组织的且主要是封闭空间的系统(尽管在乌托邦想象中,它也与外部世界紧密相联),这个孤岛的内部空间的秩序安排严格调节着一个稳定的、不变的社会过程。大概说来,空间形态控制着时间,一个想象的地理控制着社会变革和历史的 possibility。

160

并非全部的时间形式都被取消了。“永恒回归”的时间、周期性仪式的时间就被保存了。如古尔德(Gould, 1988)所评述,循环时间表达了“上帝的无所不在,一套原则如此普遍以至于它们存在于时间之外并记录了隐含在自然界丰富细节中的普遍特点和共同联系”,在这种情形中,包括乌托邦的全部居民。被压制的正是社会过程的辩证法。为了使一个快乐的稳定状态永远存在,时间之箭,“伟大的历史原则”,就被排斥了。不需要去设想未来,因为预期状态已经达到。在莫尔之后很快出现的一篇乌托邦文本、培根的《新大西岛》中,国王判定,社会已经实现了这样一种完美的状态以至于不再需要进一步社会变革了。在培根的例子中,技术变革与新知识不仅被认为是可能的,而且还被积极寻求,但其灌输是由所罗门议院(被认为是皇家学会前身的一种机构)中的哲人们紧密控制的。

这样产生的结果就是已经完善的社会秩序在技术和学术完美性方面更加发展。与之对照,莫尔唤醒了一种怀旧情绪,对神话过去、对完美的小镇生活的黄金时代、对静态精神秩序以及非冲突性与和谐性的等级制社会关联模式的怀旧。这种怀旧气质是多数乌托邦思想的特征,甚至被投射到未来及合成的未来派技术中。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它对于这种计划如何变成事实具有重要的影响。

有许多途径来理解莫尔的文本及随后产生的众多乌托邦方案(如培根及康帕内拉的文本)。在这里我仅分解出一个方面:空间与时间以及地理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乌托邦形态都可以描述为“空间形态的乌托邦”,因为社会过程的暂时性、社会变革的辩证法——真正的历史——都被排除了,同时社会稳定又是由一种固定的空间形态来保证的。路易丝·马林(Louis Marin, 1984)认为莫尔的乌托邦是“空间游戏”的一个种类。莫尔实际上从众多可能的空间秩序安排中选择了一种作为表现和固定某种特定精神秩序的方式,这不是一种独特的思想。比如说,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 1967)在1925年撰写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他把城市理解为“空间格局和精神秩序”,并坚持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但马林为我们所展开的是这样的观念:随着莫尔的首创,任意地想象“作为空间游戏的乌托邦学”已成为探索和表达有关社会关系、精神秩序、政治经济体系等等众多竞争观念的一种成熟手段。

空间秩序安排的无限可能性为社会世界的无限可能性提供了前景。当把随后产生的乌托邦计划放在一起时,它们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多样性。19世纪的女性主义乌托邦(Hayden, 1981)与那些意欲为工人阶级提供一种更加舒适、更加健康生活的乌托邦显得不同,也与各种无政府主义者、对生态学敏感的、宗教的及其他诉诸某种特定空间秩序来定义和确保其精神目标的替代方案都不同(图8.19, 8.20和8.21)。提议所涉及的范围——以及空间性所涉及的范



图 8.18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空间游戏中的一种运用。霍尔班为莫尔《乌托邦》一书所绘的卷首插图捕捉了它的一些空间结构及其随后发生的对精神和政治秩序的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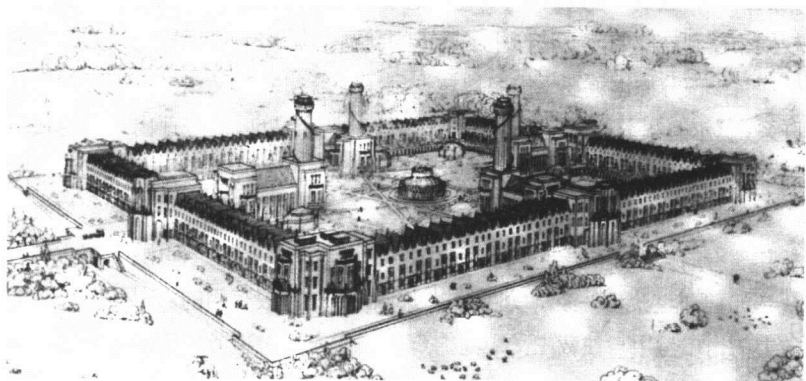


图 8.19 为罗伯特·欧文的新哈莫尼而做的设计图。罗伯特·欧文,英国 19 世纪上半期最多产的乌托邦作家和激进主义分子之一,他真正地把这种乌托邦方案投入到实践中。斯台德曼·怀特维尔为欧文在美国的新哈莫尼殖民地提出了上述设计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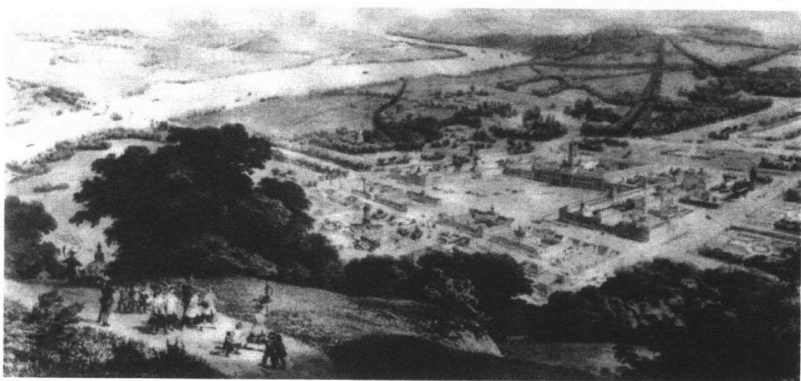


图 8.20 傅立叶的理想城市。根据凡尔赛官设计的灵感,傅立叶绘制的集体组织的共产主义工业社会,那种社会受公共产品和公共生活安排所统治。

围——证实了人类想象对社会空间方案的探索能力(请参阅 Bloch, 1988; Kumar, 1987, 1991; Levitas, 1990; Sandercock, 1998)。马林的“空间游戏”观念巧妙地捕捉了乌托邦方案中的自由想象力,对这种乌托邦模式的复归似乎为摆脱昂格尔困境提供了一种途径。

可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想象的自由运用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权威的存在和限制性管理形式。被福柯视为通过创造监视和控制的空间体系(polis = police)而产生的“全景效果”同样融进了乌托邦方案中。想象的自由运用与权威和控制之间的辩证法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在最近时期,对乌托邦理想的拒绝有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敏锐地意识到了它与独裁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内在联系(莫尔的《乌托邦》无疑可以如此解读)。但是,以这些理由来拒绝乌托邦理想也带来了不幸的结果:在搜寻替代方案的过程中抑制了想象的自由运用。因此,必须把正视空间游戏和独裁主义之间的关系置于任何试图复兴乌托邦理想的再生政治学的中心部位。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了解一下乌托邦如何通过政治—经济实践得以实现的历史是很有用的:正是在这里,想象力的自由运用与独裁主义之间的辩证法作为人类事务中的一个基本困境生动地显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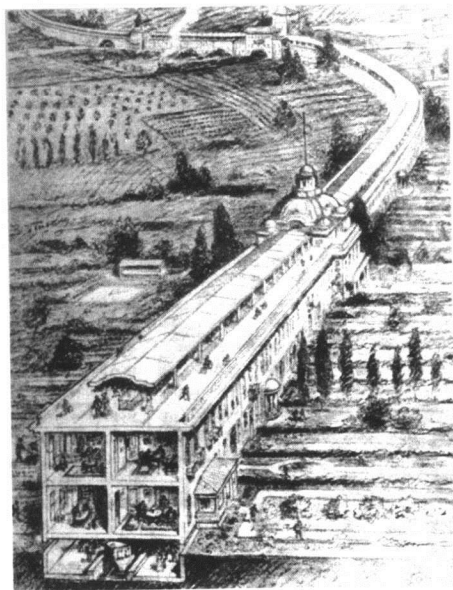


图 8. 21 爱德华·查姆布莱斯:公路城镇。新的运输系统引导着许多设计师打破传统的环形主题转而支持适应主要交往联系的线形住所。在这种设计中,两个层次的住所完全考虑到了家政的协作管理:“无声”单轨铁路铺在下面,宽阔的散步广场铺在上面。由爱德华·查姆布莱斯从1910年开始的这个设计在当时的妇女杂志中激起了相当大的兴趣。

#### 4. 空间形态乌托邦的实现

在20世纪,所有伟大的城市规划者、工程师和建筑师都把对某个替代世界(物质的和社会的)的强烈想象与根据全新理念设计和重建城市及区域空间的实践结合起来。当埃比尼泽·霍华德(图8.22)、柯布西耶(图8.23)和弗兰克·劳埃德·莱特(图8.24)这样一些人创立这种想象的背景时,一大群专业技术人员开始在砖头和混凝土、公路和塔式大楼、城市和郊区中实现那些梦想,建造 Villes Radieuses 或 Broadacre 城的样式(图8.24)、全新的城镇、私密规模的社区、都市村等等。甚至当独裁主义评论家和这些已实现的乌托邦梦想缺乏个性构成对他们的威胁时,他们也经常通过把自己更喜欢的空间游戏样式与其他人已经实现的空间秩序安排作对照来坚持自己的理想。

比如,当简·雅各布(1961)针对城市规划和都市复兴的现代主义进程而发表著名评论时,她通过怀念那种私密而又多样化的种族邻里而实际上提出了自己偏爱的空间游戏样式,在那种邻里中,技工形式的实业和工作活动,以及面对面的互动形式的社会交流占据了支配地位。雅各布完全以她自己的方式证明了她与她所攻击的乌托邦理想一样具有乌托邦性质。为了实现一种不同的精神目标,她提议以一种不同的、更加私密的(按比例缩小)方式利用空间。她的空间游戏形式包含了它自己的独裁主义,这种独裁主义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隐藏在邻里和社区的有机观念之内。在她看来,监视和控制机构是善意的,因为它提供了非常必需的安全,但这种机构给其他人——如塞纳特(1970)——的印象却是压制和贬抑。虽然她特别强调社会多样性,但也仅仅是某种被控制的多样性才真正地以她所设想的快乐方式在运行。对雅各布目标的追求可以轻易地为“私人化设计风格”的门控社区和排他性社群主义运动进行辩护,所有那些目前在美国境内把城市分割得零零碎碎。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马林最令人感兴趣的范畴:“退步乌托邦”。马林所使用的例子是迪斯尼乐园,据说这是一个快乐、和谐且无冲突的地方,游离于“真实的”世界“之外”以至能安慰心理和平息情绪、能娱乐、能发明历史并能培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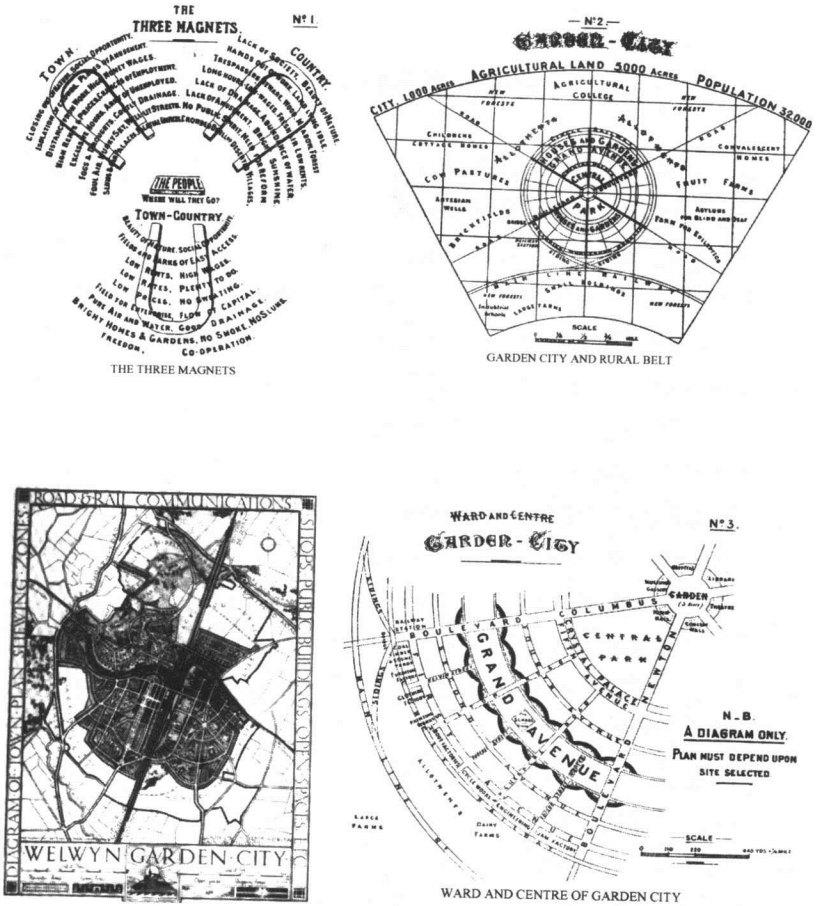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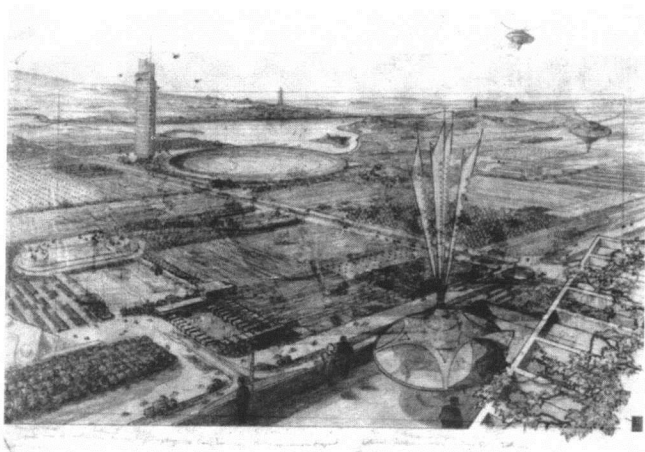


图 8.22 埃比尼泽·霍华德:从空间理想到新城镇。埃比尼泽·霍华德受他所读的爱德华·贝拉米的乌托邦小说《回顾》所启发,在其 1898 和 1902 的著名文本中开始构造一种全新的城市生活框架。由他发动的这个“新城镇运动”可证明是 20 世纪最有影响的城市规划思想之一。



图 8.23 柯布西耶的理想城市梦想:理论和实践。20 世纪 20 年代柯布西耶的“巴黎梦想”成为城市理论的基础,后来融合进很有影响的雅典宪章中,它似乎很大程度地体现在了纽约市斯图佛逊城的实际设计中。



**图 8.24 弗兰克·劳埃德·莱特的 Broadacre 城规划。**弗兰克·劳埃德·莱特关注 20 世纪 30 年代社会崩溃的结果并受到美国西部特别是中西部富饶土地的影响，他提出了一个替代性的空间组织，允许个人在保留通讯联系的同时得到更大程度的独立。他所提议的这个景观与当代郊区的蔓延(见图 8.4)有着相似的破坏性。当代的郊区蔓延具体体现了莱特设计的所有消极面却不支持其任何的积极特征。

对某种神秘过去的怀旧情怀，能使商品拜物教文化永久化，而不是对它进行批评。迪斯尼乐园把世界各地的其他地方适当地净化和神话化后，聚集在了这个包含多重空间秩序的纯粹幻觉的地方，藉此消除真实旅行的麻烦。辩证法被压抑，稳定性与和谐通过强大的监视和控制而得以确保。内部空间的秩序安排，再加上权力的等级形式，使冲突或越轨不可能成为社会规范。迪斯尼乐园提供了空间游戏世界的一个虚幻之旅。在后来的化身中，如 Epcot，它提出用纯粹技术性的未来主义风格的乌托邦和不可逾越的人类权力来控制这个世界(姑且可以说，迪斯尼从莫尔和培根那里得到他的灵感)。在马林看来，所有这些都是退步的，因为它没有提供对外部事务现存状态的任何批判。它仅仅以一种纯粹的、净化的和非历史化的形式使商品文化和专业技巧的拜物教永久化。但是，这就是马林开始出现问题地方：迪斯尼乐园是一个真实的人工环境而不是莫尔和培根所提出的那类虚构的地方。这马上就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任何得以实现的空间形式的乌托邦理想都绝不可能是马林所言的退步乌托邦吗？乌托邦不消灭自己也许就绝不可能被实现。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就会深刻地影响到任何空间形式的乌托邦理想在政治—经济生活中作为一种实际的社会力量发挥作用的方式。

从马林的观点可以归纳出,我们被一大堆退步的乌托邦所包围,迪斯尼乐园只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样本。当“美国商厦”成为时髦时,像詹姆斯·劳斯(图 8.8 和 8.12)——他偶然在巴尔的摩郊区建立了模范购物中心,后来又回去建立了锚定内港复兴的观景建筑——这样的先锋们明确承认,迪斯尼已经发明了一套成功的零售业规则。安全、可靠、秩序井然、易于到达,而且重要的是愉快、令人欣慰又无冲突的购物环境是商业成功的关键。大型购物中心作为一个幻觉世界而构思出来,在其中,商品统治至高无上。如果无家可归的年老者将此当作一个温暖的休息地方,年轻人觉得它是一个社交的绝佳场所,政治煽动者们喜欢在此散发小册子,那么监视和控制的机构(运用隐蔽的摄像机和安全密探)则会确保没有任何不幸的事情会发生(图 8.9)。

正如本雅明(Benjamin, 1969)对 19 世纪巴黎拱廊评论的那样:整个环境设计似乎是为了劝诱解脱而不是批判意识。而且许多其他的文化机构——博物馆和遗产中心、用于公开表演、展示和节日的舞台——似乎都把培养怀旧情怀、产生净化的集体记忆、培植不加批判的审美感性以及把将来可能性吸收进永远在场的非冲突性舞台中作为自己的目标。商品文化的连续表演,包括表演本身的商品化,在煽动政治冷漠方面发挥着自己的作用。麻木的解脱或全然的无动于衷(所有的冷漠之源)成为目标(席美尔[Simmel, 1971]在很久以前指出,无动于衷态度是对城市背景中过量刺激物的一种反应)。现在围绕在我们身边的多重的退步乌托邦——大型购物中心和典型的“资产阶级”郊区商业化乌托邦——就如柏林墙的倒塌曾经所表明的那样同样地表明了历史的终结。它们用具体例证说明而不是批判了这样的观念,即除了由科技幻想、商品文化和无止尽的资本积累纠合在一起提供的东西,“我们别无选择”(图 8.8)。

巴尔的摩因为那些反讽性的本地事件悄悄地出了名,詹姆斯·劳斯是其中之一。碰巧的是,他在退休之后回到了市中心,成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依靠的是他的企业基金,所设立的项目是在一个叫作沙城温切斯特的社区中复兴邻里。在那里,他试图以家长制统治的方式帮助重建一个在郊区化和商业化过程中被部分破坏的社区,他的行为因此被人们所纪念(图 8.12)。而那种商业化和郊区化正是当初他在自己商业实践中竭力促进的。

但在乌托邦方案实现过程中,蕴含其中的批判和反抗力量如此轻易地堕落为对统治秩序的顺从,这是如何发生的呢?我认为,这个问题有两个基本答案。让我通过进一步考察“新城市生活”运动的主要候选方案之一来揭示它们,那

是现在被视为改变我们城市未来的运动。

这个运动的权威人物之一杜阿里 (Duany, 1997) “强烈地感到城市生活 (要不然就是建筑) 能够影响社会”。他认为, 以新城市生活意向所提议的方式来正确地使用空间游戏将会有助于纠正问题。他的提议证实了对小城镇美国的怀旧情怀, 对其可靠的社区感、习俗、混合的土地使用和高密度以及思想家 (譬如说雷蒙德·恩威) 的怀旧。把所有这些带回到城市设计中, 那么城市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质量将会无限制地得到提高。这个主张通过对美国城市中“无地方性”及缺乏“真实性”(无情蔓延的郊区、盲目的边缘城市, 破碎和分裂的城市中心充塞了一片片这种难以消化的风景) 的一系列批判性评论 (Kunstler, 1993; 1996) 而得以巩固。新城市生活确实在与这种巨大的畸形作斗争 (Katz, 1994), 如何恢复历史、传统、集体记忆及与以之相伴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就成为其圣杯的一部分。因此, 这项运动并不缺乏一种批判性的乌托邦优势。

新城市生活提供了怀旧, 也提供了一些积极的东西, 它确实与广泛制度范围内 (开发商、银行、政府、运输集团, 等等) 那些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作斗争。芒福德的传统很乐意从整体来思考区域, 并追求城市和区域可能会关注的一个更加有机的、整体的理想。后现代的分裂倾向被拒绝。它尝试私密和综合的发展形式, 回避对城市进行水平分区和大范围绘图的愚蠢概念, 这个行为释放了作为社交竞技场的街道和市民建筑的利益。它还允许以新的方式来思考工作和生活之间关系, 并且推动一种生态学的设计维度, 这种设计不再把优质的环境质量当成一种消费品。它高度关注如何处理极其奢侈的能源需求这种棘手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占支配地位的以汽车为基础的城市化和郊区化形式所带来的。有些人视之为当今美国都市变革的真正革命力量。

但是要实现这种乌托邦幻想还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个运动假定, 美国“充满了渴望住在真正社区中的人, 但这些人对它在结构设计方面所意味的东西却持极端悲观的态度” (Kunstler, 1996)。社区将把我们从未有活力的社会分裂的世界、从自我攫取的物质中心主义和个人化的自私的市场型贪欲中拯救出来。但这儿所指的是什么样的“社区”呢? 重提小镇美国的神话过去有它自己的危险后果。新城市生活同当代一种肤浅的尝试联系在一起, 试图将巨大的、遍布各地的、似乎失去控制的城市转变为一系列相互连结的“都市村”, 在那里据说每个人都可能以礼貌的、文雅的态度与其他任何人建立关联。在英国, 查尔斯



王子对这种作为城市再生之地的“都市村”起了情感上的示范作用。列昂·克里埃,一个被经常引用的新城市生活运动的继承者,是其主要的建筑先驱之一。这个观念很有吸引力,赢得了来自各方面的支持:被边缘化的种族人口、由于非工业化而被时代所抛弃的贫穷且平阵以待的工人阶级,以及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中那些具有怀旧情绪的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文明的房地产开发形式,包含了路边小餐馆、步行街和劳拉·阿什利商店。

这种社群主义的阴暗面仍然没有得到揭示。社区精神长期以来被认为可以防止社会混乱、阶级战争和革命暴力(莫尔率先提出了这种思想)。装备完善的社区常常是排他性的,它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划定了明确的边界,树立各种各样的不得入内的标志(不然就是有形的墙),并使监视、社会控制和镇压内在化。社区常常是社会变革的障碍,而非推进器。新城市生活创建的意识形态既是乌托邦的,同时又是令人忧虑的。在其实现过程中,新城市生活为那些并不需要它的人建立了一种社区形象和修辞,那种修辞就是以地点为基础的市民自豪感和意识,同时却让那些“下层阶级”听任命运的摆布。多数已经实现的项目是为富人开发的“绿地”(当然包括查尔斯王子自己在多塞特庞德伯瑞工程上的投机活动,图 8.25),他们帮助制造了郊区的或远郊的更好的居住地(Langdon, 1994),但他们很少或根本不帮助恢复那些正在衰退的城市中心地带。斯库里(Scully, 1994),此运动的怀疑者,并不相信新城市生活曾经抓住过城市贫穷和衰退的要害。在评论新城市生活代表作西塞德时,他指出,“在创造社区形象、创造人类文明在大自然中的地位象征时,它的成功已超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建筑学工作……”(顺便说一下,对查尔斯王子的庞德伯瑞现在也有着同样的说法)。但是,斯库里继续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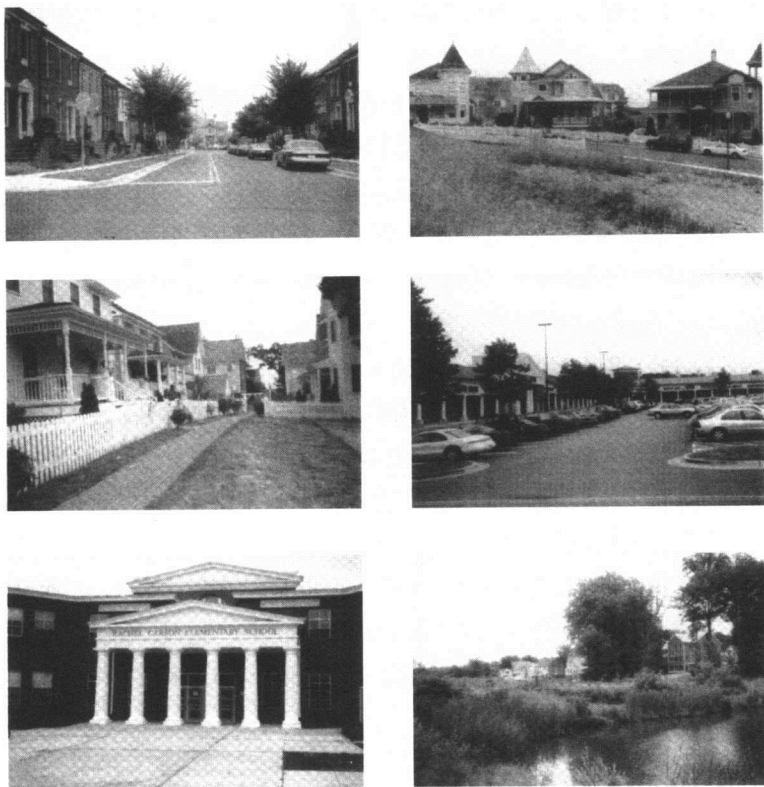
人们会情不自禁地希望西塞德和其他现正在形成的新城镇的经验可以应用于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那是最迫切需要社区的地方,而且又是遭受最惨重破坏的地方。如果这一切会在中心城市内发生,那它将确实会被瓦解为它的内在邻里。不幸地,如果是在再开发之前,当邻里的基本结构还仍然存在的时候,那一切将会容易得多……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所知的“中心城市”是否能够被塑造成多数美国人想要居住的那一类地方。(229)



图 8.25 乌托邦怀旧心理:多塞特的庞德伯瑞。查尔斯王子在呼吁解决大城市问题的建设“都市村”的运动中起了带头作用。他将这些理想付诸他靠近多尔切斯特的一个房地产,并建造了一个高密度的邻里,迎合了对本土风格和小镇亲密感的怀旧心理,据说是刻画了过去一个时代的特征。

这里的假设是:邻里在某种意义上是“内在的”,适当的城市形式是某种“邻里结构”,“邻里”等同于“社区”,而“社区”正是多数美国人希望和需要的(无论他们是否知道)。更进一步的假设是:在这种新城市生活确定的规模内所采取的行动是有效的,并足以解决存在于所有其他规模内的问题。乌托邦梦想的怀旧情绪和在空间上的有限努力重新浮现。

所有发生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新城市生活”——如果它想实现的话——必须将其方案植入一套限制性的社会过程之中。比如说,杜阿里(Duany, 1997)宣称他对设计不能建成的方案不感兴趣。他对低收入人群的关注受到了新住宅单元 15 万美元(差不多是巴尔的摩中等人口收入的 10 倍)最低价格的限制,如离巴尔的摩不太远的肯特兰兹这样的地方(图 8.26)。他对郊区感兴趣仅仅是因为这是多数新方案得以实施的地方。他认为,郊区的成长是“美国的方式”,深深地沉浸“于我们的文化和传统之中”,而且他强烈反对这样的指控:说他与权力结构“串通一气”,说他迎合于大众的口味。他还坚持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创造伟大的计划,胜过以商业基础为目的的所有其他计划。这意



**图 8.26 乌托邦怀旧心理：马里兰州肯特兰兹商业化的新城市生活。**由安德莱斯·杜阿里和伊丽莎白·布莱特—齐伯特所设计的肯特兰兹被宣布为实现新城市生活的革命性方法。它处于“科技郊区”之中（国家标准局、IBM公司和其他几个高科技公司即坐落在此），提出了高密度、人行道和“小镇魅力”的“老式城市规划”。肯特兰兹靠近华盛顿，离巴尔的摩不远，它被宣布为进行中的“新城市生活”的一个主要例子，为5000多人在一个完全规划好的356英尺土地上提供膳宿。

独立住宅起步价大约40万美元，连排房屋起步价25万美元，为低收入人群供应的每一分套公寓单元不低于15万美元。高密度设计采纳了多种建筑风格和白色篱笆墙的折衷，这种白色篱笆墙摹仿了大卫·林奇电影《蓝丝绒》中的奇特世界。超过三分之二的人都拥有小汽车（主要是耗油的SUV），小块池塘和一些小片的林地的存在以及雷切尔·卡森小学点缀着这里的生态善心。它配备了标准的郊区购物中心，供以工人服务，这些工人当然住不起他们所服务的这种社区。在进行与郊区蔓延有关的革新的同时，肯特兰兹向一些非常富裕的客户推销郊区环境中的小镇怀旧情怀。

味着“更快地批准、更少地花费、更快地销售”。他的新城市生活样式就是严格地在这种参数之下操作的。

但是在这里谁应该受到责备呢？是设计师杜阿里还是限定了他设计方案参数的社会过程条件？实际上，多数已实现的空间形式的乌托邦是通过国家或资本积累的力量来完成的，依照这两者的规范来实施（这在新加坡和韩国与在英国、瑞典、法国或澳大利亚是一样真实的）。它要么那样，要么就游离于主流社会过程“之外”（至少在19世纪看起来是可能的，那时美国是卡贝、罗伯特·欧文这样的乌托邦理想者和多种宗教运动的首选目标）。然而，当那些采取这样一种局外路线的人被吸收进资本积累和发展状态的主流时，他们的原则通常会彻底垮台（类似于以色列的基布兹集体农场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就像空间形式本身的失败一样，已实现的空间形式的乌托邦之所以失败，也合理地归因于被动员起来实现它们的那些过程。正如特弗里（Tafari, 1976）如此中肯地提出的，这是使建筑乌托邦理想在当前条件下变成完全不可能性的东西。但这里还有一种更加基本的矛盾在起作用。空间形式的乌托邦理想一般应该去稳定和控制那些必须动员起来建设它们的那些过程，因此，在实现的过程中，历史过程控制了理应控制它的那个空间形式。这种矛盾有待于进一步的仔细审视。

## 5. 关于社会过程的乌托邦理想

如果已实现的乌托邦因为在实现过程中被动员起来的社会过程而变成坏事，那么中心就转移到过程问题上来了。我们可否设想一个过程的而非空间形式的乌托邦呢？理想化的过程图式大量存在，但我们并不总是称它们为“乌托邦”。与一些杰出的评论者（如波拉尼）一样，我想打破惯例，沿着空间形式的乌托邦理想来思考时间过程的乌托邦理想。

在这种语境中使用“乌托邦”这个词似乎很奇怪，因为“乌托邦”通常与某个地方相联系，这是一个既快乐又不存在的地点。地点的特性（可以被称为174 “地点性”）是重要的，这意味着再现并密切关注作为社会过程容器的空间形式和作为精神秩序表达的空间形式。相反，社会过程的理想化样式通常以纯时间术语来表达，它们在字面上束缚于任何不存在的地点，并且典型地被指定为一

个在空间性约束之外的地方。空间和地点的特性完全被忽视了。

我们可以把一个丰富且复杂的乌托邦历史看作是发散的时间演变。黑格尔就是一个明显的代表,他的指导精神被超验辩证法(一种在“既—又”逻辑基础上展开的辩证法)描绘为物质的和具体的。当自在之物成为自为之物时,它们就改变历史。有趣的是,历史的终极状态被表示成一种空间化的隐喻。道德或审美状态是世界精神演变的终点。马克思有时会遵循这种思维方法,虽然它并不是时代精神而只是起着指导作用的积极的阶级斗争。当自在阶级成为自为阶级时,历史也是这样向前发展,向着后革命的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完美状态发展,国家最终也会消亡。在这两种情况中(很明显,我把它们简单化了),作为空间形式的最终固定状态(事先未被明确说明)是通过某种特殊的历史过程观念获得的。黑格尔和马克思给我们提供了特殊样式的时间过程而不是最终的空间形式,而莫尔却给了我们空间形式而不是过程。

当然,对这种无固定地点的目的论还存在着许多争议。例如,威廉·布莱克和克尔凯郭尔都坚持认为,辩证法应该被理解为“非此即彼”而不是“既又”。结果,历史就成为一连串有关存在的或政治学的选择,这些选择不具备必须的导向性逻辑或任何清晰可辨的终结状态(Clark, 1991)。换言之(而这正是我将要返回的一个重要观点),社会过程的乌托邦习惯于迷失在无限开放方案的浪漫主义之中,在那种方案中,永远不会存在一个封闭(在空间和地方之中)的点。

具体说来,我们发现马克思的政治经历以及后来的著作常常受黑格尔先验主义的“非此即彼”辩证法而非“既又”辩证法所吸引。在支持巴黎公社这个问题上的犹豫不决所基于的理由是当时的时机还不成熟,而他突然转向彻底支持它则与他的可以“非此即彼”又可以“既又”的双重辩证观有绝对关系。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在某一给定的地点和时间内革命或不革命的潜在后果,并在这种目的论的支配下屈从于一种更加偶然的历史演变的意义,即使阶级斗争仍然是历史的动力。正如他就这个主题在给库格曼的一封著名的信中所写的:

如果只是在绝对顺利的成功条件下才着手进行斗争,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

(Marx and Lenin, 1940, 87)

而且,公社运动正是在巴黎才得以发生,这个事实给这项运动增添了明确的特性(既是缺点又是切实的长处),同时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革命运动是否而且如何从中心向外发展并进而席卷整个法国、甚至全欧洲。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开放的“既又”辩证法与“非此即彼”封闭假设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小事一桩。

为了支撑自己的观点,马克思必须要对一个不同的、在当时甚至是占支配地位的、依赖于完善市场环境下“经济人”理性活动的过程乌托邦进行解构。因为这是到目前为止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中最强有力的过程乌托邦,所以我们要对此密切注意。亚当·斯密在他的首次出版于1776年的《国富论》一书中最精确地阐明了这个论点。他对道德情操理论的思考——他首先是个道德哲学家,然后才是个经济学家——引导他提出了过程的乌托邦理想,在这个乌托邦理想中,个人的欲望、贪婪、贪心、驱力、创造力等等东西可以通过成熟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被动员起来,从而达到整体的社会利益。从这里出发,斯密和政治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排除国家干预和调节(那些保护自由市场的机构除外)并抑制垄断权力的政治方案。放任政策、自由贸易和适宜的市场被19世纪政治经济学家们所称颂。只要给自由市场繁荣发展的空间,就万事大吉。这当然是过去20年来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尤其以美国和英国为最显著)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我们被反复告之“别无选择”的体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种过程乌托邦发动了毁灭性的进攻。在第2章中,他勉强承认斯密有关成熟市场的虚构。接着,他以无情的、不可辩驳的逻辑说明了必然的结果。他证实,无节制的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只有“靠耗尽全部财富的原始来源——土地和劳动力”——才能生存下来,这就使得对自然的掠夺、自然的退化完全与劳动力的贬值和降低同等重要。此外:

176

依照资本积累的程度而言,工人的境遇,无论他的处境是高还是低,一定会越来越糟糕……因此,财富在一个极点的积累同时也是悲惨的境遇、劳动、奴役、无知、残酷及道德堕落在另一相反极点的积累……(1976, 799)

马克思对自由市场的乌托邦理想所作的出色解构最近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抑制。波拉尼(在冷战乌云即将出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写作)对

马克思的观点理解得非常透彻,他在下列段落中对此作了详细说明:

我们的论点就是,自我调节的市场观念暗示着一个十足的乌托邦。如果不消除人类和社会的天然本质,那这种制度一分钟也不会存在;它会在身体上摧毁人类,并把他的周边环境变成一片荒野。社会必然会采取措施自我保护,但无论它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都会以另外的方式削弱市场的自我调节、打乱工业生活并因此危及社会。这就是两难困境,它迫使市场体系的发展陷入确定的轨道之中并最终破坏以它为基础的社会组织。(Polanyi, 1957, 3—4)

但是在撒切尔—里根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成为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通过说服力和经济力量的混合运用而向全世界输出),把这样的异议弃之一边。凭借私人 and 个人的责任及进取心、解除管制、私有化、市场自由化、自由贸易、削减政府规模和大幅度缩减福利国家及其保护政策这些咒语,自由市场的毁灭力量滚滚向前。20多年来我们几乎经常被哄骗去接受亚当·斯密设想的能解决所有灾难的过程乌托邦。我们也已经目睹了对可能会阻碍这样一种计划的那些机构——特别是工会和政府——的全方位攻击。玛格丽特·撒切尔宣称说没有社会这样一种东西,而只有个人和他们的家庭,并开始着手解散所有那些可能会妨碍她的乌托邦幻想的机构——从工会到地方政府。随着柏林墙的倒塌,福山给所有这些都赋予了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假象。我们现在处于历史的终结处,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是世界范围的胜利者。历史的终结处就在这儿(如果以巴尔的摩为例,那确实是令人沮丧的思想)。

把撒切尔和金格里奇这样的人当作黑格尔派,这似乎很奇怪,但他们所信奉的自由市场必胜信念只是附属于黑格尔某一特定目的论的斯密的过程乌托邦(“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别无选择”)。在许多方面,正如弗兰克尔(Frankel, 1987)指出的那样,在最近时期,最有效的乌托邦理想者就是右翼组织的那些人,他们主要拥护过程乌托邦理想而非空间形式的乌托邦理想。然而,奇怪的是没能够把右翼对社会秩序的这种攻击贴上“乌托邦”和“目的论”的否定称号。只是在最近才有像约翰·格雷这样的主流思想家试图复兴波拉尼的思想,并攻击自由市场乌托邦理想的内在破坏性。撒切尔和金里奇两个人的突然下台和失去影响证实了他们这种打算的脆弱性。

177

当他们的乌托邦理想成为现实的时候,其结果就接近了马克思的解构所描绘的那些东西了。在所有那些最积极地沉迷于市场乌托邦理想的国家中,收入不平衡迅速上升(参见第3章)。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分化具有其地理表达方式:区域之间螺旋式上升的不平衡以及富足邻里与贫民区之间逐步增强的差异,以美国为例,就是贫穷的市中心与富足的、排他性的郊区的鲜明对照。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加速、所有形式的社会凝聚力和国家权力遭到破坏、整个文化和为日常生活提供坚实基础的那些“情感结构”被毁,以及,也许是所有情况中最成问题的,大面积的环境恶化以至于地球表面上的多数地方再也不适宜人类居住了,这些就是格雷(Gray, 1998, 207)准确描述的一些后果。“结果”,他写道,“我们不是站在自由市场者计划的富足时代的边缘,而是一个悲剧时代的边缘,在其中,无政府的市场力量和收缩的自然资源把主权国家拖入到更加危险的竞争之中。”我坚持认为,这些正是在巴尔的摩衰退中发挥作用的力量。那么,如此一种想象中的仁爱过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悲剧后果呢?

答案广泛地存在于过程乌托邦在地理上实现时所发生的事情中。自由市场乌托邦理想以任何形式实现都要求这个过程停在某处,要求构筑某类它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空间。它如何在空间上成形以及它如何制造空间,这些都成为它具体实现的关键方面。过去20年来我的主要工作(Harvey, 1982; 1989)就是试图准确地追踪这样一个过程,试图了解资本如何在某一点上按照它自己的面貌建造一种地理景观,但最后为了调节它自己无止境的积累动力、强大的科技变革以及剧烈的阶级斗争形式又不得不摧毁它。资本主义时代中创造性毁灭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历史简直令人吃惊。过去200年来地球表面上所发生的许多奇异变化,所反映的正是自由市场的过程乌托邦理想的实施及其不断的、长期的对空间形式的重组。

但是这种空间实现的条件和样式具有各种各样的结果。因为自由市场的资本积累是在天然资源、文化历史、通信潜力、劳动力数量和质量这样一些多样化的地理区域中进行的(这种地理区域日益成为资本投资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人工环境上的微分产物),所以它强化了生活标准和生活前景上的不平衡地理发展。富裕地区越来越富,贫穷地区越来越穷(巴尔的摩就是大城市规模上这种不平衡地理发展的一个生动例子)。嵌入在市场过程的乌托邦理想中的循环和累积的因果关系使得财富和权力在地理差异上越来越大,而并不是朝着同质性和平等性逐步发展。俗话说,“再也没有比公平对待不公平之事更



加不公平的了”，而且正是因为这一点，自由运行的市场中所暗示的平等主义和民主化最后产生的不平等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社区和/或国家权力引领着对自由市场乌托邦理想的某些惊人后果（螺旋形上升的收入不平等、不平衡地理发展、对环境的外在影响，及诸如此类）的抵制。但是这一现象之中潜伏着一种深深的悖论。自由市场如果要运行，它就需要大量的制度安排和规则，这些制度安排和规则只能由某些类似于国家权力的东西加以保证。市场自由必须由法律、权威、武力来保证，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由暴力来保证。因为国家权力通常被认为是暴力的垄断者，所以自由市场如果要运行，就需要国家或相关的机构。简言之，自由市场并非只是偶然发生的。当然，它们会反对国家权力管制它们的某些手段，不过，它们并不反对国家权力。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只有当国家（现在我们必须把地方政府包括在这个断言中）成为“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时，自由市场乌托邦理想的实现才能得到保证。1945年之后的非殖民化和随后发生的全球市场的国际化和自由化已经使整个世界更接近于那个标准，尽管这一过程发展的不平衡的步伐（政治和社会斗争的产物，传统团结和传统思想在这些斗争中起着重要作用）已经影响到过程乌托邦理想在不同地点和时间上得以实现的方式。在各地地方之间，甚至更具破坏性地，在国家或国家联盟之间所发生的地缘政治斗争已经成为这个问题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179

争论的结果就是：任何过程乌托邦理想的纯度不可避免地会被它的空间化方式所破坏。完全同样地，空间乌托邦的具体实现与被动员起来制造它们的时间过程的特性相冲突，所以过程乌托邦理想与具体实现它所必须要的空间框架和地区结构特性是相互冲突的。令人好奇的是，亚当·斯密看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预见市场交换的延伸给世界不同地方带来的利益与灾难，这是很难的。但是，他希望：

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联合世界最遥远的部分，使他们能相互救济彼此的缺乏、增加彼此的享受、激励彼此的产业，其一般倾向似乎是有利的。不过，对于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两处的土人来说，这两件事本来能够产生的一切商业上的利益，却被它们所引起的不幸完全抵消了。这种不幸与其说是出自于它们的本性，还不如说是出自偶然。美

洲及东印度通路被发现时,欧洲人的优越努力,使他们能为所欲为,在此等遥远的地方,做出各种不合正义的事体。今后,此等地方的土人,也许会日渐强盛,欧洲人也许会日趋衰弱,使世界上各地的居民,有同等的勇气和实力。只有这样,才可引起相互的恐惧,从而威压一切独立国的专横,使它们能相互尊重彼此的权利。但最能建立此种同等实力的,似乎就是互相传授知识及改良技术了,但这种结果,自然会,或不如说必然会,伴随着世界各国广泛的商业而来临。

(Adam Smith,引自 Arrighi, 1994, 19<sup>1</sup>)

结果决不会像斯密的乌托邦幻想所假定的那样是偶然和短暂的。就像当时一样,我们现在随时可以在各种著作中发现斯密的这一标准反应:因为市场还不完善,所以产生了不平等问题。但是,经历两个世纪的苦难之后,这种论调不再有什么重要意义和可信度。

## 6. 在空间形式中奠定社会过程的基础

空间形式的乌托邦不得不与它意欲控制的社会过程相妥协,从而与它们的崇高目标相悖。现在我们也发现,已实现的社会过程乌托邦必须与空间性和地点地理学相协商,这样,它们就同样失去理想的特征,而产生了在许多情况下完全违背初衷的结果(比如,加强了独裁主义和不平等性,而非更强的民主和平等)。我们来更进一步地看看这种颠倒在理想化的社会过程中是如何发生的。

存在着两个基本点,当任何社会过程乌托邦理想具体实现时,“空间性协商(negotiation of spatiality)”一定会在这两个基本点上发生。对它们的考虑证明了斯密所哀叹的结果为什么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视为偶然的或短暂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自由市场依赖于国家权力。自由市场的发展决定性地取决于国家权力特定形式的扩展和深化。与大众信念相反,市场过程没有“挖空”国家。它们带来了国家对社会过程特定方面的更进一步控制,恰如它在履行某些比较传统的、民粹主义的职责中被驱逐一样。此外,在某种程度上,国家本身需要合

---

1 译文引自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刀,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译者注。

法性以最有效地履行职能,那就必须动员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情感,从而把自由市场的扩展变成政治的甚或明显的地缘政治的十字军东征。英国是19世纪世界范围内市场的推动者,使用了炮舰外交政策、帝国征服和有关种族优越及“白人重任”的广泛观念,并确信他们在打开世界接受贸易的运动中所肩负的“教化使命”。美国在1945年之后运用各种可自由支配的宗派和暴力手段努力寻求一种与假想中的“民主”资本主义相结合的自由市场的新世界秩序。在过去20年中,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十字军东征主题,它再一次地显示霸权国家的权力是自由运行的市场所必需的。在一个较为局部的层次上,玛格丽特·撒切尔只有通过无情地使用国家权力(比如,镇压罢工的警察暴力、对大学研究的严密监控)并诉诸民族主义情绪(当她拒绝与欧洲进行市场自由真正地且逻辑上需要的一体化时,后者就产生了导致她垮台的一个悖论)才能在英国内部实现她的自由市场哲学。

这预示着一个根本的矛盾。国家权力的保存和扩展是自由市场运行所必需的。如果自由市场像惯常那样削弱国家权力,那么它们就破坏了自身运行的条件。相反,如果国家权力对市场的运行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国家权力的保存就需要对自由运行的市场进行颠倒。正如波拉尼清楚地概括的,这是处于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心的主要矛盾。它解释了,在像巴尔的摩这样的城市中,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发展格局是通过诉诸自由市场竞争这样的花言巧语来证明是正当的,而实际上它却依赖于国家的补贴和垄断。它同样也解释了为什么全球化和更加自由的国际贸易的伟大时代已经成为单一权威国家(比如19世纪晚期的英国或1945年之后的美国)能够为自由市场获得成功提供政治、制度和军事条件保证的伟大时代。

181

因此,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虚假外表依赖于强制性合作和协作这个基础来确保自由市场和开放贸易的框架。

自由市场的乌托邦理想与空间性的第二个基本协商点更直接地取决于物质人工环境的建设,那种环境是商业活动能够依靠的资源复合体。它以其最粗糙的形式允许商业化的乌托邦理想规划,比如玛格丽特·撒切尔设立城市发展公司来恢复城区的那类规划(伦敦港区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但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总会产生地理偏见和不平衡地理发展,这又会诱发其他方面的发展,这些发展都是某种协同作用的一部分,当自由市场参与空间生产时,那种协同作用必然会发生。出售一个地方,如巴尔的摩,这本身就成为了乌托邦艺术表

现的部分。源自于空间形式的乌托邦的华丽词藻和关于过程乌托邦的华丽词藻正是在这个方面相结合从而制造了我们身边的商业化的和退步的乌托邦形式。

这种矛盾的结果加深而不是减缓了不平衡地理发展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活动。各种样式的国家统治体系的扩充把整个世界区域和居住在那里的人口中的不同阶层还原为类似于奴役的状况。主要公共资源在空间上的集中在所有的规模上都产生了螺旋式上升的地理不平等。而且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存国家权力的政治经济资源,这些资源保障了自由市场的运行。这些悖论和矛盾到处不证自明。然而,有关自主、自由和市场的乌托邦花言巧语隐藏得如此有效以至我们经常会发现难以说清楚那种潜在的强迫性协作模式,而它们原本公然地直接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 辩证乌托邦理想

### 1. 探索时空乌托邦理想

考虑到空间形式和社会过程这两方面的乌托邦都存在着缺陷和困难,那么最明显的替代方案(不同于完全抛弃任何乌托邦主张)就是建立一个明确的时空的乌托邦理想。很多年前爱因斯坦就告诫我们,空间和时间不能有目的地分开。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许多迹象表明空间同时间的分离虽然有时很有用,但却常常令人误解(参见 Harvey, 1996, 第三部分)。而且如果空间和时间被当作社会构造(暗示着否认了牛顿和笛卡尔所创立的绝对时空理论),那么乌托邦理想就必须同时包含空间和时间的生产。因此,对于我称之为“辩证乌托邦理想”的东西的探索还在继续。

然而,一定不要抛弃从空间形式和时间过程这两个乌托邦理想的分离史中所得到的经验教训。确实,对它们进一步地分析,可以得到更深层次的领悟。从前者来看,实现特定社会和道德目标的想象性空间游戏观念可以转换成潜在的、无止境的、有许多空间形式可能性的开放实验,这就允许对广泛的人类潜力进行探索(集体居住、类属关系和生产—消费风格的不同模式,与自然关系的不同模式,等等)。列斐伏尔(Lefebvre, 1991)就是这样提出其空间生产概念的,他将之视为一种探索替代方案和解放策略的优先手段。

但是列斐伏尔坚决反对传统的空间形式乌托邦,正是因为它们具有封闭的独裁性。他开辟了对笛卡尔概念、对政治专制主义进行毁灭性批判的新风尚。那种政治专制主义来自于空间和压迫的绝对观念,而那种观念又源自理性化的、官僚化的、技术统治论的和由资本主义定义的空间性对世界的报复。对他来说,空间的生产必须总是作为一个不断开放的可能性持续下去。不幸的是, 183

结果却使任何实际替代方案的空间令人失望地无法定义。列斐伏尔不接受特定的建议。他拒绝面对这个根本的问题：实现一个空间就是实施一种属于独裁主义的封闭行为（尽管是暂时的）。所有已实现的乌托邦的历史都指向了根本且不可避免的封闭问题，即使由排外行为而产生的幻灭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如果想要实现替代方案，那就不能无穷尽地躲避封闭的问题（以及它所预示的权威）。这样做就是采纳一种有关永远无法实现的渴望和欲望的牵强的浪漫主义思想。这就是列斐伏尔最终把我们遗弃的地方。

福柯试图通过不同的途径摆脱同样的困境。在首次出版于1966年的《物的秩序》一书中，他杜撰了“异托邦(heterotopia)”这个术语来描述那种不和谐、那种“高深莫测的多样性”以及语言本身能够产生的基本的混乱：

乌托邦提供安慰作用：虽然它们没有真实的位置，但却存在着一个幻想的、无烦扰的、它们能够在其中伸展的区域。它们开辟了拥有巨大林荫道和雄伟壮丽的人造公园的城市、生活安逸的国家，虽然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异托邦是令人烦扰的，大概是因为它们暗地里破坏了语言……乌托邦允许寓言故事和话语：它们采用了语言的这一特点……（异托邦）使言语无味，终止了词语，在其源头处争论语法的真正可能性；它们消除了我们的神话故事并杜绝我们句子的抒情性。

在《物的秩序》中，“异托邦”是完全从话语和语言方面来考虑的。后来，福柯努力要给这个术语一个物质的所指。在1967年所做的一个报告中，在与空间形式的建筑师和理论家展开对话的尝试中，福柯(Foucault, 1986)再一次地诉诸“异托邦”这个概念。这个报告从未修改出版（虽然他在1984年去世之前不久确实同意出版）。由他的助手们摘录，作为其所有作品中的一颗隐藏之玉，于是这个报告就成了乌托邦问题能够藉以复兴并同时被规避的一个方法（在后现代主义的教规中尤其重要）。“逃避”的主题隐含在福柯的论文中。（他写道：“海船是真正的异托邦”，“在无船的文明中，梦想枯竭，间谍代替了冒险，警察代替了海盗”[Foucault, 1986, 27]）。这个概念使福柯有可能幸免于“不存在的地点(no place)”，那是一个“地点”的乌托邦（激励法国1968年运动的一个主题），并在实际行动的特定地点实现。但他也运用它来逃避那个限制人们想象力的规范和结构的社会（顺便提一句，包括他自己的反人道主义），而且通

过对空间历史的研究以及对其异质性的理解来确认差异、变化性和“他者”可能活跃于或(如建筑师)真正被构造于其中的空间。哈瑟林顿(Hetherington, 1997)把异托邦的这个概念概述为:

[是]多个交替秩序的空间。异托邦以一种不同于周边的方式组织着一个社会世界。交替秩序把那个世界界定为**他者**并允许它们被当作是一种可供参考的选择性做事方式……因此,异托邦揭示社会秩序的过程只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物。

这个表达方式表面上很吸引人,它让我们能够思考多重乌托邦图式(空间游戏),这种图式以并不相互排斥的物化形式为我们所知。它加强了空间游戏的共时性这种观念,该观念突出选择、多样性和差异。它使我们能够把城市空间中(有趣的是,福柯的异托邦空间名单中包含了诸如墓地、殖民地、妓院和监狱这些空间)发生的多种异常和越轨行为及政治活动看作是对某种权利的有效且具有潜在意义的重新主张,它要求以不同的形象来塑造城市。它迫使我们承认拥有可以体验不同生活的空间(爵士乐俱乐部、舞厅、社区公园)是多么重要。福柯使我们确信,存在着大量的空间,在其中,“他性”、变易性和替代方案可以不被当作纯粹虚构事物来研究,而是通过与已经存在的社会过程的联系来研究。替代方案正是在这些空间内形成,而且对现存规范和过程的批判正是从这些空间出发才能够特别有效地确立。他宣称(大量利用巴什拉的著作),此类空间的历史向我们显示空间形式会如何、并以何种方式与根本不同的社会过程发生联系,并因此破坏社会(以及深层意义上的乌托邦解毒剂)通常所依附的同质性。他显然期待这个混乱的结果,这在他《物的秩序》一书中早就描述过,“大量可能秩序的片断以不规则的而不是规则或几何学维度各自闪耀其间”(Foucault, 1973, XVII)。

不幸地,这个概念不能如此轻易地逃避更加普遍的乌托邦重负(也许这就是福柯为什么会在他的《规训和惩罚》一书中拒绝详细说明这个概念、甚至默默地否认它的原因)。它假定,与统治性社会秩序的联系或者可以被切断、被削弱,或者就像监狱中的情况一样完全被颠倒。这个假定就是:权力/知识可能被分散并被分解为差异的空间。它假定,在这类“他性”的空间中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是有益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可以接受的”或“适当的”。墓地和

集中营、工厂、购物中心和迪斯尼乐园,琼斯敦<sup>1</sup>、民兵集训营、开放学制办公室、新哈莫尼,“私托邦”和“生态乌托邦”,这些全都是另一种做事方式的场地,并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是“异托邦的”。由于它的多样性,乍一看显得如此开放的东西突然显得要么是平庸(一个混乱的、异质的、多样的空间,任何“不同的”事物——无论怎样定义——都可能会发生于其中),要么是一个更加有害的空间碎片,这些空间在一个更加广泛的历史和地理转变的辩证法中是封闭的、排他性的,甚至是危险的。异托邦这个概念能够坚持对空间异质性的更好理解,这是个优点,但是对于一个更加时空化的乌托邦理想的外表特征却提供不了任何线索。福柯提出质疑并助长其动摇(特别是在话语领域),但对于任一种替代方案会如何构成却不能提供一点线索。

现在,我们从过程导向的乌托邦理想(process-oriented utopias)的立场来思考这个问题。这种据说应该不断开放且仁慈的乌托邦社会过程,如市场交换,不得不凝固为一种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存在的、以空间为秩序且制度化的物质世界。社会的、制度的和物质的世界(围墙、公路、领土细分、统治制度、社会不平等)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这种非此即彼的辩证法是无处不在的,这样的结构一旦建立就很难改变(核电站将束缚我们好几千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律制度聚集了越来越多的惯例)。尽管我们会努力创造灵活的景观和制度,但因为变化条件随时间变得越来越僵化,所以结构的稳固性往往会增长。与一个世纪前相比,彻底改造像纽约或洛杉矶这些地方的物化组织形式现在连想都比较难了,更不用说做了。自由流动的过程在各种结构中、在各种组织、社会、文化和物质的现实中得到了例证,那些现实需要相对的永久性、稳固性和不变性。物化的过程乌托邦不能逃避封闭问题或者它们自己制造的对传统、制度惯性等诸如此类东西的硬性积累。自由市场的乌托邦理想越是集中于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平等和不自由,它就越难以改变或者甚至保持它自己的轨迹。

186 在当代,任何重建社会过程的斗争必然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如何推翻由自由市场本身制造从而成为社会相对永久性特征的这些结构(既有物质方面的,又有制度上的)。虽然这个任务使人畏缩,但并非不可能,新自由主义的革命议

1 1978年,邪教头目吉姆·琼斯带领近千名信徒从美国旧金山来到南美新兴小国圭亚那的热带丛林,梦想着在那片蛮荒之地——琼斯敦(Jonestown)建立起一个乌托邦式的世外桃源。按照教主琼斯的说法,“这里没有种族歧视,充满人间正义。”11月18日,在他的鼓惑下,900多名追随者在圭亚那琼斯敦服毒自杀,从而制造了一起震惊世界的惨案。——译者注



程在过去 20 年里已经完成了许多物质上和制度上的改革(想一想英国和美国非工业化的双重影响和工会权力的缩小)。因此,当我们探索替代方案时,为什么就不能去设想同样引人注目的变化呢(虽然是在不同的方向中提出)?

正是从这方面出发,思考罗伯特·昂格尔的著作就非常有益了。像列斐伏尔一样,罗伯特·昂格尔也致力于解放方案的探究,同样渴望避开传统乌托邦构想的错误。他集中于社会过程和制度/个人的转化。果然不出所料,他对现存制度和行为的批判是强而有力的。那么,他如何设想替代方案呢?昂格尔坚持认为替代方案应该出自对既存制度、个人行为 and 习惯的批评和实践斗争,从而避免了乌托邦理想(最直接地,这些安排通过出自资本主义长期历史的西方民主模式而得以实现)。因此,他仅仅对“道路中的下一步骤”感兴趣,而并不是对某些普遍的转变原则或某种千年幻想的描述感兴趣。然而幻想的思想(visionary thought)和想象的斗争对这种努力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对理想的思考变成了梦想的或外在的,以致它展示了一幅已根本改变了的社会生活计划的景象,尽管只是部分的和片断的,并在证明方面也不严格坚持惯常的和确定的人类联系模式。这种空想家是这样的人,他们声称不受他或他的对话者所处的传统界限的约束……请注意,幻想的思想并不天生是信奉千禧年的、至善论的或乌托邦的(在通俗意义上)。通常它没必要也不会呈现完美社会的景象。但是它确实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们必须自觉地重绘可能和可欲的人类联系形式的地图、发明人类联系的新模式并设计能体现它们的新的实际安排。

(Unger, 1987b, 359—60)

昂格尔著作的中心思想是一个简单但却有力的辩证法概念。只有改变制度世界我们才能同时改变自己,正如只有渴望改变我们自己才有可能改变制度。他写道,“劳动技术和社会分工在日常生活中越是呈现为一个僵化的功能分配,它们就越是应该在文化革命的挑衅和不和谐这种微观水平上以及制度创新的宏观水平上加以摧毁”(564)。尽管如此,建立一种既自由又有改革能力的更彻底的民主统治的授权与被授权体系仍是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昂格尔设想了三种主要的授权种类。第一类,展开社会生活的实际实验;第二类,加强对“我

187

们社会经验的制度的和虚构的框架的自觉控制”，而第三类则帮助“改变群体生活的某些能力，正是借助那些能力，集体生活用依附和支配的关系把人们绑在一起并因此使他们成为预定无个性的角色代表”（363—4）。

为实现这个目标，昂格尔设想了三个主要的制度改造领域：管理章程、系统组织和权利体系。他在这些领域内探索各种建议从而努力避免无止境开放的可能性所暗示的浪漫主义色彩，他希望，这既能够激励潜在替代方案的意义，同时又可推动个人转变，这些个人转变缓和了我们都嵌入其中的日常生活之“保持惯例的结构”与通常表现为革命性和破坏性暴力的“改变冲突的结构”之间的反差。这样，他希望“把社会性从它的原本（script）中解放出来，并使我们对于他人来说相互成为自己都知道的独一无二的人而非团体对照体系中的占位符号（placeholder）。”（563—4）

我在这里对昂格尔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探讨（虽然对于一项非常丰富且复杂的三卷本研究成果来说，这远谈不上公正对待），因为在我看来，在关注幻想可能实现的机制方面，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的分析对这个世界很有益。现在，他与巴西的工人党合作解决进步政治行为的宪法和法律方面问题。在像阿雷格里港这样工人党掌权已好几年的城市中，执政者想出了一些高度创新的手段来加强大众授权和民主治理形式，这其中的大多数具有昂格尔所代表的那类思想的特点（参见 Abers, 1998, 对阿雷格里港实验的描述）。把这些实验转换到像巴尔的摩这种城市的情境中，它们确实会非常有用。我们需要从中学的东西很多。

尽管如此，昂格尔并没有考虑过社会秩序安排的特殊空间模式——他所表述的全部东西始终来自于对空间因素的概括。我不认为这对他的论点来说是致命性的，因为无须克服太大的困难就可把他的批判和重新设想社会机构的方法扩展到空间形式的水平，并因而把他的论点转变为对进步的民主化和授权（诸如此类的，它实际上正在阿雷格里港被创建）有着更加审慎思考的时空动态。

然而，昂格尔研究方法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困难。比如，他指出了他称作“所谓对替代方案的兴趣与表明这种兴趣真实性的实实在在的迹象的缺乏这两者之间令人惊讶的差距”。他还指出了“强烈的逻辑社会理论的幻觉”（主要代表是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和对自发的革命行动创造力的信心已经解除了左派的建设性的政治想象力”。接下来他写道：

试图设计出比在主流左派文献的党派论坛中所发现的替代方案还要审慎的方案的少数那几个人很快就被当作乌托邦梦想家或改良主义的修补者被抛弃：如果他们的提议过于背离既定的安排，那就是乌托邦者；如果他们提出适度的改变提议，那就是修补者。没有什么值得为之奋斗的事情是切实可行的，而且轻易设想出来的变革经常都不值得有计划的运动为之牺牲，那些运动的时间表经常不尊重个人寿命的维度。如果所有这些还不够，自诩的方案制订者注定还会有一个最后的惊奇。他将被谴责为——有时指控人恰恰一分钟之前还声称他们需要替代方案——教条地预期了将来，而且试图抢在不可预测的情形之前，就好像蒙田的警告没有什么力量似的，蒙田警告道：“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要驶向什么港口，那么就没有什么风能帮助他”。（1987a, 443）

这是相当敏锐的素材。不过，结果是，就每个人而言（包括昂格尔），在确定自己可能会希望驶向哪个港口时会犹豫不决。正是在这个方面，昂格尔拒斥任何一种特定制度安排或社会关联模式所造成的封闭性。像列斐伏尔一样，他试图使选择机会永远敞开。无情的“非此即彼”辩证法被回避了，更加温和的（昂格尔比较喜欢的词之一）、更加令人鼓舞的黑格尔先验政治学得到了支持，解放政治学思想的反独裁主义在这里达到了某种界限。人们没能认识到任何事情的实现都需要（至少是暂时需要）围绕一套特定制度安排和特定空间形式的封闭，而且这种封闭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在人类事务中有其影响力的物质性声明。抛弃全部左派乌托邦思想言论就是把合法有效的权威问题搁在一边（或者，更准确地说，把这个问题交给保守派的道德准则——新自由主义和宗教种类的保守派）。正如马林所评述的，它使乌托邦概念成为物质世界中无任何针对性所指的一个纯粹能指，而且对当代许多理论家而言——昂格尔也在其中——那正是这个概念能够而且应该逗留的地方：作为一个纯粹的希望能指，注定永远不需要一个具体的所指。但是问题就在于，没有乌托邦的幻想，就没有办法来确定我们可能想要驶向哪个港口。

## 2. 乌托邦动态

把被称为“时空乌托邦理想”的这套理论描述为完全空洞的,这是一种错误。确实,存在着许多替代它的方法。首先,格迪斯和芒福德在他们各自对城市和地区的研究方法中所采纳的进化论证风格促进了对人类活动的一种认识,在其中,处于变化规模上的空间生产是同样强制并常常冲突的经济、科技和文化需要的表现(如芒福德所述,城市首先要被当作“一件艺术品”来看)。芒福德的著作,虽然特殊且不完善,但却注入了某种时空乌托邦理想(尽管最近所做的某些灾难性选择常常带有很大程度的乌托邦情绪)。

但更为重要的是,乌托邦写作类型本身最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零散地隐藏在常常非常令人厌烦的故事内的政治小册子(如莫尔的《乌托邦》甚或巴特勒的《埃瑞恒》)变成成熟的具有戏剧性的(有时是宏大的)长篇小说,这种变化预示着情感和技术上的一个重要转变。这种长篇小说,作为对可能世界的一种探索(参见 Ronen, 1994),现在已经成为探索乌托邦情感和感受的首要场所。有关这种转变的早期暗示我们可以在下列这些作品中发现,如黑塞的《卢迪老师》、H. G. 韦尔斯、阿尔都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以及爱恩·兰德的《根源》(外加大量的乌托邦小说,如奥威尔的《1984》)。但在最近时期,在厄休拉·勒吉恩、多丽丝·莱辛、玛吉·皮尔斯及其他许多人的作品中,这种策略已变得显而易见(现在许多用这种风格写作的作者都是女性,指出这点是有启发性的——正如莱维特丝所指出的。1990; 1993)。

这种长篇小说很典型地认识到社会和空间是由持续的斗争过程塑造的。如果需要的话,这种小说形式适合于一种更强烈的时空动态。静态的并最终被实现的古典乌托邦理想的空间/制度形式被抛弃了,它们要么被当作不可实现的,要么,如果已经实现的话,则被当作不稳定的、仍处于向尚待确定的其他某物的变迁之中。让我们看一看金·斯坦利·罗宾逊有关火星殖民地的三部曲。一开始是探险航行,紧接着就是对无人居住的遥远星球的积极的殖民运动(虽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点),它把殖民的历史地理改写成一部有关火星环境和社会—空间形式变革的长期传奇。这个传奇的特点就是各种斗争:与火星环境作斗争及殖民过程本身的内部斗争——首先到来的一百名移民和后来者之

间的斗争,地球上的权威和火星上的新生社会之间的斗争,尤其是殖民者自身内部就广大问题(比如政治表现形式)而展开的斗争,但最特别的是“改变”火星环境所带来的道德和政治权利的问题。火星上的社会形态带来了对世界的生产,这种生产持续不断地从自身内部发展出新的形式,但却不是以任意的方式。每一决策瞬间都标志着一个“非此即彼”的逻辑,赢得战争(身体上的或思想上的)的人改变发展的轨迹,本身却未必需要包容所有的反对意见。总是遗留一种权力和论证的残余,它们往往在稍后作为一个替代的颠覆力量被恢复。因此,读者不是被介绍到一个已经建成并被发现的稳定世界中,而是被创造一个新社会—生态世界的辩证法所吸引。

我不是用罗宾逊的例子作为某种范本来说明应该如何制定时空乌托邦理想,虽然它确实例证了文化形式如何可以用来阐明替代性时空动态。此外,单纯依靠长篇故事作为灵感之源存在着许多危险。比如,用“纯”文学(或艺术)来代替乌托邦理想可能意味着我们未能从莫尔的《乌托邦》或贝拉米的《回顾》这样的政治小册子中获取如此断然、如此清晰地传出来的政治讯息。很难想象罗宾逊的著作作为对贝拉米干预(现实)的回应,激励了19世纪末期兴起的所有此类政治运动。更为糟糕的是,艺术创新轻易地掩盖了变革行动的真正困难。正如莱维特斯(Levitas, 1963, 265)所评述:

未来和现在通过一个切实可行的变革可靠地连接着,为什么确定乌托邦在未来的位置变得如此困难,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现在的形象不能够识别变化的手段和过程,结果就是乌托邦更进一步地向幻想的领域发展。虽然它的优点是把想象力从那些作为可能想象之物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鼓励乌托邦去要求不可能之事——但其弱点在于把乌托邦和社会变化的过程相分离,把社会变化与竞争的乌托邦形象的刺激因素相分离。

我们似乎回到了昂格尔在似乎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与看起来几乎无关紧要的前景之间所作的对比。

然而,在这点上,对罗宾逊三部曲的解读能提供一个更深层次的极为重要的见解。他的乌托邦故事中包含着无数的与实际历史地理的相互参照,即资本主义长期历史过程中所宣扬的帝国征服、殖民和新殖民活动,其故事中的历史

和地理指示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它立足于火星环境的实际特性(包括所有独特的自然危险)并求助于未来的科技,但它还是不可避免地呼吁全面质疑弗兰西斯·培根和笛卡尔以来控制自然这一极为重要的西方思想。面对恶劣的火星环境努力生存下来,这简直可以说是英雄行为。此外,把在火星上进行的殖民化过程植入到跨国的和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争论和科技政治体系中,这也得到了明确的公认。对火星的殖民是一种努力:在一个新的环境中把社会秩序从它的地球束缚中解放出来。但它是一种只获得部分成功的努力,准确原因马克思在他致伊加利亚人的公开信中作了陈述(参见第2章)。

小说对后启蒙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经验所进行的秘密对比是很大胆的(新的火星社会秩序的产生稍稍与《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资产阶级权力的兴起有一些相似)。这使得罗宾逊的三部曲很容易地成为高度批判性的后殖民解构的目标,但我宁愿以一种比较肯定的方式来评价它。在实际历史地理的转变(以严格构成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能够支配的所有力量来理解)与替代我们现在时空动态经验的乌托邦设计之间的内部联系上,它提供的预期令人可望而不可及。

### 3. 时空乌托邦理想的历史—地理学

马克思和昂格尔至少在一点上是有共同目标的。他们两个都坚持未来肯定不是以某种幻想的乌托邦模式来构建,而是通过现在状态中我们所拥有的原料的切实转变来构建。那些原料由时空动态来创建和集合,而这种时空动态又是由一套独特的冲突景象(包括压倒性的资本家和商业企业家的景象)所启发。因此,对资本主义历史地理的研究为时空乌托邦方案如何能够立足于现在和过去提供了线索。这是一个明显超出本书范围的任务,它把乌托邦思想的观念带进了一个不同的维度,但还是允许我简略地补充一些能够想到的论点。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看自由市场的乌托邦理想(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如何在全球实现的(作为空间形式的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在这方面,美国拥有全面但特殊的作用。它是中心,从这里出发,全球统治的地缘政治策略经由市场的自由而被动员起来。它经历了帝国的瓦解和非殖民化、严格的国际调解机构的形成(设法确保它自己的特殊利益成为普遍的规范)以及作为

创造世界新秩序所绝对必需的国际贸易的开展。它经历了自身同共产主义的生死之战。正如罗纳德·里根所设计的,它的自我形象作为纷乱世界中自由、个人权利和民主的一座灯塔,作为人人向往的模范社会,作为“山巅上的辉煌城市”,正在与共产主义的“邪恶帝国”作战,与无知、迷信和无理性这些黑暗力量作战。世俗化的、更加开放的时空性必须施加于世界的不同规模之上(城市的、区域的和在国际的),在其中,资本投资可以更加顺利地流动,并同时伴随着信息、人员、商品和文化形式等诸如此类东西的运动。必须把国家和地方政府改造成自由运行的资本市场的推进器(如巴尔的摩市为资本积累而设立的执行委员会),这意味一种尝试(常常是无结果的):加强(以国际舞台上大量的军国主义和暴力为基础)一个特定的“政治民主”概念(政治党派之间每四五年一个周期的选举)作为普遍原则(就好像没有什么其他可能的路径来实现自由和民主)。世界空间通过经常性的暴力斗争而被迫打开,然后由美国政策的力量(包括那些卫星国、买办阶级和国际机构的政策力量)来加以改造。美国内部那些开始从事这项方案的多数人(左派的和右派的政治派系,包括许多非政府组织)都深信他们正专心从事着一项斗争:创造更加幸福、更加开放、更加自由的世界。他们以乌托邦的信念追求发展、资助、世俗援助和军事援助、教育等方面的政策,以此作为全球范围内有力的人道主义启蒙的手段。

虽然这有些讽刺的意味,但它捕捉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有关美国国际主义时空乌托邦理想的一些重要东西(这个观点随后在福山“历史的终结”这个论点中被赋予了黑格尔色彩)。它例证了时空乌托邦模式的可能性,并使那些可能包含在其中的东西产生意义。通过把它叫做时空乌托邦理想,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它是如何运行的,为什么会失败,又是如何失败的,以及它的内部矛盾如何会成为某种替代方案的潜在发源地。

193

当然,世界上的各种事件并非仅随这种幻象而舞,但是对这个方案的内在矛盾进行详细审查却是有益的。如果必须现在就要发现革命转变的种子,如果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开始彻底重组的任务,对此它至少还未部分准备好,那么那些内在矛盾就会导致一个替代方案。现在我来列举一些主要的矛盾:

1. 通过扩大资本积累来增加全世界的物质福利,这一长期计划没有能够履行它的诺言。它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需要和欲望,也不能为感情和知识的发展释放时间和空间。它承诺无限的消费主义(有时恰如公共福利方面的集体财产)是追求幸福的途径,但实现的最多也就是不平衡的福利,而在最坏情况下甚

至是骗人的福利。它为少数人制造实际的财富和权力,为其他人则制造幻灭、压抑、痛苦和堕落。因此,当一个“发展十年”进入另一个十年,当资本主义地理的不平衡特性在各种规模上(城市、区域和国际)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它的尊重平等和福利的乌托邦声称则愈益地与现实发生矛盾。

2. 嵌入在(经常输出的)自由民主政府机构中的对个人权利、自由和自由权(自由幻想)的期望产生了大量的自我本位计算(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表现的),产生了支配和剥削其他人的自由,那些人由于不平等报酬的政治学被排除在政治影响和权利之外,要不然就是完全被边缘化。它也不承认完成下列事情所必须的集体基础(文化的和政治的),这些事情就是:保护自由和自由权,建立要么是私人财富和公共贫困(用加尔布雷思的生动的表示法)的社会要么是以压制的宽容为基础的独裁主义的(在有些情况中完全是腐败的)政治结构。在美国,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喜欢自由地花钱和选举,但不可能确保城市的基本自由(比如,白天或晚上的任何时间都可以在街上漫步)。

194 3. 这种乌托邦方案的全面“成功”是以这样一种条件为基础的:准备行使权威,并准备必要时采取暴力和镇压手段作为达到更普遍启蒙的必要途径(在这里,它不能回避古典乌托邦形式的问题)。越南战争的创伤和随后揭露的世界范围内的秘密军事行动使这种方案的乌托邦理想黯然失色,并使它看起来越来越像美国少数精英分子所理解的美国天定命运论强权政治的一种运用,而不是像全球启蒙的一种群众运动。这种方案绝没有摆脱华盛顿指挥中心的特色:政治条件和自私自利的政策。虽然美国可以保留充当国际道德的审判者和评判者的权力,但它从不愿服从于像联合国和国际法庭这样的国际机构的审判,也不会签订任何会使它受制于这种国际审判的公约(如那些反种族屠杀的公约或那些关于“违反人性的罪行”的公约)。

4. 市场力量的空间自由主义削弱了静态的领土结构和力量(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包括设立在美国的那些结构和力量),而且就“传统”文化形式来说,它是无情变化的。其反作用就是向作为政治基础的领土和民族身份的回归,并产生反动的排他主义倾向,而那种排他主义潜在地威胁着自由市场议程。特别是在东欧共产主义崩溃之后,更多的人转向宗教和/或民族作为惟一的替代认同。对许多人来说(包括美国,以及伊朗、印度和危地马拉等国内的抵抗力量,这里只列举一些),在自由市场的世俗时空性与宗教和国家地位的神秘时空性之间现在似乎只有一个选择。



5. 市场的外部性(成本不能被价格机制所控制)产生了大范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难题。在这些难题之中最主要的是资源的滥用、居住地破坏以及需要迫切关注的一系列环境难题。“可持续性”这个概念虽然容易被接受,但在某种程度上却是为对付这些难题而设计的,它显示了不同于资本积累的时空视野。

当我们把这些矛盾集中在一起的时候,浮现出来的就是全球化过程的一个画面,它以严重混乱的形式集中于美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美国领导的时空乌托邦理想所取得的确凿无疑的成就存在着一种广泛的不满。替代性幻想需要去揭示,如何履行显著提高物质福利和民主形式的诺言而不依赖于自我本位的算计、野蛮的消费主义和资本积累,如何在市场力量和货币权力之外发展自我实现所必须的集体机制和文化形式,如何把社会秩序带入环境和生态更加良好的工作条件之中。

195

#### 4. 乌托邦理想现在如何?

过去20年左右对乌托邦理想的广泛拒绝应该被理解为**特定**乌托邦形式在东方和西方的失败。共产主义作为一个乌托邦计划受到了广泛的怀疑,现在新自由主义正越来越被看作是一个不能成功的乌托邦规划。只要美国的地缘政治策略还被当作是一种时空乌托邦理想形式,那它也就越来越没有说服力。所以,我们应不应该干脆让任何形式的乌托邦理想毫不痛惜地死去?或者,我们应不应该试一试再次地点燃乌托邦的激情,以此作为手段去激励社会生态的变化?

当马克思了解乌托邦理想时,他反对它。他猛烈抨击空间形式的乌托邦,并彻底破坏了亚当·斯密有关社会过程的乌托邦理想。但是马克思热切地相信阶级斗争的解放潜力,视其为通向更加幸福生活的**真正**特许途径。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在《共产党宣言》中主张,当对抗力量处于这样一种不发达的状态以至于“对未来社会的幻想描绘”开始代表对“社会总体重建”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时,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就产生了。由19世纪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创作的著作包含了强大而又重要的批判成分,在抨击“现存社会每一原则”的过程中,他们提供了“启发工人阶级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此外“被提议的实用措施”作为废除阶级差别斗争的里程碑,是很有帮助的。他们认为,经常

存在的危险就是：我们会相信某种乌托邦科学的“奇功异效”（1952,91）。

当替代景象——无论如何富有幻想——为塑造强大的政治变革力量提供资源时，人们不断改变世界的努力就有了一个时间和地点。我相信我们正好处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无论如何，乌托邦梦想不会完全消失。它们会作为我们欲望的隐蔽能指而无处不在。从我们思想的幽深处提取它们，并把它们变成政治变革力量，这可能会招致那些欲望最终被挫败的危险。但那无疑好过屈服于新自由主义的退步乌托邦理想（以及那些给予可能性如此一种不良压力的所有利益集团）、胜过生活在畏缩和消极的忧虑之中以及根本不敢表达和追求替代欲望。

196 对乌托邦理想的批判性审查揭示了类属中的一些重要变体和突出难题。比如说，空间形式的乌托邦和社会过程的乌托邦之间的严格对比就揭示了幻想的社会思想在处理空间和时间时的某些特殊的思维习惯。但即使空间形式的乌托邦理想，它也确实对空间性不利，因为它典型地把空间当作是社会行动的容器，并最典型地把乌托邦理想限制在城市的规模上（所以，社会行为与乌托邦思想之间最明显的连结是在城市规模上，这就不意外了）。在动态的空间生产条件下，并且就不平衡地理发展而言（比较第5章内容），空间形式的乌托邦看起来会如何，这仍待勘查。

那么如何建构一个更强大的乌托邦理想来综合社会过程和空间形式呢？有可能阐明一个更加辩证的乌托邦理想形式，甚至建立一个乌托邦的辩证法？

这种事情的发生需要一个有关于空间和时间操作的辩证法（在黑格尔传统内属于某种不可能之事），它还必须勇敢面对唯物主义的权威和封闭问题。任何种类的封闭（某种东西的形成）都包含它自己的权威，因为实现任何一种计划——不管如何以玩笑的态度来解释——都是要排除实现其他事情的可能性，在一些情况中是暂时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中则要相对持久些，我们不能回避这样的选择。这个辩证法是“非此/即彼”而不是“既/又”。物化的空间形式的乌托邦理想如此清楚面对的正是封闭问题，而这正是社会过程的乌托邦理想如此危险地要逃避的。相反地，当它进行社会—生态的选择时，我们发现分裂和分散不能起作用，而且“非此即彼”的痛苦斗争永恒地干扰了更加温和的、更加和谐的“既又”的辩证法。我们同样发现，时空乌托邦理想的模糊形式并非很难从我们自己对资本主义地缘政治所推动的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发掘出来。这样

看来,任务就是确定一个替代方案,而不在于描述某个静态的空间形式甚或某个完美的解放进程。这个任务就是重振时空乌托邦理想——一种辩证乌托邦理想——它来源于我们目前的可能性中,但同时它也揭示了人类不平衡地理发展的轨迹。这就是我现在要致力于去做的工作。



## 第四部分

# 有关多元替代方案的谈话



## 建筑师、蜜蜂和“类存在物”

18 世纪早期某个时候,伯纳德·勒波威尔·冯特奈尔写出《关于世界多元性的对话》,创造了一种新颖的方式,试图以此来说服那些对牛顿世界观的可能真理持怀疑态度的读者。傍晚时分,与一位端庄而聪明的夫人在花园散步交谈,在这样的背景中,远离了日常生活的喧嚣,似乎有可能思考其他选择的可能性并由此获得对世界的不同看法。

在当代情境中,很难想到什么方法来进行此类对话。但如果我们要揭示自己目前所居住的社会世界的可能替代方案,这是必须要做的。由于缺乏任何明显的社会变革蓝图(一种无论怎样都会当作幻想的胡话而不被理会的蓝图),缺乏(也许会令人感到遗憾)任何主要的社会运动或有力的阶级联盟来推进直接的社会变革论题和计划,所以我能提供的最好东西就是一系列的有力论据,有关替代方案和可能性的对话可能会围绕它们接合起来。

如果第 3 部分的论点是正确的话,这就意味着与所谓“辩证乌托邦理想”的东西达成协议。这里的辩证法代表着某种不同于通常追随黑格尔甚或马克思来理解的东西。例如,它假定一个辩证法能够公开而直接地阐明时空动态,还能够描述把我们如此紧密地束缚在当代社会—生态生活这个精致罗网中的多重交叉的物质过程。因而,要是在思想世界中出现,它就会产生一种意愿去超越或推翻那个由不受控制的资本积累、阶级特权和政治经济权力的总体不平等所强加的社会—生态形式。这样,有关可能的替代性世界的思想实验空间就可能建立了。虽然总是存在着一种危险,即它可能退化为不可实现之梦想的产物,但是正确理解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将有助于把那些梦想转变为真正重要的前景。

## 1. 论建筑师和蜜蜂

我首先从建筑师的**形象**开始。我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形象**（是**形象**而不是我所谈及的专业人员）在构建和组织空间过程的全部讨论中都具有某种中心性和位置性。在整个历史中，建筑师对乌托邦理想的生产和追求陷得最深（特别是——虽然不只是一——空间形式的那些理想）。建筑师塑造空间，除了赋予它们社会效用，还给予它们人的意义和审美/象征意义。建筑师塑造和保存着长期的社会记忆，并努力给予个体和集体的渴望和欲望以具体形式。建筑师努力为新的可能性、未来的社会生活形式打开空间。正如卡拉塔尼（Karatani, 1995, XXXV）所指出的，出于所有这些理由，被当成“创造愿望”的“建筑愿望”是“西方思想的基础”。柏拉图坚持那个观点，莱布尼兹甚至会说：“作为建筑师的上帝完全满足了作为立法者的上帝。”

但是我坚持建筑师**形象**的其他理由则是因为存在着一种意义，在其中，我们能够完全平等地把自己看作是各种类型的建筑师。当我们从事日常实践并以此有效地保存、构造和重建我们的生活世界时，把自己解释成“我们自己命运和运气的建筑师”就是采用了建筑师形象来比喻自己的作用。这再次直接地与马克思建立了联系。因为对社会生态变化的动态学和辩证法基本原则的陈述，很难发现有比《资本论》第1卷（1967, 177—8）做得更好的：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过程……所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就在于，房子实际地建成之前，他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有它的结构了。每一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他不仅使他所从事的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



自己的目的……

这种与帕克的城市化概念(参见第8章)的相似性是不可思议的。对于当前争论来说更加重要的是,马克思的类比可以轻易地被推翻:虽然建筑师的活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般劳动过程,但参与任何劳动过程的每一个人不管怎么说都更像建筑师而不是像蜜蜂。

尽管如此,马克思以蜜蜂作例有双重考虑。它不仅直接地与它们建筑实践的复杂性相联系(对自然主义者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毫无疑问也参照了曼德维尔1714年那篇著名的小册子《蜜蜂的寓言》(副标题是“私人罪恶和公共美德”)。在其中,曼德维尔不仅评价了公共繁荣和美德如何必然地依赖个人的空虚、嫉妒、罪恶和浪费(亚当·斯密的市场乌托邦理想后来打算要纠正的一个问题),而且抱着虽然“诚实”但却更加令人厌恶的立场(Marx,1976,764—5):只有工人保持贫穷、无知并被剥夺任何可能会增加欲望的知识,社会在总体上才会繁荣。马克思的人类劳动概念一般来说明显地故意与资本主义条件下“工蜂”那卑微和低级的地位观念有反差。后者显然很少有或根本没有机会来唤醒隐藏在我们体内的“沉睡的潜力”来改变世界并改变自己。

现在我们对蜜蜂知道得就更多了。比如说,它们是真正的交流动物,它们在蜂房里跳的舞蹈准确地报告着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食物。交流系统的错综复杂(融合了准确性和精确性)证明了蜜蜂真正令人惊奇的能力,它们能以一种抽象的、符号的方式来编码和交流信息,这让许多通讯系统或地理信息系统(GIS)专家自惭形秽,更不用说任何建筑师了(冯·弗里希,1965,用了40年的时间来绘制这种舞蹈)。这种舞蹈样式的密码差不多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被一个数学家所破解的,这个数学家碰巧是一个蜜蜂研究人员的女儿。当她把一个六维旗流形特征物——这是一种罕见的、难懂的数学——投射到一个二维空间上时,她认出了这个图案(Frank,1997)。蜜蜂的全部舞蹈包括无数的部分和变体,这属于任何建筑师都不了解的数学图式。运用这一数学的惟一另外的知名物理过程就是量子论的夸克。这就提出了那个不确定的可能性:“不管怎样,蜜蜂对夸克的量子世界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具有敏感性,量子力学对它们理解世界来说就像视力、声音和嗅觉一样重要”(86)。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不仅蜜蜂“了解”(用其小小的脑袋)一种只有少数人掌握的数学,而且它们也许还能做人们似乎做不到的事情——在量子领域内操作而又不干扰它们。所以,即使我

201

202

们已经进入了以难以说清的能力进行计算的量子年代,我们仍然做不到蜜蜂似乎能够做的事。

我们对蜜蜂了解得越多,与最好的人类劳动(更不用说最差的建筑师)所进行的比较就越多,而比较的结果越来越难以对我们所谓的高傲能力感到骄傲。这严重地削弱了这样一种观念:不管怎样,人类所有方面或最主要方面都处于生物的“顶端”。但它同样也增强了对下列这个问题的兴趣:我们“专有的”物种能力和“沉睡着的潜力”可能会怎样。

## 2. 人类的能力和力量

许多的物种,如蜜蜂,拥有“完全处于人类知识宝库之外的一些基本感觉”。威尔逊(Wilson,1998,47—8)从这点出发阐明了“一条对理解人类状况相当重要的生物演化的非正式规则:如果可以设想一个有机传感器从环境中获得任何信号,那么在某个地方就存在着一个拥有这种传感器的物种。”所以说,我们人类所拥有的独立感觉“与这种差异性中所表现出来的大量的生命力量相比似乎有着显著的缺陷”,这就不足为奇了。威尔逊简要地回答了为什么会这样:

生物学能力会一直发展,直到它最大限度地适应了有机体所生存的小生境,这不是一个曲折的发展路线。每个物种,每一类的蝴蝶、蝙蝠、鱼和灵长目动物,包括智人,都占据了一个独特的小生境。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每个物种都生活在它自己的感官世界之中。

因此,当我们如第6章那样诉诸“作为万物尺度的身体”这个观念时,我们马上就受到了我们自己感官世界的局限。但是人类已经获得了“听、看和读”这些远远超出此类局限的手段,我们作为“电子人和科学家”的能力不能够被忽视。这就对马克思和威尔逊两人那种探寻知识统一性道路提出了一个基本难题(这两人不大可能联合起来)。威尔逊对此是这样描述的:

自然选择(不能)预见未来的需要……如果这个原则是普遍真理的话,那么自然选择如何在文明存在之前就从思想上为文明做好准备

呢？那是人类进化的大秘密：如何说明微积分学和莫扎特。（48）

这是马克思那里存在的一个常见的问题。从《共产党宣言》开始，在无数文章中，他似乎在反驳《资本论》中所阐明的劳动过程概念，并坚持认为我们的观念、概念、见解（一句话，我们的“意识”）随着存在的物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且生产方式的物质形式产生了以特定方式限制我们思想和潜力的制度、法律和政治结构。最著名的也许就是，马克思主张“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Marx and Engels, 1972, 4）。那么，在《资本论》中受到高度重视的人类想象力如何能够自由地延伸到现有物质和制度条件（例如，由资本主义所规定）之外从而甚至使社会主义替代方案可能是什么样子概念化？完全同样地，威尔逊在解释近代史上文化和科学形式的爆炸方面也存在着问题，所以，在为创造社会主义（或任何其他的事情）替代方案提供我们的想象时（更不用说我们的政治实践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遇到了问题。

虽然这也许解释了我们怎么会成为“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制度和想象世界的傀儡”（重复昂格爾的尖锐措辞），但它同样也提出了一个困难的悖论。当权的革命运动（及任何种类的物化乌托邦理想）的历史地理经验显示了这样一个问题的严肃性：还没有做好充足准备去进行激进变革。许多革命运动没有或不能从深嵌于它们过去的物质环境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这个困境在政治实践中是中肯的、真实的，就如在理论上是显著的一样。昂格爾的思想永远会回到这个中心问题，这是任何一种辩证乌托邦理想基本形式都必须面对的基本困境。

然而，马克思（Marx, 1970, 20—1）还是稍微缓和了这个理论悖论：

在其发展的某一阶段，物质的生产力量与现有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冲突……这些关系从生产力量的发展形式变成了它们的束缚。接着就开始了一个社会革命的新纪元。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整个巨大的上层建筑就或多或少地被迅速地转变。鉴于这样的转变，对经济生产条件的物质转变和法律、政治、宗教、美学或哲学（一句话，意识形态）的形式必须总是要做个区别，前者由自然科学的准确性而决定，在后者中，人们开始知道这种冲突并与之作斗争。

正是这些矛盾的存在(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为创造性调整和开放性决策提供可能性,后者(意识形态形式)在这里似乎没有如最初设想的那样严格地由物质条件所决定(部分原因在于它们与生俱来的模糊性)。

然而,在理解自己和自己的思维方式时,我们似乎经常动摇于无限选择的不真实幻想(昂格尔的“几乎无关紧要的备选方案”)和照常由我们的物质和智力条件所规定的无替代方案的冷酷现实之间。

这就是为什么建筑师形象如此具有启发性。我们可以作更进一步的思考。设计办公大楼、住宅、工厂、休闲公园、城市或诸如此类的东西都需要大量的想象。建筑师必然要想象空间、秩序安排、材料、美学效果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同时还要应付更加世俗的问题,如管道装置、供热设备、电缆、照明等等事情。此时,建筑师并非一个完全自由的行动者。不仅可用材料的数量和质量及建筑场所的种类束缚了选择,而且教育传统、学术实践都引导着他们的想法。规则、成本、利润率、客户的偏好,所有这些都必须加以考虑,在这点上,开发商、金融家、会计师、施工人员和政府机构看起来对事情的最后结果往往比建筑师更有发言权。“从事建筑”的过程伴随着所有这些复杂的因素。“从事建筑”就是一个嵌入的、时空的实践。但无论如何,总会存在这样一个时刻,必须开始自由地运用想象力——创造的愿望。

因而,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在马克思的对立陈述内部运转着的内在联系了。资本家的全部投机,包括对建筑师的投机,都是深思熟虑的。这就是把货币作为资本投入循环并指望实现利润这一类行动的意味。资本家的全部投机在市场上实现之前必须已经存在于想象中(由此就有了经济行为中人类期望值的公认力量)。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制度,它那不可思议的力量在于有能力动员企业家、金融家、开发商、艺术家、建筑师,甚至是政府计划制定者和官僚主义者(及一大堆的其他人,当然包括普通劳动者)的多重想象来从事物质活动,从而使这个制度能够在扩大的规模上自我再生产。由这种制度所强加的规律——尽管不过如此——经历了盈利能力的严峻考验。只有在那时,想象才以各种得到客观增强的方式实现自身。但就像谚语中剥猫皮一样,赢得利润的方式有很多。所以,虽然单一的利润目标可以指导资本主义的行为,但通往那个目标的道路并不是惟一的,确实,资本主义想象的全部历史已发现了各种各样富于创新且常常离奇的方式来实现那个单一目标。自由地驾驭想象是资本主义得以永存的基础,而且替代的社会主义想象正是在这个空间内能够生长(虽然现在

不是以一种从资本主义及其主流思维和行动方式中抽离出来的样态来生长)。

因此,我们所认识到的就是这个资本主义文化、经济、政治和意识的世界如何运转的简单物质事实,它充满了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想象计划(政治的、经济的、制度的),其中许多得到了实现。一些计划失败了,另一些取得了疯狂的成功,还有一些获得暂时成功然后又失败了。正是冷酷的市场逻辑(通常由大量的政治偏袒和串通勾结所促进)决定了结果的成败。但正是与未来可能性的斗争开始了整个的事件。左拉在他有关金钱力量通过投机而改变世界的陈述中非常漂亮地捕捉到了这个观念。左拉小说《金钱》中非正统派主角萨卡尔德说:

你将会看到对火车将要穿越的所有那些人口减少的平原、那些荒凉的隘口所进行的彻底的恢复——是的!田地将要被清除、道路和沟渠将要被建造、新的城市将会拔地而起,当我们给疲惫的血管注射新鲜的血液从而激励这个体系时,生命恢复了,虽然是回复到一个病体。是的,金钱实现了这些奇迹……你必须懂得,投机、赌博是巨大事件的主要机制,是中心本身。是的,它吸引血液,从小溪流的每个源头处获得它、聚集它,把它送回到四面八方的江河中,并确立一个巨大的货币流通制度,它是大企业的真正生命……投机——噢,它正是我们必须经历的诱惑;正是永恒的欲望迫使我们去生活、去奋斗。我亲爱的朋友,如果没有投机,那将不会有任何商业……爱情也是如此。就如在投机中一样,在爱情中存在着许多的肮脏;在爱情中,人们同样地只关心他们自己的满足;但是没有了爱情,也就没有了生命,世界也就到头了。

(Zola, 1891, 140)

萨卡尔德的洞察力,他对生活的热爱,吸引着他身边的所有人。就连他小心谨慎、端庄娴静的伴侣——卡罗琳夫人——也被黎凡特地区目前的土地状态未能跟得上人类的欲望和潜能这个问题所吸引:

一想起科学和投机将用这根全能的魔术棒来改造这块沉睡的土地并突然再次把它唤醒,她的心中就充满了激情,对生活的热爱、曾经

轻快的希望……她看见再次升起的正是这个——前进的、不可抵挡的步伐,实现最大可能幸福的社会冲动、行动的要求、继续前进的要求,无需确切知道要去哪里……而且在这之中,世界被完全搞颠倒了,成群蚂蚁重建其巢穴,它们永不停息地工作,新鲜的快乐源泉不断地被发现,人类的权力成十倍地增长,地球日胜一日地属于他。金钱通过援助科学从而产生进步。(75)

虽然这个结果暗示着没有什么替代方案,但出发点却认为,当我们试图以自己可以自由掌握的所有激情和想象去探测未来可能性时,至少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替代方案。想象的辩证法和它的具体实现(在多数情况下由生产中中介着)在于两个方面:资本主义如何复制并改变自身,以及它如何可以成为这样一个革命性的生产方式。如凯恩斯清楚地认识到的,资本主义只是一个巨大的投机体系,是由(受尊敬的)“期望值”和(声名狼藉的)“投机行为”的某种混合物提供动力。如果这种假想的、想象的因素处处围绕着我们,那么“不断增长着的”想象的替代方案,其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马克思反对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不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观念可以成为历史变化的一种物质力量,而是因为他们获得和宣扬这些观念的方式。这些观念是从某种纯粹的想象气氛中捡来的,它们注定要失败。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中提取,或者,如左拉所述,从“丰富肥沃”的众多矛盾体中提取,这些观念可以为具有变革能力的政治学提供基础。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马克思(Marx and Engels, 1972, 558)在《法兰西内战》中写道:“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对于揭示真正可能性和替代方案的辩证的和知识的探询来说,这就是任务所在。这就是辩证乌托邦理想必须由以开始的起点。

### 3. “我们的类存在”概念

谈到我们能够通过劳动改变世界并因而改变自身,再谈到在这一规划中我们如何施展自己受到约束的想象力,那就是要预先假定某种方式来理解作为一个物种[类]我们相对于所居住世界的特定能力和力量(包括马克思谈及的“沉

睡着的潜力”)。因此,我们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和新陈代谢关系以及通过这种关系回归的独特人性(有其特殊的品性和意义)必须存在于这样的基础:作为自己未来和命运的建筑师,我们能够实现什么目标,又希望实现什么目标。

每当援引生物学原理时,比如“类存在物”这类概念,一些严肃的问题就会产生于社会理论中,也产生于对替代方案的探求中(熟悉的例子包括纳粹主义和生机论的国家理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论点的运用,尤其是它被应用到种族问题上的优生学运动的黑暗历史,以及20世纪70年代有关社会生物学的辩论中所产生的深刻的社会对抗状态)。大部分的这类著述确实是反动的、保守的、宿命论的,在其中伴随着强大的生物决定论思潮(在当前通常是基因方面的)。社会科学和近期大多数左派对此的普遍反应是退出对人类行为的生物/物理基础的任何考查。比如说,在马克思主义内,倾向于把人性视为与生产方式有关(或者与一般物质生活有关),并且否认我们类存在物的任何普遍特性。

207

如杰拉斯所巧妙主张的,这并不是一个让人满意的反应(它与马克思的表述也全然不协调)。除非我们正视人性和类存在物这个概念(不管有多危险),并对它们有一些理解,否则我们就不会知道自己可能被疏远的是什么或者指的是什么解放。我们也不能决定我们“沉睡着的潜力”中的哪一部分必须要被唤醒以实现解放的目标。无论如何,人性的有效定义是暂时的、不稳定的,但却是追求与幻觉相反的真实替代方案的一个必要步骤。讨论我们“类存在”,这是非常需要的。

我主张一种大致如下的基本观念。在地球上,我们只是一个物种,像其他任何物种一样被赋予了特殊的能力和力量,按照有利于我们自己生计和繁殖的方式来改变环境。在这点上,我们与所有其他物种(如白蚁、蜜蜂和海狸)没有什么区别:在进一步适应自己参与建造的环境时也改变了环境。

这种观念定义了“自然强加给我们的生存条件”。我们是有感觉的存在物,与周围的世界是新陈代谢的关系。我们改变世界,并且这样做的时候也在通过行为和劳动改变着自己。像所有其他物种一样,我们也具有一些物种所特有的能力和力量,有证据表明,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能力改变和适应我们的社会组织形式(比如说,创造劳动分工、阶级结构和制度),有能力通过语言建立一个长期的历史记忆,有能力积累知识和理解力,让它们全部为我们所用,成为我们未来行动的指南,有能力反思我们过去所为并允许我们借鉴经验行事(不但是我们自己的经验,而且也包括其他人的经验),而且有能力通过我们独

**208** 特的聪明才智建造各种各样的辅助工具(比如,工具、技术、组织形式及通信系统)以增强我们看、听、感觉的能力,远远超越于自己身体构造所造成的生理局限。这就使得我们适应和改变类存在物和物种环境的速度和规模与文化、科技、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的步调与方向高度一致。当然,正是这一点支配了我们大多数的(虽然不是全部的)的所思所想,并屈从于主导生产方式的内在动力。从相对的角度把人的本质视为构造过程中的东西,这种论点不是没有影响和根据的,但它也显示了“类存在”与“物种潜力”之间的联系。

我们永远不可能摆脱作为感官和自然生命、作为生物和历史地理演化过程的产物而存在的普遍特征,从遗传天赋和快速累积的文化成果这两方面来看,这一过程都在我们身上留下了痕迹。社会生物学家坚持基因遗传的重要意义,这是很正确的。不存在一种可以无视现代遗传学和微生物学揭示的人类限制、能力和力量的人性概念。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在当代有关心/脑问题的研究方面的崩溃也正导致对人类行为中思想与行动之间关系进行彻底的重构。

社会生物学没有为文化和社会演进,特别是近期的演进,提供适当的解释。虽然赞成生物学特征和文化形式之间长期以来的某种共同进化似乎是正确的,但文化/技术/语言理解和实践的爆炸,特别是最近 300 年以来的情况,没有为生物学适应提供时机。而且,仅就物理/生物过程来说,它不具有适当的因果性或还原性解释。后者可能形成社会生态学变化的必要基础,但它们不能为文明的兴起(更不用说为微积分学和莫扎特)提供充分的说明。实际上,我们所必须要面对的情形是这样的:以完全新奇的文化方式来运用遗传天赋。但提供原材料——我们藉此形成自己的历史地理——的这些天赋是什么呢?

**209** 在根本上,我们是好奇的、有变革能力的生命,具有生动的想象力和各种可能的技能,我们已学会在不同的时空中以不同的方式把这些技能整合起来。我们彼此之间是政治的、符号的动物,而且政治就是建立在自身迅速进化的交流能力之上的。此外,我们更可爱的习惯之一就是有能力成为老于世故的规则制定者和不由自主的规则破坏者。确实,可以设想这样的情况(这里我参照了昂格尔作品的一般要点):可以用一个条件来完美地定义解放,在这个条件中,我们既可以是规则制定者,也可以是规则破坏者,还合理地不受惩罚(昂格尔由此认为他称之为“豁免权”的东西是任何追求解放发展形式的社会所具有的基本特色)。但是规则制定必须要承认大量的约束和可能性,它们产生于我们与众不同的和已实现的代谢条件之中。



源自进化经验的基本技能为人类行动提供了战略选择。这些技能包括：

1. 生存竞争和斗争(经由自然选择,或者在人类历史中经由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选择,产生**等级制和同质性**)
2. 适应生态环境(经由经济、政治或文化方面的增殖和创新而产生**差异性**)
3. 协作、合作和互助(依赖交流和转化的能力,形成**社会组织**、制度安排和一致同意的政治—话语形式)
4. 改造环境(将“自然”改造成与人类的需要广泛一致的**人性化的自然**——虽然常常会有一些无意识的后果)
5. 安排空间秩序(与**空间的生产**相伴的出于特殊目的的流动和迁移,诸如逃跑、防卫、组织合并、交通和通讯以及对个人、集体和物种生命的物质支持系统在空间上接合起来的组织)
6. 安排时间秩序(设置有助于生存的生物、社会和文化的“时钟”,再配上为生物和社会目的而使用的各种不同的时间秩序安排——在人类社会中,时间秩序安排多种多样,从几乎即时传递的计算机化秩序到通过文化而发展成为精神规则、传统和法律的长期约定等)。

这六个因素构成了由进化经验传递给我们的能力和力量的一个基本技能。当面对困难时,我们有选择机会。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忍受和斗争,可以通过把它们改变成一些非竞争性的、合作的事情而缓减困难,可以改变产生困难的环境状况,可以避开它,或者把我们自己置于不同的时间地平上(比如说,推迟并延**210**期进入未来)。

虽然所有的有机体都可能拥有某种甚至全部的技能,但有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人类已经以特定的方式(例如文化上被传递传统的长期时间关系)突出了每一种要素并以丰富且灵活的结合方式把这些不同的要素合并成复杂的社会系统。每一生产方式都可以被看作是这种基本技能中的多种要素的特殊组合。

但是,把这些范畴诠释为相互有关系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参见 Harvey, 1996,更加全面的陈述),这是至关重要的。例如,我认为社会生物学家的下列看法是正确的,即他们坚持认为合作(他们更喜欢“互惠的利他主义”这个词)在某种意义上是竞争的一种适应形式(互相帮助以便更好生存的有机体)。当他们使竞争要素成为其他任何事情的基础时(一种便利的方式,使资本主义竞争看起来像**真正**根本的自然法),问题就产生了。从相关观点来看,竞争可以轻

易地被视为一种合作形式。领土的产生便是一个有趣的相关例子。通过竞争性地确定领土,有机体合作性地组织了资源分割,从而避免了毁灭性和破坏性的竞争。经过精心组织,领土既体现了人类事务中的合作,同样又体现了竞争和排斥。

社会构型的特征完全由下列情况决定:全部技能的各种要素如何根据阶级力量的迫切需要而得到详细说明并联合起来。例如,人们常常认为资本主义就是竞争性的。适者生存(按照利益率来衡量)是达尔文机制,它从混乱的投机和竞争的经济行为中创造秩序。但资本主义同时也具有高度的适应性,经常探寻出创新策略、新型市场环境和新的生产线,正好避免既有领域内的竞争。此外,如果没有大量的合作、协作和互助,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够生存。这里我谈及的不仅仅是假想竞争者经常频繁串通的方式(秘密地或公开地),不仅仅是社会组织的广泛领域(诸如空中交通管制),这些领域依靠的是所有竞争本能对有组织的社会控制的严格服从,而且还涉及广泛的调节机制,这些调节机制主要被嵌入国家权力和法律中以确保市场能够担当起双方同意并协作完成的竞争框架。通过协作努力(比方说,在动植物的培育和现在的基因工程领域内,在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的建造等等行为方面),自然的改造或“生产”迅速地创造着进化的环境(既是社会的又是物质的),在其中产生不同形式的竞争、适应或协作行为。比如说,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就塑造了全新的市场小环境。并且,正如我早已强调的,资本主义已经找到了非凡的方式来生产新的空间构型、来权衡和调整周期期限,并由此建造全然不同的时空性来设计它自己的活动。

因此,不仅竞争决定着资本主义,而且深植于所有其他进化过程中的特殊竞争模式决定着资本主义。制度、规则和法令努力确保只有一种竞争——在尊重财产权和自由订约的相对自由的功能市场之内——将会获胜。社会生物学所提供的标准因果排序可以轻易地被颠倒;只有通过社会的协作和合作结构(尽管是强迫的),生存竞争和斗争才能够协调起来发生效力(值得注意的是,资本家经常抱怨“毁灭性竞争”,并呼吁政府直接干预并加以整治)。如果没有既存的广泛协作和合作网络,那我们大多数将会死亡。竞争总是受到合作、适应和环境变化的调节和制约,并且通过空间和时间的生产来达到。

这就说明了我们应该如何来解释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例如,传统思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式依赖于总体转变,比方说,从竞争向合作、协作和互助

的转变,这就太过于简单化和局限性了。如果资本主义不以某种方式配置所有的技能就不能生存,那么社会主义的任务就必须是从基本技能的内部找到所有要素的不同结合。这不能假定只有要素之一是要紧的而其他要素可以被压抑来完成。比如说,竞争就永远不能被消除,但可以有差别地去组织它并设想出不同的目的和目标。竞争和合作之间的平衡可以发生变化。“过度竞争”的阶段与强大的政府调节阶段交替发生,这经常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最近的全球化运动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全部技能中一个关键要素的转移——空间的生产——可以发生在维持这个系统的斗争中。

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充满了对这种或那种社会组织可行性的辩论。最近的争论集中于“市场社会主义”是否比民主控制的中央计划更可行或更令人向往。由奥尔曼(Olman,1998)所集合起来的生动辩论就围绕着这些问题,但奇怪的 212 是,没有一个参与者想要把他的论点置于物种能力和力量的背景之中。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那他们也许已经看见了多种不同的可能性。

任何生产方式都是不同要素的矛盾和动态的统一,这些不同要素包含在我所略述过的基本技能中。在它内部存在着大量的矛盾、紧张和冲突,而且这些为构筑替代方案提供了一套嵌入的可能性。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转变带来了全部技能中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全部要素的变化。“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马克思在1868年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并且还补充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则藉以实现的形式”。或者,比较有说服力的话就是,“没有社会秩序能够完成内部尚未准备好的变化”。

所有的物种(包括人类)可以通过他们的行为影响随后的进化。所有的物种(包括人类)做出积极的选择,并通过他们的行为来改变后代们所必须要应付的物质和社会状况。他们也改变自己的行为以回应变化了的环境,并通过行动使自己处于新的环境之下,这种新环境为进化的改变展开了不同的可能性。有机体“不只是自然法则的**客体**,改变自己以屈服于不可避免的事,而且还是活跃的**主体**,根据其法则来改变自然”(Lewontin,1982,162)。在这里,“物种潜力”的概念恢复了显赫地位,因为由于我们所获得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力量,我们现在与以前相比就更是进化的建筑师了。我们不是,也从不可能是总建筑师(master architect):如此地接近上帝,以致成为最终的立法者(正如莱布尼兹明显地认为的)。但我们已努力工作,并使自己达到了这样的位置,在这个位置

中,所有进化的未来,包括我们自己,都是有意识的政治和社会选择的作用,也是我们必须对之反应的随机事件。所以,作为精明的建筑师,我们想象和计划的是什么样的进化呢? 答案取决于我们如何重组全部技能的要素。

## 对自然和人类的责任

我们现在只考虑进化能力全部技能中的一个要素：我们现在能够创造的“自然”的种类。作为进化游戏中的活跃主体，我们已经积聚了巨大力量来改变这个世界。我们运用那些力量的方式对于确定自己作为一个物种将要成为何种东西具有根本作用。现在，这是一个开放的、批判的讨论和辩论焦点，既包括资本家及其同盟者（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困惑于长期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又包括那些寻找替代方案的人。我们拥有一个独特的“类存在”吗？它对于我们未来与外在自然的关系会带来什么呢？

当然，“类存在”这个概念是以类为中心的。它产生了不可动摇的人类中心的立场。我们永远不能避免（比蜜蜂和海狸的情况好一些）主张自己的物种身份、表达我们是谁以及会成为什么，并凭借我们的物种能力和力量作用于所居住的世界。解释这个事件的任何其他办法就是在我们是谁及我们是做什么的这类问题上自欺欺人（使我们自己异化）。

然而，我们人类建筑师之所以不同于蜜蜂，部分原因在于，我们不得不（被我们自己的成就所迫）通过想象和话语辩论来设计个人和集体的责任：不仅仅是对我们自己和彼此的责任，而且是对构成我们通常所称的“外部”自然（即，对我们来说是“外部的”）的所有那些“他者”的责任。我们已经达到了一种进化的状况，在其中，不仅仅对我们自己的进化道路，而且也对其他物种的进化道路可以而且需要做出有意识的选择。威尔逊说（Wilson, 1998, 270），即使是基因的进化“也将是有意识的、凭借意志的，并成为生命历史中新纪元的开创者”，不幸的是（根据他的计划），我们对此并没有在遗传上做好准备。我们长期以来就是强大的进化行动者，贯穿于每一件事情，从动植物的培育、大规模的栖息地改进和人口的迅速增长，到物种在全球规模上的扩散和混杂。但是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我们迅速聚集了过于巨大的力量。

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不管怎样都会“不受”代谢或进化约束,或者会对自然力量刀枪不入。但我们能够自觉地以根本不同的联合方式来配置那些已经进化的可能性的全部技能,威尔逊说(Wilson, 1998, 277),如果完全凭借意志的进化时期将要开始,那么,“不久我们就必须深入自己的内心,决定我们希望成为什么”,这句话的传统人文主义意味远远多于生物学还原论的意味。那个问题是对我们类存在物和类命运的深刻思索,就像任何建筑师过去曾经面临的那些事情一样。

## 1. 自然的话语

解决对于他人的责任和道德约定问题,需要创建话语体制、知识系统和思维方式,这些东西集中起来规定了不同种类的想象和行为方式,比如说不同于左拉所描绘的决心统治自然并按自己面貌构筑世界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典型。但我们在什么基础上努力构筑某个替代方案呢?从来都不缺少对这种或那种解决方法的热情鼓吹——关于人类在地球上可能的未来,环境运动和生态运动中都充满了各种竞争的和相互抵触的主张。

让我们看一看差异的中心问题。环境中心论或生物中心论与赤裸裸的人类中心说针锋相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社群主义)相冲突,各种体现文化和历史地理因素的观点(特别是本土人的观点)与普遍的主张和原则(通常由科学家所提出)不自在地并列在一起,唯物主义和经济主义普遍担心生活机会的获得(无论它是物种的、个人的、社会团体的,还是栖息地的),这常常与美学、精神和宗教的看法相对立,普罗米修斯式的傲慢统治态度与面对强大且奇异的自然力量时的谦卑形成对比。无数的问题起因(启蒙理性、种性主义、现代性和现代化、科学的/技术的合理性、唯物主义[狭义和广义两种意义上]、科技变化[进步]、跨国公司[特别是石油]、世界银行、父权制、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私有制、消费主义[通常所谓盲目的那种]、国家权力、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拙劣干预的官僚者、军工联合体、人类的无知、冷漠、自大、缺乏远见和愚蠢,等等)都竞相(独自地或以某种特殊的联合)成为生态健全的最大敌人。长期存在的有关目标和手段(独裁主义的、民主主义的、管理的、个人的)之间的争论在环境政治学中产生了大量的反响。

我知道这些是对环境/生态运动中某些双重立场的讽刺。然而,这种双重立场确实是一种相互反对的意见,特别是结合在一起时,它们造成了无数的混乱。但也存在着另外的复杂情况。例如,没有人确切知道一个“生态系统”或一个“社区”(通常的分析单位)在何处开始,又在何处结束。把那些在一个地理规模上(地方、生物区域、民族)提出并取得一致意见的主张聚集起来并非必然地对其他规模(例如,全球)具有意义。此外,对一代人有意义的东西并不必然地对另一代人有益。世界上的每一项政治运动——从纳粹主义者到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者,从女权主义者到社会生态学家,从资本主义者到社会主义者,从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到无神论科学家——不可避免地会认为它在环境问题上具有独特且正确的路线,因为被当成“自然的”就是披上了必然和正直的外衣。

把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我们就获得了各种政治论点、概念和困难的奇特混合,它可以便利地成为无尽的学术、知识、理论和哲学辩论的基础。这里有足够的利益无休止地吸引着学术会议的代表。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使整个话题在知识上如此有趣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境之中谈及共识(或者甚至把它拟定为一个目标)明摆着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任何一种有关替代方案的对话将要发生的话,那某种共同的语言,或者至少是不同语言间(科学的、管理的和法律的、大众的、批评的,等等)恰当的翻译方式就必不可少。所以,即使是在所有这些冲突和差异之中,也必须构筑某种共同的基础。没有它,独裁主义、话语暴力和霸权实践就会成为各种决定的基础,当然,这不太可能为其他选择的可能性创造空间。

## 2. 生存的比喻

不管怎样,存在着一些占统治地位的简化比喻,它们可以帮助人们深思熟虑。然而,不可避免地,这些比喻有自己的缺陷。例如,在相反的环境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环境危机、紧迫的生态毁灭或者甚至“自然的终结”这些观念所扮演的绝对强有力的角色。对某些左派人士来说,这种修辞是很吸引人的,因为它能产生这样的便利效果:取代对资本主义最终危机和崩溃的长期信仰——从阶级斗争领域到环境领域。这个论点认为,如果我们熟悉的世界不准备以环境灾难为结果,那就**必须**立即找到一个替代方案。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不久

的将来一定要从它之中造就出另外一个焕然一新的社会形式。

此类预示灾变的论点并不局限于极端的环境保护主义者,许多科学家也发出了类似的惊呼。在由两千多名世界最有声望的科学家签名的宣言中,我们看到:

人类和自然世界处在冲突过程之中。人类的行为对环境和重要资源造成了残酷并常常是不可逆转的破坏。如果不加以制止,那我们当前的许多行为会使人类和动植物界的未来处于危险之中,并可能改变生命世界以致它不可能以我们所了解的方式来维持生命。如果我们想避免当前进程将要带来的冲突,那根本的变化就迫在眉睫了。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1996)

“人类与自然世界处于冲突过程之中”,这种论调在许多方面看来都是奇怪的。它使得人类似乎不知怎地就处于自然世界的外围,把人类比喻成与自然世界其余部分发生冲撞的某个小行星,从而避开了人类藉此共生地改造世界并改造他们自己的那个长期进化变革史。这种陈述充斥着“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概念”,马克思曾经对此抱怨过,“每当(自然科学家)的冒险行为超出他们自己专业的范围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1976, 494)。

对危机和迫近的灾难所持的这样一种杞人忧天的论调是危险的。首先,它假设我们非常确信且非常准确地知道某一“人类和自然世界”冲突的触发点。但多数科学家,甚至是那些吹响战争号角的科学家们,对于这些确实严肃的问题存在于何处以及它们究竟如何紧迫也常常是墙头草,两边倒。威尔逊(Wilson, 1998, 285—7)认为,“人类明显撞向的那堵墙不是矿物和能量的匮乏,而是食物和水的匮乏”。他暗示,地球支撑“贪婪的人类生物量”的能量正变得越来越弱小。但其他人则指出了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栖息地的丧失和生物多样性(这也是威尔逊所珍爱的一个主题)、大批生物系统的退化(从热带雨林到海洋)以及在准备不足的生物系统中吸收大批异常的新型化学化合物(很多具有高度的毒性)等问题。尽管科学界对于这些问题可能具有的严肃性质有着广泛的一致认识,但是科学家准确地预测环境转化的影响和结果的能力却受到严格限制,多数人对此欣然承认。他们的忧虑和关注既受表面迹象影响,又受信仰所支配。面对这种不可预见性,由于将遇到某类想象的“冲突”而采取一种错



误的抢先行动,这样所产生的不确定性、风险和无意识后果可能恰恰与灾难临近而不采取行动一样糟糕。然而,问题在于,无论环境运动还是他们在科学界的联盟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来承认——更不用说认真对待——他们自己所提方案的无意识后果对于人类和其他物种所造成的潜在的消极结果。

一种轻率的危机修辞也有助于使那些不顾社会或政治后果的行为方式合法化。英国政府已经实现了早在1994年里约热内卢会议上就提出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目标,作为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它参加了1997年京都气候变化会议,当时它这样做是因为保守党决心把英国能源工业从对煤的依赖中解脱出来从而压制扎根于矿工会的劳动力。由于阶级斗争的原因而关闭矿山,但却可以借口环境福利而被合法化。不幸的是,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历史上的,以及当代的——参见Harvey,1996,第8章),在这些例子中,社会和政府的目标被赋予或假以环境保护的修辞,受自然极限或自然强加的匮乏所支配。而且,迫近的环境灾难这种花言巧语未必使我们的思想朝着合作、集体和民主反应的方向发展,它经常引发精英主义和独裁主义的冲动(特别是在许多科学家之中)或者甚至是强者把其余人抛落船外的“救生艇伦理观”。

因此,引用“极限”和“生态匮乏”这些字眼应该使我们在政治上感到不安,就像它使我们在理论上感到可疑一样(参见Harvey,1996,139—49)。对于是否接受在社会中评估和制造出来的“极限”和“生态匮乏”观点,虽然对其理由存在着广泛的讨论(在这一情况中,极限问题实际变得温和了,以至于差不多就不重要了),但却很难阻止这种思考方式滑入到某类自然主义的形式中(把极限强加给自然的专制主义),或者,更为糟糕的是,滑入到宿命论的马尔萨斯学说之中,这种学说认为,疾病、饥馑、战争和多重社会分裂可被视为“自然地”补救了人类的自以为是。现在,相当多的激进环境保护论者认为,马尔萨斯是正确的,而不是错误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正走向悬崖,掉入深渊,或者说,我们将会撞成一堵坚固的、不可移动的墙(极限)。与此相反的观点是:我们自己深嵌于生生不息的生活之流中,这个过程正是我们通过自己行动个别地并共同地加以影响的东西。我认为后者既符合较好的环境思维方式又符合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各种各样的事件(特别是能源流在地球上、陆地上和海洋上的物理变化、其他物种的适应性调节以及我们自己引起的变化)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我们是被困于“生命之网”(对这个概念的解释可以参见Capra,1996,或者Brich and Cobb,

218

1981)中的积极的行动者。由莱文斯和莱旺顿(Levins and Lewontin, 1985)所设计的辩证概念或者某类如怀特海(Whitehead, 1969)这样的人所提出的基于过程的观点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相调和(参阅 Harvey, 1996, 第2章),从而把“生命之网”的比喻合并成一个修辞的且合乎逻辑的论据结构。我认为这是到目前为止理解我们处境的最有用的比喻。它当然比那个让我们冲向悬崖撞向砖墙的线性思维要更加准确,更加有用。因此,世界科学家们对人类的警告把它的比喻基础从两个实体间的碰撞转移到“世界相互依赖的生命之网”的观念,这是意义深长的(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1996)。

### 3. 生命之网

在未来几年,我们能够生产出来的自然种类将会对突然出现的、甚至新的社会形态产生强大的影响。所以,对于任何一种辩证乌托邦思想来说,我们如何生产自然这个问题立即就成其一个极为重要的基础。并且,就像建立我们藉以描述替代景象的想象性要素那样,我们如何在话语上建构这个问题就具有了为众人所注目的至关重要的价值。

那么,如何从“生命之网”比喻的内部来构筑对未来方案的展望呢?我们首先必须考虑人类过去和现在不同行为所产生的“消极”和“积极”后果,既为了我们自己(适当关注阶级、社会、民族和地理差异),也为了他人(包括非人类物种和全部的生活环境)。但更重要地,我们需要认识自己的行动如何慢慢地影响着那张相互联系之网。这种互相联系以形形色色的无意识后果织成了活生生的世界。像许多其他物种一样,我们完全有能力(未必意识到这点)污染自己的巢穴或者耗尽自己的资源基础,从而严重地威胁自己的生存条件(如果不是在更加基本的物质方面,那至少在已实现的文化和经济方面是这样的)。无数的历史和地理例子说明了人类人口实际上死于他们自己的废弃物和排泄物(詹姆斯敦最初的殖民地也许就是因此而灭绝的)。但承认这点并不就是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自然的某个极限、环境灾难就在眼前,或更戏剧性地,我们将要毁灭地球这个星球。

我们同样可以不自量力,并在自身周围筑起以前所没有的围墙和边界,但这些是自我和社会创造的障碍和匮乏,而不是自然强加的界线和围墙。当然,

这就是乔治·帕金斯·玛什用历史—地理例子来阐明的主要论点,这是继其1864年出版的《人与自然》这一名作之后的另一例子。

虽然我们并不总能够区分人类行为的结果和纯地质原因的影响,但人类对于地球表面形态的形成影响很大,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因而,由人类所激发的自然革命并不全是对人类利益有害的……(但)人们很长时间以来都忘记了这样的事实,即人类对地球只有使用权,而不能消耗它,更不用说恣意挥霍的浪费了。自然已做好准备来防范对其基本物质、工作原材料的任何一种绝对破坏……但人类是一个无处不在的烦扰的行动者。只要他插足之处,自然的和谐就会变得不和谐,确保现有安排得以稳定的均衡和协调被推翻。本土的蔬菜和动物物种完全灭绝,取而代之的是外来的其他种类,自然生长的产品被禁止、受到限制,地球的命运不是光秃秃的就是被覆盖以一种新的、难以生长的蔬菜种类和外来的动物群落。这些故意为之的变化和替代确实构成了伟大的革命;虽然它们的数量巨大并且意义重大,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与它们所产生的意外的、偶然的的结果相比,它们就显得无关紧要了。

(Marsh, 1965 edition, 18)

结果证明,仅仅监控这种交互作用、威胁和环境挑战就是一项巨大的、复杂的任务。它需要在难以协调的劳动力学学术分工中越过广泛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信仰来配置大规模的研究和智力资源(国际气候变化工作小组最近这些年的工作说明这项任务是可以完成的,至少可以勉强完成)。

在这里,时间和空间的规模问题对我们如何识别和评估环境问题的严肃性并试图追踪非预期结果就至关重要了。全球问题(全球变暖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与微观局部问题(地下室里的氡)形成对照,短期困难与长期趋势互相混合。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参见第5章)强调的是标量和区别,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这个理论也适用于这里。我们必须理解不同规模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对自然和类存在物的责任是由行动所组成的,这些行动包括:从灌木树篱和花园隐匿处的小生境差异的微观保护,到水资源和对流层臭氧浓度的退化这些区域性问题的,再到平流层臭氧损耗、资源衰退、生物多样性的维护和全球变暖这些极为复杂的全球问题,不一而足。辩证乌托邦理想必须要在它的范围内把所有这

220

些问题结合起来,因为这是我们试图在改变自己时所必须要改变的生态世界。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概括当代的情形和它指向的替代方案呢?得到科学支持的环境运动已率先警告我们将要面临的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环境问题比传统马尔萨斯人口论提出的问题要重要和严重许多,那种人口论认为,人口增长会超过资源的生长,并产生生存危机(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还是环境保护论的主要表现形式)。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当下正在发生的人为引起的环境变革比人类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如马什在一个世纪前曾指出的;其他许多人,如贝克,在1992年所强调的)都规模更大、风险更甚、影响更深远、意味更复杂(物质上、精神上、美学上)。例如,20世纪后半叶在科学知识和工程能力、产业输出、废物生成、新型化学化合物的发明、城市化、人口增长、国际贸易、矿物燃料消费、资源提取、栖息地变更——这里只是列举了一些最重要的方面——等方面已经发生的量变意味着在环境影响和潜在无意识结果方面的质的变化,这一变化要求我们在反应上和思想上做出相当的质的变化。当前正在发生的大规模环境变化(一些对我们明显有害,而另一些则未必对其他物种有害)的普遍无意识结果的证据很令人信服,虽然并不是完全没有异议(比较日益增长的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地球生命之网变得如此受人类影响所渗透以至于进化的道路严重地(虽然绝不是唯一地)依赖于集体行为和活动。仅就此原因来说,采取谨慎的态度就很重要。虽然我并不认为这种对极限和灾难的预示性修辞是一个让人兴奋的比喻,但我并不因此拒绝所有令人担心的数据和所有严肃的关注,像许多其他环境怀疑论者那样把它们当作“仅仅是杞人忧天”。

221 在这方面,威尔逊(Wilson, 1998, 290—2)总体上是正确的。在21世纪,我们会面临一系列的环境瓶颈,它们大部分都是由人类过去的行为造成的,现在采取防范行动来阻止它们封闭成坚固的围墙非常重要。我同意他的观点:我们不仅有责任要以比进去时的“更好的”条件从那些瓶颈中摆脱出来(虽然我会以一种不同于他的方式来解释“更好”),而且我们也有必要确保自己在余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有所作为。

面对如此增长的风险而采取谨慎态度是一种完全合理的姿态,它还为培养某种集体意识——如何履行我们对自然和人类的责任——提供了更加可能的基础。但事情却远非如此简单。首先,“环境问题”的定义常常伴随特定的偏见。那些影响穷人、边缘人和工人阶级的问题常常被忽视(如职业安全和健康),而那些对富人、有钱人产生影响的问题却得到了强调(比如,在美国,贫穷

是比吸烟重要得多的缩短寿命的原因,但却是吸烟得到了重视)。第二,环境影响经常具有社会偏见(比方说,在定位有毒废物场所和资源损耗或环境退化的全球影响方面明显存在着阶级、种族和性别歧视)。第三,风险和不确定性冲击着任何一个领域,甚至是反对富人和强者者的斗争。1997年秋肆虐于印度尼西亚的烽烟不再像横扫19世纪城市的霍乱那样尊重国家或阶级的边界。后一类的问题有时会激起普遍的、而不是特定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方法来研究公共卫生和环境规则。由于全球变暖而造成日益增长的飓风爆发频繁地威胁着保险公司,当汽车和石油公司听说由于向空气排放二氧化碳存在着危险,必须削减其全球扩张计划时,他们被激怒了,这两种情况是一样的(虽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在汽车产业自身内部,正有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动力驱动着一种无污染的小汽车的生产)。最后,风险的制造/预防与资本主义对补救方法的消费/商品化偏好之间的区别具有重要意义。

这意味着,当我们一方面关注对自然的责任、另一方面又关注对人类的责任时,有多重矛盾需要解决。后者在定义上并不与前者相对立。传统方法认为解决贫穷的方案完全在于对增长的再分配(或者就此而言,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仅仅存在于生产力的解放中),但是这些方法不容易维持。必须找到实现这种社会和政治目标的其他方法。幸运的是,现在足够多的例子表明,更加平等地获得生存机会将会产生对社会有利、对环境有益的结果(比较印度喀拉拉邦的例子)。

222

环境主张并不必然或者明显地与阶级政治学相对立。一种进化的社会主义视角或其他的替代视角需要去理解环境问题的特定阶级内容和定义,并围绕其决议来寻求联盟(如在环境正义运动中一样)。此外,当改造措施被找到并得以应用时,许多开始属于非阶级的问题到最后却具有了强烈的阶级内容。比如,艾滋病与贫穷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因为控制艾滋病传播的代价昂贵,从而使得非洲的贫穷国家或一贫如洗的城市人口极易遭受感染(在一些最贫穷的非洲国家,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人口 HIV 呈阳性)。任何以阶级为基础的环境运动的政治学都需要在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口中建立联盟,包括很多未直接受这种问题影响的人。

但是,有一种更加普遍的观点。我们现在经历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依靠某种过程获得了规模、复杂性和深远的含意,这些过程已造成大工业的、技术的、城市的、人口统计的、生活方式的和知识的转变以及不平衡发展,这是我们在 20

世纪下半期已经观察到的。在这方面,数量相对较少的一些关键机构,如现代国家及其辅助机构(包括国际合作机构)、跨国公司、金融资本和“重大的”科学和技术,起着支配性的指导作用。就内在差异而言,某类霸权的经济主义工程话语也开始支配环境问题的讨论,并决定着我们将怎样认识自己对自然和人类的责任。使万物商品化,使差不多所有的事务(包括与知识生产相关的那些事务)都服从于单一的商业利润率和成本收益计算逻辑,这是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对于工人阶级、边缘化人和一贫如洗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由于掠夺性商业主义而被剥夺了资源基础),以及对于部分资本,甚至是部分富人、有钱人来说,我们环境困境的产生是这种霸权阶级规划的结果,是依附于以市场为基础的哲学和思维模式的结果。

223 作为回应,这就需要组织一种同样强大的预防和降低风险、恢复和控制资源的阶级规划,工人阶级、失去权力的人、边缘化人在其中担当着领导角色。在发挥领导作用的时候,可以就此提出建构整套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替代模式问题,这种替代模式可以降低风险,并且在环境和社会问题上都是公正和敏感的。这种政治学必须依靠阶级联盟的建立——包括愤愤不平的科学家,他们注意到了问题,但对于如何提出一个公正的社会解决方法却没有概念——在这个联盟中,环境问题和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与自然的关系”占据突出的位置,与社会关系及生产和消费模式的重建相并列。我认为,此类政治规划并不需要极限或崩溃这样的语言风格来有效地、完善地发挥作用,但它确实需要与许多环境运动和愤愤不平的科学家们细心、谦恭地进行协商,他们清楚地发现当代社会正在运行的方式与解决如此困扰他们的环境问题的令人满意的答案是不相容的。然而,这样一种规划的基础必须依赖于我们在下述问题上达成某种广泛的共识,这就是我们将如何在个人和集体层次上设立和履行总体上对自然的责任,特别是对人类的责任。

#### 4. 学会在他者的世界中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自己

围绕“对自然和人类的责任”这个总体问题来建构某种广泛的政治运动,这需要在形形色色的的习性之间进行磋商和翻译,这些不同习性来自不平衡的方式,物质生活、社会实践和知识体系以这些方式来协调和组织。我们肯定是

人类中心的、种族中心的且自我中心的。不过,即使我们的任务正如怀特(White,1990,257—64[264])所指出的,是“在他者的世界中成为与众不同的自己”,那还是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使我们“成为自己”。我们所做的选择和我们所从事的活动与建构我们的物种潜能有很大的关系。

20世纪在许多方面都受对这些问题的内省方式的支配。当代大多数伟大的艺术和文学以及近30年代来在理解情境化的知识、位置性等等方面所做的许多学术探索都受到下列这些探求的支配:理解内在自我(我们自己的内在自我,或者借助于精神分析的发现成果来理解他人的内在自我),理解表现、文本和表象的形式,甚至是从内在意义角度而言的整个符号体系。除了彻底地审查各种价值的习惯,尤其是在相对或辩证模式中提出那些价值时,这些解构和反省的技术还产生了大量的价值。要理解内在意义,必然要与理解同他人关系这种需要联系起来。比如,造诣很深的生态学家阿恩·奈斯坚持认为,有必要以更加广泛的“大自我(Self)”观念作为自然世界中所有其他要素的一种内在关系来取代狭隘的、无效率的自我本位的“小自我(self)”概念。德里达声称,惟一正确的表达形式是这样的:它解除了我们心中被内在化的他者的声音。

224

由此,存在着一个相对来说还未开垦和揭示的外部边界。这涉及到与其他人的关系,这些人过着他们自己的生活,存在于不同的物质环境中,他们在不同于我们所直接经历的意义世界中形成自己的经验。在这方面,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就能够“创造一个既包含自我又包含他者的框架,谁都不占支配地位,以一个基本上平等的形象出现”(White,1990,264)。我们可以努力地塑造自己的行为以响应一个大范围的想象,即使仍然是我们在思考和决定以**这样**而非**那样**的方式去使用能力和力量。这样一个原则适用于所有的“他者”,不管它是“自然”的“大他者”还是我们自己物种内的“他者”,它们以不同的认识来追求不同的想象,这些不同的认识出自于不同文化构型和物质实践。然而,后一种情况中,我的移情能力和“像他人一样思考”的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这个支持来自在不同语言和话语体制之间(包括形形色色的再现体系)进行翻译的可能性,那些语言和话语体制对下列问题常常表示出完全不同的态度:在通过改造世界而建构我们自己的过程中,在个体和集体两种不同的水平上,我们应该和实际上如何行动。

所以,虽然总是“我”或者“我们”在想象和翻译,虽然思想总是通过我(们)的语言最后才得以表达,但总是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方式,我们可以期望以此去

建立思想和行动的结构,使自我和他人发生联系。我可以用许多生态学家力劝的方式,试图像大山、或江河、或斑点鹰或者甚至埃博拉病毒那样去“思考”,并因此调节我的思维和存在方式,不同于喜欢像鲁珀特·默多克或澳大利亚土著人那样去“思考”的那些人。我们进行这些选择,部分原因在于这样我们可以开发自己的能力和力量,并成为比目前样子更重要的角色。如果尊重和热爱他人对于尊重和热爱自己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我们当然应该完全以这样一种精神去研究所有的其他人,包括那些包含在我们常常称为“外部自然”中的那些人。关注我们的环境就是关注我们自己。

225 由此就得出了下面两个引人注目的结论。首先,长期缺乏的、在感觉领域之间进行移情和翻译的技术(参见第12章)作为一个重要的认识方式被重建,用来补充(在某些例子中是超越)内省和所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客观化研究模式。其次,“我们从哪儿学习、向谁学习以及如何学习”压倒了当代对“我们从哪儿看到”的后现代迷恋而成为知识约定的基础。知识是而且能够由各种不同方式组成,建构它们的方式在我们解释和理解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方式的能力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 5. 关注知识的统一性

在人类所拥有的明显不同的知识内存在着(或者,更经常地,应该存在着)某种统一性,这种观点不时地会出现。最近时期,对这样一种统一性的研究在人类学、甚至多数社会科学内差不多已被抛弃。所有“总体化的思想体系”被认为是欠缺的,并因此超出了讨论范围。这个结果把潜在的知识统一性问题整个儿留给了那些仍然敬重启蒙传统的持不同意见者、宗教狂热者和一群少数精选的思想家——主要来自于自然科学领域。

事情并不总是如此。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通过对符号和数学形式的研究而对知识统一性展开了严肃的研究。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努力就逐渐地减弱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项运动的宣言没有能够对语言本身如何独特地再现世界这个问题提供一种适当的答案。维特根斯坦非常有说服力地指出,当语言被认为是语言游戏时,它们就失去了作为特权场所的卓越功能,这个特权场所也许就是能够发现统一性的地方,即



使如乔姆斯基长期以来论证的那样,对语言进行深层结构的能力是我们类存在物与生俱来的。

马克思主义对知识统一性的描述主要集中在早期著作,比如《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但它同样也失败了,因其为了自身利益而日益增加的形式主义解释(列宁和其他人所全力推进)使得其内部矛盾重重。这种内在矛盾最终被阿尔都塞和其他人熟练地揭示出来。在马克思主义内部被称为“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解构了任何一种单纯的形式主义统一性的观念(比如说,这种观念认为,物质环境决定了意识状态),但却未能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别的实质性东西。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对所有形式的“元叙事”所进行的正面攻击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深层次的内在质疑结合在一起,导致马克思主义抱负的厄运。

226

结果就是把统一性问题的严肃辩论交给科学家去解决。复杂的不同知识的统一性问题由此就被还原成比较特定的追求科学内部统一性的问题。最近有一些这方面的成果,从一般系统论、复杂性理论、甚或比较模糊但却令人感兴趣的围绕盖亚概念的争论,从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这些成果只有在在被逆转为追求各种知识——包括那些属于非科学类的知识——的统一性时才有意义。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由威尔逊所提出的论据(Wilson, 1998)。他坚持认为在解放人类想象以面对我们现在必须要承担的对于自然和人类的责任中,知识统一性是首要目标。这样一种统一性——他称为“一致(consilience)”——极其重要地依赖于不同类型(从物理学到美学再到伦理学)和规模间运转并发生联系的能力。对于后一种情况,他论证道:

规模的概念是种手段,生物科学借此在过去的50年间变得一致。根据用于分析的时间和空间数量级,生物学的基本分类完全如下:进化生物学、生态学、机体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以及生物化学……一致的程度可以通过每种分类原则被压缩成其他分类原则的程度来衡量。(Wilson, 1998, 83)

我在第5章已经论证过规模的问题,它对任何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都是基本的,所以我对威尔逊在这方面的意见特别留意。他主张,生物科学的明显成

功一般来说极其重要地依赖于随时准备着把在一个规模(如进化)上的认识植入到另一规模(如遗传学)上产生的发现中,并由此确立时空规模上的一致性。虽然这种成就受到了科学劳动分工内单个科学家日益增长的短视研究方法的威胁,但是“为了解复杂的系统,自然科学的中心已经开始从探求新的基本法则转向于新型综合方法——“整体论”——如果你愿意这么叫的话。”(267)

然而,一致依赖于普遍接受一种科学方法,使各门学科相互协调,即使单个科学家可能会不愿意。他写道:“最能发挥作用的策略就是在组织层面间建构连贯的因果解释”(267)。这种还原论不仅为建构科学的统一性也为建构其他形式的知识统一性提供了主要的指导思路(也许理解为约定规则的强制性学科机制比较好):

一致世界观的中心思想就是:所有具体的现象,从星体的诞生到社会制度的运行,都立足于最终可还原为物理定律的物质过程,无论这些序列有多长、有多曲折。(266)

在人文或社会科学中,这样一种观点很少会获得赞同(尤其是考虑到威尔逊刻画这些领域中的知识时所用的煽动性方式)。因为害怕会采取任何的生态主义、自然主义或还原主义,所以他的论点在左派那里也不会得到很多的同情(或许,在生态学者那里除外)。无论如何,在威尔逊的主张中还存在着各种各样令人关注的内部张力。他从未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物理定律的还原论如何解释文明的兴起甚或是知识的创立(仍然未能解释微积分和莫扎特)。他采取了**纯信仰**(没有任何类型的科学证据),认为还原论“原则上”是行得通的,尽管实际可能性很微弱。他模糊地认识到,综合的任务需要一种不同于纯粹附加的因果还原论的知识和程序,那种还原论是他正式倡导的。他最终认为,当进化变得凭意志发展时,要理解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我们应该“看透我们的内心深处”,这样,他就颠倒了从物理学和进化生物学到道德和伦理选择的因果顺序。虽然他的还原论公然指向完全相反的方向,但最终却是科学的人性化得到了提倡。

有必要指出,马克思并不反对类似的还原论观点,他的思想植根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同时又批评达尔文的实际表述):

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因为,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甚至所有抽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那种排除历史过程、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超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Marx, 1976, 493—4)

228

这样一个段落会获得威尔逊的评论,这是令人感兴趣的。但是关于马克思这个最为人重视的方法论宣言之一,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有用的观点。首先,对进化过程的适应以及进化科学方面的进展都有待于理论化。当历史本身区别于生物进化时,马克思确实注意到了一种质的变化。这种质的变化得到了辩证解释,但不是用威尔逊所偏爱的那种机械因果术语。此外,它没有带来与进化的任何彻底的决裂,而是有效地把对人类进取心的理解和对人类活动的历史地理学理解融入进化变迁的网络中。

威尔逊观点的问题在于(暂时不谈其内在矛盾、不合理的要求和引起争论的简化方法),他不能公开承认在追求某种科学统一性时自己必须要宣称的历史化和人性化问题(除了作为宣扬他自己信仰的开场白或闭幕词)。无论如何,这是过去许多揭示知识统一性尝试的典型特点。它假设,这样的统一性依赖于单一思路(因此渴望还原论),终点是完全获得理解的稳定性与和谐。对威尔逊来说,这种单一思路是因果机械原则,它提供了还原主义的环节,其终点存在于把每一件事情作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带到其领域内。然而,这只是一种可能的统一模式,它只有在有限条件和特定领域内才能发生作用(我们假定它是以威尔逊在一些生物科学中所描述的方式来运行的)。

229 与这种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模式相反,我建议把知识看成更多地建立在复杂的连锁生态学模式上,这种生态学由与众不同的过程和常常以混淆且又矛盾的方式动态地互相满足的部件组成。在这种系统内想象“意义的家族”(这是维特根斯坦喜爱的一种习语,与不时从其语言游戏理论中推断出来的“相互排斥的意义”相对)是有可能的。就像任何扩大的家族一样,这种系统内部存在着大量的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差异以及相当多的争论和冲突(有时还包括不同宗派和流派之间激烈而血腥的斗争)。这正是有关环境话语特别丰富多样的情形。

有趣的是,威尔逊最终建构了这样一个完全连锁的知识结构范例。他提议在“先验论”和“经验论”世界观之间展开一场不可解决却又动态的对话,一场两个不同认识模式间的对话。但他认为这两个世界观互相排斥而不是内在地发生联系。威尔逊自己既作为一个基督徒又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家的历史对他在所有层面上的理论化起到了作用,他很乐意认为这个历史既互相矛盾又互相滋养,在这里他阐述了根本不同的意义如何能够而且必须互相联系。没有信仰,他的整个科学一致的使命便不可想象,没有共同性,对话便不可能发生。

知识的生态和演化观为思考知识的统一性和差异性提供了一种意义。当家族比喻从“人类的家族”这一概念延伸至“类存在物”时,它就提供了通过可能的相互关系而进行思考的方式。拥有了各种不同的能力和力量——包括那种移情、转化和客观评论的能力和力量——就有可能设想不同意义家族相互之间发生(内在)联系的方式。方法论立场就成了一种辩证法(正如莱文斯和莱旺顿[Levins and Lewontin, 1985, 278]所述,这里面“没有根基”,因此完全有理由在其中探寻运行于特殊规模和层次上的独特的基本单元和过程)而不是一种还原论的因果关系。这样,设置关于空间、时间、规模和环境的分界线就成了发展观念、抽象概念和理论时要考虑的一个主要策略因素。情况常常是这样的:这些分界线上的任何实质性变化都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些观念、抽象概念和理论的特性。莱文斯和莱旺顿就时空和变化表明了相似的观点:

这种辩证观强调,持续和平衡不是事情的自然状态,但却需要解释,它们必须在对立力量的行动中寻找。对立力量保持平衡,系统总的来说就处于稳定的平衡之中,达到这样状态所需要的条件是相当特殊的。当系统中存在着许多变量时,它们就需要同时满足同样多的数学关系,这些变量通常表明系统中多种参数之间的不平等。(1985, 275)

怀特海说,自然一直就是对新奇事物的永恒探索,人类在这方面也不例外。

因此,辩证研究必然会把伦理、道德和政治选择(价值)纳入自己的过程中,并且把因此产生的推定知识作为追求这样或那样目标的权力游戏中的话语。价值和目标(我们可能会把它们称为反思性思想的“目的论”和“乌托邦”要素)不是作为从外面提取的一般抽象概念而强加的,而是通过生存过程(包括知识研究)来达到,这个生存过程被嵌入在不同的权力游戏和实践形式中,伴随着这样或那样的潜能探索(在我们自身中和我们所栖息的世界中)。

此外,知识统一性不是从一致方面而是从进化过程方面来理解的,在这个进化过程中,竞争、差异、协作、分散和扩散、客观世界(社会的和自然的两个方面)的改造以及时空秩序的安排等多个方面都发挥了作用。这也许就揭示了威尔逊描述中最显著的悖论:此种进化过程不能彻底发挥作用的惟一地方就在于一致的知识系统自身的生产。

## 6. 时空乌托邦理想和生态学特性

我们再回到建筑师比喻这个话题上来吧。在建筑师所做的事情中,我们应该假设什么样的知行统一呢?卡拉塔尼(Karatani, 1995, XXXVIII)对建筑实践的描述在这里很有帮助:

设计与维特根斯坦的术语“游戏”是相似的。正如他所言,在其中,“我们一边前进,一边运用并补充着规则”。没有哪个建筑师能够预测到结果,没有哪个建筑师能够不受环境的约束。建筑是一个卓越的事件,它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超越制造者控制的形成或生成(making and becoming)。柏拉图赞许建筑师比喻,但却鄙视作为一个世俗劳动者的建筑师,因为真实的建筑师,甚至建筑本身,会受到偶然性的影响。然而,偶然性并不意味着,与设计理想相对、实际的建筑是次要的且常常有倒塌的危险。更确切地说,偶然性确保:没有哪个建筑师能够在确定设计时不受与“他者”关系的影响,这些他者就是客户、职员以及与设计过程相关的其他要素。所有的建筑师都面临这类他者。因此,建筑是一种缺乏共同规则条件下发生的交流形式——与

他者的一种交流,从定义上来说这个他者并不遵循同一组规则。

231 辩证乌托邦理想的建筑必须立足于现存的和已经实现的社会关系的偶然母体,这些母体包含政治经济过程、科技能力的集合以及法律、知识、政治信仰等等方面的上层建筑特点。它还必须承认自己在持续变化的物质和经济世界中的嵌入。按照马克思的意思,我们建筑师全都运用意志来创造,但却不是在自己所选择或创造的条件下进行。此外,因为我们永远不能完全确保我们行为的全部意义,所以作为结果发生的历史地理变迁的轨迹就总是处于我们个人或集体意志的绝对控制之外。

这个概念与一个西方思想中可以追溯到希腊人的强大二元论传统相对立。卡拉塔尼(Karatani,1995,5)是这样总结的:

一方面,进化论者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活生生的、正在成长的形态或有机体;另一方面,创造论者认为这是一项有计划的艺术工作。这两种类型代表了两种世界观:一种是把世界理解为生成,另一种把世界理解为形成的产物。

当代的这种争论使“社会建构主义”与“客观科学”(比如说,遗传决定论的客观科学)相对抗。但是马克思并不是很轻易地适合于这样一个二元论。有趣的是,尽管威尔逊的所有声明都与马克思相反,但他实际上也不适合于这个二元论。我认为,这样的二元论不能捕捉到一般意义上的进化和特定意义上的人类进化所涉及的东西。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关于人类发展的历史地理学,并不存在着什么“非自然”的东西。我们作为“自然力量”对世界产生影响,而且像所有的建筑师一样,我们努力去创造我们永远不能完全领会或控制其含意的艺术作品。

因此,挑战就在于设计出一种辩证乌托邦理想的语言,它实质上立足于社会和生态的条件,但却仍然通过创造意志来强调人类行动的可能性和选择性。当然,乌托邦思想的生态维度有其自身的传统。但是它要么被边缘化(多数经典的乌托邦计划很少或根本不谈及与自然的协商,即使涉及到,也往往倾向于预想一块像安乐乡那样流淌着奶与蜜的土地),要么就是受太多限制,通常依据在一些相对较小规模上(社区、村庄或者小镇)达到的与自然的和谐这种教条。

我们会在资本主义景观(花园城市、市郊、进入休闲地区的权利及大城市中为争取干净空气、干净水和足够的污水处理而进行的运动)中发现乌托邦环境保护主义的许多残余。虽然这些成就和运动不应该被忽视,但很明显,我们还是超越了由这些思维模式所轻易陈述的情境。我们对于人类和自然的共同责任需要在多种时空规模间以一种更加动态的、共同进化的方式连接起来。小型栖息地的保护、生态修复计划、城市设计、矿物燃料的利用、资源利用模式、民生保护制度、某些地域性特殊文化形态的扶持、从全球层次到地方层次生存机会的提高,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以某种方式联合起来,作为因素计入一个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政治经济的替代方案如何可能从受阶级束缚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矛盾中产生出来。

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通过发挥我们的创造意志而成为自己命运的建筑师,但是没有一个建筑师会免于偶然性,不受现有条件限制。除了在无关紧要的纯幻想领域内,没有一个建筑师能一直希望去那样控制生命之网以便幸免于由他们的行为所产生的“偶然的、意想不到的结果”。建筑师和蜜蜂至少在那点上是共同的,即使他们之间的区别也同样清晰地预示着:彻底解决当前糟糕状态的真正政治运动能够在某处以某种方式产生。

## 行动中的反叛建筑师

想象我们自己是建筑师,全都拥有广博的能力和力量,深嵌于充满了明显约束和限制的自然和社会世界之中,再想象我们正努力地改变着这个世界。当灵巧的建筑师醉心于反叛时,我们必须从战略、战术上来考虑:改变什么、从何改起、如何改变、又使用什么工具来改变。无论如何我们还得继续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就是每个对进步变迁感兴趣的人所需要面对的基本困境。

但我们生活于怎样的世界中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矛盾、充满了多重位置性、充满了必然会爆发的想象(这些想象力已转化成不同领域的行动)、充满了不平衡地理发展、充满了高度竞争的意义和抱负。广阔世界及其惊人的复杂性为行使批判性判断和个人及集体意志的有限自由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但是大量的表面选择和可能引起斗争的分歧领域永远都处在这样一种危险之中:产生一种失去权力的混乱(比如说,全球化所竭力推动的那种混乱)。此外,我们行为所产生的无意识结果看起来不可能避免,但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将如何克服这些混乱并建立一种不同感觉的可能性,同时又承认围绕在我们周围的约束力?

在此,我提供某些对话性观点而不是答案。在最后这一章中,我论证一种穿越性质不同但却相关的社会和生态生活领域并在其中进行翻译的系统。过程得以运转的时空规模在这里有很大影响。因此,威尔逊认为规模是科学统一性内部最重要的区别之一。革命情绪从政治个体经过工厂、政治党派和民族国家再到使全世界工人得以团结起来的运动,《共产党宣言》指出的是同样问题。

234 辩证法允许不同的知识和实践在各种规模之间连贯一致而无需采用狭隘的因果还原论。这种辩证思维方式重复了本书第5章阐发的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理论观点。在第5章中,我认为,在确定世界如何以及怎样更好地运转时,时空规模的生产完全和一个规模内差异的生产同等重要。



现在我进一步展开这些观点。我首先提议在各种不同的时空规模上来思考政治可能性,接着再论证,真正的政治变革产生于几个规模间思想和行动中同时发生且又松散协作的转变(要么同时发生,要么先后发生)。因此,如果为了理解它在政治变化全部动态中的作用而分离出一个特殊的时空规模作为思考因素,那么我就必须承认它和只在其他规模上才能确认的过程之间的联系。我把某个特定时空规模比作位于“反叛”政治实践的“长边界(long frontier)”上的一个思想和行动“剧场”。除非得到其他剧场的支持,否则一个剧场中的前进最终会受到阻碍甚至倒退。即使我们有一些人比较能干、比较专业,比较适合于在一个剧场而不是另一个剧场中表演,但任何一个剧场都不拥有特权。典型的政治错误是那种完全可以理解和思考习惯:惟一有影响的剧场正是你或我碰巧所在的剧场。反叛政治实践肯定发生在这条长边界上的所有剧场中。改变社会生活形态和方向的普遍性反叛需要所有这些剧场的合作和协作行动。在这一基础上,我考察七个反叛行动的剧场,在其中,人们可以作为个人和集体命运的建筑师来思考和行动,尽管是以根本不同的方式。

## 1. 个人是政治的

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反叛的建筑师也是一个具体的人(embodied person)。那种人,也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在一段时间内占据着一个惟一的空间(人类生活的时空性是根本的)。他被赋予可以用来改变世界的某种能力和技巧。他或她也有丰富的感情、欲望、利益和恐惧,所有这些全都通过社会活动和行动释放出来。反叛的建筑师不能拒绝体现在物质、精神和社会生活中的结果。

我们通过改变世界而改变自己,因此,我们任何一个人怎样才能做到在谈论社会变革的同时不在精神和物质上做好改变自己的准备?相反,我们如何能够改变自己却又不改变这个世界?这种关系是不容易协调的。福柯(Foucault, 1984)不无正确地担忧,“支配我们大脑的法西斯主义”远比任何建造在外面的东西要阴险许多。

235

然而我们同样不得不做出决定——修建道路、建造工厂、房屋、休闲公园、城墙、露天场所……一旦下定决心,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就会把其他可能性排除在外。各种决定都具有自身的果断、封闭和专制代价。实践总是以“非此即

彼”而非先验的“既/又”形态来对抗辩证法。它总是具有自身的存在要素。过去许多伟大的建筑师以不可思议的决定性和专制性方式使他们个人政治化(结果有好有坏,这取决于后代们的偏爱)。

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个人(包括建筑师)具有很深的政治性。但就像女权主义者、生态学家和过去几年中大显身手的大批身份政治家们付出代价才发现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个人差不多都会促成良好的政治。它也不意味着个人态度和行为上的根本转变足以(不是必然)让社会变革发生,就像一些激进的替代运动(比如深度生态学)常常表明的那样。

因此,尽管社会变革开始于个人,结束于个人,在这里却还存在着比个性化的个人成长(这是现在美国许多书店中能保证一个独立和巨大柜台的主题)或个人责任的表现更加危险的东西。即使当某个具有超凡魅力而又无所不能的人——豪斯曼、罗伯特·摩西、奥斯卡·涅梅耶——似乎要建立一个世界旨在影响他人来遵守他们特定的个人幻想和欲望时,事实证明它还有更多的意义而不只是人的幻想。阶级利益、政治权力、暴力的动员、话语和公共舆论的协调等等全都包括在内。

但是在反思我们反叛的建筑师所做的事情时,必须为私人和个人留下一个空间——疑惑、愤怒、焦虑和绝望以及信心、利他主义、希望和得意有可能活跃于其中的空间。反叛的建筑师最终不可能比其他任何人更能抑制或压制个人。没有人可以指望改变世界而不改变他们自己。因此,始终建立在所有建筑和政治实践基础之上的协商就存在于试图互相改变、改变世界以及改变他们自己的那些人之间。

## 2. 政治人是社会构造

坚持认为个人是政治的就要面临人和身体问题,它们是全部政治和社会行动基础的不可还原要素(在某一特定时空规模上被定义)。但是,个体、身体、自我、个人(或者我们想用的任何术语)是一个流动的社会构造(参见第6和第7章)而不是某种固定在具体东西中的绝对不变的实体。这样一来,如何理解“社会构造”和“体现”(embodiment)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比如说,相对的自我概念特别强调涉及到社会生态变化世界时我们的多孔性(porosity),并由此调

和许多有关个人权利、法律地位等类似东西的理论。于是,政治性的个人就被当作是一个向无数过程(发生于不同时空规模内)开放的实体,这些过程贯穿了我们的自然和社会世界。因而,个人必须被视为社会生态关系的整体。

但是,一个已经实现的时空秩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远离自己思想和行动中这种流动、开放的概念。在美国,私有权和继承权、市场交换、万物商品化以及货币化、经济安全和社会权力的组织,所有这些都导致人格化的私有财产,自我(被视为有边界的实体,一个无孔的个体)是这样的私有财产,房屋、土地、货币、生产资料等等也是,它们都被视为政治经济生活的基本社会空间形式。生产和消费组织造成了劳动分工和功能分工,并构造了专业化的角色(建筑师、教授和诗人以及无产阶级,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些都“已失去了他们的神圣光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成为资产阶级权力的雇佣劳动者)。我们生活于这样一个社会世界之中,它把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一块块碎片,每个碎片都有特定的附属物、技能和才能,这些东西然后又被整合到我们称为“生产方式”的强大的动态结构之中。我们与此相关的“位置性”(positionality)或“情境性”(situatedness)是一个社会构造,和生产方式是一个社会产物完全一样。这种“位置性”规定我们是谁或者我们是干什么的(至少在目前)。在那个过程内部,“我们从何处看到它”为我们的意识和想象提供了大量有利的东西。

但是从“我们从何处看到它”中产生的“我们能看到什么及能看到多远”又根据我们在所栖息的世界中的时空构造和选择而变化。比如说,通过媒介获得信息的机会以及信息流的质量和控制在我们的希望去了解和改变世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既是空间又是时间的视野,在过去30年间同时得到了扩张和压缩,而且任一部分的政治方案都必须要以渐进的、建设性的方式来干预作为结果发生的信息流。但同样也有必要去说服人们把视线超越于我们必然居住于其间的短视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边界。

237

相反,当我们以科技进步和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名义匆忙去履行各自的专业任务时,日常生活的激烈时空性——由强调速度和迅速减少距离摩擦与周转的技术所驱动——阻止时间去想象或建构其他选择方案,那些未经思索便强加在我们头上的除外。生产、交换和消费的物质性组织依赖于特定的权利和义务观念,并使之增强,而且还影响了我们的异化和从属感觉、我们的权力和无权概念,即使表面上看起来新颖的自我表现途径(多元文化主义是主要的近例)也

受制于资本积累的力量(如,对自然的热爱变得等同于生态旅游业)。实际效果就是限制了我们对可能事物的幻想。正是亚当·斯密本人(马克思所引用,1976,483)认为,“绝大部分人的理解力是由他们的平常职业发展起来的”,并且“(劳动者)生活的单一性自然地损害了他的进取精神”。如果这只是部分正确——我确信这点——那它则突出了思考替代方案的斗争——想的和做的不一样——如何不可避免地来自于局部化日常生活的意识及其环境相冲突。最具有潜在害处的是这样的方式,它使日常工作借助其舒适和安全掩盖了人们最后用来面对不和谐的变化前景的那些方式。那么,我们进取精神来自于何处呢?

我们再回到反叛的建筑师这个比喻上来吧。他或她扮演着由社会构造的(有时甚至是述行的)角色,同时还面临着来自日常生活的环境和意识。在这种日常生活中,需要被按时制定,社会期望存在于此,技能在此获得并被设想为以有限的方式通常服务于由他人确定的目标。因此,建筑师看起来像是资本主义城市化车轮中的一个嵌齿,同样是由那个过程的构造者所建构(豪斯曼、梭达、埃比尼泽·霍华德、勒·柯布西耶和奥斯卡·涅梅耶难道不是像其他每个人一样的吗?)。

然而建筑学家可以(实际上是必须)希望、设想并梦想差异。而且除了他  
238 或她必然调动的思辨想象外,他或她还会有效地利用某种特殊的批判资源,从而产生可能的替代前景。这种资源存在于乌托邦思想的传统之中。这样,“我们从何处知道它”就变得与“我们从其可见之处可以看到什么”一样重要,要不然就是更重要。

空间形式的乌托邦计划代表性地展开了从事批判的政治个人的建构。他们这样做的前提就是想象完全不同的财产权制度、生活和工作安排,这些都表现为完全不同的空间形态和时间节奏。这个被提议的重组(包括社会关系、再生产工作的形态、工艺和社会供应形态)使一种根本不同的意识(社会关系的、性别关系的、与自然关系的,视情况而定)以及基于集体生活方式而表达不同权利、责任和义务成为可能。

设想这些替代方案允许我们进行一项“思想实验”,在这个实验中想象在不同的情形中它会如何(思考)。据说通过改变我们的情境性(物质上或精神上)我们就可以改变对世界的幻想。但它也告诉我们,从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境达到那样的另外一个情境,实际上做起来多么困难。如何通过改变世界而改变

我们自己,对于这样一个鸡与蛋的问题不能操之过急,必须持久地进行。但是,改变那些用以建构政治人——我的政治人——的力量现在被当作一个计划。作为一个政治人,我可以通过改变我的位置、移动我的时空视野来改变我的政治学。我同样可以改变我的政治学以回应外边世界的改变。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彻底的革命突变发生的(虽然创伤事件和社会崩溃常常为根本不同的概念开辟一条道路)。长期革命的前景是必然的。

但是构想某种具有变化冲动和渴望的集体革命却是必须的。没有人可以永远地单干。但是被定位为一个反叛建筑师,拥有各种资源和欲望(有一些直接来自乌托邦传统),我可以立志成为一个破坏分子、制度内部的第五纵队成员,把一只脚坚定地踏在某个替代选择阵营中。

### 3. 集体政治学

集体政治学到处存在,但它们通常流淌于受制约的、可预示的渠道内。比如,如果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空隙中有明显的反叛政治学在起作用,那它就是捍卫私有财产权的一种动员。用暴力和愤怒的方式来迎接那些对权利和价值的威胁,不管这种威胁来自于国家还是像开发商那样的资本积累的代理人,这些暴力和愤怒是一种可怕的政治势力。但它典型地转向内部以保护已经存在的个人化的“私托邦”。同样的势力可以在民兵或右派新法西斯主义运动(反叛政治学的一个吸引人的形态)以及一些生态学家的激进社群主义中找到。

239

集体治理的这些形式妨碍着对任何意义深远的替代方案进行探求。大多数政治学和集体行动形式保护并维持着现有的系统,恰如它们加深了它在生态、政治和经济上的一些内在矛盾(比如,集体性的市郊化热潮增加了对汽车的依赖,产生了温室气体、颗粒物污染以及对流层的臭氧浓度,等等)。巴尔的摩的门控社区是自生自灭的集体政治学的一个象征。

传统乌托邦理想试图对抗这种流行状况。例如,社群主义作为乌托邦运动典型地认为,相对于个人利益的追求以及由此附属的“权利对话”,公民身份、集体认同和责任应优先考虑。这种理想建立了许多的乌托邦梦想,从托马斯·莫尔到傅立叶,并且注入了许多当代宗教运动,比如争取基督教基本社区运动

甚或那些更加温和地(有人会说是更加软弱地)培养作为良好生活依据的“公民身份”概念的运动(例如,参见 Douglass and Friedmann, 1998)。

特殊社区由社会实践(包括行使独裁权力和老一套的约束)辛辛苦苦建立,它们不只是被想象出来的(不管它们的想象会有多么重要)。因此,把已完成的“社区”视为一个封闭的空间(不考虑规模或者边界的定义)是很有用的,某一明确的规则系统在这个空间中占据优势。进入那个空间就是进入了被人们承认、尊重和遵守(自愿地或者通过某种强制)的规则空间。“社区”的构造伴随对这样一个空间的生产。挑战这种社区规则就意味着通过挑战其规则而挑战这样一个集体性的存在。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很少有社区能够保持长期稳定。在这里,反叛的建筑师有大量的机会来宣扬新规则和/或塑造新空间。我们作为规则制定者或规则破坏者的能力在这里得到了尽情发挥。空间形式的乌托邦传统的部分吸引力恰好在于它用以创造想象空间的方式,在那个空间中人们可以思考一些完全不同的规则。因此,城市形象作为民主和归属的观念和理想得以最好阐述的空间规模,它周期性地重现于政治理论中,注意到这一点是十分有趣的。

**240** 在这里要想弄清楚进步的反叛政治学与排他的、独裁的行为(比方说,为了捍卫自己财产权,私房屋主协会所做的事)之间的差异并不总是容易的。例如,新社群主义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埃特西奥尼(Etzioni, 1997)积极地支持封闭和门控社区的原则,认为它是社会生活组织的一个进步贡献。在资本主义不平衡地理发展的高赌注竞赛中,集体机构同样最终只能增进领土的竞争能力(参见普特南 1993 年对意大利不平衡地理发展制度基础的描述)。对于特权阶层来说,社区经常意味着保护和增加已经获得的特权,而对于下层社会的人来说,它时常意味着“控制他们自己的贫民窟”。

辩证乌托邦理想必须以某种方式面对“社区”的生产和“为了集体行动”目标的团结,并在更加广泛的政治学框架内把这种现象的地点和意义接合起来。这意味着从具体的政治人规模向一个不同规模的转换。社区必须被看作是变动过程与相对持久的归属和联合规则(像形式上强加在民族国家头上的那些)之间一种微妙关系。通过立宪形式、政治党派、教会、工会、邻里组织、地方政府等诸集体权力而确定它的界限和范围(有时甚至是领土和边界)、创造并维持它的规章制度,这一实际斗争已被证明对追求其他方案来替代自私自利的个人化市场个人主义是重要的。但是,正如许多人最近所指出的,只有在实现目标

的过程中与更加普遍的激进反叛政治学相联系,“社区”的重塑才会朝着进步的方向前进。那意味着必须有一个激进的方案(不管如何定义)。曾经构造社区的规则制定(rule-making)必定与导致革命变革的规则破坏(rule-breaking)相对立。

社区提供的作为政治行动基础的嵌入性(embeddedness)和组织起来的力量是至关重要的,即使它的一致性需要权威、舆论和“归属规则”这样一些民主建构的体系。因此,虽然“自在”社区作为较广泛政治学的一部分具有意义,但是“自为”社区几乎总是堕落到倒退的排他和分裂(一些人称之为否定性空间形式的异托邦)。所以,必须找到一些方法,由此我们反叛的建筑师可以穿越时空去塑造一个更加一体的历史地理变化的过程,不受那种典型地由某种利益共同体规定的界线所约束。在个人和政治向一个更加广泛的人类行动领域的转换中,集体身份、行为共同体和归属规则的构建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要素。同时,这些集体性的结构创造了一种环境及一个空间(像民族国家一样,有时会相对稳定和持久),这种环境和空间塑造了政治人,以及个人存在并成为政治人的方式。

241

#### 4. 战斗的特殊主义和政治行动

“战斗的特殊主义”理论认为,所有具有广泛基础的政治运动都有其特殊斗争、特定地点和时间上的起源(参见 Harvey, 1996, 第1章)。许多斗争都是防御性的——例如,与下列行为所做的斗争:工厂倒闭或者对劳动者的过分剥削、有害设施(有毒废物的倾倒)的选址、社会或警察保护的终止或缺乏、对妇女的暴力、由开发商推动的环境改变、外来者对本土资源的占用、对本土文化形态的攻击,等等。现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广泛的抵抗政治,比如针对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抵抗政治。不过,战斗的特殊主义的某些形式是前瞻性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有代表性地意味着为特殊群体的权利进行斗争,这些权利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但只是得到一部分落实(在过去,这通常意味着企业主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有权利自由地行使他们不受限制的物主身份的权利,但它也同样延伸到下列人或物的权利:奴隶、劳动者、妇女、同性恋、文化差异者、动物及濒危物种、环境等)。

对这一连串的斗争来说,关键问题就是改变方式,超越特殊性,并获得一个普遍的方案来替代那些造成困境的社会制度。与之前的生产方式相比,资本主义(加上现代主义和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主义”)成功地做到了这点,但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环境保护主义、女性主义,甚至人本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对抗运动全都从战斗的特殊主义中建构了某种普遍的政治学。这样,理解这种普遍化是如何发生的、了解所产生的问题以及传统乌托邦理想所担任的角色就很重要了。

辩证法在这里就有用了。它教导,普遍性总是**相对于**特殊性而存在的:双方都不能从其他一方中分离出来,即使它们在概念运用和实践活动中是有差别的要素。比如,正义的观念通过从特殊事例和情形的抽象过程而获得普遍性,但当它在真实世界中通过社会实践得到实现时,它又变得特殊了。不过,这种过程的协调取决于中介制度(比如,那些特定领土内或特殊社会群体中的语言、法律和习俗)。这些中介制度在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翻译”,并(像高等法院)成为普遍原则的守护者及其应用的仲裁者,它们凭本身的资格也变成了权力中心。广义地说,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的结构,国家及其所有机构(现在又增加了各种国际机构,诸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关贸总协定以及世界贸易组织)作为资本主义体系利益的“执行委员会”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资本主义充满了在特殊性(甚至个人的)和普遍性之间反复以动态和互动模式转换的机制。当然,历史地看,主要的媒介就是民族国家及其所有机构,包括那些操纵货币流通的机构。

因此,没有什么社会秩序能够躲避普遍性问题。很悲哀地,当代对普遍主义的“激进”批判搞错了方向。它应该集中于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进行翻译的特殊权力机构,而不是攻击普遍主义**本身**。无疑,较之其他的特殊性(如直接生产者的权利),这些机构更支持某些特定的特殊性(如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提倡一种特殊的普遍性。

但是还存在着另一种困难。特殊性向普遍性的运动伴随着从具体到抽象的“翻译”。既然暴力和抽象是连在一起的,那在政治学中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总存在着一种紧张状态。这要么被视为一种创造性张力,要么更经常地被视为一种破坏性的、维持现状的力量,刚性的中介机构(如独裁主义的政府机关)凭借某种普遍原则向个人和共同体要求权利。

就是在这里,通过诉诸时空变革的乌托邦理想,与静态的空间形态乌托邦



理想(特别是其怀乡倾向)保持批评性联系并摆脱它的控制,这样做就可以为进一步的变化保持开放的前景。特殊性—普遍性这类辩证法内的创造性张力不可能被压制很长时间。不管有多必要,中介机构也经不起僵化,而且传统的乌托邦理想对于制度改革常常大有启发。显现出来的动态乌托邦景象是一种具有充分稳定性的制度和空间形式,它提供安全性和连续性,加上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动态协商从而迫使中介机构和空间结构尽可能地开放。资本主义有时就以这样一种方式运转(想一想法律如何被重新解释以正视新的社会—经济状况,空间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的长期历史中又是如何发生的)。任何彻底的替代方案,如果它要成功地实现,就必须在这点上遵循资本主义的范例。一方面是由固定机构和空间形态所带来的安全,而另一方面则是新的社会空间可能性对开放和灵活的需求,所以必须要找到一些方法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协调。杰斐逊和毛泽东都知道,对某种“永久革命”的需要存在于任何进步的社会秩序的中心部位。苏联崩溃的核心原因就在于未承认那种需要,美国也因为这点而受到严重威胁。所以,当我们追求时空的和辩证的乌托邦理想的原则时,必须要在长期革命的观点中加入永久革命的观点(比如,空间形式生产的永久革命)。

243

## 5. 中介机构和人工环境

形成能够中介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辩证关系的机构和人工环境,这具有相当关键的重要性。这些机构有代表性地成为主流话语形式的中心,同时又是权力运作的中心。不同种类的人工环境促进社会行动在一些方面的可能性,同时却限制其他方面的可能性。同样地,许多机构——医疗保健、教育、财务和国家——培养一项特殊的专门技能。许多的机构(如地方政府和国家)是按照区域组织起来的,并在某一特殊空间规模内规定、调节着行为。他们可以把战斗的特殊主义转换为推动或压制某种社会行为而设计的制度化空间秩序,并由此影响个人成为政治人的方式,鼓励一些行为(比方说企业家的进取)同时却阻碍其他一些行为(如社会主义公社)。

已经建构的各种人工环境有许多相同的方面,想一想城市化的形式和风格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当环境状况制约人们自由地享用根本不同的生活方式(诸如在洛杉矶没有汽车或没有私有财产的生活)时,个人又如何公开地成为

政治人？现在巴尔的摩市盛行的不平衡地理状况只允许个人在某些有限方面成为政治人（郊区富人家的孩子与市中心穷人家的孩子一样地受到压抑，虽然方式并不相同）。

244 中介机构的创建令人焦虑，并经常受到争论（正如人们完全可以预料到的），主要的困难在于它把多重战斗的特殊主义（在当代美国，这也许意味着激进生态学者、商会、种族或宗教团体、女性主义者、开发商、阶级组织、银行家等类似人群的渴望）引入相互关联的制度关系中却没有采取专制权威和权力。阿雷格里港的经验（参见 Abers, 1998）暗示，这类事情可以做成。但是必须要作出一些决定，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总是会涉及到专制权威和权力。这些东西有着世界上最好的意愿，所以它们不可能被消除。结果就是使中介机构成为权力的场所，并由此成为独特话语和构造的源头，这些话语和构造可以在个人很难抵抗更不用说超越的统治体系中组织起来的。所以，夺取或毁灭中介机构（如国家、财政部门、教育）以及改造人工环境就常常是反叛的激进主义者最重要的事情。虽然这是反叛政治学漫长边界中一个决定性剧场，但它还远远不是故事的全部。

## 6. 翻译和渴望

渴望变革行动的反叛建筑师必须能够在不可思议的社会生态和政治经济状况多样性和异质性之间翻译政治抱负。他或她还必须能够把不同的话语结构和对世界的再现联系起来（如讨论环境问题的异常多样方式）。他或她必须要面对不平衡地理发展的条件和前景。在这里翻译的技巧就很重要了。对于詹姆斯·博伊德·怀特（James Boyd White, 1990, 257—64）来说：

[翻译意味着]要正视文本之间、语言之间和人与人之间无法逾越的间断性（discontinuity）。就这一点而言，它具有道德的和智力的因素。它认为他人——原始文本的设计者——是除他自己之外的意义的中心。它需要有人去发现他人语言的价值和自己语言的局限。因而，好的翻译不是出于支配和获取的动机发生的，而是出于尊重才进行的。这个词是为一组实践而提出，通过这些实践行为我们学会与

差异、文化流动性和自我的不稳定性和睦相处。(257)

我们不应该认为尊重他人就是迫使我们删除自我或自己的文化，仿佛所有的价值只在那里而绝不在这里。他人的传统尽管对我们来说是奇怪的，有时是残酷的，但它们还是值得尊重，就如我们自己的传统值得尊重一样。我们的任务就是在一个他者的世界中成为与众不同的自己：创造一个既包含自我又包含他者的框架，谁都不占支配地位，以一个基本上平等的面貌出现。这是当我们面对世界的多样性时，作为个人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真实的自己，同样作为文化所展示的真实自己……这不是一种声称什么都不可知的相对主义立场，它本身就是一种认知方式：从另外一件事情的角度来看待一件事情。同样它也不断言形成不了任何判断，但它本身却是一种判断的方式，是我们处于变动的世界中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做事情的方式。(264)

245

这本身就有它自己的乌托邦口气。使这样一个论点问题化并不困难，就如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所巧妙地做到的，如翻译者（通常是白种男性和资产阶级）以被统治的臣服者（东方人、黑人、妇女等等）被迫消化并接受的方式来再现“他者”的能力。但是那种历史理解本身为预防赛义德及许多女性主义者已经显示的某些代表性压抑提供了防备措施。这使我们又回到了个人总具有政治性这个话题上。正如怀特所注意到的：“尝试‘翻译’就是要在曾经激进的和得体的方面体验失败：激进，是因为它使我们对自己、对语言、对他人的感觉陷入了疑问；得体，因为它把我们从小自我思考和存在的方式中暂时地解放了出来”（White, 1990, 257）。翻译行动提供了暂时的解放和压制性可能，时空乌托邦理想的建筑师们必须要面对这些可能性。

但是我们作为自己未来的真正建筑师，不可能卷入到无穷无尽的提问和无限的对话之中。在清晰地了解所有无意识后果（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的局限性和可能性基础上，我们必须提出确定的建议并做出决定。我们需要逐步地达到更加普遍的认识。这有两方面令人信服的理由。首先，正如包括泽尔丁（Zeldin, 1994, 16）在内的人所评论，对于是什么把人们分隔开，我们知道得很多，而对于我们共同拥有什么却还不是那么了解。反叛的建筑师要履行他在确定共同性以及记录差异性方面的任务。第二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就是：没有翻译

就不可能有集体行动的形式,替代政治学的所有潜能就消失了。资本家及其代理人运用货币、商品和财产这些基本语言方式(如果有必要还会以还原论经济学理论语言来支持)在他们自己之间进行翻译的流动的能力是其巨大的阶级力量之一。任何反叛的对抗运动必须正好这样做,不然就是更好。尽管我们也许很努力,但不进行适当的翻译就不可能实施政治学。如果威尔逊类型的还原论被否决,那么惟一的选择就是翻译。托马斯·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认为翻译(而非还原)是根本不同的科学知识范式可能会发生联系的特许的而且也许是惟一的手段。朱迪斯·巴特勒(Butler, 1998, 38)因身份政治学的分裂效果曾受批评,在这种压力下,她争论说:

无论什么样的普遍概念成为可能——也许它只是暂时地成为可能,即本雅明意义上的“一闪而过”——那都是艰难的翻译劳动的结果,在这种翻译中,社会运动在持续不断的社会争论这个背景下提出自己的集中意见。

任何辩证乌托邦理想中无处不在的威胁就是:一些全能的中心或一些精英人士开始占据支配地位。这个中心哄骗、威吓并说服它的外围加入到某些思想和行动的模式中(就好像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做的、并在臭名昭著的华盛顿共识中达到顶点的行为。凭借华盛顿共识,美国试图通过获得每个人对政治经济生活某些普遍原则的支持而使它在世界秩序中的霸权地位制度化)。与此相对,民主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翻译规则必须很明确。但是,不管它们如何作为附带现象只是“一闪而过”,从丰富的翻译经验中出现的、定义我们共同拥有什么的普遍原则也应该清楚明白。

## 7. 普遍性的要素:关于个人承诺和政治方案

普遍性的要素不是启示或绝对真理的最后要素。首先,当某些原则通过行动而物化时,我把它当作是有关存在决定的一种要素,“非此即彼”实践的要素。姑且可以说它是自然强加给我们物种生活的状况,我们必须做出决定(个别地或集体地)并遵照这些决定行事。普遍性的要素就是选择的要素,不管我

们对此后行动会有多少保留意见。我们如何依据作为未来决策指导方针的行动原则或法则来向自己再现那些决定,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价值。当这个文化价值在话语和机构中得到例证时,它就获得了对我们的控制权。正是在这里,抽象的普遍原则作为权力游戏发挥着作用。

无论如何,普遍概念不能也不会存在于坚持它们并依照它们行事的政治个人之外。它们不是无所事事地存在,也不是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对人类事务产生影响的、抽象的绝对事物。在全部实践中,它们无所不在。但是就我们出于特定目标制订和定制它们的程度来说,它们表现为我们所坚持的抽象原则(甚至是书面的法规和法律)。如果我们从中发现成功的行动指南(就像我们在科学认识文献中所做的那样),那么它们就塑造了我们的世界观并作为中介话语发生制度化。它们往往作为激活我们信仰和行动的支配性范式、霸权话语或者普世伦理、道德或政治经济原则丛生或聚集,它们被编撰成语言、法律、制度和宪法。普遍概念是在社会中建构的而不是给定的。

247

虽然社会构造可能预示着争论,但常见的情况却是,传给我们的占统治地位的原则如此限制我们的概念从而约束了对世界景象的各种幻想。广大的潜在普遍概念和统一原则事实上已经传给了我们(长期的痛苦体验的产物)。但是,正如许多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通常带着批评意图),这些原则中有很多起源于西方启蒙运动,当时自然和社会秩序的理论家会毫不犹豫地以普遍真理和命题来表达他们的意见,而不像现在这样。现在流行的是贬低这些原则(至少在人文学中),同时却在总体上让它们的一些原始观点在社会中充分发挥作用。但没有某种普遍概念,我们永远不能行事。当然,我们可以**假装**没有它们也能做。关于这一点,现在许多人文研究中的激进观点和社会科学的某些部分采取了相当虚伪和含糊的姿态(当它不忙于诡辩时)。

因此在一开始就去挖掘普遍原则的踪迹很重要,这种普遍原则是这样表述的:个人是并能够是政治性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没有一定的判断标准(直率的或含蓄的),就不能区别对错或者进步与退化的政治行为路线。我支持或我不支持这种或那种行为方式,其存在要素伴随着这样一个判断。即使我可能宁愿不这样,但不做决定本身就是一种决定形式(许多美国人现在更喜欢呆在已有特定结果的投票箱旁边就是这样一种方式)。所以,虽然普遍性的要素不是启示的要素,但它仍然是**判断和决定**的要素,而且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些都带来了对某种普遍概念的**表达**,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只有在这些情形中我们才能够

248 说,反叛政治学的**这种**形式(比方说,包含于环境公正运动中的某形式)是进步的并值得支持,而反叛政治学的**那种**形式(就像密歇根森林中的民兵运动)却不是。所以,普遍性的要素是政治判断、承诺和物质实践的要素。

因此,悖反性地,它是在最抽象的意义上进行争论的要素。实际上,我们试图创造一个关于事实真相、道德义务及适当和不适当的目的与手段的普遍话语,我们藉此努力去劝说自己和他人遵守某些一贯的行为方式,充分了解我们每个人是不同的,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个性。

这种论点似乎是多余的,不过,当它们与反叛政治学漫长边界中所有其他的行动剧场相联结时,它们就能够获得一个更强大的力量,甚至会提供某种政治和情感线索,通过翻译者的行为和反叛建筑学的想象以动态的方式帮助我们认识个人、集体和中介机构以什么方式互相关联。而且也可以说,普遍概念从类存在物的概念中汲取力量 and 意义(普遍行为原则只是从物种权利方面来看才有意义)。因而,也可以得出结论(如我在第 11 章中所论证的),接受某种“科学统一性”是传播普遍性主张的必要条件。相反地,普遍性的讨论极其重要地依赖于与类存在物和科学统一性观念之间的批判性联系。

那么,我们目前可以拥有什么样的普遍概念作为富含意义的理想呢?当我们作为自己未来的反叛建筑师时,它可以让我们的想象自由翱翔。我已经在第 5 章中提到过《世界人权宣言》是一种用有问题的但却令人信服的话语来表达这种普遍原则的文献。对这些原则的应用经常受到争论,它们的解释几乎在每一特定的情形中都会遭到反对。我们可以用有趣的方式来增加或重新表述那些普遍观念吗?对于值得关注的普遍权利,我本人比较偏爱的一张候选单如下:

#### 1. 生活机会有权利

这包括生存和基本经济安全的基本权利。食物安全将会是这些权利中最基本的表现,但综合的权利制度——如森(Sen, 1982)所称呼的——同样也是根本的。这重申了《世界人权宣言》(第三部分第 23 条)中的观点,“每个人都有权享受公正、合适的报酬,保证使他本人和家庭有一个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必要时并辅以其他社会保障。”“最低生活工资”和足够的社会安全,这样的普遍权利是要求这样一揽子普遍权利并把它们问题化的一种途径。

249

## 2. 政治联合和“良好”治理的权利

为了在各种规模上塑造并控制政治机构和文化形态,个人必须有结社权(比较世界人权宣言第20和21条)。可以这样推测:人们会为完全民主的联合程序发现某种适当的定义,而且集体行动的形式必须为少数派意见提供合理的保护。还可以设想:人们会从地方层次到全球层次上发现“良好”治理的某种定义。在这里,这个要求还突出了问题和差异(“良好”治理的定义远不是同质的),同时它也提出了普遍化的主张。但是个人明摆着有权去生产他们自己的共同体空间并在其中铭写他们自己的规则,正如限制这些权利对于约束社群主义运动的狭隘排他和内在压抑是绝对有必要的。

## 3. 生产过程中直接劳动者的权利

劳动者的权利对于民主和自由的概念是极其重要的,那些劳动者辛勤劳动,实施对劳动过程(生产什么,应该怎样生产)某层面的个人和集体的控制。对劳动条件的长期关注以及遇到不合理的负担和苦难(诸如那些导致平均寿命缩短的事情)时接受赔偿权利的长期关注需要在一个更加全球化的规模上加强。这便提出了涉及一般生产制度的(不管它是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或者其他什么制度)加强劳动者权力的要求。它还突出了在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全球体系内尊重劳动尊严和劳动者的尊严(关于这一点,至少各种各样的教皇教谕和世界人权宣言提供了有利的素材)。

## 4. 人的身体的不可侵犯性和完整性

世界人权宣言(第1至第10条)坚持了身体和政治人有权享受尊严和完整性。这就假定人们有权免于受折磨、被监禁、被杀戮以及其他的身体强迫,这些在过去经常被用以实现狭隘的政治目的。妇女控制她们自己生育功能的权利以及不受强制和暴力(家庭的、文化的和制度化的)的生活权利也必须是这个概念的核心。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妇女屈服于父权制和家長式统治制度,这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普遍权利的声称也由此具有深刻的似是而非性和强制性(虽然常常与文化传统自主权的声称相冲突)。

## 5. 豁免权/变动权

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和19条),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

的权利。宣言在这一点上是清楚确定的。但在这里我认为昂格尔的(Unger, 1987b, 524—34)豁免权制度——与公民变动现存东西的权利相联系——的论据更强大,因为它坚持批判性评论和争论的权利,而不惧怕报复或其他什么损失。社会正是通过对这些权利的运用才能够被再想象、再生产(昂格尔的论据在这点上是有说服力的)。

#### 6. 体面、健康的生活环境的权利

特定国家的立法有时是以人人有权享有体面、健康的生活环境为基础的,人人免于威胁和危险,没有不必要的意外伤害(特别是由人们的行为所产生的那些危险,比如有毒物质、恶劣的空气和被污染的水)。世界范围内正在扩散的环境不公正的弊端以及环境恶化(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对人类健康和安宁造成的大量后果表明,在一个地带适当地建立普遍权利是必要的,即使很明显这些权利的含意、解释和应用在操作时一定很难。

#### 7. 集体控制公共财产资源的权利

资本主义典型地藉以声称其普遍化主张(在人权宣言第17条中得到积极支持)的财产权制度被广泛理解为对我们的自然和社会世界来说既有缺陷而且在某些情形中又有破坏性。没有什么方面比公共资源中的情况更加明显(每一件事情,从热带雨林中的遗传物质到空气、水及其他环境特性,顺便还包括对出于历史、文化或美学原因对人工环境的控制权利)。确定这些资源以及决定谁代表“集体”、控制权以谁的名义授予,这些都是备受争议的问题。隐含在自私自利且缺乏远见的私有财产权结构中的财产权制度不承认产生于普遍市场(和由公司支配的)个人主义的任何其他形式的公共或集体利益,对于这些财产权制度,现在则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替代它们是可能的。

#### 8. 尚未出生的人的权利

未来一代人有权向我们要求,宁愿住在任何可能性都会发生的世界中而不是预先处理好的世界中。全部有关可持续的环境发展的修辞都取决于某种超出我们自己当前利益范围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尽管模糊、不确定)。在极端的情况下,此项权利同样认可我们在进化过程中的意志作用以及我们的责任,不仅是对于自己物种的责任,而且还是对于其生存前景依赖于我们行为的无数物种的责任(见第11项)。



### 9. 空间生产的权利

个人和集体“用行动选择”的能力以及长期寻求在其他地方实现其要求和欲望的能力可能是所有提议中最激进的。然而,没有它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特定区域内受限制人口的相对封闭。例如,如果劳动可以像资本一样有自由流动权,如果政治迫害可以由地理运动所抵制(如富人和特权人士已证明的那样),如果个人和集体有权随意改变他们的位置,那么我们生活的世界将会发生剧烈的变化(这个原则在人权宣言第14条中有陈述)。但是,空间的生产不只意味着在预定的空间构造的世界中进行循环的能力,它还意味着重建空间关系(领土形式、通讯能力和规则)的权利,所运用的方式是把绝对行动框架中的空间变为更具延展性的社会生活的相对和相关方面。

### 10. 差异权,包含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差异权

人权宣言(第22条和27条)规定,每个人都应该被赋予“他的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所必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同时也指出了这样一种权利的重要性,即“自由地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并对由“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和物质利益”享受保护。这就意味着保持差异的权利,探索文化、性别、宗教信仰等领域中差异的权利。但它还暗示了不同团体或集体探索这些差异的权利,以及因此产生的在某个背离确定规范的领土和集体基础上追求发展的权利。不平衡地理发展也应该被认为是一种权利而不是资本主义强加的一种必然性:减少一个地方的生活机会以加强别的地方的生活机会。此外,不以消极方式侵犯他人权利,对这一原则的如此应用是必须要争取的,但是这个原则的陈述,像最低生活工资,却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辩论基础。最近联合国把文化权利(特别是原始人权宣言第27条中规定的那些权利)扩展至包含少数派的权利(比较Phillips and Rosas,1995)就朝这个方向迈出了最初的一步。

### 11. 我们作为类存在物的权利

这也许是所有权利中最含糊、又最不容易说明的一个权利,但它又可能是所有权利中最重要的一项,它肯定会成为争论的中心。如果回顾一下我们在生物和社会进化这一长期历史中的地位,那么很明显,我们是并将继续是强大的进化行动者。如果我们现在凭意志和意

识来干预进化过程(这些干预具有巨大的风险和危险),那么我们必然要对一些普遍概念做出解释,既促进又调节我们进行这种干预的方式。我们全都应该有权自由地探索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我们类存在物以创造性的方式所天生具有的变化潜力。这就意味着我们有权探索全部进化技能各种联合的可能性——协作、变化和竞争的能力,并有权探索自然的产物和不同时空维度的产物。但自由实验的那种权利(昂格尔非常重视)也必须要用对于他者(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的义务、责任和职责来调和,而且肯定必须要实施强大的保护以防止非民主精英(或资产阶级)的潜在力量把我们推上只代表狭隘阶级利益而不是一般人类利益的科技、社会和进化的道路。任何“物种利益”概念必然会被阶级、性别、宗教、文化和地理的粗暴区分所分裂。但是如果不知道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共同利益在何处,那么就不可能构筑任何“意义家族”来联系或支撑数不清的局部主张和要求,这些主张和要求使我们的社会世界成为如此有趣分割的地方。在这点上,奈斯和罗森伯格(Næss and Rothenberg, 1989, 164—70)贡献颇多,他们坚持,“自我演变的普遍权利”与对所有物种间同样权利的认可有关,而且“生命的演变”通常与我们个人自我发现和发展的演变轨迹同等重要。

我坚持认为,这个互相联结且通常矛盾的普遍权利体系并不是斗争的要义,而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致力于社会生态变革的社会过程中的成长环节,这个生态变革包含社会活动所有其他的独特领域。但是反叛的建筑师必须是这些权利的提倡者。同时,他/她必须清晰地承认:他们的设计来自于社会生活,而且除非以切实的方式对中介机构和社区形成的过程施加影响、对个人被当作政治人并作为政治人行事的方式施加影响,不然它们仍然是多余的、没有意义的。

## 8. 塑造社会生态秩序

我所追求的辩证乌托邦理想需要一个长期且持久的历史地理革命视角。  
253 把变革的政治实践作为辩证的和时空的乌托邦理想之显现,这是有益的。但是除非我们理解社会行动不同区域中的行为和思想是如何发生联系、如何结合,

又如何彼此消融从而创造进化的社会行动总体性,否则它不会如此。

不幸的是,多数被认为是富于想象的建筑和政治实践常常只在我现在定义的一两个剧场中保持不变。精神和实践的劳动分工以及它们在视角上的分工现在深深地扎根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中,以至于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任何时候完全出现在一个以上的思想和行动剧场内。问题不在于这一点行不通,事实上,它可以像过去一样相当好地发挥作用(例如,当占统治地位的中介机构运用精神劳动和实践劳动的分工来规定普遍性术语和个人成为政治人的可行方式时)。过去的错误总是存在返回并困扰我们的危险(虽然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通过把我所描述的七种要素视为组成整体不可或缺的部分、通过认识所有这些是如何内在地相关联、通过努力使我们的分析、思想和实践在整个范围内流动,我们可能会更好地定位自己作为反叛建筑师的能力:另外某个具有潜在动态的反叛建筑师。任何有抱负的反叛建筑师必须学会在与他人联合的情况下去比较并结合所有战线上的行为。缺乏个人的普遍性是抽象的教条,不然就是政治虚伪。缺乏个人或普遍性的共同体是排他性的和法西斯主义的。中介机构把革命动力颠覆为国家独裁主义,它们巩固其权力并压迫个人,或把普遍概念翻译为专制和控制的官僚体制。具有无限威力的翻译者采取高压手段进行压制。脱离群众和日常生活的伟大个人(建筑师/哲学家)要么是毫无意义的笑料,要么就是当地(不然就是世界舞台上)苛刻和专横的人物。

真正重要的正是这个长长边界线上各剧场内的公开对话和实际的交互作用,而且我们必须依靠的正是辩证法而不是威尔逊的还原论,从而在这些不同规模内进行联系,不管如何假定。只有那样,实现辩证乌托邦理想的那股推动力才能够不失去生气,不会最终成为自我毁灭的乌托邦理想,那种乌托邦理想要么是封闭的空间形式,要么就是长期创造性毁灭的时间过程。

但是抱负肯定会由于局限感和脆弱感而有所调和,甚至最傲慢的雄心也存在着一一些必要的限制。正如我所论证的,如果辩证乌托邦理想必须有效地以历史地理现实和成就为基础,如果——回到马克思的著名公式——我们始终能够有志于创造我们自己的历史地理而绝不是处在我们自己所选择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之中,那么不管我们如何艰难地努力把我们自己从下面三种基本约束中解放出来,从现在到将来的飞跃也总是会受到抑制。这三种约束就是:1)我们可以从何处看到它;2)我们能够看多远;3)我们可以从何处学会它。

当我们进行那飞跃时,我们还必须承认,这是向未知因素和不可知物的一

次冒险性飞跃。存在着一个标准,在此之上,不管我们如何刻苦地努力,我们都不能完全确切地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出现。社会和生态秩序,特别是当两者结合在一起时,是开放的、异质性的,它们的总体性永远不可能被完全掌握,更遑论被操纵为可预知的、稳定的状态。不管我们如何艰难地试图按照指定的计划来建构和重建这个社会生态秩序,我们还是会不可避免地沦为牺牲品,不仅是我们自己行动的意外结果的牺牲品,而且还是在每个迂回曲折之处、在每个规模内对我们产生冲击的进化偶然事件(马克思所指的那些“意外事件”)的牺牲品。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共同体的理想、空间形式的乌托邦的理想就具有了这样一种吸引力,因为它们描绘了一个具有已知确定性和规则的封闭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可能性和偶然性、不确定性和风险都被坚决地拒之门外。

在此也许存在着反叛建筑师最难克服一个障碍。在勇敢面对一个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世界时,我们自己行为的后果可能会造成完全的毁灭,这种可能性沉重地压在我们头上,常常使我们宁愿选择“我们已拥有的痛苦,而不是去追求我们所不了解的另外不幸”。但是,哈姆雷特由于被焦虑和疑惑所困扰而不能行动,就是因为他不采取行动,而正是这一点给他自己和国家带来了灾难。我们正是需要在这点上相当留心资本主义历史地理的教训。因为正是通过无数的投机行为、通过随时准备冒险并由这些风险带来毁灭,那种历史地理才得以创造。虽然我们劳动者(以及达观的下层劳动者)也许有很好的理由“缺乏思想的勇气”,但资本家却很少会缺乏思想的勇气。而且,可以证明,当他们开始怀疑时就已经失去了创造和再造这个世界的的能力。马克思和凯恩斯两个人都认为它是“活力”,是资本家的投机激情和期望(就像左拉非常显著地描述的那些东西),这些活力、激情和期望支撑了这个制度,在新的领域获得它并进入新的空间(字面上的和比喻性的),所以,建筑师作为一个极为投机和冒险的职业(不是作为柏拉图的一个比喻或一门手艺)与15和16世纪通过贸易投机而开始全球冒险事业的商业资本家共同出现于意大利也许就不足为怪了。正是这种投机精神以各种方式为人类的思想 and 行为开辟了新的空间。

经验是清楚的:在反叛的建筑师了解自己的思想勇气并准备同样投机性地投入到某种未知领域之前,我们仍将继续是历史地理学的客体(像工蜂一样)而不是活跃的主体,有意识地把人类的潜能推至极限。马克思所称的将会废除“事物现存状态”的“真正的运动”总是在那里等着形成和进行。那就是获得我们思想勇气的全部内容。

## 埃迪里亚 (Edilia) ， 或者 “使它成为你愿意的那样”

1888年的某一天，埃比尼泽·霍华德读到了爱德华·贝拉米刚刚出版的乌托邦小说《回顾》。他“相当着迷”，一口气把它读完。第二天上午，他：

来到了伦敦某一拥挤的地方。当我经过狭窄阴暗的街道、看到多数人居住的糟糕不堪的住所、从四周观察追逐私利的社会秩序的表现并反思我们经济体制的绝对不健全时，突然一种强烈的感觉向我袭来：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暂时的，它完全不适合新秩序——公正、统一和友善的秩序——的劳动生活。

霍华德融合了这两种感情。他寻求一种途径来实现贝拉米的幻想并促进“公正、统一和友善的秩序”，他发现这种秩序是他那个年代里伦敦所缺乏的。1898年他自费（事实证明出版商和编辑是冷漠和敌对的）出版了后来被称为《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就这样，“新城市”运动就诞生了，这项运动被证实是对20世纪城市重建的最重要干预之一。

另一个世纪的终点。我走在巴尔的摩的街道上，甚至比霍华德还要被公正、统一和友善的缺乏所吓坏。我说“被更加吓坏了”是因为这些不平等如此显著、如此明显地多余、如此有悖于任何理性，如此被接受为某些永恒不变的“事物的自然秩序”，以至于我几乎不能抑制愤怒和挫败。整个一代人的全部才能都渐渐枯竭，陷于异化和失范、愤怒和绝望及无动于衷的冷漠这些痛苦的深渊。

别无选择吗？贝拉米提供的那种鼓舞人心的景象在哪里？唉，宣告乌托邦已经死亡，坚持任何乌托邦理想必将不可避免地归于极权主义和灾难，这种论调现在十分流行。透过犬儒主义的棱镜来看，非常自然地，我们时代的城市问 258

题似乎难以应付,似乎不受我们凡人所掌握的任何补救措施的影响。我们断定,根本“没有其他选择”。我们要么用余生来寻找补救措施,要么像哈姆雷特一样,宁愿懦弱地接受已经出现的那些城市的痛苦“而不愿去追求我们所不了解的其他不幸”。

放下研究去浏览自己的藏书,我读到了批判的法律学者罗伯托·昂格的书,他抱怨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我们所居住的制度和想象世界的无助傀儡”,我们似乎不能够脱离现有结构和规范进行思考。他说,我们在“看起来不能实现的梦想”(媒体给我们提供的虚幻世界)与“几乎无关紧要的景象”(大街上的日常生活)之间左右为难。我放下昂格的书,拿起了另一本由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所写的书,他很想知道为什么“可能性会受到新闻舆论的苛评”。他严厉地警告说,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利益阻碍着世界成为那种可能”。确实是如此。“别无选择”,我想起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如何经常地说这种话以及它所产生的政治效果。我陷入了白日梦之中,“别无选择,别无选择,别无选择”,我脑子里反复回想着这些。我被当头一击,进入睡眠状态,在不安宁的梦境中,一大堆乌托邦人物回来困扰着我。下面就是他们讲给我听的内容。

.....

到2020年革命就会结束,知道这点无疑会使你感到惊讶。仅仅7年的时间里社会就经历了这样一种彻底的重建,它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崩溃早在2013年就开始了。它集中于股票市场,这个市场在本世纪的头10年间道琼斯指数涨到85 000点——正如许多分析家所指出的,这是完全满足你们这些婴儿潮时期出生人员的渴望所必须的一个标准,你们的积蓄刺激着这个增长。

但是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迹象。到2005年全球变暖已气势汹汹,在某些地区产生了严重的环境危机和作物歉收。这使大范围传染性流行病得以爆发,产生数百万的环境难民,形成大量的难以承担的保险索赔。社会不平等在你们那个年代已经很严重了(回忆一下在1990年,358个亿万富翁支配的资产如何等同于全球27亿最穷人口的财产?)。但是到了2010年,10%的世界人口却控制着98%的收入和财富。

这些财富的大部分都花在了建造隔绝穷人的强大屏障上(远比你们那谨慎的门控社区要严厉)。事实上,在那些年,对于那些足够幸运地找到工作的普通

劳动者来说,建造栅栏把他们自己隔绝于外是一项主要的职业。但是栅栏越高 259  
级,全世界受苦的人似乎越有可能形成不断增长的威胁。

但正是股票市场的崩溃使世界发生了动摇。没有人完全知道它是如何发生的(曾经有人知道吗?)。俄罗斯的股市突然崩溃,但那时人们已习惯于这类事件(想想1998年的印度尼西亚甚或俄罗斯)。大家普遍期望另一轮强制性经济紧缩(由世界中央银行推动),再配以金融欺诈会足以解决这个问题。

然而,一些富裕的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决定是时候把股票兑成现金了。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股市就跌落了。股市越是跌落,其他人就越是想赶在不太晚之前兑现。

四个月以来,政府和中央银行注入足够的流动资金以保持市场稳定(道琼斯指数维持在50000点左右)。但那时世界充斥着无用的纸币。通货膨胀加速,所以成罐的金枪鱼和成袋的大米成为比美元、日元和欧元还要合理的流通形式。利率飞涨至千个百分比。

公司——甚至是那些赢利的公司——在彻底的金融灾难中纷纷破产;失业(在这些举措仍然举足轻重的那些地方)增至前所未有的水平,甚至涉及到了富人(你们教授真的表现很差)。

政治权力在货币迅速贬值的重压之下慢慢地消散了。政府声名狼藉,并陷入混乱。如果金钱能够买到最好的政府,那么顺理成章,无价值的货币就会购买无价值的政府。

他们支持的私有财产权和人为短缺在人类需要的绝对力量面前开始逐渐削弱。法律失去了它作为权力的大部分意义,从而使消失在强大债务漩涡中的私人契约得到加强。法律制度慢慢地屈服于强力,因为治安权不能完全区分如此多的不能执行的合同的真相。

大坝最终在2013年的早秋被冲破。到这年年底,道琼斯指数已低于2000点。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像银行和其他大多数金融机构一样破产了。股票市场消失了,纸上财富化为乌有。你们这些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失去了金融安全(例如,你们的养老金领取权完全没有了)。每个人都受到了损失,因为2005年大改革中人们荒谬地相信,私人投资的社会保障制度要好于政府投资的计划。这刺激了股票市场的步伐,现在又成了其崩溃的牺牲品。

2014年的军事接管是激烈的。当局设计了一套强硬的指挥和管理等级模式。军事法律和秩序残忍地强加于世人的头上。持不同政见者被逮捕,不幸的 260

人被推回窘境,忍受折磨,并死于军事机关令人恐惧的、恶毒的监视之下。

将军发布公告,声明主要问题在于人口过剩,太多的人追逐太少的资源。每个地方的承载能力都受到破坏,最优人口(据你们时代的生态学家估算,美国也只能承受1亿人口)被大大超越。他们说,尽管令人遗憾,但马尔萨斯在其有关人口的名著中(首次出版于1798年)所描述的控制人口增长的方法——主要是饥荒、疾病和战争——是使人口和资源重归平衡的惟一恰当措施。只有当自然发挥了效力,它的可持续性才能实现,自然秩序才能恢复。

未来无政府状态就是这样被预测、论证、管理的。

然而,军方确实为社会生活的完全重组和合理化打下了基础。

到2010年,由信用机构(在你们那个时代,它的发展已远远超出想象)汇编的个人数据库被合并为一个大众监视系统。为了保护自己,富人们坚决要求在为他们服务的人的身体内植入电子监视设备,从而确保没有什么不受欢迎的人可以闯到他们的附近。这样就有可能监视个人并获得他们的即时“简历”(想象一下它所发挥的用处!)

军方使这种制度普遍化。他们把能抓的每个人都植入了电子设备,并编了码。每个人的位置可以从太空监控到。这就是乔治·奥威尔那被提高至n次方的“老大哥(Big Brother)”。在酝酿的革命中,它被视为可以凭借独立和自由的名义而加以摧毁的东西。

军方还会利用手头的每一项技术以及其他更多的技术来创造非凡的通讯系统,这个系统甚至能够免于最有才能的电脑黑客的攻击。他们同样还建立了高度有效且生态上更为健全的运输系统,这些系统被用于曾经比较严密的监督和控制形式,后来被转换以满足不同的需要。

261 军方缺乏任何清晰的道德威信或大众合法性,它开始与宗教力量结盟,产生了相当于军事化神权的全球治理制度,根据宗教联系按区域划分(这种划分起初激起了大规模的、破坏性的群众运动,与这些运动相比,1947年发生在印度次大陆的那些运动就显得极其渺小了)。

这些军事神权甚至短暂地商定了一段时间的世界单一治理,召回了某位年老的乔治·索罗斯式的人物来当这个和谐世界(Concert of the World)的第一任总统,但是这个世界很快就崩溃了。每个军事神权政治越是集中化和等级分明,他们之间的斗争就越是具有达尔文主义性质,激起世界范围内损失惨重的消耗战。



首先,双方都把这些斗争描述为反对某一邪恶帝国的斗争,通过动员民族主义狂热和宗教仇恨来巩固国内统治。但是国内供应能力的崩溃使中央权力越来越难在人们为日常生存而发动艰苦且重要的经济斗争的地方进行统治。

由于当局抢占越来越多的资源,地方上的不满就开始萌芽了。小型的反抗运动随处可见,它们武装反抗等级权力的腐败和政策,指责权威部门未能处理迫切的生存问题。这些运动开始在地方层次组织起来,为生存和抵抗建立先驱性的集体组织。但由于没有武装,他们常常受到暴力镇压。

究竟如何发生的,这仍然不得而知,但2019年这些根本不同的、分裂的运动突然就集合起来了(后来有人说这是某个秘密的革命组织者协会所策划的,尽管当时并没有什么证据)。

不幸的人们自发地集体起义。他们创建了大规模的非暴力抵抗运动,静静地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全球经济空间,发布连珠炮式的要求,要求获得更多的平等、要求解散军方统治、要求弹劾军事和宗教领袖。

当局认为这是集体疯狂。由于受到了挫败和惊吓,他们陷入了无理性的、无法控制的暴力,在担心中猛烈攻击,厌恶自己的同类也彼此对抗。这些行为加强而不是削弱了无依无靠者取得控制的决心。而且在许多对抗和自治的飞地上,各族人民已经取得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不同层次的信任、理解和团结。

由于对极端恶劣的暴力感到厌倦,军方中有一些异议分子开始开小差,正如长期支持人们同当局作斗争的那些圣人们所为。等级制的宗教信仰和军国主义开始崩溃。他们彼此之间被破坏的信任以及他们无耻的虚伪和唯利是图证实了他们的毁灭。

许多科学家、医生和技师放弃了对军事化神权政治的支持,转而运用他们 262  
技能服务于这项新运动,一开始是暗地里,但是当被解放的领域开始被确定时,他们就是公开的了。他们放弃了腐败的军事神权的御用文人的特权地位,发动了一场运动,重新主张科学、医学和知识的解放和教化使命。

这被证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文化时刻(对参与其中的每个人来说都值得纪念的一个时刻)。虽然宗教权威自我毁灭,专制主义军事化科学的等级权力土崩瓦解,但人类所特有的两股最强大力量——精神承诺和科学研究力量——融合在一起创立了一个人性化的、有政治意识的科学敏感性,它成了政治革命的基础。

许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也加入到这场起义中。一些管理人员和技师(特别

是负责闲置工厂的那些人)开始着迷于真正变革的可能性,并在他们的工作场所(工厂、农场和办公室)零星地领导一些运动,致力于使生厂设备重新用于不同的社会目标。

在军事神权政治被还原为一个挥舞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非法残余势力后——在几个可怕的情况确实使用过这些武器——一个和平的、非暴力的几乎完全由妇女领导的大规模运动席卷了全球。

这项运动使军方和抢劫团伙、黑手党组织以及警卫团体这样一些乌合之众都解除了武装,这个乌合之众曾在各处兴起,填补了军事权力消逝而留下的真空,这些劫匪威胁着要成立一个全新的虚无为政府主义的社会秩序,在这个社会中,男性暴力和父权统治将会是主要的政治权威。

抵抗这一威胁的妇女运动在 10 亿左右的妇女中兴起,到 2010 年这些妇女会成为无产阶级中的大多数。正是这种女性化的无产阶级将会成为历史转变的动力。这些妇女在不堪忍受的压制条件之下工作,还要继续负担着关键的生育责任(同时却被排斥于公众权力之外,特别是在军事神权统治之下)。

263 她们开始到处称呼自己是“未来人之母”(这个名称来自于 2019 年 7 月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爆发的一场运动所发表第一份宣言)。她们行走于家家户户,世界各地,摧毁她们所能发现的每一件武器和枪炮,最终唤醒了一大批新入行的技师——既有男人又有女人——去解除和销毁所有的暴力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是一场非暴力运动,兼有消极抵抗和群众运动的特点。这是为争取社会平等和互相尊重而进行的最强大的一次斗争,尽管它仍处于革命骚动之中。

这场运动被证实是一种催化剂,它使世界从集权化的权力等级制转变成为一个平等主义的群众力量的政治学,把地方、个人和各种社会团体连接成为复杂的全球交换的交互网络。

到 2020 年世界大多数的地方都会解除武装。军事和宗教权威会在致命的包围中慢慢地窒息而亡。所有那些阻碍可能性实现的利益都会屈服。人们可以思考、讨论并交流他们的另外一些幻想。

这就是由“未来人之母”与科学家、知识分子、精神思想家和艺术家形成联盟所领导的不幸的人所梦想并真正实现的社会。这些科学家、知识分子、精神思想家和艺术家解放了自己对阶级权力和军事神权的政治依赖和意识形态依赖。

.....

基本的居住单元被称作 hearth<sup>1</sup>，差不多由 20 到 30 个成年人组成，家庭内的所有孩子由集体抚养，被叫作 pradasha（稍后作详述）。每个 hearth 集体安排生活，成为相互自治的共同经济体。

hearth 成员一起吃饭、一起工作，就如同协调内部关系以及如何通过与其他 hearth 交换而“谋生”达成集体决议。neighborhood 由 10 个左右的 hearth 组织，edilia 是一个更大的组织单元，200 或更多的 hearth（大约有 6 万人）在其中松散地协同行动。最大的连续的政治单元叫 regiona，差不多由 20 至 50 个 edilia 组成（至多有 300 万人）。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形成人类居住环境的一个生物区，努力做到尽可能地自给自足，并密切关注环境和可持续性问题的。

在此之上就是 nationa，它是一个松散组织的 regiona 联盟，为了相互交换和贸易而集中在一起。它一般至少由两三个 regiona 组成，分散在世界每一热带、亚热带、温带和亚北极地带，在陆地 regiona 和海洋 regiona 之间、干旱的 regiona 和多雨的 regiona 之间各自具有类似的多样性。联盟法规定期进行重议，而且当 regiona 觉得合适时，他们会不时地从一个 nationa 转向另一个 nationa。此外，新的 nationa 可以随意形成，其他的 nationa 可以随意解散，因此不存在固定的人口规模，甚至也没有超出联盟法规的任何固定的政治组织。

因为货物在这些生态规划的 regiona 内自由流动对于维持一个合理的生活标准来说是根本的（尽可能地保证不发生局部饥荒和匮乏），它同样意味着人员可以自由流动。因此，种族、人种和文化融合的程度（在革命期间已经非常混乱）使任何种类的 nationa 定义从古老的种族特征、种族划分乃至共同文化遗产方面来说都变得毫无意义。 264

这并不意味着同质化。实际上，与你们的时代相比较，经济、政治和文化多样化的层次是惊人的。但这发生在整个 nationa 中相互自治、非排他行为的复杂制度之内。

针对这种困境，人们就设计了某类比较粗糙的解决方案，一方面建立一个秩序良好的制度以保障所有人都有适当的生活机会，而另一方面又为某类混乱秩序留有余地，它为创造性交互作用和个人自我实现提供温床。

例如，关于 hearth 和 neighborhood，有趣的是它们实现高度自足的程度，它

<sup>1</sup> 在设计乌托邦的时候，哈维自创了一些术语来命名其组成部分。这些术语描述了未来乌托邦的不同规模，对应于现实之社区、地区、国家等层次。——译者注。

们本身就是创造多种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中心。它们是深刻的社会性和文化实验的中心,是人们进行晚餐后的对话、音乐表演和诗歌朗诵、“精神交流”和讲故事的地方,这些地方被精心装潢从而成为连续的社会接触场所(顺便说一下,它们并不是全都很和谐!)

它们是这样的地方:想与众不同的人在这里可以最自由地表达他们的需要。

普通的组织方式由物质支象征化。支配你们国家和你们时代城市形态的核心家庭必然要被某类更加集体化的安排所取代(这一原型被证明是20世纪晚期在美国西部由多配偶制摩门教徒所建立的一些结构)。整个城市街区被改变。在联排房屋之中打通分割墙来开辟入口,至于独立住宅群和无计划发展的郊区,则在现存的结构之间建造人行道和填充房间,从而把它们连结成一个连贯的高密度居住单元(释放某些先前无计划发展的郊区地域以精耕细作)。比较大的空间被开辟为公共厨房和餐厅,但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私人房间,这些房间里配备了一些基本的实施,人们可以在其中随心所欲地自由运用他们的空间。

265 好几个 hearth 围绕一个 neighborhood 中心连在一起,这个中心包括一些普通的教育和卫生健康功能。在一些情形中,我们使较旧的小镇、甚至市中心适应了这些任务(虽然我们对任何高于四层,或最多七层的建筑物所持的怀有敌意的反对意味着我们对曾经称为西部的地区所作的城市规划要做重大改变)。在别的地方,因为需要,特别的传统形态和生活方式已适应了新的环境。neighborhood 还是深刻的社会交互作用和娱乐活动的场所(在这里,edilia 的集中化的录像带和唱片商店可以被随意接进)。

在重新组织的城市街区内,受保护地区大多数转变成了设有围墙的公园——配有孩子们玩耍的适当的游乐场所和大人们休息的宁静凉亭——在这里,人们进行各种精耕细作(生产丰富的水果和蔬菜),再补充以温室和溶液培养的耕作体系,可以保证一年四季每样东西不间断的供应,从色拉蔬菜到极品大麻(精选的主要休闲毒品)。

城市农艺和园艺是一个突出特色(在你们那个年代,纽约市被抛荒的一些土地就是这样使用的),这既有经济意义又有社会意义,因为许多人明显地乐于做这样的事情。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园地就成了许多社会化的“精神交流”的集合地。

把有机废弃物堆制成肥料结合了对中国一项古老的粪便循环系统的改变应用(是生物化学工程学的一项胜利),以便使营养物质在 neighborhood 和 edilia 这两个基础上被循环利用。你肯定记得维克多·雨果的评论:“文明的历史在于其下水道”——那么,就以我们这个系统来证明一个正在形成根本不同文明的社会!

住所的屋顶被装饰以太阳能电池板和小型风帆(其结果多少有点希思-鲁宾逊式的风格,并且有可能在美学效果上不能令你满意),大功率的电池在地下室存储能源,再补充以精致的燃料电池系统(由军方加以完善的一项创新)。其他各种局部能源同样被动员起来。

对外界的能源依赖通常被当作是衰弱的、不体面的,每个 neighborhood 都有它自己的内埋石油储备以供急用,但不使用它是一个自尊心的问题(补给能源的费用是高昂的)。人们常常宁愿在寒冷的冬天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或者蜷缩着睡)以取暖,也不会用光所有的石油。

每个人都分担着 hearth 内的工作。做饭、清洁和所有其他杂事都按照值日表被细分。多数 neighborhood 都会培训一些人来承担自然建筑及其电子系统所必需的维修工作。

另外,每一 hearth 都擅长于某项可以与其他 hearth 进行交换的特别生产(烘焙、酿造、缝纫、裙子和衬衫制作、意大利面食制作、沙司、果酱等)。(你在烘焙和果酱制作方面的专长可以大大地发挥用处!)在这里,通讯系统是至关重要的。秩序安排可以电子化,多余的东西可以在公告牌上做广告。这样,工作和交换就可以在一个有效的、最小化浪费的基础上进行组织。 266

特殊的 hearth 常常可以利用他们的劳动信用(下面将会对此进行解释)来建立一种专门化的原料贮存(干豆、大米、面粉、糖、咖啡、布和线,等诸如此类),这些原料可以用来与其他 hearth 进行交易来换取其他产品。剩余产品的集中储存分散在各个 hearth 中,所以 edilia 可以把不易腐烂的基本储备很好地保存几个月。

在各个 hearth 之中可以进行劳动交换。比如,neighborhood 中主要的建筑或修复工程是由来自于不同 hearth 的具有不同技能的工人所承担,虽然在一些情况中也会以互惠约定来“引进”其他 neighborhood 的劳动,在将来某一天还给对方。劳动信用的计算机化评估为保证公平交换提供了一个粗略的计账方式。

各个 hearth 可以根据所提供的待客的慷慨和老练而获得名望和声誉。他们之间以这种方式进行的互惠交换成了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有关待客的慷慨度的竞争是一个重要的价值标准。

在你们看来,hearth 对个人也许是压制性的。他们当然不利于你们所习惯的公然的个人主义形态,但是个人如果愿意是可以改变 hearth 的。hearth 的特征如此不同(在食物配制风格、音乐嗜好、文化表达、传统、性别组合方面各不相同),所以个人在民族风味餐馆方面比你们这一代纽约人有更多的 hearth 类型选择机会。

惟一的限制就是:变换应以一年为基础,并且在指定的时间内(十一月的第一周是一般的搬家日期)。必须提前一个月通知搬家意向,这样就可以在计算机电子公告牌上做空缺广告,并希望得到填补。多数人并不选择搬家,但是感觉压抑的人却有机会这样做,一些不安分的人(你可能是他们其中的一员)永远不可能定居在任何一个 hearth 中。

另一重要的创新——周期性长假制度——对这种安排作了补充。每个人每隔七年(17岁以后)都有权花上一年的时间到处游走(几乎是世界各地)。

267 这样的人必须作为他依附的不管哪个 hearth 的完全参与者来做出承诺,但是周期性长假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学习并探索这个世界。许多人并不利用这个机会(比方说,一生中不止一次),但是差不多同样数量的人有规则地接受他们的周期性长假,获得利益及快乐,有时抓住机会再学习一些完全不同的技能。

个人也拥有他们自己的私人资源预算,给予他们有限的权利在 hearth 经济体的框架之外为自己交换货物和服务。这是在崩溃之时产生的许多地方经济贸易系统(LETS)的残余(甚至在你所处的年代你也拥有一些)。

它实际上是一个广泛的计算机化易货网络。个人必须通过向别人提供特定的货物和服务而获得点数,然后可以用这些点数来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或服务。个人在17岁的时候进入这个系统,那时每个人获得由 edilia 的富人所创立的最初的社会捐赠,这给了他们最初的点数值从而可以开始进行交易。因此,遗产被认为是集体的而非私人的货物。

既然大量的维持生计的基本组织已经被 hearth 的集体行为所接管,那么个人交换的意义就有点下降了。但是还有各类的项目,如收藏品和“无价值的”物品,是用这种方式交易的。讨价还价的欲望、易货贸易的欲望由此就得到了

满足。分散在每个 edilia 之间的无数的“跳蚤市场”和一些非正式的市场证明了这种行为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应该这样说:现在看来,“逛市场”这种行为的社交意义要远远大于严格的贸易意义。人们进行物品交易的目的,常常更多地是为了获得谈话和社会接触的机会,而获得经济利益的想法却不是最主要的。

这种行为的最普遍形式(在你们色情的目光看来或许也是最令人震惊的)就是性行为的交易,这件事值得进行丰富且坦城的讨论。事实上,你们那个时代杂乱地散落在媒体中的所有那些“个人”广告和“约会网络”已经变成了计算机化的有组织的性交易系统(他们真的曾经是一些多余的东西吗?)。

我们完全承认很久以前就很明显的事实:性行为与养育组织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偶然的。

神权势力为了使 hearth 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保持活力所做的最后努力日益被视为对社会控制的一种运用,是通过欲望、性情、甚至个人身体功能进行 268 严密控制而进行的。神权统治的灭亡与这些控制的瓦解相符合。

那么接下来就是一场激烈的辩论:如何统筹安排性生活和养育行为从而取代功能受损且古老的家庭结构(这种结构在你们那个年代有时可以运行良好,但在绝大多数时候却集中了暴力、虐待和异化,最糟糕的是,忽视孩子应该在安全的、具有爱心的、支持性的环境中成长的真正需要)。

我们的解决办法有点类似于此。被叫作 pradasha 的组织由许多人组成,他们为了抚养孩子而以一种不可撤消的契约结合在一起。这种单元可大可小,但最少是6个成年人,一般来说8至9个。也会有一些纯男性或纯女性的 pradasha,但通常来说是两种性别都有。“助手”在抚养过程中也可以是参与者,但他们不以任何不可撤消的方式属于这个单位。他们担当的角色就像祖父母和叔叔阿姨,必要的时候可以求助于他们。这个整体结构就像过去的大家庭,只不过现在是基于自愿的约束而非血缘关系。

Pradasha 的形成要经过相当多的准备工作。它把那些非常乐于抚养孩子的人集合到一起,并创建了有利于抚养孩子的环境。我们确信,有关于孩子培养的惟一焦点问题不久就会解决,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其精神气质和态度将完全不同于你所熟悉的那些。

基于情感、爱和尊重而建立的关系对于 pradasha 的安宁来说是根本的,这其中就包括性关系。但个人可以完全自由地享受与他人的性关系(任何类型

的)。由此,一种广泛的计算机化的性服务交换市场就成立了,在这个市场中个人通过为他人提供性服务而获得点数,在获得他人的性服务时而花费点数。

与这种自由相伴而来的是某些在你们看来似乎严厉的措施。到2005年,一种为男人而设计的避孕体系最终会出台,这样就有可能在血流中插入一个有效期为一年的小小胶囊来避孕。

所有希望在约会网络上登记的男人们都必须从青春期开始就服从于这种医疗程序。而且,还要进行强制管理的、谨慎的性健康监测系统(特别是通过性渠道传播的疾病)。任何可能的性伴侣的性健康都在约会网络中被编了码以供检测。

269 当然,以你的思维方式来说,这可能会令人厌恶。但如果考虑到它在其他方面所赋予的难以置信的自由,这种想法就比较合乎人意了。确实,在我们看来,与真正保护个人权利相比,你在这些问题上最需要关心的隐私似乎更应该通过畏惧而控制性行为。

此类性交易既有困难又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从积极的一面来说,点数制为两性之间的性行为带来了更大的平等。比如说,男人要想获得点数就必须在对女人的性满足方面建立好的名声,这样,后者的性特征就具有了很大的支配性。

妇女运动——其多数成员在你们那个时代为了收支相抵而被迫从事性交易——实际上在裁军运动期间在建立这种更加平等的制度方面起了带头作用。在构思后来发展为 *pradasha* 的儿童保育的集体制度方面,她们同样也处于领先地位,大部分是出于需要。

各种性关系的探索也意味着“异性恋”、“同性恋”这样一些范畴的消失,因为不再有人特别坚持这些身份,而是自由地徜徉于他们认为合适的性行为中。

最大的危险就是性强迫症——不能把性欲当作是一种快乐之源,却渴望用它来控制他人或者使个性完全消失。这是最深刻的问题之一,而且限制那些源自这些坏习惯的潜在危险要花费很多的艰苦劳动和细心咨询。

我们现在在性交换和养育孩子这两者之间达成了很好的平衡。孩子们以一种完全正确的方式所养育,那里充满了爱心和关怀,它带来了相当普遍的乐趣。他们再也不被当作所有物和财产,他们的发展超出了出于个人利益而考虑的商品经济和斗争的利诱,在你们那个年代,这些利益使他们的生活处于黑暗之中。养育孩子的世界受到了保护,幸免于性渴望的追求和自由所造成的潜



在的破坏性影响(使你们那个时代所有的离婚事件、私通行为及淫秽的公共道德统统成为过去)。

养育孩子同样还免除于你们那个时代由于迫切需要一种劳动市场而造成的破坏,那种劳动市场只专注于生产利润而不是生产公共需求。

无论如何,这证明了一个更加普通的原则: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存在着一个完全自由的状况。一方面是个人的权利和个人欲望的追求,另一方面是集体权利、规则和义务,在这两方面之间总是要达成一种平衡。2020年的革命只不过是改变了目前你所知道的相关事情之间的平衡。它解放了个人主义,并追求自我在某些方面的实现,因为它并不害怕在他人之中抑制它们。

270

这种改变最明显地体现在由信用机构首先创建的个人身份标识系统以及由军方创建的压缩家庭系统的转变中。自由意志论者想要完全地废除它。

但是女人们坚持认为,能够通过浏览而即时知道正在与谁打交道,这不是一件坏事。曾经有一个提议:如果把数据库对每个人都开放,而不是限制它的作用,或者甚至完全假装它不存在,那民主就会最好地被实现。现在每个人都了解在你们那个时代只有信用机构和政府机构才能知道的有关其他人的事情(除此之外还有更多)。人与人之间的信息可以立即浏览到,所以没有人可以出于特权目的或独裁目的而使用它。

失去假定的(实际上主要是虚构的)隐私是不可避免的,但个人安全的获得却是巨大的,任何犯罪者——比如说某一暴力行为者——的身份立刻就会被识破察觉。hearth 和 neighborhood 对所有的人开放,因为所有的局外人很容易被识别。所有的社会空间以一种迄今为止都不可议的方式打开——安全不再取决于围墙、门、锁、栅栏、电子屏障。谁在哪儿,依赖简单知识就能知道,并且对所有的人都是有效的。

再举一例。免费交通每个人都可获得。由军方设计的高效且生态上合理的交通系统被极好地运用从而促进世界范围内的交流和运动。

在局部地区,每一 neighborhood 的边界线都配有一些小电车(其设计并不适合 20 英里以上的路程,其运行速度每小时也不能超过 20 英里)和自行车。插入式钥匙卡可以让任一成年人操纵任一车辆,并在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再重新插入(只有再连接顺利,这个极重要的钥匙卡才会松开,而且滥用任一设备都会很快被追踪到)。

移动可能会很慢,可能会受限制,但它就像性一样是自由和安全的。

这也就说明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一般来说，它是减速而不是加速了。它也非常明显地变得更加安静了：在你们那个时代属于致命创伤的噪音污染的激烈程度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了。当然，像在许多其他事情中一样，在 neighborhood 和 edilia 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后者更受年轻一代人的钟爱，它们的特征是狂热的生活方式和热闹、喧嚣的节日。一些年轻人还以玩速度极快的（有时是致命的，很遗憾这样说）轮滑来表达他们对运动的热爱。

在你们那个时代，科技创新从来就没有真正关注过减轻劳动负担，或者使人的生活更轻松些：它关注赢利，强迫所有人的行动像电子人一样（人附属于机器不仅存在于工作场所，同时更是不知不觉地存在于家里）。它迫使压力的标准通过其对速度和强度的不断追求而达到极高的层次，从希望、压力和需求中解放出来并不是它的目标。人性化的科技关系的前景被排除在外。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待它的方式。

我们认为科技必须使生活更加简单而不是更加复杂。科技变化还没有停止。事实上，对它的强调还很大（特别是在电子学、基因医学和材料科学这样的领域，其中基因医学被视为治疗许多疾病的最终方法），但是支配其应用的规则却非常严格。

委员会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评估新科技。它们必须：

1. 减轻劳动负担；
2. 从环境方面来说是友好的，要不然就是有益的（比如说，产生无毒的并易于再使用的废物）；
3. 变得更为简单而不是更为复杂，并因此更容易被大家所使用和维护；
4. 符合这样的理想，即劳动是技术行为，同时也是社会行为（把人群隔绝开来的科技与把人群集合起来的科技相比是不太受欢迎的）；

最后，科技应该服务于所有人的利益，而且要特别关注那些弱势群体。

这些要求并不总是一致的（正如你毫无疑问马上会提出反对意见）。因此，委员会常常很难做出决定。我们不能够声称我们总是判断正确。但这类不确定性却从不会伤害到任何人，实际上我们很喜欢这种挑战。

另外一个有力的变革标志就是历法改革。这在以前也尝试过好几次（最著名的就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改革），但直到现在也从没有成功过。

周末的废除无疑会使你感到震惊。之所以会这样是由于星期六和星期日

的宗教意义,以及神权政治如今滥用权力通过要求顺从和崇拜从而操纵所有人。

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每星期五天制,每个月6个星期,留出5天(闰年是6天)插在6月和7月之间作为“节日”——这是狂热庆祝的时机(整个一年中 edilia 和 neighborhood 都在辛勤地准备着),它使像肥美星期二和里约狂欢节这样的事件黯然失色。

现在回头来谈谈更严肃的问题!每个成年人都被期望在一个星期的5天中“工作”3天,每天“工作”5个小时。也可以灵活处理,每个人可以工作2天,每天工作7个半小时,或者其他什么方式。这意味着每个月大约有90个小时的工作量,去掉每年一个月的休息时间再加上每7年一次的周期性长假,每个人一生中正式的工作时间就大大缩减了。

hearth 也可以指定另外10天作为“仪式日”。大多数 hearth 至少用4天来参与 neighborhood 和 edilia 的庆典(更像你们的街道节日),但剩下的日子则是每个 hearth 所特有的。

人们还选定了各种不同的重大时节(值得注意的是,老一点的宗教和神话仪式——像死人的纪念日——经常被保存下来)。庆祝方式从安静的内心沉思到喧闹的“待客日”,各不相同,在这些“待客日”中,外人被邀请来参观、吃饭、喝酒、表演,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

人们还对这种劳动制度进行了另外一个有趣的调整。hearth 中一半的集体劳动通常被分配给由 edilia 和 neighborhood 所组织的活动,以换取必需的原料、权利和服务(诸如免费交通、机械和设备、建筑材料等等)。另外一半则被交付给 hearth 中注定要相互交换的活动(上文已经提到的烘焙、酿造、缝纫等等)。

hearth 中进行的最重要的讨论之一(有时也是强烈争执的一个原因)就是如何改变这些比例。如果 hearth 决定生活方式变化或内部生产机制较少地依赖于外部交换,则可以削减向 edilia 或 regiona 提供的劳动时间。

如果 hearth 想要从 regiona 的工厂获得材料,或者想要增加交通权利,它就必须给 regiona 派送很多的劳动单位才能得到它们。但是从 edilia 或 regiona 中获得产品或服务所需要的劳动分数是多样化的。当 edilia 或 regiona 缺乏劳动时,从它们之中获得原料和服务就会花费比较多的劳动分值。

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新奇的劳动市场。Edilia、regiona 和 hearth 之间的交

换比率(以劳动分值衡量)以月为基础进行变动。

273 这种制度有时会导致不稳定,但通常它会足够平稳地运行。大多数 hearth 为 regiona 和 edilia 提供稳定的劳动供给以换取获得他们所需东西的稳定分值。

偶然的不足是大声抱怨的一个时机。但它们也有一个积极作用:鼓励大量的回收利用(从钉子到塑料和纸等每一样东西),提醒每个人用完即扔和即时报废这样糟糕的老日子(你们时代的典型特征)肯定不会回来了。无论如何,现在的这些不足还有一种优点,那就是大家共同分享而不是强加给运气最不好的人(如你们时代所发生的)。

然而,这种制度最美好的方面也许在于它逐渐融合了工作和娱乐之间的分界线。虽然人们普遍认为社会需要某个正式的会计制度以完整运行,但事实是积极的人总是积极的,因为他们喜欢活动,而且大多数的行为都已被引导到愉快的却又是生产性的工作上来了。

曾被当作业余爱好的东西现已成为生产的一部分,很多生产被当作业余爱好一样组织起来。园艺和果艺管理、孩子教育、环境维护、木工活和一些改善型的小零活、甚至扩大和刷新建筑,以及烹饪和具有文化形式的实验(绘画、数学、音乐、诗歌,等等)都以这样一种与“正式”工作要求无关却与追求令人满意的社会生活有关的方式组织起来。hearth 永远都在为他们自己的娱乐和自我改善而组织计划。

这样花在孩子们教育上的正式时间就大大缩减了。孩子们天天跟着大人们(虽然不是全部,但他们中的多数都很喜欢这种体验)进入菜园和果园,进入温房或池塘、进入车间或其他什么地方。他们边做实际工作边学习关于植物学、生物学,以及农学、机械技艺等类似东西的原理。

不再有正式的教堂。教堂的用途发生了改变——小一点的变成了集体居住空间,其他的变成了 neighborhood 中心,还有一些变成了大型的娱乐礼堂(体育是一项备受喜爱的活动),或者变成了举办音乐会、戏剧表演、诗歌朗诵、音乐竞赛等类似事情的地方。这些空间的美妙因而就被保存了下来(经常在某个古老教堂聆听音乐的你们将会懂得我所说的意思)。

274 音乐很受喜爱,但它呈现了惊人的多样化形式。很明显,数学和诗歌已经与它联系在一起,而且每一种都会如此地加强另一种,以至于创造了一种每个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赞同的、我们这个世界的一般性诗歌概念。这三项已成为最大的公共庆典仪式的中心。

正式宗教的瓦解并不意味着任何精神损失。事实上,人们重视并尊重所有形式的“精神交流”。他们还把宗教文本当作美丽的故事和包含实际训诫和深刻精神领悟的道德童话来阅读和崇拜。

我们叫做“精神交流”的东西并不局限于传教士或者有学问的人,它对任何人都是开放的。当感觉到来时,个人会在家里、在工作场所、在街道上或者许许多多其他公共地方传布他们的思想。

你肯定会厌恶地看待这点,想象整个世界已经被你常在纽约市碰到的那些街角胡言乱语者所取代。但是这个行为现在已经融入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集中在精神权力和理性秩序的联合上。个人可以以孩子般的好奇心来探索思想、感情和梦想的王国,而且他们可以在一个最大自发性的氛围中这样做。

听起来我们似乎缺乏争论,其实这并不完全正确。冲突和争议(不仅仅在常常激烈辩论的精神交流者之间)被积极看待而不是被压制。争论的辩证法普遍被认为对于自我实现和社会变革是根本的。然而,如何表达、如何面对且如何解决争议,显然还存在着一些差异。

首先,“律师”的职业已完全消失(这是你们那一代大多数人所虔诚希望的历史事件,即使他们正沉溺于自己的诉讼中)。回顾过去,我们认为法律共同体是促进向野蛮状态早早堕落的主要肇事者。

但是法律的传统(就像宗教的传统)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因为它们被广泛地认为是文明社会生活的至关重要的准备。然而,在过去,他们却总是为某件永远不会到来的事情做准备。所以我们保留法律传统但废弃律师和法官的职业。

这个态度也贯彻在其他领域。例如,大学被解散。它们完全由20世纪早期的大企业势力所接收和管理,到2010年已成为企业/军事研究的中心或自我复制的企业/国家精英的特许培训中心。惟一一种默许的传统学术是一种令人困惑的学院主义,特别为剥夺所有的学习乐趣并防止重大思想形成或传播而设计(或者它看起来似乎如此)。

但是对知识的热爱并没有消失。现在摆脱了专业化的束缚,它经历了一个显著的复兴。个人以各种方式追求他们对文学、诗歌、数学、历史、地理、科学和艺术(传统的以及机械的和技术的)的热爱。他们在一个高度快乐、享受和争论的氛围中实现自己的多方面爱好,虽然总是要符合他们的其他职责(如木匠、美术设计员、厨师,或者其他什么)。至高无上的翻译艺术被高度崇拜和重视。

许多人选择在某一特定的 neighborhood 或 edilia 中度过周期性长假(乃至重新安排全部时间),在那里某一群人聚集到一起分享他们对某类知识的共同爱好,通过全身心地投入到他人的生活方式中从而学习谦逊的翻译艺术。

处于 17 岁年龄段的年轻人被要求在他们的 pradasha 之外至少生活一年,常常要去一个著名学者聚集的地方去学习诸如科学、数学、法律、宗教、图腾术或印度、中国和欧洲的伟大文学。虽然多数的信息可以用电子存储,但在一些 edilia 还是能发现许多古老的书籍和手稿,连同当地图书制作的技术,这些东西延续了那种手拿一本好书蜷在一个角落中的古老快乐。

大多数私有财产形式的废除以及向财产共有形式的转变消除了支配你们那个时代的许多法律争论,但是争议还是很频繁,有时甚至很严重。为了解决不同领域内的冲突,一些粗略的规则和习俗就产生了。

比如,人们极为重视 pradasha 内逐步上升为愤怒和斗争的争议。neighborhood 或 edilia 内富有经验的人的智慧很快就会被动员起来平息这样的斗争。

处理报应、公正和惩罚的所有方法都已改变。虽然对他人的侵犯事件(尤其是暴力)已大大减少,因为使其产生的温床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毁灭,但这样的事情仍有发生。这些情形主要被认为是犯罪者内心的不协调。所做的反应(如纳瓦霍人曾经的情况)就是寻找方法解决混乱并恢复和谐。

持久的侵犯会导致制裁,比如收回贸易特权。极端情形的持久侵犯会有可能被放逐到“危险地带”(由 edilia 议会作决定)。

276 这就意味着被分配到革命战争期间被污染的、生活仍有危险的地方。这些地方不能被遗弃,因为这里引起的毒性和疾病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来自于不同 nationa 的委员会和工作组在这里互相合作,而且出于清除持续犯罪和暴力目的而被从 edilia 中放逐出来的那些人部分地满足了对于非自愿劳动力的需求。

Edilia 或 regiona 之间的争议由协商委员会解决。在 regiona 的层次上,多数的争议涉及贸易关系,这些贸易关系通过普遍协议,以平等、非强迫和互惠为基础(我们已经把亚当·斯密的完善市场理念变得实际和真实,虽然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双边协议实现的)。有关贸易问题的纠纷是按照常规解决的,没有太多的异议。

相比较而言,广泛宣传的、具有咨询作用的全球委员会,它的存在是考虑到了一些更加困难的问题,比如:技术变革的路径、生产形态、环境问题、被认为是

全球共有地一部分的那些资源(比如生物多样性和海洋)的管理,以及属于灾难消除、人口再安置等类似情况的一些问题。

这些委员会应该警告各种层次(从 nationa 到 hearth)上的每个人注意全球共同问题的存在,这些问题也许需要地方性的解决方案。这些委员会首先成立于世界治理的短暂期间,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咨询性和顾问性的,但它们继续在制定 nationa 间协议的方面发挥着重大的影响。

政治代表制度非常简单。我们作简要讲述以免使你们感到厌烦。

每个 hearth 选举一名代表在 neighborhood 委员会工作,任期三年,不可续约。每个 neighborhood 选举一个人服务于 edilia 委员会,任期三年,不可续约,如此这般一直到 nationa 级别,每个 nationa 派一些代表到全球委员会工作。

Neighborhood 以上的每一级政府都可以支持个人(不超过人口的 5%)在技术/行政秘书处工作十年以下。在这样一个职位上,个人可以凭借计算机化的招标制度和电子公告牌而从事科学/科技委员会工作或从事分配制度的改善及研究和发展工作。

所有这样的人员必须附属于一个特殊的 hearth,他们在这个 hearth 中以标准方式参与活动(他们的活动所得到的劳动分值在 hearth 中非常受重视),这是一个严格的规则。这些人员被分散在许多 hearth 中(委员会和秘书处定期地从一个 edilia 搬到另一个 edilia),确保 hearth 中的人员与在更高级层次上的工作人员之间的强大联系。我们因此就避免了这样一种行为:允许特权的官僚政治精英形成一个小的居住集团,并脱离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必需品和欲望,这在你们时代极具破坏性。

277

一些生产活动通过 nationa 来组织。我们这里所谈的是像电子学、硅片、金属加工、工程学、交通、通讯系统和纺织纤维生产这样的事情。这些部门高度自动化,所需劳动力很少。他们通常把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结合起来,并能够很快地从一种产品转换到另一种(如用于不同目的的硅片或不同种类的电子设备)。

因此,这就含有很强烈的、曾被你们宣告为“非民主的中央计划编制”的成分(被当作是“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而不加理会)。这种计划编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 regiona 的层次上,它在把生产中的秩序需求和作为文化复兴温床的局部混乱的渴求相结合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

农业同样在大规模的、少劳力的谷物、原料、豆子和豆类生产输入制度和

涉及鱼池、园地及溶液培养的耕作体系这些劳动密集型活动之间进行分配。Regiona 层次上的管理委员会努力在这两类农业之间寻找平衡,以期构建长期的可持续性、自足性和社会性。

一个极好的副作用就是人们的饮食偏好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主要以谷物、豆子、豆类、蔬菜、坚果和水果为基础。含肉量(始终都是富人们的一个独占领域,又是一种非常低效的养活人的手段)大大降低。这就允许废除在你们那个时代为了生产牛肉和鸡肉而发展的令人不快的、丧失体面的活动。

革命以后确定的某些个人习惯和价值在你们看来也许很陌生,甚或感觉不快。有许多人已经有点习惯于符合局部自足的斯巴达式简朴生活方式。即使已尽了各种努力来抚慰身体痛苦,但形势也需要人们养成相当坚强的心理态度来面对伤痛和伤害。

这种普遍的态度有助于防止回到自我放纵的忧郁症(类似于大规模的歇斯底里症),这种忧郁症是你们那个时代服药丸的精英阶级的特征(你不也是在服用抗忧郁药品氟西丁吗?)。它还预防医药公司去迎合(如它们过去曾经公然所做的)与真正疾病相对的形象出来的病症。而且它强迫精神分析回归源头,并承认精神疾病的治疗在于亲密的、优秀的和深入的对话艺术。一个专门化的职业就成了一个普通的艺术形式。

我们对医疗保健的思考已经非常成熟。每个 hearth 至少有两个人了解较轻微的病症,而且从 neighborhood 到 edilia 再到 regiona 都存在着某种信息流和设备等级。许多(虽然不是全部)大型医院被解散了转而支持 neighborhood 保健单位。

卫生保健重预防胜于治疗,对缓解药物的需求大大减少(你们自己的制药企业就是典型地反对预防,甚至反对治疗,就是为了通过对缓解药物的依赖而长期保持利润)。另一个有趣的特征就是,既被认为是一门治疗的科学又被当作是一项艺术的医疗保健因为地区的不同而在特性和风格上经常存在着差异。

例如,虽然人们普遍认为,有尊严地死去是正确的,但方式大不相同,从相对私人 and 安静的方式到非常社会性的、甚至喧闹的方式,各有差异。死亡并不可怕,但却被当作是生活的完整部分,而且不遗余力不惜任何代价地去阻止它已不仅仅只是方式问题(正如你们时代特权精英们的情况)。

死亡被看作是极端悲伤和庆祝的时刻,是人类精神永远地回到其起源的时刻,是把所有完成的东西通过生命传给下一代的时刻。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



人反思和清算的时刻，是屈服于生死并再次致力于值得传给下一代的行为和关系的时刻。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使我们许多人现在相信死者的灵魂会继续流传在我们中间，直至永远。

但我们必须停止这一话题！在可以言说的许多其他事情中，我们只说那些最重要的。

也许所有的事情中最难传达的（特别对一整代你们这类怀疑主义者和愤世嫉俗者来说）是那个遍及新社会秩序中的精神。似乎并不是权力的意志、表演的兴奋、激情的追求或者个人和集体充满危险的好奇心受到约束，正好相反，所有这些因素都繁荣活跃，只是被引向不同的路径。

首先，正是价值革命产生了影响。关于此事，最重要的事情留在最后去说。金钱在我们的世界里消失了，这是令人吃惊的。有关这一点，我们没有什么原创性的东西要说，因为托马斯·莫尔爵士早已非常完整地阐述过（竟然是在1516年），你也许还记得。他主张，现存社会只是：

279

富人在有组织的社会这个借口之下增进他们自己利益的一个阴谋。他们想出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首先是为了保持他们来路不正的财富，然后是为了尽可能廉价地购买穷人的劳动从而剥削他们。一旦富人们决定这些阴谋诡计应该得到社会——既包括富人也包括穷人——的正式承认，他们就获得了法律的力量。因此，贪得无厌指引着这样一群寡廉鲜耻的少数人垄断了足以满足全部人类需要的财富。

但是在乌托邦中：

随着同时废除金钱和对金钱的激情，有多少社会问题会迎刃而解，有多少犯罪行为会被根除！显然，金钱的终结意味着所有其他类型的犯罪行为的终结……一旦金钱消逝，你就可以对恐惧、紧张、焦虑、过度操劳和不眠之夜说再见了。哎呀，如果金钱不再存在，那么即使贫穷本身这个似乎总是依赖于金钱来加以解决的问题也将迅速消失。

由你们那个时代的电子银行业所开创的计算机化交易业务允许废除金钱

交易,制度就是专门设计用来促进这种交易的。现在参与各种各样的多重服务交易,从性承诺到炊事用具,有可能根本不需要用到金钱。整个社会世界现在被以这样一种方式完全颠倒了,那就是与无意识地追求金钱权力相对比,交换有意义的用途现在成了社会秩序的支配性主旨。

我们现在的主要辩论是围绕特殊用途的“意义”进行的。在这里,那个仍然激励无数激情的、巨大的、未能回答的问题仅仅是:“人性的真正天性到底能变成什么……”

.....

我惊醒时一身冷汗。我是不是做了一个美梦或者一个恶梦?我使劲地张开眼睛,凝视着窗外。我还是在1998年的巴尔的摩,但是我不确信对事实感到安心还是感到忧伤。

这天的大多数时候,这个梦都纠缠着我。留给我的基本画面是实际的、符合基本常识的,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很诱人的。但是还有很多的因素使我在对它们做进一步的思考时感到焦虑和紧张。

280 想象这样一个世界:我们的生活中没有银行或保险公司,没有跨国公司,没有律师、股票经纪人,没有巨大的官僚机构,没有这样或那样的教授,没有军事机关,没有错综复杂的执法形式。

想象所有的工人不再屈服于他们现在必定要做的悲惨的、寄生的活动。想象他们摆脱生产性任务的工作,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对生态有益的科技只要求一天几小时的工作以满足日常的需要。

想象当代生活发狂的步伐减慢了,想象我们目前只能在各种强制性义务之间攫取的纯享受时刻变得丰富充足。

最重要的是,想象一个尊重人的、平等的世界,不仅是才能和成就的平等,而且是生活条件和生活机会的平等——总之,把自己的生计负担转嫁到他人肩上的这样一个丑陋习俗完全消失的世界。

想象这样一个世界,对金钱利益的追求不再重要,金子的光芒也失去了它的诱惑力。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景象是令人愉快的。但日常生活失去了所有这些惯常的支撑,那也是非常可怕的。

喝了一杯热卡普契诺咖啡,我渐渐地放松了下来。股票市场在经过了一个夏天的起伏之后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点。我所梦到的每件事情对我们当

代方式来说无疑是令人不能容忍地、奇异地陌生,以至于肯定不能成为现实,我从这个事实中得到了一些安慰。社会舆论对于这一系列可能性的讨论必定会没有什么好话,我自言自语,“肯定如此”。它毕竟是由那种我非常不喜欢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预示灾难性的情节所支撑的非辩证传说。

我漫步在巴尔的摩的街头。

这座华丽塔楼的宏伟纪念碑沉重地环绕着我。宾馆、公司、高消费公寓、足球和棒球体育馆、会议中心、精英医疗机构等等这些设施都是由一个精致的政府资助的福利制度支撑着。富人建立了国内最好的私立学校、大学和医疗设施体系,而同时大量被排斥的人口却淹没在公共部门的泥沼中,这个公共部门如此忙于对富人资助以致于不能为主要的入口实现哪怕是基本的功能标准。

市郊非生态蔓延繁荣发展,但市中心4万闲置房屋却在风化和腐烂。炎热的夏天,污秽的臭氧层盘旋在城市的上空。4万静脉注射吸毒者徘徊在街头;施舍处被迫达到饱和(就像监狱里的情况);穷人的食物储备已经用完;死亡、饥馑、疾病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马尔萨斯式的幽灵像块幕布一样笼罩在城市的街头。

281

霍华德呼吁的团结、友善和正义的秩序在哪里?如果我的梦境有一些梦魇的成分,那么现实不就完全是一场恶梦吗?

我总是认为莫尔写《乌托邦》的目的不是为未来提供一份蓝图,而是为了审视他那个时代荒谬的浪费和愚蠢,并坚持事情可以而且必须变得更好。

我想起贝拉米的主人公在回到1888年的波士顿时,发现情况比他想象的甚至更加可怕,同时他还因为谈论替代方案而被嘲笑、被放逐。他的当代现实变成了他的梦魇。这不正是像我们的情况吗?

正如我们大多数人所相信的,如果我们有能力按照我们的幻想和欲望去塑造世界,那么我们是怎么共同地把它弄得一团糟的?社会的和自然的世界可以而且必须被制造、被重造,如果失败了,那就再重造。从何处开始,以及要做什么才是关键的问题。

贝拉米指出,《回顾》是写于“预示着重大变革发生的”时刻,就像现在一样。它还写道:

相信黄金时代存在于我们的前方而不是后方,而且并不遥远。我们的孩子将肯定会看到,而且如果我们通过自己的信念和工作证明我

们值得拥有这些,那我们——男人和女人——也会看到。

当黄金时代来到的时候,我们最终会希望“对恐惧、紧张、焦虑、过度操劳和不眠之夜说再见了”。

## 参 考 书 目

- Abers, R. 1998, 'Learning democratic practice: Distributing government resources through popular participation in Porto Alegre, Brazil,' in Douglass, M., and Friedmann, J. (eds), *Cities for Citizens*, New York, 39-66.
- Alston, P. (ed.), 1992, *The United Nations and Human Rights: A Critical Appraisal*, Oxford.
-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1947, 'Statement on human right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49, 539-43.
- Amin, S. 1974,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New York.
- Arrighi, G. 1994,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 Avineri, S. 1972, *Hegel's Theory of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 Bacon, F. 1901 edition, 'New Atlantis,' in *Ideal Commonwealths*, London, 103-7.
- Bakhtin, M. 1981,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Austin, Texas.
- 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 Bellamy, E. 1888, *Looking Backward*, New York.
- Benjamin, M. 1998, 'Time for a living wage, around the world,' *Global Exchanges*, 36, 1-5.
- Benjamin, W. 1969, *Illuminations*, New York.
- Benton, T. 1993, *Natural Relations: Ecology, Animal Rights and Social Justice*, London.
- Birch, C., and Cobb, J. 1981, *The Liberation of Life: From the Cell to the Community*, Cambridge.
- Blakely, E. 1997, *Fortress America: Gated Commun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Mass.
- Blaut, J. 1977, 'Where was capitalism born?' in Peet, R. (ed.), *Radical Geography*, Chicago, 95-111.
- Blaut, J. 1993, *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 New York.
- Bloch, E. 1986, *The Principle of Hope* (4 vols), Oxford.
- Bloch, E. 1988, *The Utopian Function of Art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
- Bohm, D. 1983, *Wholeness and the Implicate Order*, London.
- Borja, J., and Castells, M. 1997, *Local and Global: Management of Cit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London.
- Brooks, R. 1992, 'Maggie's man: We were wrong,' *The Observer*, Sunday June 21st, 1992, 21.
- Butler, J. 1993,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 Butler, J. 1998, 'Merely cultural,' *New Left Review*, 227, 1998, 33-44.
- Campanella, T. 1901 edition, 'City of the Sun,' in *Ideal Commonwealths*, London.

- Capra, F. 1996, *The Web of Life*, New York.
- Cardoso, F., and Faletto, E. 1979,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Berkeley.
- Castells, M.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 Castells, M. 1997, *The Power of Identity*, Oxford.
- Castells, M. 1998, *End of Millenium*, Oxford.
- Chevrier, J.-F. 1997, *The Year 1967: From Art Objects to Public Things*, Barcelona.
- Clark, L. 1991, *Blake, Kierkegaard, and the Spectre of the Dialectic*, Cambridge.
- Deleuze, G., and Guattari, F. 1984,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London.
- Derrida, J. 1994, *Given Time: 1. Counterfeit Money*, Chicago.
- Derrida, J. 1994, *Specters of Marx*, London.
- Dickens, C. 1961 edition, *Hard Times*, New York.
- Douglass, M., and Friedmann, J. (eds), 1998, *Cities for Citizens*, New York.
- Duany, A. 1997, 'Urban or suburban?' *Harvard Design Magazine*, Winter/Spring 1997, 47-63.
- Eagleton, T. 1997, 'Spaced out,' *London Review of Books*, April 24th, 1997, 22-3.
- Edsall, T. 1984, *The New Politics of Inequality*, New York.
- Elias, N. 1978, *The Civilising Process: The History of Manners*, Oxford.
- Emmanuel, A. 1972, *Unequal Exchange: A Study of the Imperialism of Trade*, New York.
- Etzioni, A. 1997, 'Community watch,' *The Guardian*, June 28th, 1997, 9.
- Fernandez-Kelly, P. 1994, 'Towanda's triumph: Social and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in the urban ghett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8, 88-111.
- Fishman, R. 1982, *Urban Utopia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 Fishman, R. 1989, *Bourgeois Utopias: The Rise and Fall of Suburbia*, New York.
- Fontenelle, Bernard Le Bovier, 1972 edition, *Conversations on the Plurality of Worlds*, New York.
- Forman, M. 1998, *National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Movement: The Idea of the Nation in Socialist and Anarchist Theory*, University Park, Pa.
- Foster, J. 1974, *Class Struggl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 Foucault, M. 1973 edition, *The Order of Things: The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 Foucault, M. 1984, 'Preface' to G. Deleuze and F.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London.
- Foucault, M. 1986, 'Of other spaces,' *Diacritics*, 16(1), 22-7.
- Foucault, M. 1995 edition,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XI-XIV.
- Frank, A. 1969,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 Frank, A. 1997, 'Quantum bees,' *Discover*, November 1997, 81-7.
- Frankel, B. 1987, *The Post-industrial Utopians*, Oxford.
- Fraser, N. 1997, *Justice Interruptus*, London.
- Friedman, T. 1996, 'Revolt of the Wannabe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7th, 1996, A19.

- Fukuyama, F. 1992,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 Geddes, P. 1968, *Cities in Evolution*, New York.
- Geras, N. 1983, *Marx and Human Nature: Refutation of a Legend*, London.
- Geronimus, A. T., Bound, J., Waidman, T., Hillemeier, M., and Burns, P. 1996, 'Excess mortality among blacks and whi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35, No. 21, 1552-8.
- Gibson, W. 1984, *Neuromancer*, New York.
- Glickman, L. 1997, *A Living Wage: American Workers and the Making of Consumer Society*, Ithaca, New York.
- Goldberg, D. 1993, *Racist Culture*, Oxford.
- Goodman, E. 1996, 'Why not a labor label?' *Baltimore Sun*, July 19th, 1996, 25A.
- Gould, S. 1988, *Time's Arrow, Time's Cycle*, New York.
- Gramsci, A. 1971 edition,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London.
- Gramsci, A. 1978 edition,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21-1926*, London.
- Gray, J. 1998, *False Dawn: The Il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
- Greenhouse, S. 1997a, 'Voluntary rules on apparel labor proving elusiv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st, 1997, 1.
- Greenhouse, S. 1997b, 'Accord to combat sweatshop labor faces obstacles,' *New York Times*, April 13th, 1997, 1.
- Greider, W. 1997, *One World, Ready or Not*, New York.
- Grosz, E. 1994, 'Bodies-cities,' in Colomina, B. (ed.), *Sexuality and Space*, Princeton, 241-53.
- Hall, P. 1988, *Cities of Tomorrow*, Oxford.
- Hamilton, B., and Kahn, P. 1997, 'Baltimore's Camden Yard Ballpark,' in Noll, R., and Zimbalist, A. (eds), *Sports, Jobs, and Taxes: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Sports Teams and Stadiums*, Washington, D.C., 245-81.
- Hanke, S. 1996, 'Looks like charity, smells like pork,' *Forbes Magazine*, May, 87.
- Hanson, S., and Pratt, G. 1994, *Gender, Work and Space*, London.
- Haraway, D. 1991,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 Haraway, D. 1995, 'Nature, politics, and possibilities: a debate and discussion with David Harvey and Donna Haraway,' *Society and Space*, 13, 507-27.
- Hareven, T. 1982, *Family Time and Industrial Time*, London.
- Harvey, D. 1982,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 Harvey, 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 Harvey, D. 1992, 'A view from Federal Hill,' in Shopes, L., Fee, E., and Zeidman, L. (eds), *The Baltimore Book: New Views of Local History*, Philadelphia, 226-49.
- Harvey, D. 1996,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Oxford.
- Hayden, D. 1981, *The Grand Domestic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Feminist Designs for American Homes, Neighborhoods, and Cities*, Cambridge, Mass.
- Hegel, G. W. 1967 edition, *Philosophy of Right*, New York.
- Herbert, B. 1997, 'Brutality in Vietnam,' *New York Times*, March 28th, 1997, A29.

- Herod, A. 1997, 'Labor as an ag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as a global agent,' in Cox, K. (ed.), *Spaces of Globalization: Reasserting the Power of the Local*, New York, 167-200.
- Herod, A. (ed.), 1998, *Organizing the Landscape: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s on Labor Unionism*, Minneapolis.
- Hetherington, K. 1997, *The Badlands of Modernity: Heterotopia and Social Ordering*, London.
- Hirst, G., and Thompson, G. 1996,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Cambridge.
- Holmes, S. 1996, 'Children of working poor are up sharply, study says,' *New York Times*, June 4th, 1996, D21.
- Huntington, S.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Cambridge, Mass.
-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1996, *World Employment 1996/97: National Policies in a Global Context*, Geneva.
- Jacobs, J. 1961,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 Johnson, C. 1974, *Utopian Communism in France: Cabet and the Icarians*, Ithaca, New York.
- Karatani, K. 1995, *Architecture as Metaphor: Language, Number, Money*, Cambridge, Mass.
- Kasarda, J. 1995,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changing location of jobs,' in Farley, R. (ed.), *State of the Union: America in the 1990s*, Vol. 1, New York, 151-76.
- Katz, P. 1994, *The New Urbanism: Toward an Architecture of Community*, New York.
- Kuhn, T.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 Kumar, K. 1987, *Utopia and Anti-Utopia in Modern Times*, Oxford.
- Kumar, K. 1991, *Utopianism*, Milton Keynes.
- Kunstler, J. 1993, *The Geography of Nowhere*, New York.
- Kunstler, J. 1996, *Home from Nowhere: Remaking Our Everyday World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 Langdon, P. 1994, *A Better Place to Live: Reshaping the American Suburb*, Amherst, Mass.
- Lange, J. 1996, Personal interview, Baltimore, Md.
- Lefebvre, H. 1976,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New York.
- Lefebvre, H.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 Lenin, V. I. 1956 editio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Moscow.
- Lenin, V. I. 1970 edition, *Selected Works* (3 vols), Moscow.
- Levins, R., and Lewontin, R. 1985, *The Dialectical Biologist*, Cambridge, Mass.
- Levitas, R. 1990. *The Concept of Utopia*. London.
- Levitas, R. 1993, 'The future of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in Bird, J., Curtis, B., Putnam, T., Robertson, G., and Tickner, L. (eds), *Mapping Futures*, London, 257-66.
- Lewontin, R. 1982, 'Organism and environment,' in Plotkin, H. (ed.), *Learning,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hichester, 151-68.



- Lowe, D. 1995, *The Body in Late-capitalist USA*, Durham, N. C.
- Lukerman, F., and Porter, P. 1976, 'The geography of utopia,' in Lowenthal, D., and Bowden, M. (eds), *Geographies of the Mind: Essays in Historical Geosophy*, New York, 226-49.
- Luxemburg, R., and Bukharin, N. 1972 edition, *Imperialism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New York.
- Mandeville, B. 1970 edition, *The Fable of the Bees*,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 Mao Tsetung 1971, *Selected Readings*, Peking.
- Marin, L. 1984, *Utopics: Spatial Play*, London.
- Marsh, G. P. 1965 edition, *Man and Nature: Or, Physical Geography as Modified by Human Action*, Cambridge, Mass.
- Martin, E. 1994, *Flexible Bodies*, Boston.
- Marx K. 1964 editio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New York.
- Marx, K. 1965 edition, *Wages, Price and Profit*, Peking.
- Marx, K. 1967 edition, *Capital* (3 vols), New York.
- Marx, K. 1968 edition,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3 vols), New York.
- Marx, K. 1970 edition,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 Marx, K. 1973 edition, *Grundrisse*, New York.
- Marx, K. 1976 edition, *Capital*, Vol. 1, New York.
- Marx, K. 1978 edition, *Capital*, Vol. 2, New York.
- Marx, K., and Engels, F. 1952 edition,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Moscow.
- Marx, K., and Engels, F. 1972 edition, *The Marx-Engels Reader* (edited by Robert Tucker), New York.
- Marx, K., and Engels, F. 1980 edition, *Collected Works*, Vol. 16, New York.
- Marx, K., and Lenin, V. I. 1940 edition,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The Paris Commune*, New York.
- Meszaros, I. 1995, *Beyond Capital*, New York.
- Miyoshi, M. 1997, 'A borderless world,' *Politics-Poetics Documenta X* (the book of the exhibition), Kassel, 182-202.
- Moody, K. 1997, *Workers in a Lean World*, London.
- More, T. 1901 edition, 'Utopia,' in *Ideal Commonwealths*, London.
- Mumford, L. 1961, *The City in History*, New York.
- Munn, N. 1985, *The Fame of Gawa*, Cambridge.
- Naess, A., and Rothenberg, D. 1989, *Ecology, Community and Lifestyle*, Cambridge.
- Nussbaum, M. 1996, *For Love of Country: Debating the Limits of Patriotism*, Boston.
- Ohmae, K. 1995, *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The Rise of Regional Economies*, London.
- Ollman, B. 1993, *Dialectical Investigations*, London.
- Ollman, B. (ed.), 1998, *Market Socialism: The Debate among Socialists*, London.

- Parfitt, D. 1986, *Reasons and Persons*, Oxford.
- Park, R. 1967 edition, *On Social Control and Collective Behavior*, Chicago.
- Phillips, A., and Rosas, A. 1995, *Universal Minority Rights*, Abo and London.
- Polanyi, K. 1957 edition,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 Pollin, R., and Luce, S. 1998, *The Living Wage: Building a Fair Economy*, New York.
- Poovey, M. 1998,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Fact*, Chicago.
- Prigogine, I., and Stengers, I. 1984, *Order out of Chaos: Man's New Dialogue with Nature*, New York.
- Putnam, R.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 Readings, B. 1996, *The University in Ruins*, Cambridge, Mass.
- Ricoeur, P. 1992, *Oneself as Another*, Chicago.
- Robinson, K. 1993-6, *The Mars Trilogy*, New York.
- Rodney, W. 1981 edition, *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 Washington, D.C.
- Ronen, R. 1994, *Possible Worlds in Literary Theory*, Cambridge.
- Ross, A. (ed.) 1997, *No Sweat*, London.
- Ross, K. 1988,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Space: Rimbaud and the Paris Commune*, Minneapolis.
- Rothman, D. 1971, *The Discovery of the Asylum*, Boston.
- Said, E. 1978, *Orientalism*, New York.
- Sandercock, L. 1998, *Towards Cosmopolis*, New York.
- Scully, V. 1994, 'The architecture of community,' in Katz, P., *The New Urbanism: Toward an Architecture of Community*, New York.
- Schwab, K., and Smadja, C. 1999, 'Globalization needs a human fac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28th, 1999, 8.
- Seabrook, J. 1996, *In the Cities of the South: Scenes from a Developing World*, London.
- Sen, A. 1982, *Poverty and Famines*, Oxford.
- Sennett, R. 1970, *The Uses of Disorder: Personal Identity and City Life*, New York.
- Simmel, G. 1971,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in Levine, D. (ed.),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Chicago, 324-39.
- Smith, A. 1937 edition, *The Wealth of Nations*, 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 Smith, H. 1998, 'How the middle class can share in the wealth,' *New York Times*, April 19th, 1998, B18.
- Smith, N. 1990, *Uneven Development: 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 Smith, N. 1992, 'Geography, difference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 in Doherty, J., Graham, E., and Malek, M. (eds), *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57-79.
- Soros, G. 1996, 'The capitalist threat,' *The Atlantic Monthly*, September, 1996, 18-28.
- Stafford, B. 1991, *Body Criticism: Imaging the Unseen in Enlightenment Art and Medicine*, Cambridge, Mass.
- Strathern, M. 1988, *The Gender of the Gift*, Berkeley.

- Swyngedouw, E. 1997, 'Neither global nor local: "gloc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 in Cox, K. (ed.), *Spaces of Globalization: Reasserting the Power of the Local*, New York, 137-66.
- Tafuri, M. 1976, *Architecture and Utopia*, Cambridge, Mass.
- Thomas, P. 1985, *Karl Marx and the Anarchists*, London.
- Thompson, E. P. 1968,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 Thornberry, P. 1995, 'The UN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 belonging to national, ethnic, religious and linguistic minorities: Background, analysis, observations, and an update,' in Phillips, A., and Rosas, A. (eds), *Universal Minority Rights*, Abo and London, 13-76.
- Unger, R. 1987a, *False Necessity: Anti-necessitarian Social Theory in the Service of Radical Democracy*, Cambridge.
- Unger, R. 1987b, *Social Theory: Its Situation and Its Task*, Cambridge.
-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1996, *World Scientists' Warning to Humanity*,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Cambridge, Mass.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1996,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6*, New York.
- Von Frisch, K. 1967, *The Dance Language and Orientation of Bees*, London.
- Wallerstein, I. 1974,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New York.
- Webber, M., and Rigby, D. 1996, *The Golden Age Illusion: Rethinking Postwar Capitalism*, New York.
- White, J. B. 1990, *Justice as Translation: An Essay in Cultural and Legal Criticism*, Chicago.
- Whitehead, A. N. 1969, *Process and Reality*, New York.
- Williams, R. 1989, *Resources of Hope*, London.
- Wilson, E. 1998, *Consilience: The Unity of Knowledge*, New York.
- Wilson, W. J. 1996, *When Work Disappears: The World of the New Urban Poor*, New York.
- World Bank 1995,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Workers in an Integrating World*, New York.
- Wright, M. 1996,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Geography of Skill*, Ph.D. Dissertati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Baltimore.
- Zeldin, T. 1994, *An Intimate History of Humanity*, New York.
- Zola, E. 1891, *Money*, Gloucestershire.

# 索引

(索引标注的页码为原著页码,查阅时,请看本书页边码)

- alienation 异化 10-11, 21-2, 28-9, 49, 102, 106, 207, 213
- alternatives 替代方案, 其他选择 5, 9, 17, 40, 45-6, 48, 50, 63, 70-4, 82, 91, 108, 117, 154-6, 163, 168, 175-6, 182-3, 187-8, 195-6, 199, 203-4, 206, 211-13, 218, 223, 231, 235, 243-55
- Althusser. L. 阿尔都塞 12, 225
- anarchism 无政府主义 35, 82, 161
- architects 建筑师 159, 164, 169-73, 183-4, 200-2, 204, 212, 214, 230-2, 233-55
- authenticity 本真性, 真实 74, 101, 169, 244
- authoritarianism 极权主义 66, 163-4, 182-3, 188, 215, 217, 235, 240, 242, 253
- authority 权威 104, 163, 178, 188, 193, 196, 240
- Bacon. F. 培根 160, 167, 191
- Bellamy. E. 贝拉米 190, 257, 281
- biology 生物学 99, 115, 202, 206-12, 214-16, 226-7
- Bloch. E. 布洛赫 156, 258
- body 身体 12-16, 49-50, 85, 90, 92, 97-116, 117-30, 202, 208, 236, 249
- bourgeoisie 资产阶级 18, 22, 24-40, 47-8, 55, 57, 71, 76, 85-6, 91, 94, 107, 115, 119, 168, 178, 191, 206, 236
- built environment 人工环境 58, 77, 159, 171-3, 178, 181, 243-4, 250
- Butler. J. 巴特勒 15, 98, 115, 118, 127, 246
- Cabet. E. 卡贝 30, 173
- Campanella 康帕内拉 160
- capital 资本 21-2, 25, 28-9, 38-9, 68, 88-9, 101, 103, 107, 117, 120, 122
- accumulation of 积累 7, 16, 23, 25, 27-30, 31-40, 49, 52, 54-5, 57-60, 68, 85, 89, 97-116, 120, 122, 128, 160, 173, 177-9, 192-5, 199, 237, 239
- flows 流 33-5, 41, 56, 65, 192
-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5-7, 13, 22-40, 43-5, 48, 54-67, 73-4, 78, 82, 89-91, 104-16, 122, 130, 176, 181-2, 186, 191-6, 203, 206, 210, 213-14, 241-3, 254
- capitalists 资本家 6-7, 38, 69, 77, 107-8, 111, 114, 191, 215, 245, 254-5
- cities 城市(参见 urbanization) 8-9, 24, 36-7, 46-7, 50, 54, 64, 77, 133-54, 156-79, 189, 195, 204, 211
- class 阶级 5, 24, 34, 36-8, 41-2, 47-52, 56-7, 64, 69, 81, 99, 102-3, 106-16, 118, 126-30, 148, 158, 161, 170, 177, 207, 210, 218, 221-2, 235, 244, 252
- definition 定义 102-3
- formation 构成 39, 41-2, 51, 56, 64, 118
- struggle 斗争 7, 18, 21, 25-6, 31, 34-8, 41,

- 45-52, 54-5, 57, 71-2, 76, 81-2, 89, 104, 107, 112, 121-30, 170, 174, 177, 196, 216-17, 222
- collectivities 集体 49, 62, 75, 104, 106, 110-13, 115, 159, 193, 200, 207, 213-14, 217-18, 223-4, 231, 234, 238-41, 246, 249-50
- colonies 殖民 5, 11, 24, 26-30, 53, 74, 82, 86, 106, 178, 189-92
- commonality and difference 共同性和差异 40, 72, 74, 84, 87, 130, 245-50
- communications 通讯 25, 32-4, 45, 62-3, 73, 76, 208-9, 230, 251
- communism 共产主义 4, 6, 23-50, 31-40, 48-51, 54, 57, 82, 194, 211, 221, 241
- communitarianism 社群主义 154, 214, 239-41, 249
- community 社区, 社群共同体 4, 40, 50, 55, 75, 79, 84-5, 113, 115, 125, 127, 148, 150, 239-41
- gated 门控 150, 164, 168-7, 239-41, 249, 253
- competition 竞争 13, 16, 42, 56, 64, 66, 69, 79, 109, 150, 156, 181, 209-11
- consilience 和谐, 一致 226-30
- consciousness 意识 13, 21, 85, 203-5, 236, 238
- consumption 消费 11, 62-3, 67, 70, 101, 109-16, 117, 120, 128, 154, 182, 193-5, 221, 223, 236, 249
- contradiction 矛盾 23, 26-9, 50-1, 55, 57-8, 59, 86, 91, 93-4, 98, 102-4, 112, 180-1, 193-4, 204, 212, 221, 225, 233
- creative destruction 创造性破坏 21-3, 58, 69, 105, 115, 177, 253
- creative powers 创造力 102-3, 117, 175, 200, 204, 232
- crises 危机 22-3, 29-30, 54, 58, 111
- environmental 环境 215-18
- culture 文化 5, 13, 16, 23-4, 40, 45-6, 56, 62, 65, 67, 74, 78-80, 83-8, 91-4, 107-8, 110, 115, 127, 130, 166, 177, 185, 189, 205, 208-10, 214, 224, 241, 244-6, 250, 252
- Darwin, C. 达尔文 5, 210, 227
- deindustrialization 非工业化 7, 9, 78, 91, 113, 122, 148, 170, 186
- Deleuze, G. 德鲁兹 58, 60
- democracy 民主 30, 65, 69, 74, 91, 178, 180, 187-8, 192, 215, 239, 249
- Derrida, J. 德里达 49, 224
- Descartes, R. 笛卡尔 100, 182, 191, 208
- desire 欲望 5, 21, 106, 110-12, 115, 175, 183, 186, 195, 234-5, 237
- dialectics 辩证法 (参见 utopianism, dialectical) 15-16, 26, 29, 32, 35, 40, 52, 55, 88, 94, 98-101, 104, 116, 159-60, 167, 174-5, 185, 188-9, 196, 199-200, 206, 218, 224, 228-30, 233-4, 241-2, 253
- difference 差异 (参见 diversity: heterogeneity), 67, 77-84, 86, 93-4, 99, 184-5, 237, 241, 251
- discourse 话语 11-12, 15-17, 53, 85, 98, 122, 130, 183-4, 209, 213, 215, 218, 222, 224, 229-30, 235, 243-4, 246-7
- Disney 迪斯尼 44, 51, 164, 167, 168
- diversity 差异 (参见 difference: heterogeneity) 46, 64-5, 74, 77-84, 152, 164, 184,

- 202, 209, 215, 229
- ecocentrism 生态中心主义 214 - 15
- ecology 生态 23, 33, 46, 50 - 1, 59, 71, 75, 78, 116, 138, 161, 169, 190, 199, 214 - 15, 220, 227 - 9, 231, 233, 236, 239, 244, 254
- either / or 非此/即彼 174 - 5, 185, 188, 196, 235, 246
- Engels, F. 恩格斯 21 - 40, 43, 45, 48, 52, 114, 154, 178, 195, 203, 206, 236
- environment 环境 5 - 6, 15, 23, 42, 46, 51, 65 - 7, 73, 76 - 7, 81, 84, 91, 141, 159, 169, 177, 189, 191, 194 - 5, 202, 204, 207, 209, 211, 215 - 23, 229, 231, 241, 244
- environmental justice 环境正义 73, 222, 248, 250
- evolution 进化 77, 98, 189, 202, 208 - 12, 213 - 32, 251 - 2, 254
- family 家庭 26, 45, 105, 114, 125, 129, 176, 229
- finance 金融 13, 35, 58 - 9, 61 - 3, 65, 203 - 4, 222, 242, 244
- Foucault, M. 福柯 15, 100 - 1, 106, 163, 183 - 5
- Fourier, C. 傅立叶 239
- Fukuyama, F. 福山 176, 192
- Geddes, A. 格迪斯 189
- gender 社会性别(参见 women) 5, 40, 45 - 6, 98 - 9, 105, 109, 112, 114, 116, 122 - 3, 126, 182, 221, 252
- geography 地理, 地理学(参见 historical geography) 3 - 4, 14, 23 - 41, 47 - 9, 54, 56 - 68, 70 - 1, 75 - 94, 105, 108, 121, 148, 160, 177 - 80, 252
- expansion 扩张 24 - 30, 54, 62 - 3, 179
- fragmentation 碎片化 32 - 4, 39 - 40, 45 - 6, 49, 55, 63, 77 - 83, 185, 218
- geopolitics 地缘政治 31 - 3, 40, 51, 54, 65, 68 - 70, 76, 80, 178, 180, 192 - 5
- Gingrich 金里奇 62, 176
-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9, 12 - 14, 21, 23 - 5, 38, 46, 49, 53 - 72, 73 - 94, 98, 109 - 10, 116, 120, 126, 130, 178 - 81, 191 - 6, 211, 233, 249
- Godard, J-L. 戈达尔 8 - 11
- Gramsci 葛兰西 6, 17, 98, 104
- Gray, J. 格雷 68, 70, 74, 177
- Haraway 哈拉维 98, 101
- harmony 和谐 99, 160, 167, 228, 231
- Hausmann, G. 豪斯曼 235, 237
- Hegel, G. 黑格尔 11, 26 - 9, 31 - 2, 174, 176, 188, 192, 196, 199
- heterogeneity / homogeneity 异质性/同质性(参见 difference) 45, 64, 67, 74, 83, 104, 106, 113, 178, 184 - 5, 244, 254
- heterotopia 异托邦 183 - 5, 240
- historical-geographical materialism 历史-地理唯物论 15, 55, 191, 200, 254
- historical geography 历史地理(学)(参见 geography) 6, 15, 21 - 40, 47 - 51, 54, 58, 60, 67, 77 - 93, 98, 105, 109 - 10, 114, 116, 118, 121, 159, 189, 191 - 6, 203, 219, 226, 231, 240, 252 - 5
- history 历史 5, 21, 24, 32, 47 - 9, 57, 60, 78 - 9, 105, 160, 164, 169, 174, 176, 184, 192, 200, 204, 206 - 7, 214, 216, 226

- Howard. E. 霍华德 164, 237, 257
- Hugo. V. 雨果 265
- human nature 人性, 人类 10, 14, 17 - 18, 206 - 12, 213 - 32
- Huntington. S. 亨廷顿 79 - 80
- identity 身份, 同一性 5, 9, 65, 74, 79 - 80, 93, 100, 115, 118, 120 - 1, 154, 169, 194, 235, 246
- ideology 意识形态 4 - 5, 21, 38, 43, 65 - 6, 105, 119, 170, 191, 203
- imagination 想象(力) 48, 64, 116, 130, 155, 158 - 9, 161, 182, 186 - 9, 203 - 6, 208, 214, 218, 224, 226, 233, 236 - 9, 248, 250, 253
-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3, 6, 13, 26 - 30, 53 - 5, 82, 180, 191 - 6
- individual 个人的, 个别的 49, 87 - 8, 91, 99 - 100, 110, 118, 159, 170, 176, 192 - 3, 200, 213, 218, 223 - 4, 231, 234 - 8, 240, 246, 250
- inequality 不平等(参见 poverty) 22, 27, 42 - 3, 68, 73, 81, 91, 115, 122 - 4, 133 - 8, 148, 177 - 81, 185, 199
- regional 区域 42 - 3, 68, 70, 81, 148, 177, 181
- information 信息 34 - 5, 62 - 3, 66 - 7, 236 - 7
- institutions 机构 25, 36, 49, 51, 59, 62, 65, 77, 82, 86, 89, 91, 94, 100, 122, 130, 150, 154, 159, 178, 185 - 8, 192, 203, 207, 209, 222, 240, 242 - 4, 246 - 7
- investment (public) 投资(公共) 124 - 6, 138, 140 - 2, 178
- Jacobs. J. 雅各布 164
- Karatani. M. 卡拉塔尼 200, 230 - 1
- Keynes 凯恩斯 206, 254
- Krier. L. 克里埃 170
- labor 劳动(x) 7, 16, 25, 28 - 9, 32, 35 - 6, 38, 40 - 52, 66, 69, 74, 79, 85, 89, 102 - 17, 120 - 30, 175 - 6, 200 - 2, 249, 251
- market 市场 41, 92, 106 - 10
- process 过程 7, 16, 41, 44 - 5, 51, 58, 102 - 16, 200 - 1, 204, 236 - 7, 241, 249
- wage 工资 37 - 8, 41 - 5
- Le Corbusier 勒·柯布西耶 164, 237
- Lefebvre. H. 列斐伏尔 31, 98, 100, 182 - 3, 186 - 7
- Leibniz 莱布尼兹 200, 212
- Lenin. L. 列宁 6, 36, 49, 54 - 5, 57, 225
- Levins. R. 莱文斯 218, 229
- localities 地方(参见 place) 25, 38 - 9, 49 - 51, 53, 55, 65, 67, 69, 75 - 6, 80, 84 - 5, 109 - 10, 121 - 30, 192, 214, 237, 249
- Locke. J. 洛克 100, 120
- Luxemburg. R. 卢森堡 54 - 5
- Malthus. T. 马尔萨斯 66, 217, 281
- Mandeville. B. 曼德维尔 120 - 17 201
- Mao 毛泽东 6 - 7, 10, 11, 55, 240, 243
- marginality 边缘 74, 124, 148, 170, 193, 221 - 2
- Marin. L. 马林 30, 161, 164, 167 - 8, 188
- market 市场 5, 13, 61, 67 - 8, 108 - 16, 152, 156, 170, 175 - 9, 201, 204 - 5, 210, 236, 250
- free 自由(参见 neoliberalism) 5, 7, 13, 22,

- 28, 43, 66, 68, 70 - 1, 175 - 80, 185 - 6, 192, 214 - 15
- socialism 社会主义 211 - 12
- Marsh. G. 玛什 219 - 20
- Marx. K. 马克思 3 - 8, 11 - 12, 14, 18, 21 - 40, 43 - 5, 48, 52, 55, 59, 66, 70, 82, 86, 94, 98, 101 - 16, 118, 120 - 1, 125 - 6, 129 - 30, 159, 174 - 8, 191, 195, 199 - 207, 212, 216, 218, 225, 227 - 8, 231, 236 - 7, 254 - 5
-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5, 7, 11 - 12, 55 - 60, 62, 82, 86, 225 - 30
- materiality 物质性 21, 42, 5, 52, 178 - 80, 183, 185, 188, 196, 203, 206
- migration 移民 29, 46, 64 - 6, 106, 110, 158, 209, 251
- militant particularism 战斗的特殊主义 55 - 6, 71 - 2, 82, 241 - 4
- money 货币 35 - 6, 58, 73, 108, 156, 160, 205 - 6, 236, 242, 245
- Moody. K. 穆迪 50 - 1
- moral order (ethics) 精神秩序 83, 85 - 6, 93 - 4, 108, 115, 118 - 19, 121, 125, 127, 130, 156 - 7, 160 - 1, 174, 188, 190, 209, 227, 230, 247 - 8, 251
- More. T. 莫尔 156, 159 - 61, 163, 167, 170, 189 - 90, 239, 279, 281
- Moses. R. 摩西 164, 235
- Mumford. L. 芒福德 169, 189
- Munn. N. 芒恩 99, 129
- Naess. A. 奈斯 224, 252
- nation 民族 (参见 state) 25 - 6, 32, 34, 38 - 9, 41 - 2, 50 - 1, 56, 60, 65, 69, 75 - 6, 192, 194, 215, 233, 240 - 1
-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38 - 9, 50, 57, 61, 65, 85, 218, 280
- nature 自然 14, 16, 23, 25, 46, 75, 78, 98 - 9, 129, 175 - 6, 191, 200, 206 - 12, 213 - 32, 237
- needs 需要, 贫困 21 - 2, 107 - 16, 129, 248 - 9
- neighborhoods 邻里 118 - 19, 123 - 5, 164, 171, 177
- neocolonialism 新殖民主义 13, 53, 82
- neoliberalism 新自由主义 (参见 market) 7, 28, 43, 49, 65 - 6, 73 - 4, 81, 90 - 1, 155, 175 - 9, 181, 186, 195, 215, 241
- new urbanism 新城市主义 169 - 73
- Newton. I. 牛顿 10, 182, 199
- Niemeyer. O. 涅梅耶 235, 237
- Nike 耐克 43 - 5, 51, 73, 110
- nostalgia 怀旧 160, 164, 168 - 71, 242
- order 秩序 99, 170, 210
- Orwell. G. 奥威尔 157, 189, 260
- otherness 他性 74, 84, 99, 158, 184 - 5, 213, 218, 224, 244 - 5
- Owen. R. 欧文 173
- Park. R. 帕克 158, 161
- particularity 特性 15 - 16, 35 - 7, 49, 71 - 2, 74, 80 - 1, 83 - 93, 192, 241 - 3, 248
- persons (personal) 人 30, 49, 75, 85, 88, 92, 102 - 3, 106 - 7, 118 - 30, 176, 186 - 7, 234 - 8, 245, 247, 253
- Piercy. M. 皮尔斯 189
- place 地方, 场所 (参见 localities) 30, 40,



- 47, 55-7, 59, 77, 122, 167, 173-4, 179, 181  
-4, 241-3
- Plato 柏拉图 6, 77, 156-7, 200, 254
- Polanyi. K. 波拉尼 176-7, 180
- political action 政治行为 15, 31, 49, 82-3,  
85-6, 113, 118, 126-30, 163, 187, 190, 196,  
208, 217, 222, 232, 234-55
- political conditions 政治状况 3-9, 11, 17-18,  
21, 50-2, 54, 70-2, 193-5
-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 5, 11, 13, 21,  
57, 65, 74, 90, 108, 112, 114, 118, 121-2,  
163, 167, 175, 244
- political projects 政治方案 11, 49, 53-4, 66,  
125, 163, 180, 222-3, 234-55
- possibilities 可能性 (参见 alternatives) 5,  
10, 49, 116, 129-30, 155-6, 159-61, 183,  
187, 189, 192, 195, 199-200, 203, 206,  
208, 212, 231, 237, 243, 246, 255
- 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 10-13, 16, 68, 83  
-4, 169, 225
- poverty 贫穷 (参见 inequality) 42-4, 73,  
122-7, 133-8, 148, 154, 171, 178, 193,  
221, 243
- power 力量, 权力 9-10, 66, 76, 78, 81, 100,  
173, 185, 189, 192-5, 199, 204, 210, 213,  
224, 235, 240, 242, 244, 246
- United States 美国 9-10, 51, 68-9, 86,  
90, 180, 192-6, 246
- primitive accumulation 原始积累 30-3
- production 生产 16, 30, 41, 44-5, 51, 61-4,  
67, 103-6, 108, 112-13, 115, 117, 120, 128,  
148, 154, 221, 223, 236-7, 249
- property 财产 30, 34, 43, 45, 100, 102, 114,  
160, 214, 236, 238-40, 245, 250
- Proudhon, P.-J. 蒲鲁东 35, 86
- race 种族 5, 45, 99, 105-6, 109, 116, 122-4,  
126, 128, 141, 148, 154, 158, 207, 221
- radicalism 激进主义 3-4, 8, 10-11, 53, 187,  
235, 244
- Reagan, R. 里根 156, 176, 192
- reductionism 还原主义 15, 118-19, 208, 226-  
8, 245-6, 253
- region 地域 53, 60-1, 64-5, 67, 69, 74-5,  
78, 92, 114, 189, 192-3, 215, 220
- relations 关系 98-101, 118-20, 226, 234,  
236
- internal 内部 16, 98-101, 113-14, 116, 118,  
210, 224, 229-30
- religion 宗教 5, 40, 45, 85, 116, 125, 127, 154,  
156, 161, 173, 194, 215
- representation 表象 10, 35, 99, 224
- repression 镇压 3-4, 6-7, 10-11, 42, 86,  
157-8, 170, 245
- revitalization 复兴 124, 138, 141, 181
- revolution 革命 6, 21, 24, 28-30, 38, 46, 71,  
81, 86, 91, 102, 111, 129, 170, 174, 186-7,  
193, 203, 206, 238, 240, 243, 252-5
- long 长期 238, 243
- permanent 永久 243
- rights 权利 6, 15, 18, 51, 69, 73-4, 81, 84-  
93, 119-20, 122, 128, 184, 187, 189, 192-3,  
209, 236-7, 239-42, 248-55
- UN Declaration of 世界人权宣言 18, 74, 86-  
93, 248-50
- Robinson, K. 罗宾逊 189-91

- Rouse. J. 劳斯 149, 168  
 59, 62, 75 - 94, 129, 160, 177, 180, 182, 187, 189, 195, 211, 239, 243 - 4, 251
- Saint-Simon. C-H. 圣西门 35 - 6
- Saro-Wiwa. K. 萨鲁-维瓦 89
- scale 规模 (geographical) 25 - 6, 47 - 52, 67, 75 - 7, 157, 181, 192 - 3, 196, 215, 219 - 20, 222, 226, 229, 232 - 4, 236, 239 - 46, 254
- Schaeffer. W. 谢菲尔 154
- science 科学 75, 88, 99 - 101, 104, 206, 214 - 23, 225 - 30, 247
- Scully. V. 斯库里 170 - 1
- Seabrook. J. 西布鲁克 42 - 3
- Smith. A. 斯密 175, 179 - 80, 195
- Smith. N. 史密斯 50
- social control 社会控制 141, 164, 168, 170, 173
- social justice 社会正义 71, 74, 80, 84, 86, 89, 94, 130, 222 - 3, 241 - 2
- social relations 社会关系 21, 48, 68 - 9, 84 - 5, 100 - 1, 105 - 6, 112, 130, 164, 187 - 8, 230, 238
- social struggle 社会斗争 (参见 class struggle) 18, 25, 73 - 6, 83, 91, 104, 113, 120, 178, 186, 189
- socialism 社会主义 6, 21, 31, 37 - 9, 46, 48, 51 - 4, 57, 65 - 6, 71, 80, 83, 114, 203, 205 - 6, 211, 215
- sociobiology 社会生物学 207 - 8, 210 - 11, 226 - 30
- space 空间 9, 14, 23 - 5, 33 - 6, 40, 47 - 51, 55 - 7, 59, 62 - 3, 71, 100, 108, 129, 152, 174, 177, 180, 182 - 5, 187, 193, 196, 200, 204, 209, 211, 229, 240, 249, 255  
 produced 生产的 31, 40, 47 - 51, 54 - 7, 59, 62, 75 - 94, 129, 160, 177, 180, 182, 187, 189, 195, 211, 239, 243 - 4, 251
- spatial fix 空间定位 24 - 31, 48, 54
- spatial form 空间形式 47, 160 - 74, 182 - 3, 185 - 8, 192, 196, 239 - 40, 242 - 3, 253 - 4
- spatial play 空间游戏 161 - 2, 169, 182, 184
- spatiotemporality 时空性 31, 57, 82, 98 - 9, 103, 108 - 9, 110, 113, 130, 182 - 96, 204, 211, 226, 230 - 4, 236 - 8, 243
- species being 类存在物 84, 91, 94, 108, 206 - 12, 213 - 32, 248, 251 - 2
- spectacle 表演 168 - 9
- state 国家 6 - 7, 9, 13, 24 - 7, 32 - 5, 41 - 3, 46, 50 - 1, 56, 59 - 60, 65, 73, 76, 89, 115, 126 - 8, 152, 173 - 5, 178 - 9, 180 - 1, 192, 204, 210, 222, 233, 240 - 2, 214
- Strathern. M. 斯特拉森 99, 101
- suburbs 郊区 8, 138, 141, 152, 154, 158, 168 - 70, 177, 234, 243
- Swyngedouw. E. 斯温格多夫 76, 80
- technology(change) 技术(变革) 6 - 7, 22, 33 - 4, 61 - 3, 75, 79, 98, 104, 111, 160, 167 - 8, 177, 186, 189, 181, 208, 222, 237
- temporality 暂时, 时间性 55, 57 - 60, 109, 160, 174 - 9, 209 - 11, 219, 238
- territorial organization 领土组织 34, 54 - 6, 58, 60, 64 - 5, 75 - 7, 108 - 9, 194, 240, 251
- Thatcher. M. 撒切尔 7, 17, 63, 65, 68, 76, 154, 176, 180, 181, 258
- time 时间 24, 57 - 9, 62, 100, 108 - 9, 160, 182, 185, 193, 196, 211, 229, 237, 240
- trade unions 工会 5 - 6, 25, 37, 50, 125 - 7,

- 176, 186
- transformations 转换 24, 30, 46, 98 - 9, 102, 117, 129, 186 - 7, 180, 203, 206, 210, 212 - 13, 216 - 17, 220, 222, 224, 237, 240 - 1, 244
- translation 翻译, 转化 45, 224 - 5, 233, 240 - 2, 244 - 6
-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运输和通讯 24, 32 - 4, 45, 54, 76 - 7
- unemployment 失业 7, 68, 81, 89, 109 - 10, 148
-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不平衡地理发展 23, 31 - 40, 54, 58, 60, 68 - 71, 73 - 94, 109 - 10, 122, 177 - 9, 181, 193, 195, 211, 220, 222 - 3, 226, 233 - 4, 240, 243 - 4, 251
- Unger. R. 昂格尔 155, 159, 163, 186 - 91, 203 - 4, 209, 250, 252, 258
- unity of knowledge (science) 知识的统一 202, 225 - 30, 233, 248
- universality 普遍性 15 - 16, 35, 49, 55, 72, 74, 79, 81, 83 - 93, 122, 129, 192, 202, 214, 241 - 3, 246 - 55
- urbanization 城市化 (参见 cities) 8, 9, 24 - 5, 36 - 8, 59, 64, 67, 76 - 8, 110, 122 - 30, 133 - 54, 156 - 74, 181, 184, 192 - 3, 201, 222, 237 - 8, 243 - 4
- utopianism 乌托邦理想 10 - 11, 28 - 30, 48 - 9, 68, 74, 84 - 5, 138, 156 - 96, 199 - 201, 206, 231, 238 - 9, 241, 245, 252 - 5
- degenerate 退步的 164 - 8, 181, 195
- dialectical 辩证的 182 - 96, 199, 203, 206, 218, 220, 230 - 2, 240, 243, 246, 252 - 5
- materialized 物化的 163 - 73, 177 - 9, 183, 185, 188, 203
- of process 过程的 49, 173 - 9, 182
- of spatial form 空间形式的 160 - 74, 182 - 8, 192, 196, 200, 238, 242
- spatiotemporal 时空的 182 - 96, 230 - 2, 243, 245, 253
- variable capital 可变资本 102 - 16, 117 - 18, 122, 128, 130
- Von Frisch. K. 冯·弗里希 201
- wages 工资 (参见 labor) 41 - 5, 50, 62, 66, 113, 121 - 30, 160
- living 最低生活 50, 89, 91 - 2, 113, 120, 121 - 30, 249, 251
- White. J. 怀特 223, 244 - 5
- Whitehead. A. 怀特海 218, 230
- Williams. R. 威廉斯 16 - 17, 55 - 7, 71 - 2
- Wilson. E. 威尔逊 202, 213 - 14, 216, 221, 226 - 9, 233
- Wittgenstein. L. 维特根斯坦 10, 225, 230
- women 妇女 7, 14 - 15, 45 - 6, 51, 73, 90, 105, 122 - 3, 126 - 7, 148, 157, 189, 241, 249
- workers 工人 21, 24 - 6, 30, 36 - 40, 41 - 5, 59, 69, 94, 101, 103 - 6, 111 - 16, 120, 161, 170, 201, 206, 222, 233, 249
- workers' organization 工人组织 (参见 trade unions) 27, 36 - 8, 40, 44, 46, 56, 71, 90, 125 - 30
- world market 世界市场 (参见 globalization) 23 - 40, 42 - 5, 54 - 72, 108
- Wright. F. 莱特 164

Zapatistas 萨帕特党人 73-4,77,80,85,88

Zeldin, T. 泽尔丁 245

Zola, E. 左拉 205-6,214,254

## 译 后 记

尽管这本书的翻译工作陆陆续续地进行了好几年,但还是存在着许多不尽意的地方。为了尽量减少可能出现的人为阅读障碍,利用“译后记”对一些重要术语的翻译做点说明。

### (1) 有关空间结构变化的术语。

空间生产分析的重点之一在于地理景观的变迁,而在表述这种变迁时,哈维使用了多个术语。它们包括,地理重组(geographical reorganization)、地理重构(geographical restructure)、地理的重新安排(geographical reordering)、地理重塑(geographical reconfiguration)等,加之 configuration、formation、shaping 等,情况更加复杂。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尽可能照顾到用语的差异,但是我们并不主张把研究的焦点放在这些近义词的细微差别上。事实上,它们之间差别的修辞意义,在中文语境中亦是理解的。所有这些术语,突出的都是结构变化和主体活动之间的关系,虽然不少术语如 shaping、formation 同样突出了景观面貌方面的内容。

### (2) 有关空间规模和环境方面的术语。

空间规模(spatial scale)区分以及不同规模之间的转换和相互影响,是不平衡发展地理学的焦点问题。就规模来说,哈维并没有十分严格地区分出一个等级制的规模表,而灵活地讨论家庭(family)、邻里(neighborhood,即社区)、城市(city)、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全球(the global)等这些地理规模,以及阶级(class)、地方(locality, place)等这些社会空间的规模,甚至身体(body)也是一种空间规模(最小的单元)。这种讨论集中体现了历史—地理思想。由于这些不同规模的空间都同时是人类的直接生存环境,他亦使用了诸如小生境(niche)、生活环境(habitation)等这些具有细微差别的术语。

### (3) 空间定位(spatial fix)。

哈维对这个术语没有专门定义,它指资本主义空间得以稳定的某种机制,它表现为克服既有空间内在矛盾的某个外部空间乌托邦,因此,资本主义的空间定位总是与地理扩张联系在一起,而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总是依据乌托邦想象。

#### (4) 翻译(translation)

在哈维的使用中,作为专有名词的 translation 已经充分包含话语政治学的成果。像库恩把翻译作为解决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le)那样,他把 translation 作为不同话语(不同地理规模、不同文化、不同结构)之间的沟通机制,以期压抑源自具体起源的特殊性并因而获得普遍性。在这一意义上,他要求当代激进政治学把特殊要求和普遍权利结合起来,以获得广泛的基础从而产生现实的影响。所以,translation 在大多数时候可以统译“翻译”,我们也有意这样做。但是考虑中文习惯,我们还是依据对象采取了较灵活的译法。例如,在不同结构和规模之间,便用“转化”或“转换”。

#### (5) Project

Project,一般依语境译成“计划”、“方案”或“事业”。例如 hegemonic class project,我们统一译为方案,以与替代方案(alternative)对应。在这一意义上,共产主义或其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都从属于替代方案。

#### (6) 类和类存在物(species, species being)

“类存在物”这个术语,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广泛地使用,但他是在社会义上来使用这个概念的。因此,他的“类”概念与费尔巴哈从自然基础来谈论的“类”概念就有很明显的差异。在哈维这里,“类”概念直接源自马克思,但他明显地是从自然基础来谈论的,人作为“类存在”,只是生物物种之一。因此,在谈及 species interest 等问题时,我仍然将其译为“物种”。

#### (7) 嵌入性(embeddedness)

如果按照一般的含义来翻译以 embed 作为词根的术语,可能会带来理解上的困难并产生一定的歧义,但是这些已经在社会理论中较为广泛使用的术语,一时还找不到对应的中文。我们只是以尽可能接近该术语标准含义的方式来翻译,以不至于离题太远。这里,对这几个相关术语略加辨识。Embed 的基本含义是“插入”和“嵌入”,社会理论使用它以及由此演化出来的形容词 embedded 和名词 embeddedness,主要是指个体在社会中的被动性或对社会的依赖,其直接的意义倒与海德格尔的“被抛”接近。因此,它的否定形式 disembedded 便是指个人从对具体时空背景的依赖性中解脱出来。

#### (8) 想象/想象力(imagination)

作为哈维使用的一个高频词,imagination 这个词源自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sociological imagination),这一点他在《社会正义与城市》(1973

年)中专门谈过。在那本著作中,他要求发展一种“地理学想象力”(geographical imagination)。而在《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和《希望的空间》中,大量的imagination也来指称特定的知识成果,因此也译为“想象”。

(9) 异托邦(heterotopia)

Heterotopia 这个词的传播和产生影响主要是福柯的功劳,但这个词不好译,在福柯的翻译中一般被译为“异位空间”或“差异地点”。福柯使用这个词时,他自己交待,是按照 utopia 构造的,也是指一种空间。如果说 utopia 是指一个不存在的空间(u-topia),那么异托邦便是指一个不同的空间(hetero-topia),它们都是一种空间(topia)。从构词法角度,我将之译为异托邦以示简洁。在福柯那里,异托邦之“不同”是指与它所反映的空间的差异,哈维沿袭了这一用法。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杨乔喻翻译了第一章的初稿,对此十分感谢。同时,真诚感谢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南京大学出版社胡豪副总编、黄继东主任、施敏老师、董颖老师和蒋桂琴老师。

译 者

2005. 8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导言

第1章 一代人制造的差异

第一部分 不平衡的地理发展

第2章 《共产党宣言》的地理学

第3章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插图一览表

图3.1 1792—1992年“巴尔的摩”这个地方的变化规模

第4章 当代全球化

第5章 不平衡地理发展和普遍权利

第二部分 全球空间中的身体和政治人

第6章 作为积累策略的身体

第7章 身体政治学与争取最低生活工资的斗争

第三部分 乌托邦机遇

第8章 乌托邦的空间

图8.1 放弃城市：巴尔的摩市的住宅

图8.2 城市中的施舍处：巴尔的摩市中心“我们每日的面包”

图8.3 城市中的贫穷：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阴暗面

图8.4 资产阶级乌托邦：郊区的蔓生

图8.5 开发商的乌托邦：巴尔的摩的内港恢复

图8.6 城市中的公共投资：为富人们建造的体育馆和会议中心

图8.7 政府补助和私人收益：海港风景的故事

图8.8 城市中的退步乌托邦——作为商品的景观

图8.9 城市中的退步乌托邦——马里兰科学中心的景观和

社会控制

图8.10 雅皮乌托邦：巴尔的摩市坎顿行政区内的绅士化和复兴

图8.11 给穷人提供新房子

图8.12 邻里的复兴：沙城 - 温切斯特与詹姆斯·劳斯的悖论

图8.13 巴尔的摩的非工业化

图8.15 私托邦：巴尔的摩的门控社区

图8.14 临时工

图8.16 城市中的公共投资：为穷人而建的改造机构（门控



社区)

图 8 . 1 7 理想城市的景象：来自于巴尔的摩沃特斯艺术画廊

图 8 . 1 8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空间游戏中的一种运用

图 8 . 1 9 为罗伯特·欧文的新哈莫尼而做的设计图

图 8 . 2 0 傅立叶的理想城市

图 8 . 2 1 爱德华·查姆布莱斯：公路城镇

图 8 . 2 2 埃比尼泽·霍华德：从空间理想到新城镇

图 8 . 2 3 柯布西耶的理想城市梦想：理论和实践

图 8 . 2 4 弗兰克·劳埃德·莱特的 Broadacre 城规划

图 8 . 2 5 乌托邦怀旧心理：多塞特的庞德伯瑞

图 8 . 2 6 乌托邦怀旧心理：马里兰州肯特兰兹商业化的新城市生活

第 9 章 辩证乌托邦理想

第四部分 有关多元替代方案的谈话

第 1 0 章 建筑师、蜜蜂和“类存在物”

第 1 1 章 对自然和人类的责任

第 1 2 章 行动中的反叛建筑师

附录：埃迪里亚 ( E d i l i a ) ，或者“使它成为你愿意的那样”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